

华中解放区 干部教育史

夏征农 



林子秋编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一青

封面设计：朱吟秋 俞水清

责任校对：龚秀华

ISBN 7-80199-583-X



9 787801 995834 >

ISBN 7-80199-583-X

定价：25.00元

2005 年度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资助项目

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

林子秋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林子秋主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 10

ISBN 7—80199—583—X

I. 华… II. 林… III. 解放区—干部教育—历史
—中国 IV. K26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0607 号

书 名：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

主 编：林子秋

责任编辑：一 青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10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苏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148mm×210mm

字 数：309 千字

印 张：12.25 0.75 印张插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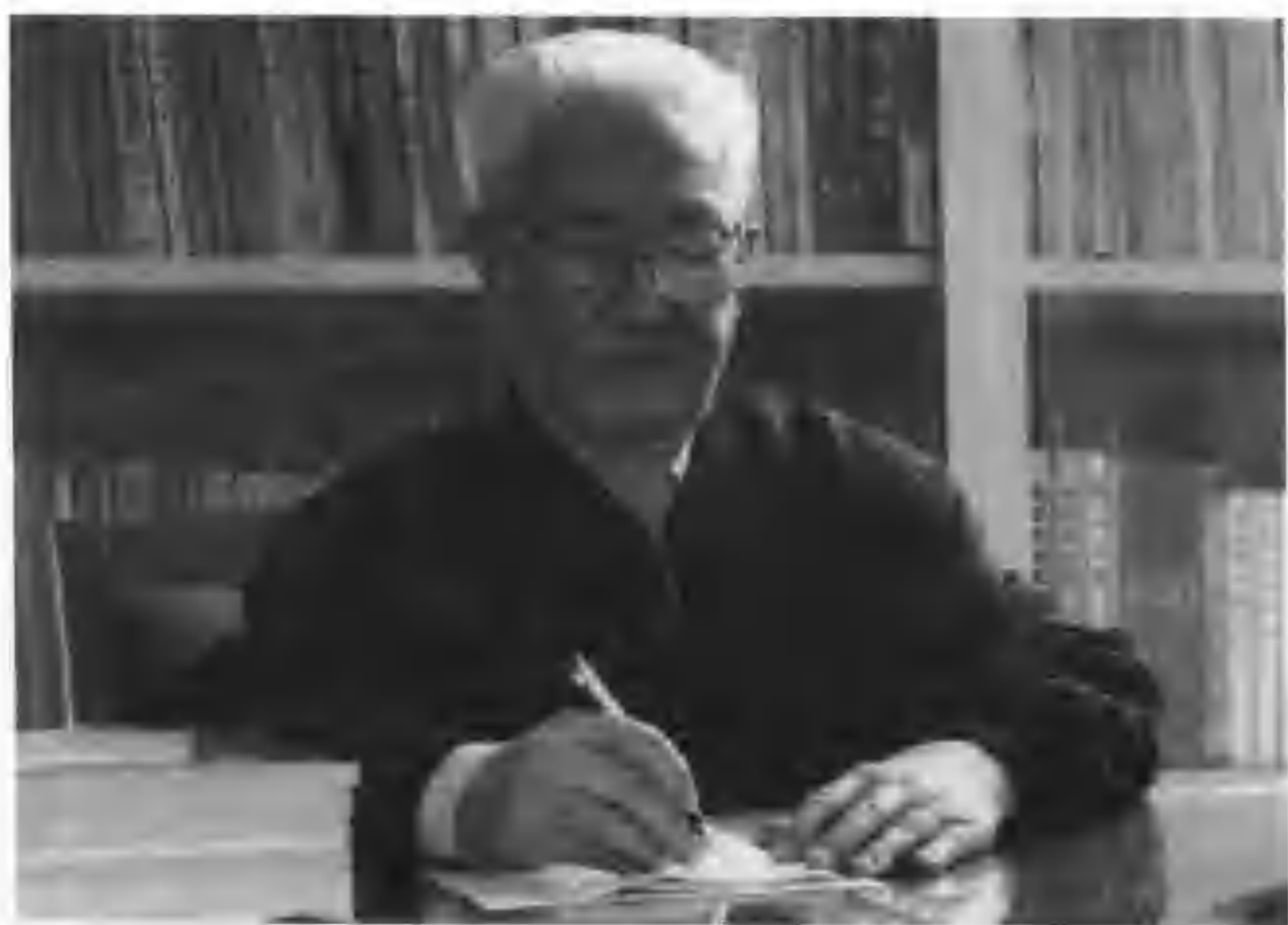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99—583—X

定 价：26.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82517249、82517244



作者简介：林子秋，江苏省东台人。1924年生。194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7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师训部哲学专业毕业。长期从事宣传理论教育工作。曾在华中大学、江苏省行政干部学校和干部政治学校任教学工作。盐城地、市委宣传部任理论教育工作。1989年任盐城地、市委党校副校长、副书记（主持工作），兼任盐城市干部学校校长。职称：教授。曾兼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理事、盐城市社科联副主席（主持工作）和《黄海学坛》主编。主要著述有：编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课题《江苏盐城沿海经济开发研究》和“八五”规划课题《王艮与泰州学派》，均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先后在全国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

勇敢 坚定 沉着
向斗争中学习 智为
民族解放事业 献身
时 半俯 牺牲自己的一
切！

向序东

為正義，為自由，為
民族的真正社會的解
放而戰鬥到底！

劉少奇題

永遠跟着共產黨
走，為全世界的解放而
奮鬥，有一分力量，盡
一分力量，不避艱險，
不畏強敵，陳毅

华中抗日革命熔炉

李先念

一九四二年二月廿八日



2005年8月作者与百岁老人夏征农同志合影



华中大学主持工作的教育长董希白（中），副教育长吴天石（右），二部主任王伟平（左）



1986年6月，管文蔚发起召开的华中解放区部分干部学校校史讨论会合影。前排自右向左为张子嘉、肖本业、王韦平、周一峰、管文蔚、王一香、鲍汗青、冒进、周蒙。后排由右向左第八人是作者



1986年6月参加《苏中公学校史》审稿会议的原苏公领导人管文蔚（中）、夏征农（右二）、张藩（左二）、余伯由（左一）、周蔚昌（右一）同志



1944年5月，夏征农、吴天石、吴森亚、吴镇等同志在苏公开学前合影于金吾庄



1998年在纪念华中大学五十周年时作者与原华中大学教育长董希白的夫人陆明及张铠等部分师生合影



列队训练



上军事课



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在济南时的校门



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学员在上课——门板暂作黑板用



刘少奇在华中党校讲课



陈毅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



新四军教导队女生就餐前(美记者史沫特莱摄于云岭村)



新四军教导队女生在野外上课



华东军大学员在听报告



合唱队在练唱



学员们在小组讨论会上



学员们在劳动



苏中公学前线剧团演出《甲申记》



《甲申记》中陈均饰园园 茹志娟饰长平公主



盐城中学正北楼，刘少奇、陈毅曾住过



1941年鲁艺华中分院旧址



出席华中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校友和盐城市领导同志合影



1986年参与编写华中干部学校校史时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右起第一人为华中大学一部主任汉青、第二人为二部主任王韦平、第三人为江苏省干部政治学校副校长张锴。后排右起第二人为苏南公学校委,江苏省干部文化学校校长张子嘉,第四人为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胃进,二排中间为作者

序 言

夏征农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从十年内战时期算起，有着20多年的光荣历史，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也有10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干部教育的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这些珍贵的干部教育史料进行认真的整理和研究，从中吸取至今仍有现实意义的干部教育经验，以促进我国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仍有重要的意义。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既借鉴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经验，又在新的干部教育的实践中有所创造和发展。所以它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比较符合实际，因而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学校，继承和发扬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到处生气勃勃，意气风发，既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又有高度的集中和纪律。物质生活虽然艰苦，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和集体英雄主义。

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的教学内容，根据不同对象，结合当时的形势和任务，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和人生观、世界观教育、革命形势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使学员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教育中思想上起到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走上了为革命而奋斗终生的道路。

毛泽东同志曾经对抗大说过这样一句话：“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这是一条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行之有效的干部教育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学员，以强烈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四面八方来的有着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志趣的青年引上革命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干部学校的工作人员对学员生活上关心体贴，思想上耐心开导。他们既言传又身教，要学员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做学员的表率，有这样一支干部队伍，这是办好干部学校的关键。

从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革命大熔炉中出去的学员，不论是在对日寇浴血奋战的时刻，还是在硝烟弥漫的反对蒋军大举进攻的艰难岁月里，也不论是在革命战争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能够坚持立场，坚持信念，经受住各种考验，为革命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些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的历史功绩是应该肯定的。

这本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记录了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极其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里进行干部教育的艰难英勇事迹。本书的出版，历史地回顾、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工作经验，为开展干部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同时，也将有助于继承、发扬老解放区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学习老解放区干部教育工作者排除万难、忠诚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革命精神，为更好地做好新时期的干部教育工作而奋斗。

林子秋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长期从事干部教育工作。他经过多方搜集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资料，编写了这部《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对于今天从事干部教育工作的同志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启示作用。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华中解放区的建立概况和干部学校的发展过程	1
一、华中解放区的建立和发展概况	1
二、抗日战争时期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建立与 发展过程	6
(一)华中解放区的建立与发展急需大量干部	6
(二)华中解放区培养干部的有力条件	10
(三)大力创办各类干部学校积极培养干部	11
三、解放战争时期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的发展变化	19
第二章 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是党的干部教育优良传统的 继承和发展	31
一、重视党的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31
(一)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学校	31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干部学校	34
(三)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学校	35
(四)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学校	38
二、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是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 发展	42
第三章 华中解放区军事干部学校	45
一、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分校	45
(一)皖南教导总队	45

(二)华中抗大五分校和抗大总分校	53
(三)四师抗大四分校	57
(四)二师抗大八分校	59
(五)一师抗大九分校	61
(六)五师抗大十分校	66
(七)七师抗大十分校	69
(八)三师抗大五分校	71
二、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分校的教育方针、内容、 方法和校风	72
(一)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分校的教育方针	72
(二)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分校的教育内容	75
(三)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分校的教学方法	79
(四)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分校的优良校风	84
三、华东军政大学	90
第四章 华中解放区党校	94
一、华中局党校	94
二、华中工委党校	107
三、苏中区党委党校	113
四、苏南区党委党校	115
五、淮南区党委党校	116
六、盐阜区党委党校	116
七、解放初期的苏南、苏北区党委党校	120
第五章 华中解放区行政干部学校	123
一、苏中行政学院	123
二、苏中公学	125
三、华中建设大学	134
四、苏公分校	149
五、江海公学	152

六、盐阜行政学院	156
七、淮海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157
八、苏北公学	159
九、苏北青年干部训练班	161
十、淮南行政学院	162
十一、淮南公学	165
十二、洪山公学	166
十三、鄂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	169
十四、建国公学	172
十五、鄂东公学	173
十六、鄂豫皖军政大学	174
十七、中原民主建国大学	175
十八、鄂豫公学	176
十九、湖北人民革命大学	177
二十、江汉公学	178
二十一、襄南公学	179
二十二、中原大学	179
二十三、苏浙公学	180
二十四、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182
二十五、苏皖边区行政干部学校	183
二十六、华中公学	184
二十七、华中大学	191
二十八、苏南公学	200
二十九、苏北建设学校	208
三十、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210
第六章 华中解放区专业干部学校	217
一、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	217
二、江淮大学	223

三、南通学院	229
四、华中卫生学校	230
五、华中军医学校和白求恩医学院	232
六、淮南新医进修班	236
七、浙东鲁迅学院	242
八、华中新闻专科学校	244
九、淮南艺术专门学校	248
十、苏中四分区专门学校	250
十一、苏中一分区建设专门学校	252
十二、苏中三分区联合专门学校	253
十三、苏皖边区财经干部学校	254
十四、苏皖边区教育学院	255
第七章 华中解放区中等学校	257
一、苏中四分区联合中学	260
二、界首乡村师范学校	264
三、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联合中学	266
四、盐阜联立中学	268
五、盐阜联立第二中学	270
六、盐阜师范学校	272
七、淮涟中学	273
八、淮海区第二中学	276
九、淮南联合中学	278
十、淮北中学	281
十一、邳睢铜灵联合中学	283
十二、淮宝中学	285
十三、沐宿海抗日中学	287
十四、东灌沐边区中学	293
十五、青少年干校 一新安旅行团	296

第八章 华中解放区在职干部教育	300
一、在职干部教育的重要意义	300
二、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	301
三、在职干部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302
第九章 华中解放区基层干部教育	307
一、苏中地区的基层干部教育	309
二、苏北地区的基层干部教育	311
三、培训基层干部的形式和方法	313
第十章 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	316
一、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刘少奇干部教育 思想的出发点	320
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干部,是刘少奇干部 教育思想的中心内容	322
三、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锻炼,是刘少奇干部 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324
四、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克服党内不良倾向,是刘少奇 干部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329
五、用党的战略与策略教育干部,是刘少奇干部教育 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331
六、教育党员干部发扬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是刘少奇 干部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334
第十一章 陈毅的干部教育思想	340
一、为建设正规化党军而斗争是陈毅干部教育思想的 出发点	341
二、加强军队干部的党性教育,提高干部服从党的 自觉性,是陈毅干部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344
三、加强部队的整训和学习,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是陈毅干部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346

四、加强军队在职干部的业务教育和文化教育,全面提高军队的素质,是陈毅干部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349
五、大力培养和提拔非党干部,是陈毅干部教育思想的内容之一	350
六、努力办好抗大,大力培训军队干部,是陈毅干部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352
(一)抗大的性质和任务	353
(二)抗大的教学方针	354
(三)抗大的教学内容	356
(四)抗大的教学方法	357
(五)抗大的革命校风	359
第十二章 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365
一、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基本特点	365
二、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历史地位	371
主要参考文献	378
后 记	380

第一章 华中解放区的建立概况 和干部学校的发展过程

这里所说的华中解放区的含义，既包括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挺进华中敌后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也包括解放战争中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的解放区。抗日根据地实质上也是解放区。所以，这里说的华中解放区是华中抗日根据地和华中解放区的统称。这两个时期长达近 12 年，中间虽有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实际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在这两个时期中的华中解放区创办了大批干部学校，培养了 20 多万军队和地方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在分别对抗战时期的华中解放区和解放战争时期华中解放区的建立与发展概况以及干部学校的创建过程做概括的介绍：

一、华中解放区的建立和发展概况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过共产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国共两党达成协议，把闽、粤、湘、浙、赣、鄂、豫、皖 8 省 14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开赴大江南北对日作战。这是继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又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国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

平为政治部主任。

新四军组建后,于1938年4月5日由江西南昌移驻皖南歙县岩寺后,迅速整编各游击区来的队伍,组成了一支统一的抗日武装。1938年1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核定新四军编制为四个支队,并任命了各支队的司令员。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傅秋涛任副司令。有兵员3000人。张鼎丞任第二支队司令,谭震林任副司令。有兵员1200人。张云逸任第三支队司令,有兵员2000余人。高敬亭任第四支队司令,有兵员1800余人。到1938年4月,全军已集中10329人,枪支6200支。这支队伍虽然人数不多,装备落后,但他们是经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磨炼和考验而保存下来的精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中成为在华中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8年9月29日至10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全会决定:共产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全会确定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华中的战略地位。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①1940年5月5日,毛泽东、王稼祥又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将领,指出:“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抗日根据地。”^②于是发展华中,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是新四军的战略任务,而且成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共同的战略任务。

^{①②} 《新四军·文献》第126,684、689—690页。

1939年2月,周恩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时,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①“向东作战”,就是要新四军向南京、上海之间敌后地区出击,造成巨大的国际影响。“向北发展”,就是要新四军多抽部队过江,加强江北部队的领导,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抗日根据地。

按照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在陈毅、张鼎丞的率领下,向苏南敌后挺进。1938年4月28日,以粟裕率领的1000多人的先遣队进入苏南敌后南陵。6月1日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一、二团离南陵东进,6月14日到达茅山地区。新四军挺进苏南后约两个月,经过大小战斗百余次胜利,开辟了茅山抗日根据地。并把地方游击队扩大为四个支队(团),番号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为司令员,郭猛为政治部主任,张震东为参谋长。新四军第一支队第六团在叶飞领导下向东进军,一直打到上海郊区,火烧虹桥机场。经过艰苦战斗,创建了苏(州)常(熟)太(仓)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初,挺纵一支队由张震东、郭猛率领收复扬中。11月经扬中北上,进入运河以西的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活动。另一路是1939年4月25日叶挺率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第一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新四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等一批干部突破日军长江的封锁线,于5月6日到达庐江东汤池与张云逸会合,组成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率领下,于5月东进皖中,在安(庆)合(肥)沿线开展抗日斗争,创建了皖中游击根据地。7月,新四军第五支队在罗炳辉领导下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彭雪枫率领下,于10月东进豫皖边,创建了豫东游击根据地。1940年1月上旬,豫鄂挺进中队成立,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朱理治,下辖五个团,

^① 《新四军·文献》第141页。

三个中队,约 9000 余人,建立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江北总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徐海东,率领所属部队在皖东地区经过反复战斗,建立了津浦铁路西线和东线的抗日根据地。

1940 年 5 月,陈毅、粟裕率领江南新四军向江北进军,先由叶飞率领的挺进纵队过江到江都吴家桥地区占领郭村,然后继续东进,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成立了以管文蔚为主任的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随后,新四军部队继续北上,与黄克诚率领的南下八路军在东台以北的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开辟了苏中与苏北抗日根据地,为建立华中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新局面。

至此,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开辟的抗日根据地计有:苏南茅山根据地、路东和丹北游击根据地、津浦路西和路东根据地、皖中根据地、豫皖苏边区和皖东北根据地、豫鄂边区根据地、苏北淮海、盐阜根据地和苏中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总面积达 4.4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1500 万,占敌后地区人口的三分之一。建立了 42 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和一些地区性的政权机关,出现了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

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新四军的队伍也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从皖南出动时,人只有 1 万左右,枪不足 7000,在开辟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不断扩大武装,使新四军由开始的零星的游击队伍,逐步发展成为正规的游击兵团。在八路军一部的加强下,到 1940 年底,新四军部队发展到近 9 万人,其中皖南军部和第三支队 10770 人,苏北指挥部 12000 人,江南指挥部 3500 人,江北指挥部 18800 人,八路军第四纵队 13489 人,八路军第五纵队 18185 人,豫鄂挺进纵队 12000 余人,此外,还有地方武装和不脱离生产自卫武装数十万人。

1940 年 11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任总指挥,在叶挺过江前,陈毅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为政委。

1941年1月,国民党军队包围袭击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项英牺牲,叶挺被俘。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以后,将遍布大江南北的9万余人统一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

第一师,由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编成。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全师1.2万余人。第一师活动于东濒黄海、西抵京杭大运河、南濒长江、北至淮安、大冈、斗龙港一线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二师,由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所属部队编成。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参谋长周骏鸣,政治部主任郭述申(未到职)。全师1.5万余人。第二师活动于东起运河,西至淮南铁路、北临淮河,南濒长江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三师,由原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文玉(吴法宪)。全师2万余人,第三师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淮安、大冈、斗龙港以北,东濒黄海,西至运河的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四师,由原八路军第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全师1.5万余人。第四师活动于陇海铁路以南,淮河以北,新黄河以东,运河以西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五师,由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刘少卿,政治部主任任质斌。全师1.4万余人。第五师活动于武汉四周,地跨鄂、豫、皖、湘、赣5省边区。

第六师,由原在江南的新四军第二、三支队编成。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义。全师6000余人。第六师活动于西起

南京、芜湖、东至淞沪、北濒长江，南抵天目山麓的苏南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七师，由新四军无为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挺进团及皖南突围出来的部队合编而成。师长张鼎丞（未到职），政治委员曾希圣，参谋长李志高，政治部主任何伟。全师近 3000 人。第七师活动于东起江浦，西到岳西、宿松，南至太中、旌德，北临合肥，长江横贯其中的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

独立旅，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编成。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全旅 4000 余人。该旅主要活动于淮海区与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接合部。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新四军军部的重建，以及各师的整编，使华中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局面。华中解放区各个方面的建设任务也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不仅需要扩大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而且需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建设工作。这就迫切需提高原有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更要大量吸收和培养各个方面的新干部，以适应解放区建设的需要。因此，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培养各方面的干部，就成为华中解放区党政军的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成为革命链条中的一个决定性环节。

二、抗日战争时期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建立与发展过程

（一）华中解放区的建立与发展急需大量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干部教育工作放到重要的战略地位。毛泽东早在 1938 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指出：“指导伟

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又说:“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①他还说:“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②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又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广大地培养人材。……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③1936年毛泽东在给抗大的指示中说:“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强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④为了培养大量干部,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干部。1939年12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说:“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⑤1940年在《论政策》中又指出:“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使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

① 1938年《论新阶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③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618—61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毛泽东对抗大的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4期。

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①

新四军进入华中地区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初期,刘少奇和陈毅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结合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具体情况,积极筹办各类干部学校,培养各类干部,把它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

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建立之初,不论军队和地方都急需大量干部,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1. 从军队建设来看,迫切需要培养军队的军事政治干部。新四军不仅需要继续扩大,而且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也亟待提高。新四军最初是由江南八省游击队经过集中整编组成的。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坚决勇敢。但他们文化水平低,长期处于反“围剿”斗争的环境中,没有时间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对理论和政策知之甚少。在军事上虽然身经百战,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但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斗争的战略战术懂得很少。他们习惯于游击生活,习惯于打山地游击战,不善于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争。因此,军事、政治和思想素质都有待提高。要使部队从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转变,需要有一个教育转变过程。而转变的关键在于教育培训军队的干部,特别是教育培训军队的中下层干部。对他们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进行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教育,提高他们的军事、政治和思想素质,才能适应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而且随着军队的扩大和新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还要不断地扩大干部培训基地和培训规模,以适应抗日战争形势和军队建设的需要。

2. 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来看,迫切需要培养造就大批地方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8—7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政干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方政权是“白手起家”的,是随着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逐步建立起来的。军队打到哪里,地方政权就建立到哪里。而建立地方政权需要大批懂政策会领导的党政领导干部和中下层干部。加之,抗日民主政权是在敌伪顽所占领的地方夹缝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新建立的地方政权,任务十分繁重,既要放手发动基层群众,争取团结地方的上层民主人士,又要发动组织群众维护地方治安,开展对敌斗争。抗日根据地的广大群众对党的政策不了解,存在观望态度,需要干部去宣传发动。筹粮筹款,保证党政军的后勤供应,也需要干部去完成。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发展都需要干部去组织和推动。可是,根据地的创建初期,干部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迫切需要创办各类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政策的干部来充实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及基层政权,以适应根据地各项事业发展的需要。

3. 从党的建设来看,迫切需要提高党员干部的党的观念,增强组织纪律性。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前,在苏中、苏北等地区虽然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但为数很少。在新四军进入华中地区建立根据地以后,在广泛发动群众的过程中才逐步发展新党员,建立起党的地方组织。这些新入党的党员对党的基础知识了解很少,党的组织观念和党的作风更是不甚了了。就是担任县、区、乡领导的党员干部,多数对于党的基本知识和党性修养也缺乏深刻的了解。至于军队的党员干部由于战斗频繁,没有机会学习,党的基础知识和党性修养的知识都很缺乏。因此,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培训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增强党的观念和加强党性修养,就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1. 从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来看,迫切需要培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各个方面的专业干部。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是一个系

统工程,不仅是党政军的建设,而且还包括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卫生以及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的建设,需要各种类型、各个方面的专业干部,而这些干部是不可能自发产生的,只有通过开办各类专业干部学校进行培养教育,才能满足各方面对干部的需要。

(二)华中解放区培养干部的有力条件

华中抗日根据地不仅有培养各类干部的迫切需求,而且也具有得天独厚的培养造就各类干部的有利条件。华中地区是邻接京、沪、杭这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区,人民的文化水平较高,知识分子较多,干部的后备资源较丰富。这个特殊的优势是其他抗日根据地所没有的。被日寇占领下的宁、沪、杭等大中城市中的知识青年不愿在日寇统治下生活,纷纷离开城市到抗日根据地来参加抗日斗争,也有少数人跑到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去。就是长江以北的苏中、苏北等地区,文化教育也较发达,知识分子也较多,很多知识青年因战争使学校停办而失学在家。他们看到日寇铁蹄蹂躏下的中国,爱国热情高涨;又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所以他们愿意投奔到抗日队伍中来。这都说明华中地区干部的后备资源是比较充足的,这是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培养各类干部的有利条件。只要我们通过开办各类干部学校,进行短期培训,完全有可能培养造就各种类型的干部,以适应抗日战争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培养干部仅有生源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支德才兼备的师资队伍。只有好的师资,才能培养出好的学生。华中抗日根据地由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仅有众多的生源,而且有高素质的师源。宁、沪、杭地区是人才荟萃之地,著名的专家学者众多。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等城市沦陷,许多文化教育界人士离开沦陷区,有的跑到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去,有的到延安,有的到香港,也有一些

人留在沦陷区。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以后,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只要我们通过各种关系进行动员争取,许多专家学者是完全有可能来解放区的,创办各类干部学校的师资问题是完全可能解决的。

以刘少奇、陈毅为首的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正是看到了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又看到创办干部学校的有利条件,在新四军到达盐城前后就把创办各类干部学校提上了重要议事日程,积极筹办各类干部学校。

(三)大力创办各类干部学校积极培养干部

刘少奇、陈毅到达苏北不久,在黄桥战役胜利以后,1940年11月11日刘少奇和赖传珠到达海安,与陈毅、粟裕等研究如何建立与巩固华中抗日根据地问题时,就研究了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筹办干部学校的问题。刘少奇、陈毅在听了一些文化界人士丘东平、陈岛、刘保罗等人的意见后,决定创办一所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陈毅还邀请刚从上海来海安的文化界人士许幸之商谈筹建鲁艺问题。刘少奇从海安到盐城后,于1941年1月下旬,主持召开华中局会议,讨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决定创办干部学校,培训大批干部,以适应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需要。并成立华中局文教委员会,由彭康、孙冶方、薛暮桥、钱俊瑞、戴伯韬等人组成。会后,刘少奇找冯定、孟波等同志谈话。刘少奇说:“我们党的事业在苏北又有一个人发展。需要培养很多干部,现在要办抗大,马上还要办党校,还要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并要他们着手筹办。

刘少奇、陈毅为了创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反复考虑院长人选问题,觉得邀请鲁迅夫人许广平前来任院长比较合适。他们在海安时就请刚来苏北不久的剧作家、美术家许幸之前往上海邀请许广平和文学家王任叔(巴人)、社会科学家李平心来盐城。陈

毅以“陈仲弘”的署名分别写了三封信给许幸之带去。后因许广平正全身心地编辑《鲁迅全集》，加上儿子海婴正在治病，无法前来苏北“鲁艺”工作。王任叔和李平心也各有原因不能离开上海来苏北。他们三人虽未能成行，却动员了20多个进步青年前来苏北参加学习和工作。

为了解决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干部学校的领导干部和师资问题，从中央到华中局、军部领导同志都亲自出马，采取各种措施动员文化、教育、医务等专家学者来华中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化、教育、卫生工作及其他工作。

首先，中央领导关心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工作。除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发了一系列指示以外，有些中央领导同志，还指示和帮助动员专家学者来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例如，毛泽东1941年1月14日发给在重庆的周恩来与叶剑英的电报是这样说的：“……请你们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亦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麟、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征求他们对苏北问题的意见，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①

又如周恩来在新四军组建之初，在江西遇到回乡探亲的医学界知名人士戴济民，亲自邀请他到新四军工作，先任新四军军医处副处长，后任军卫生部副部长，兼任后方医院院长。在他的主持下创办了军医学校，培养了大量医务人员。又如吕振羽，是著名历史学家，湖南武冈人，1928年在北平民国大学任教。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筹办塘田战时讲学院，任副院长兼党代表。1939年赴重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及文化委员会

^① 《中共统一战线文件汇编》，第475—476页。

工作,兼任复旦大学教授。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决定派吕振羽来华中抗日根据地,化名柳岗。他的夫人王叶真,是民国大学的高才生,到苏北后化名江明。他们到盐城后,刘少奇、陈毅决定将吕振羽分配到华中党校任教。他在党校主讲《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

再如,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原名薛芎果,曾用名宋亮,无锡人。192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40年秋天,他到重庆,准备赴延安。后来周恩来要他到华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夏到达盐城。刘少奇先是留他在华中局任教育科长,不久就调他到华中党校去教授马列主义理论课,并兼任党校教育科长。

其次,中央军委大力支持和帮助新四军培训干部。早在新四军建军之初,军部在皖南创办教导队(后改为教导总队)时,中央军委特从华北抗大总校派了一批干部来皖南帮助教导总队培训干部。教导总队的负责人周子昆、教育长冯达飞,教导员谢祥军、贺敏学、刘文学、程业堂,以及担任队长、指导员的杜屏、周星五、于晶等同志都是由抗大总校派来的,他们在培养军队干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6月,抗大总校也曾派遣一个华中大队到淮北地区帮助新四军第六支队创办了抗大四分校。1940年11月新四军在盐城创办抗大五分校不久,1941年6月,华北抗大总校又派来由洪学智同志率领的华中大队到达盐城,加强抗大五分校,洪学智任抗大五分校副校长。

再次,是华中局和新四军的领导人,积极采取措施向全国各地招揽人才。他们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多种办法,利用朋友熟人的关系等办法招揽各种人才。比如新四军组建之初,医务人员特别是高级医务人才奇缺,创办卫生学校更为困难。1937年叶挺在赴武汉就任新四军军长时,途经上海特地邀请著名的医学博士沈其震到汉口军部,任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是湖南人,青年时期即倾

向革命。1925年在广州结识了叶挺。随后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医科,1930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沈其震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以后,又通过各种关系动员各地医务人员来军部。他从过去的导师中国红十字会的林可胜提供的高级医务人员名单中,亲自派人前往上海等地动员著名的上海医学院和沈阳盛京医科大学毕业的医学界知名人士王聿先、吴之理、章央芬、宫乃泉、崔义田、齐仲桓、王雨田等一批著名医生来皖南军部。同时又动员了一批从中央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毕业的郑素文、薛和、赵国宝、唐球、戴锡彤、程风琴、马万芬、宋文静、朱士荣等一批护士和南京鼓楼医院来的化验师李启宇等来解放区。后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以后,又通过上海地下党动员组织上海宝隆、仁济、同仁、广仁等医院及华美、华洋等药房医药人员来苏北工作。这些医务界的专家、医生、护士和医药人员的到来,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创办卫生干部学校和开办战地医院创造了有利条件。

沈其震、崔义田等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就十分重视对卫生干部和医务人员的培养教育。他们开办医务干部培训班,亲自任教员,分别授课。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以后,沈其震任卫生部长,戴济民和崔义田任副部长。在他们的领导下,在苏北开办了华中卫生干部学校和短期卫生医务人员培训班,后来又办了军医学校和白求恩医学院,为根据地培养了大批卫生医务人才。

以刘少奇、陈毅为首的华中局领导同志还通过京沪地下党动员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来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经过多方的努力,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纷纷来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盐城。先后来到盐城的文化教育方面的专家学者有:著名的理论家、教育家有彭康、钱俊瑞、孙冶方、吕振羽、薛暮桥、骆耕漠、冯定、夏征农、戴伯韬、刘季平、艾寒松等;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有丘东平、陈岛、戈茅等;从事美术创作的美术家有莫朴、铁缨、鲁莽、赖少其、刘汝醴、沈柔坚等;从事音乐创作的音乐家

有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枚等；从事戏剧的剧作家有阿英、刘保罗、许晴、李增援、吴强、黄其明等；从事诗歌创作的诗人有许幸之、林山、辛芳等；从事新闻出版专家有范长江、王阑西、聂绀弩、黄源、刘述周、李恩求等；从事医学卫生的专家有沈其震、崔义田、齐仲桓、宫乃泉等。华中抗日根据地依靠这些文化、教育、卫生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创办了华中党校、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华中卫生学校、江淮大学、华中建设大学、苏中公学等干部学校。创办了《江淮日报》、《盐阜大众报》、《江淮文化》、《江淮杂志》和党内刊物《真理》、《实践》，出版了一些通俗读物，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使地处黄海之滨的盐城，成为华中地区坚持抗日斗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成为华中坚持抗日斗争的总后方和大江南北革命青年、抗日志士瞩目的地方。

以刘少奇、陈毅为首的华中局和华中军委的领导同志，不仅从全国各地动员争取文化教育卫生科技界有名的知识分子来华中解放区从事文化教育工作，而且还很注意争取团结苏北地区本地的知识分子参加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刘少奇到盐城后不久，他了解到本地有少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共产党采取怀疑观望的态度，不愿留在本地工作和学习，有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跑到国民党占领区和大后方去，甚至跑到敌占区去。因此，他们要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做好本地知识分子工作。

为了争取团结更多的本地和外地的文化教育界人士，刘少奇、陈毅接受文化教育界人士的建议，决定成立苏北文化协会。1941年1月16日，苏北文化协会举行成立大会，刘少奇、陈毅出席了会议。刘少奇在大会上作了《苏北文化协会的任务》的报告，深刻阐明了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说：“抗日民主政府对于文化教育采取保护政策，让其自由发展，并将尽一切可能帮助其发展。凡是愿意在苏北开办学校、出版报纸、杂志，开

办书店、印刷厂、图书馆、体育会、俱乐部、戏剧团、歌咏队，推行新文学，研究旧学问、讲习各种学问……都可自由，政府都保护，都给予他们以便利。只要他们不与敌寇、汉奸勾结，不破坏民主政府与抗日部队，一切都有自由。除此以外。政府对于某些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还准备以全力来推广，准备供给必要的经费和物质资料。如各县的中学，政府即拟扩大免收学费与膳费的范围，使贫穷子弟能得到充分入学的机会。”^①陈毅也在会上作了《为广泛开展苏北文化事业而斗争》的报告。

刘少奇、陈毅的报告，鼓舞了文化教育界人士的信心，粉碎了敌人的造谣中伤，打消了知识分子的疑虑，使许多知识分子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他们所长，在文化教育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正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当时苏北的许多知名人士，如宋泽夫、江重言、宋我真、江育才、江国栋、江云青、李继南、扬幼樵等都先后参加了教育工作，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和领导者。

1941年下半年，日伪军发动对盐城地区大“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阜宁农村停翅港。刘少奇约见白桃（戴伯韬，盐阜区文教处长）、刘彬、宋乃德。刘少奇说：“这个地区知识分子很多，青少年也很多，但学校已经零散。为了避免这些人流到敌伪地区去，我们应该开办学堂，团结他们，使他们有书可读，有地方教书，希望你们办一所联合中学。教育青少年工作很重要，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依靠青少年。……要看到他们有抗日的进步的一面，是勇于接受真理的。你们没有教师，军部可以调一些给你们，但主要是团结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待遇提高一些，使他们可以赡养家属。我们拿供给制，刻苦一点为好”。^②他建议在阜宁一带办一所联合中学，让青少年有学校读书。在刘少奇的指导下，不久就在阜宁郭

^① 原载《江淮文化》，1941年第2期。

^② 戴伯韬：《回忆刘少奇同志在苏北时对教育工作的关怀》。

璆、张庄办起了盐阜区联立中学，校长拟邀请盐阜区知名人士、原盐城中学教导主任江重言担任。此人毕业于中央大学，因对党的政策持怀疑态度，不肯出来工作。盐阜区行署主任宋乃德曾经三次登门邀请，前两次被拒绝，第三次邀请终于被宋乃德的诚意所感动，答应出来就任联立中学校长，宋乃德还备马送江重言到校赴任。

盐阜区的联立中学开学后，陈毅还亲自到联中给全体师生员工作政治报告，他要求大家正确地观察国内外的战争形势，要看到全局，不能光看眼前的一时困难和挫折。他的报告给全体师生很大的鼓舞。联立中学并不是普通中学，实际上是一所培养干部的干部学校，它为盐阜区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

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采取各种措施既争取动员全国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来根据地从事文化教育工作，又用各种办法争取团结教育本地的知识分子，为发展根据地文化教育事业，创办各类干部学校，培养各条战线的干部创造了师资条件。

为了扩大生员，动员全国各地青年来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学校学习，1941年8月，陈毅公开发表了《四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用较大的篇幅向全国进步人士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发出号召，欢迎他们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的工作，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进抗日根据地开办的抗大、鲁艺及其他干部学校。现摘要介绍如下：

“我们欢迎各地青年来新四军参加抗日事业，我们很盼望各地热心救国人士，特别是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机关办事人员来参加新四军的工作，参加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欢迎各地革命的青年，来到苏北、皖东、皖东北的抗大、鲁艺及其他学校，不要任何介绍，不拘什么资格，只要是爱国的青年，来到新四军活动的地区，一律保证入学，一切待遇条件同延安抗大一样。各地人上来

新四军者,如果是从香港、上海、汉口起身,只要能到海门、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泰县等地即可,向东向北走出敌人据点以外 10 里 20 里的乡村即可找到新四军或地方的抗日政府,能打听到新四军活动的地点。或者到扬州、天长以西,六合以北,在津浦路的滁县、明光以东以西、无为县附近,芜湖区附近,洪泽湖的四周地区,及徐州宿县以西,萧县永城地区,均可找到或打听到新四军。长江沿岸各港口与上海经常有小轮船、帆船来往,津浦沪宁各地,经常有车来来往往。在上海即可探知到海门、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扬州、泰县、六合、滁县、明光、蚌埠、徐州、芜湖、无为等敌占城市的办法。由这些城市到新四军地区,虽然要经过敌人的检查,但只要应付得稍好一点,是没有危险的。如能取得利用伪政府通行证则更好。我们盼望各地抗日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自动找办法来本军,不胜欢迎之至,并保证能找到抗日救国的工作做或入学校读书。”本军地区“有专门培养文化干部之鲁艺华中分院,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有三,东南最高学府之江淮大学正计划创办,明年今日,即当开学。”^①

陈毅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动员全国各地抗日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来华中抗日根据地干部学校学习的号召书。在这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陆续来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和进干部学校学习,甚至东南亚国家许多华侨青年也来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工作或学习,使根据地的干部学校教育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1941 年以后,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既解决了师资来源问题,又解决了学生来源问题。这样,华中解放区创办干部学校的主客观条件已经逐步具备,先后创办了各类干部学校。在军队干校方面,先后创办了军部直属的抗大五分校、抗大总分校;各师的抗大四分校、抗大七分校、抗大八分

^① 《陈毅在盐城》,第 234—235 页,解放军出版社 2001 年版。

校、抗大九分校和两个抗大十分校。在地方干校方面,先后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华中卫生学校、苏中公学、华中建设大学、淮南公学、洪山公学、建国公学、鄂东公学、淮南行政学院、苏中行政学院、盐阜行政学院、江淮大学、雪枫大学、苏浙公学、淮南艺术专科学校、浙东鲁艺学院等数十所干部学校。在党校方面则创办了华中局党校和各区党委、地委党校。还有许多以培养干部为主要任务的中学和师范学校。这些干部学校和党校培训了大批党政军各部门和各条战线的干部,对华中解放区各方面的建设,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解放战争时期华中解放区 干部学校的发展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华中地区广大军民执行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津浦铁路沿线和豫鄂边区向日伪军展开了大反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在长江北部以解放两淮(淮阴、淮安城)为标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已基本上连成一片,创建了苏皖解放区。它的范围是由江苏省的江北地区、安徽省江北的东部地区和河南省东部的一角所组成。辖有原江苏32县、安徽18县和河南三县共53个旧县治。它东滨黄海,南界长江,北枕陇海铁路,西迄涡河、浴溪口一线,全区总面积9.5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2500万。

与此同时,原新四军五师在中原地区创建的以河南信阳县四望山为中心的豫鄂边区,在日本投降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它的范围:东起安徽省宿松和江西省彭泽,西至湖北省宜昌,北起河南省中部地区的叶县、舞阳,南抵湖南省的洞庭湖畔。共计解放人口1300余万,建立7个专员公署和38个县政府。

根据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华中分局决定,并请示中央的

批准,在华中的东部地区成立华中军区和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华中分局决定撤销苏中、苏北、淮北区党委,保留淮南区党委,直接设立第一至第八个地委。同时成立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兼任政委,粟裕、张爱萍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华中军区下辖:苏中军区(辖第一、第二军分区和独立旅)、淮南军区(辖第三、四军分区和独立旅)、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军分区。10月29日,苏皖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组成,同时组成主席团,李一氓任主席、刘瑞龙、季方、韦懋、方毅任副主席。11月1日,苏皖边区政府在淮阴城正式宣告成立。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后,即宣布撤销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行政公署,全地区统一调整为与区党委、军分区相适应的八个行政区,各设专员公署。

1946年7月中旬,国民党部队大举向华中解放区进攻,华中野战军主力首先在苏中地区迎接进犯之敌。从7月中旬到8月下旬,华中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在海安、李堡等地,接连进行七次作战,取得七战七捷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后来华中野战军又经过泗县、涟水、宿北地区的战斗,在大量歼灭敌人以后,华中野战军和华中党政军机关北移山东。1947年1月21日,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编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新四军番号至此撤销。苏皖解放区党政军领导机构也进行了重大调整,华中分局并入华东局,苏皖边区政府机关撤至陇海铁路以北也终止活动。

为了坚持和加强华中地区的斗争,1947年11月又成立中共华中工委、华中办事处和华中指挥部。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华中办事处主任曹获秋,华中指挥部指挥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副指挥陈庆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统一指挥留在华中的第11纵队和第12纵队,坚持华中敌后斗争。管文蔚和姬鹏飞兼任苏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陈庆先和曹获秋兼任苏北军区司

令员和政治委员。淮北地区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饶子健领导的淮北支队坚持游击战争。淮南地区则由淮南支队司令员杨效椿、政治委员李世农领导的淮南支队开展游击战争。此外,原在华中地区的一些地方军区、地方武装在战争中也得到了很大发展。重新组成了皖北、苏北军区,筹建了苏南、皖南军区,并组建了 12 个警备旅,隶属于各军区。

华中苏皖解放区军民又转入了极其艰苦的坚持敌后斗争环境。但是,华中苏皖解放区的军民咬紧牙关,针锋相对,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各分区的游击队、联防队、武工队灵活巧妙地与敌周旋,或正面打击敌人,或侧翼牵制敌人,或敌后袭扰敌人,积极配合和支持主力部队作战。野战兵团灵活运用敌进我进、机动跳转的战术手段,适时采取外线出击与内线坚持相结合的斗争方法,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斗,搞得敌人无所适从,坐立不安。经过近两年的坚持与恢复的斗争,苏皖解放区又逐步得到巩固与发展,雄踞于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卧榻之侧,成为巩固华北、发展东北的重要屏障,成为华中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

在华中的中原地区原新四军五师建立的豫鄂解放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945 年 8 月 20 日,豫鄂边区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遵照中央的指示,由平汉铁路东的大悟山转移到路西的河南信阳四重山地区,进行反内战的准备工作。豫西边区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及嵩岳军区部队也在这时转移到豫南桐柏山区。同年 10 月 28 日,上述三支部队发起著名的桐柏战役,先后解放了河南的桐柏、新野、唐河和湖北的枣阳四座县城,进一步扩大了豫鄂解放区。

194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豫鄂边区的基础上成立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第一副司令员王树声,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同时,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郑位三代理书记。从此,豫鄂边区正式更名为中原解

放区。

解放战争开始后,华中中原解放区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猛烈进攻。1946年1月到4月,国民党军队10万余人向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南罗山县宣化店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军分南、北、东三路先后突围进入鄂、豫、皖、川、陕五省的边境地区。经过近一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扭转了战争的形势,恢复了中原解放区。特别是1947年6月大为好转,先后解放了20几座县城,进一步扩大了中原解放区。

解放战争开始后的前两年,战争频繁,规模空前,环境十分恶劣,给华中苏皖解放区和中原解放区的干部学校带来了严重困难,许多干部学校经受了严峻的战争考验。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下,干部学校有的停办,有的合并,有的缩小办学规模,有的转移到农村以至外省去办学。

在华中苏皖解放区,部队的抗大分校已全部停办,四师的抗大四分校曾改组为雪枫大学,解放战争开始后转移到山东后也停办。

抗日战争后期建立的华中建设大学,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春,校长彭康调山东华东局宣传部工作,400多名学生也转入山东临沂山东大学学习,部分教授也调山东大学工作。华中建设大学的第一个时期也宣告结束。建大留下的部分干部教师,经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决定,重建华中建设大学,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兼任校长,李亚农、夏征农任副校长。设立工、农、文、医、师范、社会科学六个系和一个预科部。全校学员900多人。同时还新办了苏皖边区行政干部学校、财经干部学校、苏皖边区教育学院、苏北工业专科学校、苏北盐垦专门学校、华中畜牧兽医学校和师范学校等干部学校。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建大从淮阴城迁到农村办学,经常进行转移。因此,华中局决定建大向山东转移。1946年9月中旬,全校师生编成三个大队开始北撤。与建大

同时北撤的还有苏皖边区财经干部学校和苏皖边区教育学院。建大到山东后坚持在战争环境下办学,直至1947年10月停办。

解放战争开始后,苏中地区1946年底在苏公分校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所江海公学,校长吴天石、副校长陈枕白。由于战争环境恶劣,学校转移到东台东边人烟稀少的海边一带坚持办学,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办了两期,培训干部1500多人。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集中兵力大举向华中解放区城乡进攻,大多数城镇被其占领。大批干部撤到苏北射阳县沿海地区。为了接纳这些撤退下来的干部,华中工委于1947年11月决定举办华中工委党校和华中公学。华中工委党校由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兼任校长,工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一诚任副校长。华中公学是在江海公学的基础上成立的,由华中工委宣传部长俞铭璜兼任校长,吴天石任副校长。华中党校主要接受县、区一级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华中公学主要接受区委以下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学习,也有一部分区级干部。华中工委党校学员将近500人,华中公学学员最多时达3200人。由于国民党部队不断向解放区进攻,华中工委党校和华中公学不得不经常转移。1948年4月,华中工委决定华中工委党校和华中公学全体干部学员转移到山东滨海地区办学。两校在转移途中,党校中途受阻,未能到达山东,华中公学2300多人则安全到达山东鲁南的莒南县,在那里学习了半年多,1948年11月战争形势好转后才回到苏北分配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苏皖解放区的中学和师范学校,除少数停办外,多数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继续坚持办学。如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的界首乡村师范和联合中学,就是分别转移到偏僻农村坚持游击办学。山淮海地区各中学合并的淮海联合中学师生曾跟随部队转移到山东继续办学,后并入建大,改为建大附中。

华中中原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开始前,也创办了不少干部学校,大力培养干部。比如1945年下半年,成立了青年干部研究班。

后改为中原军区工作团。1946年2月,河南罗山宣化店成立了中原民主建国大学。1947年9月,在安徽省丘西县成立了鄂豫皖军政大学。同年11月,在河南省栾川县成立了豫西军政干部学校。12月,在河南鄢陵县成立了豫皖苏建国学院。1948年1月,在湖北大洪山建立了江汉公学。同年3月,在湖北潜江县老新口成立了襄南军政干部学校。同年5月,在河南鲁山县成立了豫陕鄂人民军政大学等。这些干部学校坚持在战争中办学,为中原解放区培养了大量干部。

由此可见,在解放战争的前期,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不论是华中苏皖解放区,还是华中中原解放区的干部学校都有所变化和减少,但仍有不少干部学校坚持在战争环境中办学,培养了大量干部。到了1948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的后期,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转入大反攻,华中解放区的干部学校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形势发展十分迅速。三大战役有的已经拉开序幕,有的正在积极准备之中。形势的发展,对党的干部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对于干部的需求使党始料不及。如何解决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与干部准备不足的矛盾,是党的干部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大规模地培训干部成为党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在1948年9月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战争形势的发展做了认真的分析,估计再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即1951年7月左右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会议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问题,提出了必须尽快从干部上做好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准备,并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通知》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

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5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困难。”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中央估计到1950年6月,我们可能从现有的1.68亿人口和586个县市发展到3.5亿左右的人口和1000个左右的县市。大约需要准备5.3万个干部。包括军事工作、党务工作、机要工作、政府工作、工农青妇群众团体工作、经济工作、财政工作、银行工作、贸易工作、新闻宣传工作、高校和党校的教育工作等干部。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每一个新开辟的县,至少需要县级和区级干部75人左右;平均5个县设一地委,每一地委至少60个干部左右;120个县成立一个中央局,每个中央局至少300个干部左右。这样,500个县需要37500人左右;共设100个地委,需干部6000人左右;17个区党委,需干部1360人左右;4个中央局,需干部1200人左右。此外,还需要准备7000左右的干部在大城市工作。5.3万个干部中,县以上领导干部最低限度需要近5000人。其中,中央局一级的领导干部160人,区党委一级的领导干部255人,地委一级的领导干部1000人,县一级的领导干部3500人。这5.3万个干部分配华北抽调17000人,华东抽调15000人,东北抽调15000人,西北抽调3000人,中原抽调3000人。

当时,解放区县以上干部大约共有30万人,从中抽调5.3万人就占了干部总数的18%。尽管任务非常艰巨,但各中央局接到中共中央通知后,立即进行落实,积极完成抽调干部的任务。

但是,形势发展超出了中共中央的预料。中央10月28日的电报发出半个月后,11月11日,毛泽东根据当时形势发展情况,做出了再有一年左右即可以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估计。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后,解放军在数量上开始占了优势。紧接着解放军又取得了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的

伟大胜利,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军队退守江南。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加强了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这样,在干部的准备上,不但要满足长江以北新老解放区大量补充干部的需要,而且还要准备军队渡江南下以后南方广大新解放区对大量干部的需要,干部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为了解决干部远远不足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设想。他在1949年2月8日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所写的复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电报中指出:我们现在正准备5.3万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军队就是一个学校,210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靠部队本身来解决。此点,你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毛泽东还要求:“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受城市和管理城市”的任务。后来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报告中又再次指出:“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5万3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我们必须把210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学校。”这一方针的确定对于解决新解放区急缺干部的问题开辟了一条新渠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但是,向江南地区进军,接管广大城市和乡村,完全依靠军队是不行的,还是需要通过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大量培训各级各类干部。因此,随着党对干部的需求越来越大的情况,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大量培训新干部的工作越来越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提出了一系列大规模培训干部的计划。一是各区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两级立即开办党校,抽调各级各类的干部到党校学习。已经开办的党校要加强和扩大。学习中,以区党委为单位,配备包括区党委(或省委)、地委、县委、

区委四级干部在内的整套干部架子。配备架子集中学习培训的目的,是为了有利于上下级干部之间相互熟悉和了解,加强学习的组织领导,更重要的是将来这些干部派遣出去时,不需要再重新进行组合搭配,可以把这架子完整地直接安置在各种地方,有利于尽快开展工作。地、县两级普遍开办短期训练班,训练区、乡级干部,并从中挑选一批比较优秀的乡、村级干部脱产进行学习,以其中的一部分补充区级干部的缺额,一部分送地委或区党委、省委办的党校学习训练。二是增设副职跟班锻炼。中央局(分局、工委)、区党委(省委)、地委、县委、区委五级各种重要岗位一律增设副职,挑选一批区、乡两级的干部到县级担任副职,县级干部到地委一级担任副职,地委干部到区党委或省委级担任副职,区党委或省委级的干部到中央局或分局或工委一级担任副职,使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以便将来提拔使用。三是各大军区开办军政学校或加强和扩大已有的军政学校,培养军区、军分区及地方所需要的一部分军事和政治工作干部。四是创办中等学校并办好已有的中等学校,培养大批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才,准备补充各级各项工作的干部。五是在可能开设大学的解放区,迅速开办正规大学,以培养将来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人才。六是创办各种专门学校,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中学、大学及专门学校中均可以大量地附设短期速成学校或训练班,以应急需。七是在解放了的城市中大量培养产业工人干部,以满足城市管理以及大工业、大运输业、大商业和银行、对外贸易等方面的迫切需要;大量训练和改造旧职人员,以补充城市干部的严重不足。这些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以后,党再把他们派往新解放区去工作。八是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大量地吸收工人及知识分子到解放区来,加以必要的训练以后,派往各种岗位去工作。为使调往新区工作的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有充分准备,除已在党校学习以外,

都要集中训练一个较短的时期。^①

中央关于大规模培训干部的一系列指示下达以后,华中工委和中原局立即研究贯彻,决定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大力培训各类干部。

华中工委除要求有条件的地、县委开办干部训练班之外,主要是在原来已办的华中工委党校的基础上扩大办学规模和华中公学的基础上开办华中大学,大力培训各类干部。

华中工委党校是在1947年11月创办的,主要是接受解放战争开始后华中各地撤退到后方来的区级以上干部。他们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坚持学习。华中工委在1948年9月接到《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后,决定华中工委党校扩大办学规模,一方面抽调华中解放区的区级以上干部进党校学习,另一方面接受从上海、南京等国民党统治区撤退到解放区的地下党的骨干和党员进党校学习。特别是从上海来的地下党员很多。华中党校学员最多时达1500多人,编成15个队。

与此同时,华中工委决定在原华中公学的基础上创办华中大学。管文蔚兼任校长,董希白任教育长,主持学校的工作。吴天石、唐君照任副校长。校址设在盐城。华中大学主要接受从上海、南京等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及苏北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学员最多时达3000多人,加上南通、泰州、扬州华中大学工学团,学员达4000多人。

华中工委党校的扩大和华中大学的创办,共培训干部五六千人,为进军江南、接管新解放的广大城市乡村准备了干部条件。

华中工委除了举办华中工委党校和华中大学以外,还在华中各地开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大力培训干部。这些干部学校有:1948

^① 陈凤楼:《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第83-86页,第89—90页,党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年 11 月开办的华中行政干部学校,校长贺希明(兼),培训学员 500 余人。1948 年 11 月开办的华中邮政学校,校长贺希明(兼),培训学员 200 余人。1948 年 6 月,华中财经办事处开办的工商干部学校,培训学员 300 余人。1948 年 7 月开办的华中供给学校,校长朱季文(兼),培训学员 200 余人。此外,华中各分区也开办了培训干部的学校和训练班,培训了不少干部。

在华中中原解放区,中央关于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指示下达后,中原局立即研究贯彻,决定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培训干部。1948 年 9 月 28 日,中原局发出《关于争取团结改造和培养知识分子的指示》。同年 11 月 10 日,中原局宣传部向全区发出《关于大量吸收训练与使用知识分子的指示》,指出,对知识分子训练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十天、半个月、一个月、至多两个月就够了。训练的内容侧重时事与政策,并联系他们过去的的生活,进行思想改造。”

中原局为了贯彻中央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指示,新办了以下干部学校:

一是鄂豫公学。于 1948 年 12 月成立,校址在河南尚城县,校长王树声(兼),教育长蒋怀奇(兼)。学员总数 600 人。

二是江汉公学。于 1948 年在江汉解放区创办的一所“抗大式”的革命干部学校。校址在大洪山麓。院长郑绍文,副院长张斧,学员 1200 多人。全国解放后江汉公学并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

三是中原大学。1948 年 8 月在河南宝丰县白庄创办,同年 12 月迁至开封。范文澜任校长,潘梓年任副校长。学校先后招收学生 15000 余人,培养了大批干部。

四是襄南公学。1948 年 12 月,襄南地委将创建的襄南军政干部学校改为襄南公学。校长薛坦,副校长彭志深。校址开始在潜江县老新口,1949 年初迁至潜江县城,培养了近千名干部。

五是河南大学。1948 年 7 月,河南开封解放后,利用原有的河

南大学培养了 2000 多名干部。

六是鄂豫皖军政大学。1947 年 7、8 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在安徽省岳西县创办了鄂豫皖大学。1948 年 1 月,改为中原军政大学。校长刘伯承(兼),副校长曾绍山,教务主任方维舟。

七是湖北人民革命大学。1949 年 6 月创办,校址在武昌。校长李先念、副校长程坦,教育长王均予。学校先后办了四期,培训干部 15613 人。

中原解放区创办的这些干部学校,培养了大量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不论是华中的苏皖解放区,还是华中的中原解放区,在解放战争的前两年中,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猖狂进攻,战争异常激烈,环境十分艰苦,给解放区的干部学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许多干部学校经受了严峻的战争考验。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校暂时停办,有的学校缩小规模,有的学校转移到农村以至转移到外省坚持办学。但到了 1948 年下半年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大规模进攻,在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关于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指示下达以后,在华中地区掀起了大规模培训干部的热潮,把干部培训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培训了接管江南新解放地区的大量干部。

第二章 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是党的干部教育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党成立以后,就十分重视党的干部培养教育工作,把它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重视加强党的干部培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干部教育史。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始终紧紧抓住干部培养教育这一决定性环节,在第一次国内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历史时期创办了大批干部学校,培养了上百万干部,带动了党的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一、重视党的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重视和加强党的干部培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党的干部培养教育工作,把它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大力培养党的干部。现在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办的干部学校简要地介绍如下:

(一)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学校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

先进分子中传播,积极创办各类干部学校和工人夜校,培养训练党的干部。特别是从工人中培养干部,成为党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1921年8月,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在这一时期,曾经召开了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每次大会对开展工人教育问题都有专门的决议。在《决议》中明确指出:“为了革命的胜利,在可能条件下,广泛地发展工人阶级的教育是必要的,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是战胜资产阶级的根本动力。”

1925年5月,党召开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规定了青年团在青年教育工作中的任务:“要在广大青年中开展政治教育运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青年的政治觉悟。”

在这一时期,党的各级组织都把开展各种类型的干部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培养干部的各类干部学校也先后在全国各地逐步创办起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恽代英、何叔衡、彭湃、任弼时等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党的干部培养教育活动,创办了大批干部学校。

1. 湖南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在长沙创办的一所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培养干部的学校,1923年该校创办了《新时代》月刊,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如郭亮、夏曦、夏明翰、罗学瓚、李维汉等。

2. 上海大学,是1922年春在上海创办的。这个学校的主要任务是为文艺战线和理论战线培养革命干部。于右任任校长,陈望道任教育长,瞿秋白任社会系主任,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任弼时等都在这里任过教。学生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占多数。

3. 农民运动讲习所。1924年7月至1926年9月间,在广州由彭湃、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共主办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广东、

广西等八个省市农民运动干部。毛泽东主持的第六届讲习所就培训学员 327 人。

4. 安源党校。1923 年冬,长沙党组织派任弼时、任岳到安源,协助刘少奇创办了安源党校。校长由俱乐部主任刘少奇兼任,任岳主持教学工作,100 多名党员参加学习,他们在安源煤矿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

5. 北京党校。1925 年 9 月,中共北京地委根据党的四大关于设立党校有系统地教育党员的指示,在北京区委的领导下,筹办了北京党校。由罗亦农任校长,赵世炎、陈乔年等任教员。李大钊经常进行指导,瞿秋白常来讲课。

6. 上海党校。1925 年 10 月,中共上海区委开办了党校。由瞿秋白、罗亦农、彭述之等讲课。课程设有:资本主义特征及其崩溃、第三国际政策、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解放、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中国国民革命、党的组织及纪律等。

7. 上海高级党校。1926 年 2 月初,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开办一所高级党校,学习期限为八个月,由罗亦农、尹硕夫等讲课。课程有:马克思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史、列宁主义、辩证法唯物论、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等。

此外,在广州、武汉也开办了党校,培训党的干部。

8. 上海平民女校。为了培训妇女干部,1921 年 10 月,党中央宣传部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李达任校长。

9. 湖南自修大学。为了培养党的干部,1922 年毛泽东、何叔衡在湖南利用船山学社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聘请李达任校长。

10. 黄埔军校。1926 年 1 月,在广州,国共两党联合创办了黄埔军校,培训军队干部。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

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党的干部,还得到共产国际和当时苏联的支持,于 1925 年在苏联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拉狄克,第二任校长是米夫。莫斯科中山大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

了一批干部,比如俞秀松、沈泽民、邓小平、左权等就曾在该校学习过。

此外,在苏联还创办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干部。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干部学校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正式开始。党在中央苏区极其严重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环境下,仍然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大力培养干部。在这期间,除了举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外,创办的干部学校主要有:

1. 红军步兵学校。1930年冬,彭德怀在湖北新龙港创办了红军步兵学校,后改名彭杨学校。招收部队排班级干部和赤卫队的班长、小队长进行培训。

2.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先后有萧劲光、何长工、刘伯承、叶剑英、周昆担任校长。学制三个月到五个月。第一期有学员700多人。到1932年夏办第二期时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学员增至1500多人。

3. 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是由中央红军学校和苏维埃大学政治部合并组成的。学校设立高级指挥、政治、参谋等科。学员来自红军营级以上干部,周恩来、瞿秋白、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萧劲光等都先后来校授过课。学校还有一个干部培训班,调训红军高级领导干部。红军大学1934年10月随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

4. 苏维埃大学,任务是培养苏区行政管理干部。毛泽东任校长,沙可夫任副校长。学校分普通班与特别工作班两部分,有1500多名学员,分别编入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8个专业进行学习。1934年学校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

维埃大学,由瞿秋白担任校长。

5. 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1933年3月在苏区中央局党校的基础上于瑞金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央高级党校。第一任校长任弼时,副校长杨尚昆。后由张闻天兼任校长、董必武任副校长、罗明任教育长。主要是培训苏区和白区的党员干部。

6. 中央农业学校。学校设有本科、预科和教员研究班,学习时间为一年。学校实行半工半读的方法,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7. 中央列宁师范学校,主要培养苏区学校的师资。校长由著名教育家、苏区人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徐特立兼任。

此外,中央苏区还创办了许多中等专业学校,如无线电学校、护士和医务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以及各种短期训练班等。

(三) 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学校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干部教育经验更加丰富,干部教育理论更加成熟,党的干部教育也发展到一个新高峰。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干部教育理论和干部教育思想体系,并日益达到成熟。

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说的话:‘干部决定一切’。”又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他特别指出:“伟大的抗战运动,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每

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①在1941年底到1942年初,党中央相继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党教育工作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

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和华南解放区都先后创办了许多干部学校。

1.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学校:

(1)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它的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抗大成立于1936年6月1日,毛泽东亲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学员主要是红军干部和知识青年。共办了八期,每期都在1000人以上,最多的第五期学员数达13392人。

(2)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它是在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的基础上,于1935年11月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李维汉、陈云、邓发、毛泽东等先后担任过中央党校的校长。

(3)陕北公学。1937年9月底以抗日军政大学的一个队为基础在延安筹备成立了陕北公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根据地需要的行政干部、民运干部和文化工作干部。1941年,陕北公学合并到延安大学。

(4)中国女子大学。为了培养妇女干部,于1939年7月在延安成立了这所学校,校长由王明担任,后由李富春接任,副校长为柯庆施。女大在1941年合并到延安大学。

(5)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为了培养从事青年工作的干部,1940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这所学校,由陈云任校长,冯文彬任副校长。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中央自然科学学院。为了培养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懂得自然科学的人才,于1939年底创办了这所学院,先是李富春任院长,后由徐特立任院长。它为边区培养了第一批230名科学技术干部。

(7)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1月10日在延安成立。院长是吴玉章,副院长为周扬。由沙可夫、周扬、艾思奇、朱光、徐以新等同志组成院务委员会,领导整个学院的工作。

(8)华北人民革命大学。1939年7月7日,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延安成立一所综合性的革命干部大学,由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等学校合并组成。由成仿吾任校长,江隆基任教务长。学员最多时达1000多人。

(9)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任务是培养和提高边区行政工作干部。1940年成立,院长由林伯渠兼任,副院长王凌波主持工作。

陕甘宁边区还有农业学校、医药学校、鲁迅师范学校、新文学干部学校等。

2. 华北解放区的干部学校:

(1)中共北方局党校,1939年成立。由朱德兼任校长,后由罗瑞卿任校长,杨献珍任教务主任。

(2)抗大第一分校,1938年12月成立。何长工任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黄欧东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任训练部长。

(3)抗大第二分校,1938年12月成立。陈伯钧任校长,后由孙毅任校长,邵式平为副校长,袁子钦为政治部主任。

(4)抗大第六分校,1940年11月成立。刘忠任校长,黄欧东任政治委员,姚继鸣任教育长,符光义任政治部主任。

(5)抗大第七分校,1947年7月成立。周士弟兼任校长,喻楚杰为副校长,徐文烈为政治委员,杨尚高为政治部主任。

(6)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1940年1月成立。江一真任校长,殷希彭为教务主任。

此外,还有冀中抗战学院、晋察冀抗战建国学院、筑光抗战学

院、山东公学和山东省抗战建国学校。

3. 华南解放区的干部学校：

(1) 琼山抗日公学(后改为琼崖抗日公学),1940年7月成立。冯白驹兼任校长,史丹为副校长。

(2) 琼崖抗日军政干部学校,1941年6月成立。李振亚兼任校长,云涌为专职副校长。

(3) 东江纵队军政干部学校,1944年7月成立。王作尧兼任校长,李东明任政治委员,林鹗任教育长。

此外,还有东江纵队青年干部训练班、西山公学、南侨中学等。

抗日战争时期华中解放区的干部学校将在下面专门介绍,这里从略。

(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学校

现将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各解放区所办的干部学校择要介绍如下：

1. 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学校：

(1) 延安大学。延安大学是1941年成立的,解放战争开始后继续坚持办学。李敷仁任校长,江隆基任副校长。于1946年1月在边区招生。此时学校已不设院系,只设教育、司法、农业、文艺、会计五个班。

(2) 西北军政大学。1945年9月,陕甘宁晋绥五省驻晋随营学校改名为贺龙中学。1948年9月临汾解放后,学校迁至临汾,扩建为西北军政大学。贺龙兼任校长、副校长李长路、钟师统。

(3) 西北人民革命大学。1949年西安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将延安大学从延安迁往西安,改名为西北人民革命大学。马明方任校长,李敷仁任副校长。

(4) 西北医药专门学校。1946年春,陕甘宁边区政府卫生署和

陕甘晋绥联防军卫生部共同组建的西北医药专门学校。校长曾育牛，副校长马荔。

(5)西北财经学校。1948年8月创办，校长贾拓夫。该校宗旨是培养新民主主义的财经干部。

此外，还办了妇女职业学校和中医训练班等。

2. 华北解放区的干部学校。

(1)马列学院。中共中央于1948年7月，决定在华北创办高级党校仍沿用延安的马列学院名称。1948年11月8日在河北平山县李家沟口开学。院长刘少奇、副院长陈伯达、教育长杨献珍。1949年1月进入北平，校址在香山碧云寺。

(2)华北大学。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大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河北正定。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在石家庄举行开学典礼，校长吴玉章，副校长范文澜、成仿吾，教育长钱俊瑞。

(3)华北人民革命大学。1949年2月成立。校址在北京西苑。校长刘澜涛（兼），副校长胡锡奎。共办了三期，培训干部2万多名。

(4)华北军政大学。1948年5月，晋冀鲁豫军政大学和晋察军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华北军政大学。校址在石家庄。校长兼政委叶剑英（兼），副校长萧克（兼），副政委朱良才。

(5)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1946年2月，以原抗大二分校的干部为基础组建了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校址张家口。聂荣臻兼任校长和政委，朱良才任副校长和副政委。1948年5月，学校合并到华北军政大学。

(6)冀东建国学院。1945年秋在河北省玉田县城创建。院长由冀东行署主任张明远兼。

(7)冀鲁豫革命干部学校。1948年下半年，冀鲁豫行署决定创办冀鲁豫革命干部学校。校长山行署主任潘复生兼任，武冠英任

副校长。

(8)白求恩医科大学。1946年1月在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的基础上,改名为白求恩医科学学校。同年6月,白求恩医科学学校与延安中国医科大学部分师生及张家口医院合并,命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军卫生部长殷希彭兼校长,卫生部政委姜齐贤兼政委,耿毓桂任副政委,张文奇、陈淇园任正副校长。

(9)华北医科大学。1948年5月白求恩医科大学和北方大学医学院合并后建立起来的。华北军区卫生部长殷希彭兼校长,耿毓桂任政委,张文奇任教育长。陈淇园、刘和乙任副教育长。1948年2月,改由钱信忠兼任校长。

(10)北方大学医学院。1938年夏,一二九师卫生部长钱信忠开始组建医疗处。1940年在医疗处的基础上建成卫生学校。不久合并为十八集团军卫生学校。1945年卫校改名为晋冀鲁豫军区医科专门学校。1946年4月,学校扩建为北方大学医学院。院长刘和乙,共有学员400多人。

此外,还有冀鲁豫建国学院、冀中“五一”学院、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张家口农科职业学校、太岳师范学校、武训师范学校、邢台师范等培养干部的学校。

3. 东北解放区的干部学校。

东北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一个新的解放区。它地处我国东北,山海关外,与华北解放区毗连,其西、北、东分别与蒙古、俄国、朝鲜接壤。

东北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期间新办了大批干部学校,这些学校主要有:

(1)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的前身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45年10月16日,学校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约有千人由绥德出发于1946年2月进驻吉林省通化,建立东北军政大学。校长林彪,副校长何长工、朱瑞,政委彭真、副政委吴溉之,政治部主任

徐文列。

(2)东北大学。它的前身是1945年10月从延安来的一批干部在本溪创办的东北公学。1946年2月改称东北大学。校长张学忠,副校长白希清、舒群。1948年7月,迁往吉林,与吉林大学合并,仍称东北大学。校长张如心,副校长吕振羽、张德馨。

(3)东北医科大学。它的前身是抗日时期的中国医科大学。1945年由延安迁往东北,与东北军医大学合并。校长王斌,副校长李亭植。

(4)哈尔滨大学。它的前身是伪满洲国时期的王道书院。东北解放后,改为国学院。1946年1月1日,改为私立哈尔滨大学。同年9月18日民主政府接收。校长车向忱、副校长何礼。

(5)东北科学院。1948年7月创建于哈尔滨,是一所综合性大学。院长林枫(兼),副院长王一夫(兼)车向忱(兼)。

(6)辽宁建国学院。1947年7月,辽南公署在瓦房店创办。院长邹鲁风,教育长黄中、吴延生。

(7)邮电学校。校址佳木斯。校长陈先舟,副校长孟贵民、刘钦云。

4. 山东解放区的干部学校。

(1)山东大学。1945年8月底,山东省政府决定成立山东大学,校址是在鲁南临沂。校长李澄之。副校长田佩之。1946年4月,华中局决定将苏皖解放区的华中建设大学的部分干部教师和420名预科学生并入山东大学。

(2)华东大学。1948年8月,中共华东局创办。校址在潍坊市。校长韦恂,副校长张勃。1948年9月济南解放后,华东大学迁往济南。改为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彭康任校长,李宇超任副校长。

山东解放区在1948年8月前后,还在山东益都成立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在潍坊成立了华东工商干部学校,山东军区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山东省政府创办了行政学院和省立师范学院。还接

领导下,在总结干部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于1941年和1942年先后做出了关于干部教育的两个《决定》,即《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是对党的干部教育历史经验的系统总结。它是党的干部教育理论全面形成并达到成熟的标志。它对干部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和学校校风等方面都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教育上的革命》的文章,称《决定》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在学校教育上的具体运用,是培养干部工作中的新纪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新革命。”这两个《决定》指出:“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果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而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中共中央的这两个《决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党的整个干部教育两大部分——学校教育、在职教育构成了一个“两条腿走路”的完整的教育体系,使整个干部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更加符合实际和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构成了完整系统的干部教育理论。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领导下,既继承和发展了党的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又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把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一文一武,互相配合,在地方和军队的干部教育的实践中,形成了各有重点、各具特色的干部教育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党的干部教育理论,把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刘少奇和陈毅的干部教育思想各有特点,各有侧重。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偏重于党的建设,陈毅的干部教育思想偏重于军队建设,他们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从不同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在他们的干部教育思想指导下,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事业出现了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为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量干部,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继承了党在苏区和延安的干部教育优良传统,学习借鉴党在干部教育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又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无论在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上都有所发展和创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独具特色的干部教育思想(这些思想将在后面有专章加以论述)。他们的干部教育思想既继承了党的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和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又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有所创新和发展。在刘少奇、陈毅的干部教育思想指导下,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创办的干部学校之多和培养的干部之众,在全国解放区中是名列前茅的。特别是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丰富了党的干部教育理论的宝库,从而开创了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新局面。它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为党培养了20多万党政军民各个方面的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干部教育史和在革命过程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中国现代教育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它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与实践是这份宝贵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包括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干部教育理论,推动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章 华中解放区军事干部学校

新四军在建军之初，干部十分缺乏，迫切需要培训教育大批军队干部。无论是叶挺、项英领导的皖南军部创建之初，还是在陈毅、刘少奇领导的重建军部以后，都把培训教育军队干部工作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新四军的干部教育分为两个时期：一是新四军建军之初在皖南创办教导总队的时期，二是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在苏北创办抗大分校的时期。现在分别对教导总队和抗大各分校加以介绍：

一、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分校

（一）皖南教导总队

1937年12月，新四军正式组建，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在组建之初，干部严重缺乏。虽然党中央从延安陆续调派了多批干部前来加强新四军，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这时，来自南方八省游击区的红军干部，需要进行比较系统的政治和军事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素质；从各地收编的地方武装的骨干需要进行军政训练，以改变其不良习气，转变其思想作风；大批新参军的知识青年需要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完成从老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转变。因此，军部从武汉移驻南昌后，便调集干部筹建教导队，着手干部培训工作。1938年2月15日，教导队第一期在南昌正式开学，设军事、政治各一个队。学员大多数是从各个地区

游击队陆续抽调的骨干。1938年4月,军部迁移到皖南歙县岩寺后,教导队扩大为教导营,营长刘世湘、副营长谢祥军,教导员龙树林,辖三个队,学员300余人。

新四军到达皖南以后,各个支队相继挺进苏南、皖中等敌后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大批知识青年和工人、农民参军。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也纷纷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因此,大规模地培训干部就成为新四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1938年9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将教导队扩建为教导总队,由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长,冯达飞任教育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赵希仲、薛暮桥任训练处正、副处长,主持军事和政治文化教育工作。教导总队实际上是一所抗大分校。无论是教学方针、课程设置、培训目标和校风,教导总队都是依据抗大总校的有关规定,参照抗大总校的办学经验,结合新四军部队的实际来制定的。教导总队的负责人周子昆曾在抗大总校学习和工作过。教育长冯达飞曾任抗大总校的大队长,在教导总队担任大队长。教导员谢祥军、贺敏学、刘文学、程业堂等同志都来自延安抗大。因此,教导总队完全按照抗大的教学方针、内容和方法进行办学。

教导总队的学员主要来自四个方面:一是来自上海等沦陷地区的知识青年和产业工人。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有70万以上的难民先后到“租界”避居,各个行业共设立了五六十个难民收容所。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党的工作属江苏省委领导)为此成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并在20多个难民收容所成立了临时党支部。1938年7月,经省委难民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党组织秘密动员,由上海各界慈善机关总联合会出面,以遣散难民回乡,到江西、浙江等地垦荒为名,组织了第一批共700多名青年学生和产业工人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后来,又有几批约400人陆续到达皖南军部。这些从上海等地来参加新四军的青年,大多数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有抗日爱国热情,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接受

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过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到皖南军部以后大多数都进教导总队学习。

二是新四军设在各地的办事处招募和动员来的青年学生。在建军之初,新四军设在各地的办事处设立招生站、招兵站,为新四军招募兵员、输送干部,送往军部教导总队培训。长沙办事处在短短两个月中,就在湘南省立第一师范、长沙中学等校招收了近2000名学生,其中部分送往延安,大部分送往皖南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向新四军军部输送的进步青年近2000人。据不完全统计,仅1938年至1939年,各办事处向新四军军部输送的人员近3万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到皖南后先到教导总队学习培训,然后分配工作。

三是来自南方八省游击区的红军干部和老战士。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游击队集中整编而成。这些游击队的红军老战士习惯于游击战争的生活,缺少正规的军事训练,对军事战略战术了解很少,思想作风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培训加以教育和整顿。

四是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新四军到达皖南以后,新四军各个支队相继挺进苏南、皖中敌后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对广大群众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大批知识青年和工人、农民参军,其中的一些人先进教导队进行培训,然后分配工作。

这些来自南方八省坚持游击战争的老战士和从沦陷区、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其他地方来的知识青年、产业工人等都需要有一个培训教育,提高思想觉悟的过程,以实现从老百姓到革命军人的转变。比如,从南方八省游击地区来的老游击战士有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但文化水平很低,没有见过大城市和现代工业。他们受过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而对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情况所知极少,虽然长期受共产党的领导,但缺乏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青年学生文化水平较高,一般是初中高中程度,有少数大学生,他们目睹日本军队的侵略屠杀,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但缺乏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他们虽然没有经过艰苦生

活的磨炼,但都抱着为国捐躯的决心,所以参军后很快就习惯于艰苦奋斗的环境。产业工人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是小学水平,有些人甚至是文盲。他们身受资产阶级剥削,而且大多数是共产党员,但在艰苦奋斗的环境中,没有机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对资产阶级如何剥削工人,工人阶级如何求得解放,大多数人也缺乏明确的认识。至于当地新参军的青年虽有革命热情,但懂得的革命知识极少。上述几种人都需要进行学习培训。他们在学习中都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他们都有强烈的民族革命意识,没有名利思想,相反,他们决心把自己的一切(包括最宝贵的生命在内)奉献给民族解放事业。这也是办好教导总队,培养教育干部的有利条件。

教导总队的学制一般为半年。在总队成立以前的教导队原有的四个队,作为第一期,于1938年9月毕业。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3月为第二期。全总队有两个大队,十个队,学员1000余人。学员来源,除上海等地党组织输送来的党员、工人和青年学生以及各部队抽调的干部之外,从国民党统治区的浙江、江西、福建等东南各省也来了大批青年,以及南洋各地归国的华侨当中,也有不少青年前来参军,其中来自菲律宾的华侨青年就有数十人。

第二期两个大队主要负责人和各队培训对象是:第一大队为军事队,大队长贺敏学,教导员刘文学。一大队辖三个队。学员从部队抽调来的,很多是老红军干部或战士。一队培训连级军事干部,二、三队培训排级干部。第二大队为政治队,大队长乔信民,后由饶守坤接任,教导员谢祥军。二大队也辖三个队,四队学员全部是党员,大多数是老红军,培训连级政工干部。五、六队则是知识青年队。

直属总队部的有四个队:七队、八队、入伍生队和青年队。七队和入伍生队也是知识青年队。女生队编为八队。青年队的学员年龄都不到15岁,实际上是少年队。

第三期是教导总队学员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期。一方面,我军在敌后开辟了大片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新参军的青年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武汉失守后,南方各省去延安交通不便,有相当一批本来打算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转往皖南参加新四军。这些刚参军的青年一般都是首先进教导队进行培训,然后分配工作。

从1939年四五月至10月为第三期。这一期共13个队,学员1200多人。第一大队共三个队,大队长林维生,后由张日清担任,教导员程业堂。一队培养连级干部。二队是知识青年队。三队培养训练班、排长。第二大队共三个队,大队长饶守坤,教导员彭德清。四、五、六队培训对象与第二期相同。

总队部直属七个队。其中,有两个人伍生队,两个女生队,还有文化队和青年队。

新设上干队即中高级干部队,共编为几个队。培训对象是团营级干部。队长费元庆,支部书记曾昭铭。学员30余人。

文化队队长何士德,副队长邵维,指导员殷扬(扬帆)。学员70余人。

正当教导总队蓬勃发展、影响日益扩大之际,国民党当局极力限制和削弱我军。由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出面对新四军进行无理指责,要求缩编教导总队。因此,军部在1939年9月间决定,将教导总队改名为教导队,训练处改名为总教室。训练处长薛暮桥改称为总教。女生队毕业后停办。

尽管如此,教导队第四期仍有十个队。学员近1200人。第一大队大队长张日清,教导员程业堂。一、三队培养对象与第三期相同。二队改为培训排级军事干部。第二大队大队长张闯初,教导员罗福佑。四队培训对象与第三期相同。五、六队培训排一级政工干部和连队文化教员。上干队仍称九队,队长林维先,支部书记梅嘉儿。

第四期自1939年10月起,先后分批开学,1940年三四月毕

业。第五期接着开学。此时教导队又恢复教导总队的名称。周子昆仍兼总队长,冯达飞任副总队长兼教育长,余立金任政治处主任,薛暮桥任训练处长。朱毅、张元寿任队列处正副处长。全总队共有两个大队,11个队,学员800余人。各队培训对象未作变动。

第五期的各队始终处在紧张备战和进行战斗的环境中,原定学习期限六个月,后宣布延期毕业。大部分学员继续留在教导总队直到皖南事变的发生。

教导总队是以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为队训的。同时,也以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毕业证书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作为学员的座右铭,以加强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

教导总队的教学计划、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基本上与延安抗大相同。政治教育以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统一战线、民运工作等为主要内容。从基本的马列主义理论和阶级政策、民族政策等方面进行启发教育,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军事教育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地形学、兵器学、班排连战术等为主要内容,培养军事指挥员具有新型军队的革命素质和指挥作战能力。

在教学方法上,政治教育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少而精的原则,注重理解,融会贯通,不死背条文。军事教育,要求精讲多练,课堂讲课与野外练习相结合,提倡军事民主,官兵互教。

当时,有许多文化名人、知名学者来到新四军军部,他们成为教导总队的教员,如夏征农、姚耐、陶白、罗琼等,兼职教员则有薛暮桥、冯定、朱镜我、彭伯山等。新四军的领导人叶挺、项英、袁国平等,也常来教导队作抗战形势和当前任务等专题报告。

教导总队对实兵对抗演习十分重视,经常进行步兵班、排、连攻防对抗演习,以培养和提高指挥员的军事素质和指挥能力。

教导总队的学员在学习上紧张的，生活上是艰苦的。教导总队既无教室，又无桌椅。每个学员用稻草编织成一只圆形草垫，席地而坐。上政治课时，则在树荫下或找遮阳之处；寒冬时则集结在阳光照耀的小山岗上。学员们双膝弯曲，作为临时的“课桌”听教员讲课，俯首作笔记。上军事课时，常在野外各种地形上摸爬滚打，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学员们的学习生活是紧张有序的，每天清晨，各队就集合在石埠桥大操场上，进行紧张的队列训练和战斗动作的练习。有时全副武装以班、排为单位进行越野跑步或登山竞赛，每周还举行夜间紧急集合，以检查战备思想状况。在日常生活管理上，则严格执行条令条例，认真贯彻集体化、军事化的管理教育。学员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伙食费的标准每人每天一角二分，只能以素食为主，每周吃一顿荤菜。穿着也很简单，时届寒冬腊月，仍脚穿草鞋，单衣短裤，被褥单薄，难以御寒。但学员的精神生活是很充实的。每到周末，各队举行各种晚会，有诗歌比赛，有歌咏，有讲解前方作战的战例，有讲工农红军长征中的革命故事。一到周末，大家精神奋发，兴高采烈地参加周末晚会。

新四军在皖南时期除举办教导总队培训部队的军事、政治干部以外，还重视卫生干部和医务人员的培训，举办卫生干部培训班。

新四军在建军之初，叶挺就任军长、赴武汉经上海时，特邀请医学博士沈其震同往军部任军医处处长。他到任后，即着手招聘医药人员。他先后聘请了上海医学院和沈阳盛京医学院毕业的吴之理、章央芬、王聿先、宫乃泉、崔义田、齐仲桓等一批著名医生，又聘请了从中央医院高级护士学校毕业的郑素文、马万芬、朱士英等一批高级护士，以及药师、化验师等。这些医学专家到达皖南后，除建立军部医院外，即着手筹建卫生干部培训班，培养部队的医务人员。并着手建立健全了各级卫生机构，军、支队、指挥部都设有

军医处和休养所,团设卫生处,营有卫生指导员(医务员)。并建立了军部医院和后方医院。同时开办了卫生干部培训班,培训急需的医务人员。先后主持过培训班和讲课的有:沈其震、王聿先、崔义田、宫乃泉、戴济民、齐仲桓、章央芬、王雨田、杨光、郑素文、左英、薛和等。这些医学专家亲自任教员,分别上课,有时一个人担任了大半课程。从1938年—1940年,先后不间断地开办了六期卫生干部培训班,每期4—6个月。第一期基本上是轮训红军老卫生干部,从第二期起到第六期均是培训抗日青年学生。每期学员均在30—50人,第六期开学后因皖南形势紧张即北撤苏北。在皖南共培训250名左右的卫生干部,分配到各个支队和留军部医院工作。

教员上课都是就地取材进行教学,自编教材讲义,刻蜡板油印,用皖南土造纸印刷。自制教具,用人体骨骼架自己挖制做成人体骨架模型,用狗、青蛙等进行解剖实验,挂图也是自己制作。

培训班的教学坚持从抗战的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强,少而精,边教理论边实习,时间短,收效大。学员毕业后到卫生队和医院就能独立工作,迅速解决问题。

经过培训的学员绝大多数都成为后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卫生战线上的领导骨干。有的同志在抗日战争中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当局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同时密令顾祝同率领数十万军队准备进攻皖南新四军军部。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多次指示和催促之下,新四军军部决定北撤。1940年12月,军部后方机关人员分两批先行北撤,每批约1500人。教导总队的撤离干部由薛暮桥带队,将总队部机关和训练班所辖教育干部编成干部队,共约300人,在12月9日离开中村驻地,前往苏南,转往苏北,干部中有不少人后来到达盐城,在抗大五分校工作。

1941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北撤。教导总队留在皖南的干部学员改称教导团,编入中路纵队,随军部一同行动。此时,冯达飞调任中路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教导团由余立金统一指挥。皖南事变发生后,教导团较好地执行了中路纵队的后卫任务。当所有作战部队被敌分割包围之后,教导团依然保持较完整的战斗力,成为叶挺军长直接指挥用来进行突围作战的部队之一,在最后几天进行了激烈的战斗。1月9日高坦战斗,10日至12日的东流山战斗,13日火云尖突围,教导团全团奋勇作战,非常顽强,一直战斗到最后时刻。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了。1月7日,当我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9000余人行至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军七个师8万余人的围攻。新四军奋起出击,浴血奋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遭受惨重损失,新四军军部被毁,叶挺军长被俘,项英副军长和周子昆副参谋长遭叛徒杀害。

皖南事变结束后,教导团有少数人突出重围,到达长江以北我军活动地区。因分散突围而不幸被捕的同志在上饶集中营进行了英勇斗争,坚贞不屈。有不少同志积极参加了1942年5月25日的茅家岭暴动和1942年6月17日的赤石暴动。这两次暴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当中,多数是教导总队的干部和学员。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为教导总队的历史写下了灿烂辉煌的最后一页。

(二)华中抗大五分校和抗大总分校

1940年11月,华中总指挥部决定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华中第五分校,陈毅兼任校长、政治委员,赖传珠兼任副校长,冯定任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谢祥军任教育长,谢云晖任政治部副主任。

抗大五分校是以江北军政干部学校和苏北抗日军政学校为基础组建而成的。江北军政干部学校原隶属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

兼任校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刘毓标任政治处主任,共辖三个大队。其中两个大队于1940年由谢祥军、刘毓标率领,随同刘少奇从淮南地区到达苏北盐城,成为抗大五分校的组成部分。(淮南地区还保留一个大队,1941年5月在它的基础上扩建为抗大八分校)。苏北抗日军政学校隶属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陈毅兼任校长,冯定任副校长,谢云晖任政治部主任,它于1940年10月开学,后随军部到达盐城,合并于抗大五分校。

抗大五分校成立后不久,又从两个方面充实和加强了领导力量和教学力量。一是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的一部分,由薛暮桥率领、先期撤离皖南的教导总队部机关干部和训练处的教育干部,以及在皖南事变中由余立金为首的突围出来的原教导总队的部分干部,如陶白、陈铁军、唐炎等近百人,他们到达盐城后被分到抗大五分校。二是1941年6月初,华北抗大总校派来由洪学智率领的华中大队130余人到达盐城支援华中抗大五分校。这两个方面人员的到来充实和加强了抗大五分校的领导力量和教学力量。

上述两方面干部充实到抗大五分校以后,军部重新确定了抗大五分校的领导干部。校长、政委仍由陈毅兼任。任命冯定、洪学智为副校长,谢祥军、贺敏学为正、副教育长,余立金、吴胜坤为政治部正、副主任,薛暮桥、谢云晖为训练部正、副部长。

抗大五分校共举办两期。第一期,从1940年11月至1941年5月,教学时间近六个月。这一期学员共1478人,其中江北军政干校来的400余人,苏北抗日军政学校来的400余人,其余600多人是新招收的学员。当时学员的来源,除了两个干校的学员外,一部分是从部队调来的连、排、班级干部,以及少数营团级干部;一部分是从上海、江南以及苏北,皖东地区招来的青年学生,还有不少来自东南亚的爱国华侨青年。

抗大五分校第一期共11个队,编为三个大队:一大队是军事队,以从部队调来的学员为主,辖四个队,大队长严昌荣,教导员黄

队。一队和四队分别培训连级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二、三队培训排级干部。二、三大队是政治队，各辖三个队。二大队副大队长殷逸，教导员石炎，辖五、六、七队。三大队队长周长胜、教导员朱迅，辖八、九、十队。二、三大队以招收的知识青年为主，也有少数的地方干部。直属校部的是女生队，队长钟平、指导员克宁、张西蕾，支部书记王丽英。此外，还有军部责成代管的炮兵连和警卫连。

1941年2月，苏北日伪军从扬州、高邮、如皋出动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侵占海安、东台后，直逼盐城。五分校第一期学员经受了这次反“扫荡”的考验。一大队学员分配到盐城以北，配合三师进行反“扫荡”，参加收复上岗的战斗。二大队也担负战斗警戒任务。在上岗战斗中，一队队长程贤义等四位同志壮烈牺牲。在春季反“扫荡”中，五分校学员在作战中伤亡、失踪及其他减员共200多人，毕业分配的学员共1262人，其中女生129人。

第二期，从1941年7月开学，到1941年底结业。中间经历日伪军约两个月的夏季反“扫荡”，实际学习时间近半年。这期招收学员1526人，编成三个大队12个队。各队培训对象与第一期基本相同。一大队大队长何家东，教导员黄瑛，二大队大队长张兴发，教导员于辉；三大队大队长田培芳，教导员朱迅，后由吴凡吾接任。

1941年7月，日伪军17000余人，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企图围歼华中我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7月20日，日军分四路进攻盐城，军部撤向阜宁地区。抗大五分校副校长洪学智已兼任盐城卫戍司令员，他率领抗大五分校学员抗击进犯盐城的日寇，掩护军部后方机关转移。洪学智率一大队的一队在盐城登瀛桥等地布设水雷，组成若干游击小组，骚扰敌人，并炸伤日军汽艇一艘，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

随后，奉军部命令，洪学智率领抗大五分校一部配合一师二旅在盐城南面伍佑作战，五分校的一大队攻击南洋岸，在大雨中战斗了一夜后撤出阵地，共伤亡十余人，其中牺牲六人。在反“扫荡”期

间,学校在转移途中又在南洋岸附近和敌人相遇,经过激烈的战斗虽把敌人打回去了,但各队牺牲的同志有20多人,有一个名叫锦明的学员,他只有18岁,原来在主力部队的一个连里当文书,是调来抗大学习的。在战斗中,他打死了五个敌人,枪里的子弹打完了,四颗手榴弹只剩两颗,正准备从玉米田里撤走的时候,敌人一颗掷弹筒炮弹炸伤了他,当敌人临近他的时候,他把两颗手榴弹的导火索一起拉响了,与敌人在玉米田里同归于尽。连同这一次牺牲的同志在内,抗大五分校在夏季反“扫荡”中,战斗伤亡和减员共60余人。

第二期学员在1941年12月底以前先后结束。全校在1942年元旦举行了毕业典礼。这一期毕业学员共1257人,其中女生240人。

到1941年12月,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北起陇海铁路,南至长江,西至津浦路,东到黄海边,已建立起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二、三、四各师在这四个行政区建立了军区。五、六、七师也在鄂豫边区、皖西地区以及苏南地区,皖江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随着新四军主力部队的扩大,需要对军队干部进行培训以提高军政素质和领导水平。仅靠抗大五分校对干部进行培训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和新四军军部做出决定,以抗大五分校为基础成立抗大华中总分校,再从原来的五分校抽调一部分干部组建新的抗大五分校,划归新四军三师领导。其他各师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建立抗大分校,培训本师干部。

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抗大华中总分校仍由陈毅兼任校长,韩振纪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薛暮桥为代理政治部主任。抗大华中总分校的任务是:统一领导华中各抗大分校的工作,建立华中统一的军事学校教育制度。要求“由上而下,由下而上,建立完整的统一的军政制度,建立工作的报告制度和检查制度。”

“华中各抗大分校接受总分校的领导,成为总分校的组成部分。各旅、团教导队接受各分校的领导,成为各分校的组成部分。”要求“由上而下,山下而上建立完整的、统一的军教制度,建立工作报告制度和检查制度。”(《华中局关于抗大工作的决定》)这样,华中地区的军队干部教育,便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干部教育体系和网络,向干部教育的正规化迈进了一大步。

新建的抗大总分校比较精干,只招收少量学员,主要轮训军队团营级干部,培训参谋、工兵干部。全校共五个队,一队为上下一队,培养团营级指挥员;二队为上中二队,培养团营级政治干部;三队培养连级军政干部,四队培养团级司令部参谋,五队培养工兵技术干部。学员约300人,学制一、二队为一年,其余三个队为八个月。总分校办了一年,培训了一期学员以后,1942年12月,日军准备以盐阜区为重点,进行“拉网”式大“扫荡”。新四军军部于年底向淮南地区转移,在1943年年初抵达盱眙县黄花塘。抗大华中总分校随同军部一同转移。到达牛柿湾。这时,根据华中局和军部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将总分校的干部、教员和学员全部分配到部队和各分校,抗大华中总分校就宣告结束。

抗日战争期间,除了华中局、华中军分会直接创办的抗大五分校和抗大总分校以外,大多数师也先后创办了抗大分校。现在将各师所办的抗大分校介绍如下:

(三)四师抗大四分校

四师抗大四分校是新四军各师办得最早、历时最长的一所军事干部学校。

1938年9月,彭雪枫从山西临汾办事处带过来的冲锋枪排和手枪班来到河南竹沟,和竹沟教导大队的学员编成一个大队,共373人,长短枪190支,在竹沟誓师出发东征。10月11日,部队到

达豫东西华社岗,与吴芝圃部会合,统一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副司令员吴芝圃,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政治部副主任谭友林。支队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连,共1020人。各类枪支672支。1938年11月,彭雪枫的基干部队已发展到七个团、一个总队和一个直属队,共7300多人。在部队发展壮大过程中,彭雪枫十分重视干部的培训。早在河南确山县留守处时,彭雪枫就将学兵连改编为教导队,开始培训干部。后来又把教导队扩大为教导大队,方中铎任大队长,周季方任政治教导员。1938年3月初,教导大队第一期开学,有三个男生队,一个女生队。又招收各地的爱国知识青年,分设青年干部、地方干部、妇女干部以及电台、机关、卫生、司号、供给等专业队。彭雪枫讲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张震、岳夏耕讲军事工作,王国华讲群众工作。在游击支队组成前,教导队和教导大队共培训各类干部1500多人,大部分分到部队工作,少数回地方组织地方武装。

1939年11月2日,叶挺鉴于彭雪枫的部队发展壮大,指示彭雪枫把部队改称新四军暂编第六支队。到1940年1月,彭雪枫部除二个主力团、一个特务团外,另有四个总队和三个独立团,计17800人。为了适应部队发展的需求,经中央军委批准,在支队教导大队的基础上,于3月18日在永城县麻冢集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校长彭雪枫(兼),副校长吴芝圃(兼)、张震,政治部主任萧望东,教育长方中铎、刘作孚。同年6月,抗大总校为了支援华中抗大四分校,组织了一个200多人的华中派遣大队,由刘清明、李干辉率领,到新四军第六支队协助办抗大四分校,加强了四分校的领导和教学力量。改由刘清明任教育长,李干辉任政治部主任。校政治部出版了《抗大生活报》,组织了抗大生活剧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抗大四分校第一期共有学员500余人,学员来源:一是各地来的学生,二是部队调来的干部,编成军事、政治、民运三个大队,九

个中队,另外还有一个女生队。抗大四分校第一期于1940年3月18日开学。彭雪枫校长,吴芝圃、张震副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讲了话。勉励同学们发扬革命作风,继承革命传统,做一个有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抗大四分校共办了七期,历时五年半。仅第一、二期毕业的学员就有1253名,先后共培训了四五千名干部。1944年9月11日,彭雪枫牺牲后,由新任四师师长张爱萍兼任校长,四师政委邓子恢兼任政委,张震、冯文华任副校长。1945年3月24日,为了纪念彭雪枫,四分校更名为雪枫大学,解放战争开始后结束。

(四) 二师抗大八分校

二师抗大八分校的前身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军事干部学校和二师的军政干校。再往前可追溯到1939年5月创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教导大队。

为了加强对新四军江北部队的领导,1938年冬,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由皖南军部渡江到皖中地区,于1939年5月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江北指挥部在庐江东汤池组建了教导大队,教导大队下辖两个队。大队长由赖传珠兼任、副大队长谢祥军,政治教导员刘毓标。9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开始培训干部。

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很快,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由5000人很快发展到1万多人。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原局决定,将江北指挥部的教导大队扩建为军政干部学校。1940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军政干部学校正式成立。由张云逸兼任校长,赖传珠任副校长,谢祥军任教育长,刘毓标任政治处主任。学校迁至津浦路东天长县汊涧镇。1940年全校有三个大队,九个队,学员近千人。

不久,谢祥军、刘毓标率两个大队随刘少奇到达盐城,成为抗大五分校的组成部分。留下的一个大队继续办学。

1941年5月4日,根据华中局和军部的指示,在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留下的一个大队的基础上成立抗大第八分校,并充实干部配备,扩大招生。八分校校长仍由张云逸兼任,副校长由罗炳辉兼任,冯文华任教育长、高志荣任政治部主任,黄一平、扬采衡先后任训练处长,王淑明任训练处副处长。校址起初设在天长县张公铺,后迁至龙岗。

抗大八分校成立后,共办了四期。

第一期学员700多人,设一个大队,七个队,第一队是营级干部,第二队是连指导员,第三队是连长,第四队是排级干部,第五队是游击队长,第六队是地方干部,第七队是青年学生。这一期学员经过八个月的政治军事教育,于1942年春结业。

第二期于1942年4月开学,有学员近千,分九个队。都是二师营、连、排级干部。他们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基础较差。学校按学员文化程度高低进行编队,其中高中以上水平的学员编为第一队,其他各队学员从进校起先进行为期三个月预科文化学习,然后转入本科学习军政业务。

1943年,抗大总分校撤销后,派来数十名有教学经验的干部和教员来八分校,充实加强了八分校的教学力量。第二期学员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于1943年秋结业。

第三期学员共有500多人,分五个队。这一期的主要任务是整风学习。学员都是师的营、连、排干部。开学不久,根据中央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八分校改为二师教导团。冯文华任团长,刘毓标任政治委员,黄元庆任参谋长,朱云谦任政治处主任。这一期学员学习一年多,于1945年春结业。

第四期有学员300多人,分三个队,于1945年5月开学。这期主要是对二师的基层连排干部进行短期的军政训练。同年八月,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了配合大反攻,学员学习提前结业。从此,八分校及其以后的教导团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八分校坚持为部队和淮南根据地培养基层军政干部的方针。学习的课程,一是军事课,主要讲军事条例、条令,班、排、连攻防战术,遭遇战的处理等,并进行野外实习。二是政治课,其内容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统一战线教程、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三是文化课,1942年增设了国文、数学等文化基础课。

抗大八分校同其他抗大分校一样,贯彻执行党中央为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军政教育的内容、课程设置、时间分配及教学方法,与其他分校大致相同。但与其他抗大分校相比,也有其特点。八分校的课程中文化教育所占比重较大,学制也长一些,有两期学员的学制都超过了一年。

举办文化预科是八分校办学的一个特点,由于学员的文化水平不高,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学员占一定比重,因此,学员入校后先进预科学习文化课。文化教育的内容有国文、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算术等五门课程。教材大部分是由师政治部和学校自己编写的。学员经过预科的学习,为进入本科学习打下了基础。

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教导大队、军政干校到抗大八分校、二师教导团,在六年多的时间里,一共训练了近4000名学员,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二师所属部队以及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培养训练了大批干部,受到陈毅的表扬。

(五)一师抗大九分校

抗大九分校是在抗大苏中大队的基础上扩建的。1941年7—8月间,日军对我苏北、苏中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以后,又继续进行分区“扫荡”、“清剿”,把苏中抗日根据地分割成零碎小块。集中办干校培训干部比较困难。9月间,盐城抗大五分校的一部分干

部,在该校训练部副部长谢云晖的率领下来到苏中,与原一师苏中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合并,成立抗大苏中大队,作为组织抗大九分校的准备。原苏中军政干校教育长吴肃任大队长,谢云晖任政治委员。大队下设五个队:一个连排军事队,一个政治队,一个知识青年队,两个地方武装队,1942年4月毕业前,已发展到八个队,学员600人左右。

抗大苏中大队成立后,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进行办学,一面学习,一面战斗。1941年10月苏中大队在东台县三仓镇曾被日伪军包围,在突围中,干部、学员伤亡近30人。12月中旬苏中大队由东台经如皋县向南通、海门地区转移。苏中大队在90天中跑了七八百里,先后参加了八次战斗,平均十天左右就有一次。这批学员于1942年春结业。

1942年5月,师部根据华中局的决定,将抗大苏中大队正式改为抗大九分校。校长由一师师长粟裕兼任,张日清任教育长,谢云晖任政治部主任,刘亚齐任副主任。全校有学员600多人,编成七个队:一个连级军事队,一个连级政治队,一个参谋训练队,一个青年学生队,一个地方武装队,两个专业队(电台训练队、会计训练队)。此外还有一个医务干部训练队。

6月15日,日伪军3500余人,分九路“清剿”我苏中四分区,情况十分严重。抗大九分校奉命突破封锁线,从吕四港附近的三甲镇人海乘船北上。在海上生活了十多天,在船上仍进行军事、政治和文化学习。每天吃的是元麦面炒的干粮。过了几天,船上淡水吃完,只好用海水和着炒面粉充饥。师生在船上度过了十多天艰苦的海上生活,在东台琼港附近登陆。登陆后,一直在台北、盐东的海边地区活动,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教学,按计划完成了教学任务。

抗大九分校政治部主任谢云晖在1942年的总结报告中说:“一年来我们流动区域,北至盐城,南至崇明,东到黄海,差不多整

个二分区、四分区都走遍了。我们经历了盐城、台北、东台、泰东、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共八个县……一年中，我们移动宿营地百余次，平均每周移动两次到三次，所走途程约3000里，平均每次约20里。”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面战斗，一面学习”；“武装保卫学习”。在敌人举“扫荡”，或情况严重时期，他们主要重心放在行军、作战、“保存自己”上。这时教育就成为次要，教育必须不妨碍战斗。在敌人“扫荡”结束，或情况比较缓和的时期，他们的主要重心放在学习教育上。他们还提出要善于钻空子，这个空子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争取时间，一个是寻找空间。时间的产生是由于“扫荡”必然有间断，一连串“扫荡”之间便是时间的空隙。空间的产生是由于敌人不能占领每一块土地，在据点与据点之间、“扫荡区”与“扫荡区”之间便是空间的空隙。他们就是利用这种时间与空间的空子来进行学习。

1943年开始，日本侵略者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敌后战场，对苏中根据地实行反复“清乡”，斗争形势十分严重。1月上旬，苏中区党委和一师师部决定：抗大九分校南下苏南，前往十六旅驻地溧水地区。一旅和三旅的两个教导队划归九分校建制。苏中党、政机关和部队也抽调部分干部到苏中党校学习，由党校校长刘季平率领，与抗大九分校共同南下。于1943年2月中旬，九分校和苏中党校全体人员先后分批乘船渡江，又通过运河和铁路封锁线，到达茅山西南溧水地区的里佳山、云鹤山一带，胜利完成了从苏中到苏南的转移。

2月26日，根据一师师部的指示，抗大九分校进行整编。党校并入九分校，校长仍由粟裕兼任，刘季平任副校长，杜屏任教育长，张崇文任政治部主任，姚耐任副主任，廖昌金任参谋长。校部下设一个直属的党训队和三个大队。党训队主要由苏中党校学员、师部服务团和部分营以上干部组成。一大队以一旅教导大队为主组成，下辖三个队：一队为军事队，主要由一旅连、营军事干部组成；

二队为原校部所属的连级军事队；三队为政治、文化干部队，主要由一旅连、营干部和部分文化干部组成。二大队为新划归九分校建制的十六旅教导大队，下辖四个队；四队为排级干部队，五队为连级干部队，六队为政文干部队，另外还有一个培养重机枪手和迫击炮手的机炮队。三大队以三旅教导大队为主组成，下辖三个队，七队为连级干部队，八队为三旅排级干部队和原校部所属的十八旅教导队合并组成，九队为原校部所属连级政治队。全校约有1200余人，是九分校的最盛时期。

为了保密，抗大九分校对外代号为“特务团”。杜屏为团长，刘季平为政委。大队对外称营，中队称连，党训队称为特务连。

整编后，3月10日，抗大九分校在溧水甘戴村举行开学典礼。十六旅政委江渭清致贺词，刘季平作动员报告，提出校风八大要求。开学后，一大队、三大队在上下芝山、二大队在云鹤山，以山野为课堂进行教育训练。

九分校到溧水后，日伪军开始对苏南地区连续“扫荡”。3月，又宣布在茅山、大溧地区为“清乡区”，开始了“清乡”与反“清乡”的斗争。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调集主力部队共12个团1.5万人，大举向我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九分校驻地溧水地区进攻。我军顽强作战，抗大九分校的干部学员也多次参战。在西线，抗大九分校三个大队和四十七团的一个营，面对国民党军队主力五十二师、一九二师及江苏省保安纵队七个团的猛烈进攻，浴血奋战，节节抵抗，牵制了顽军主力，赢得了东线主力部队转移的时间。在战斗中，五队队长陈吉冲等同志英勇牺牲。当顽军五十二师、一九二师另一部进攻我铜山阵地时，扼守铜山是抗大一大队的一队和三队。我一队学员都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军事干部，在大队长汤万益的指挥下打得机智顽强，先后击退敌人的数次进攻。顽军转而攻击我右翼的三队阵地。我三队学员大多数是政工干部，还有一些没有打过仗的文化干部。他们面对人数众多和装备精良的顽军，毫无

惧色，在政治指导员唐昆元、副大队长文有武的带领下，坚守阵地，浴血奋战。我一大队一队和三队与顽军激战到傍晚，终因顽军火力猛烈，敌我众寡悬殊，伤亡过大而撤出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大队长汤万益、教导员唐昆元、副大队长文有武、三队队长张茂发等同志均壮烈牺牲。

在这次苏南反顽战役中，九分校三个大队全部投入战斗，付出了血的代价，伤亡近200人，其中阵亡的团级干部3人，营连以下干部和学员105人。

抗大九分校突围以后，经过短期休整后，师部决定抗大九分校渡江北上，到淮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区休整。1943年4月22日傍晚，经过50里路的急行军，从江边的营防口附近渡江到仪征县胥浦镇附近。5月上旬到达天长县大通镇，7月全校移驻桐城以东的龙岗镇。按照上级指示，精简了组织机构，取消了大队建制。全校缩编成五个学员队，第一队是连级军事队，第二队是排级军事队，第三队是班级军事队，第四队是政治队。此外还有一个以苏中党校学员为主的党训队，主要是营级以上和地方区级以上干部以及文艺骨干和女同志。在此前后，有一批学员提前结业，分赴工作岗位。

九分校从苏南突围回到淮北驻地以后，陈毅、张云逸、粟裕等领导同志曾先后到九分校进行视察慰问。陈毅说：“你们是日行百余里，爬山渡江过铁路，是从龙潭虎穴里闯过来的，很不错。你们有一面作战、一面学习的经验，要好好总结。”不久，校长粟裕、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也先后来校检查工作，并亲自向干部、学员讲课、作报告。军、师首长的关怀和教育，使全校师生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九分校在龙岗住了八个多月，集中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军事教育的重点是提高学员对游击战术的运用和组织指挥能力，着眼于使具有实践经验的学员把实践上升到理论，提高军事素质。

讲授游击战术是军事教育的中心。军事教育的主要方法是课堂讲授、示范动作、操场训练、野外实习。并结合战例尤其是学员自身经历,总结和交流经验。教育中贯彻精讲多练的原则,把主要时间放在做实际动作和野外演习上。

政治教育分一般的政治课和整风学习两个方面。前期主要是一般政治课程,后期主要是整风学习。政治教育除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外,主要是进行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整风学习的方法主要是学习整风文件,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进行反省、自觉清理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共产主义人生观。

文化教育主要是集中时间学文化。对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进行扫盲;对初小水平的进行语文、算术、自然、历史等教育;对少数文化稍高的进行阅读、写作指导等。

九分校于1944年3月从淮南龙岗向苏中地区转移,经车桥进驻金吾庄,5月底各队学员相继结业。九分校原有机构基本上转入苏中公学,从而完成了历史任务。

九分校从1941年9月成立抗大苏中大队起到1944年6月1日苏中公学成立止,在近三年中,辗转于一师苏中的一、二、三、四分区和三师盐阜区、六师苏南地区、二师淮南地区、四师淮北地区。学校规模最小时仅3个队,全盛时有11个队。在历时近三年的时间内,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一面战斗,一面学习,为革命培训了3000余名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六)五师抗大十分校

孤悬在鄂豫边区的第五师,长期处在日伪顽夹击之下,处境严峻。但他们于1942年2月在随营学校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五师抗大十分校。五师师长李先念任校长兼政委,萧远久任副校长,郑绍文任副政委,冷新华任政治部主任,张永泉任训练部长。1943年秋

调整领导成员,杨焕章接任副校长,余潜任政治部主任,邝林任教育长。

五师抗大十分校第一期于1942年2月举行开学典礼。五师和鄂豫边区政府领导人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都到会讲了话。李先念作了《我们的大学》祝词。他说“抗大十分校在边区抗日人民四年艰苦的胜利斗争中诞生了!它是边区人民四年英勇斗争的成果;而它又将是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豫鄂边民族英雄的摇篮!虽然它的教授不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但是,这里教职员都是为中国人民抗日事业,流过血,绞过脑汁,都是真理的拥护者,革命的战士。他们的工作方向,是向着‘中国抗日人民’。因此,它决不是制造‘一党专政’的专家‘养成所’。它决不是口是心非,自欺欺人的政治骗子‘镀金炉’。它是豫鄂边英雄儿女的‘萃英堂’,新中国的‘育才院’”。

五师在1942年4月2日“关于创办抗大十分校的工作”意见中指出:“过去随营军校培养了很多干部,蓄积不少经验对部队有很大贡献。但随校未能大量吸收部队外知识分子青年,学员质量太低,数量又少,不能满足环境的要求;在教育方法与内容上尚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毛病。现在边区及五师日益扩大,需要大批干部,而部队精兵化要求更要大规模培训干部,提高其军政水平。边区周围在敌伪顽奴化压迫下的青年不下十万,边区内埋没的人才也为数极多,他们极希望能受抗战教育,而后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在这种客观主观的要求之下,遂决定创办抗大十分校。”^①

五师抗大十分校的学员来源,一是部队的营、连、排干部,有计划地挑选这些干部到抗大学习受训。二是在根据地各地成立招生处广泛招生,吸收根据地和敌占区的知识青年来校学习。第一期

^① 《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4辑。

招生 1000 名。分预备班、本科及高级班。学习时间半年。共编成三个大队。其中一个大队就有 360 名排级干部,其他是知识青年队。抗大十分校从 1942 年 2 月至 1945 年 9 月,先后办了五期,每期学员 1000 人左右。共培养 5000 多名干部。同时,五师所属的各个旅还办了教导队和随营学校,培训了 2000 多名班排干部。

五师抗大十分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理论教育。主要进行抗日战争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和抗战胜利的信心。其中又特别突出阶级教育,着重清除学员思想上对国民党蒋介石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幻想和错误认识,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在十年内战中屠杀我党无数党员,对日寇妥协求和断送东北华北等罪恶事实,提高学员的阶级觉悟,肃清国民党的影响。在理论教育方面,主要是讲解社会发展史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提高大家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认清新中国的光明远景。同时还注意进行思想意识和生活作风教育,着重教育学员克服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改造不良的生活作风,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

二是军事教育。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主要教材,讲解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并进行战术训练和反“扫荡”的实弹演习。

三是文化教育。对于文化水平低的学员,先进行文化补课,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然后再进行政治理论教育。

在五师抗大十分校办学过程中,五师的领导同志十分关心教学工作,亲自对抗大学员讲课。李先念就曾在第三期学员毕业大会上作了题为《革命军人的特点与远大前途》的报告,给学员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五师抗大十分校的学员,每期经过半年时间的教育和艰苦生活的锻炼,思想觉悟大大提高,革命决心大大增强。比如第一期四队的学员在白兆山的保卫战中,配合正规部队坚守太平寨一线阵

地。他们以一队之众,抵御顽军二个团以上的兵力,在战斗到每人只剩下三五颗子弹时,全队学员还是沉着勇敢作战,固守阵地,并用石头来代子弹,打退了反共军上百次的进攻,完成了光荣的牵制任务。

(七)七师抗大十分校

新四军第七师也举办了一个抗大第十分校,于1945年4月建校,1945年10月改编为七师随营学校,历时约半年。它的前身是1941年5月成立的新四军七师教导大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在安徽省长江两岸坚持游击战争的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和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人员,奉命组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

为适应七师发展的需要,师部决定,以江北游击纵队二团的教导队为基础,成立教导大队培训干部。下设两个中队:一个队是由部队调来的连排级干部队,培养军事干部;一个队是接受地方新参加工作的,具有初中或高小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培养部队的文化教员、青年干事等政工干部。

1942年至1944年是七师的巩固和发展时期,创建了正规兵团,全师扩大到6000余人,在皖江地区建立了正规的抗日根据地,皖江区党委也正式成立。随着皖江形势的发展和七师部队的扩大,要求师教导大队培养更多的干部,以满足部队的需要,这时教导大队由原来的两个队扩大到四个队。

1943年初,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实行“精兵简政”,缩小机关,减少单位,加强基层。抗大华中总分校于此结束,干部和教员大部分分配到抗大各分校。被分派到七师的由杜剑华带队,有干部、教员和学员共百余人,协助七师创办抗大十分校。

1945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七师部队已发展到3万

人。为准备反攻,需要培养大量干部,师部于4月间决定正式成立抗大十分校。师长谭希林兼任校长,师政委曾希圣兼任政委,陈仁洪任教育长,杜剑华任副教育长,阙中一任协理员负责全校政治工作。十分校校部驻团山里。全校有六个队,学员500余人。其中一个军事队,一个政治队,是由部队抽调军政干部前来学习的;两个知识青年队是从上海等地招收的学员;一个队训练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的干部;还有一个队是皖江区党委办的县区党政干部训练队。

七师抗大十分校以及它的前身七师教导队,其教育方针和教育内容基本上都是按照抗大总校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和原则予以实施的,有些教材采用了抗大总校和华中总分校的教材。训练处长杜剑华、教育长陈仁洪、协理员阙中一等原来都在抗大总校、华中抗大总分校学习或执教,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教学经验,因而能够正确地贯彻抗大的教育方针,保证了教学质量。

学校的政治理论教育,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军事教育以连排战术训练为主,扩展到营的战术范围。单兵动作和军事技术,重点是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有的结合实践进行训练。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皖江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从9月间奉命开始北撤。十分校随同七师师部撤退到苏北的淮阴。抗大十分校于10月间改名为七师干部随营学校,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从1941年七师教导大队成立,到1945年的七师抗大十分校,先后共为皖江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培养训练了两三千名各级干部。这对皖江部队的发展和军事斗争,对皖江根据地的建设,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八)三师抗大五分校

1941年底,华中局和新四军总部决定:在原抗大五分校的基础上成立华中抗大总分校,并从原抗大五分校抽调一部分干部到三师成立新的抗大五分校。由黄克诚兼任校长,吴胜坤任政治委员,张兴发任副校长,王信虎任教育长,唐克任政治部主任。几个月以后,改由钟伟担任校长,吴胜坤任政治委员,张兴发任副校长,庄林任教育长,于辉任政治部主任。学校成立后,由于日伪军第二次对盐阜区大“扫荡”,该校停办一年,至1944年复校,由谢祥军任校长,在苏北地区扩大招生。这一期共有九个学员队,其中三个干部队,约400人;六个知识青年队,800人,共1200余人。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学员全部毕业,奔赴解放战争战场。学校改为盐阜区独立旅,三师抗大五分校宣告结束。

新四军六师由于地处苏浙地区,斗争十分尖锐,环境特别恶劣,所以没有创办抗大分校,但他们创办了教导大队和教导队,进行培训连排干部。同时还创办了苏浙公学,既培训地方基层干部,也培训军队连排干部。

新四军各师除办抗大分校以外,各旅和团都很重视创办随营学校或教导队。随营学校和教导队的任务是轮训部队在职基层干部。团轮训在职班级干部,一般一个月一期。旅轮训在职的连级干部,一般三个月一期。军区和军分区一般也办了教导队或随营学校,用以培训地方部队基层干部。

为了加强对华中各抗大分校培训工作的指导,交流办学经验。1942年8月1日,在苏北的东坎镇(今滨海县)召开了华中抗大总分校与各分校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陈毅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对会议中发生的争论问题做了总结。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华中抗大总分校和各分校的教育方针、内容、方法、制度、计划和教

材,总结过去工作,并交流各分校的教学经验。

在会议的总结中,陈毅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顿“三风”和关于干部学校教育的决定的精神,着重阐述如何正确理解抗大的教育方针,批评了教学中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他说:“理论与实际一致,所学与所用一致(做什么学什么),教育与作战联系,这是我们军队教育上、学习上应该采取的三大原则”。“华中各抗大应根据实践去讲授理论,根据理论去总结实践,作为教育与学习的总方针”。“教员的任务不仅限于讲解书本,而在于帮助学生如何去运用书本知识,以总结其本身的工作经验。学生的任务,不仅限于照读讲义和课目,而在于能领会课目讲义所包含的精神实质,并能进一步启发他对实践经验的了解并提高他今后指挥作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他还指出:“为了实践而学习理论,为了打胜仗提高工作而进学校,为了养成一批军队工作干部而办抗大。”陈毅的讲话从根本上提高了全体与会者对于抗大教育方针的认识。这次教育会议,对于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正确贯彻抗大办学方针有重要的意义。

会议指出:抗大总分校要通过文件、电报,交流各分校的情况和经验,提供教材,对各分校的教育思想和业务工作进行指导。从抗大总分校到各分校、随营学校和教导队,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教育体系和网络。

二、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分校的教育方针、内容、方法和校风

(一)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分校的教育方针

无论是新四军教导总队,还是华中抗大总分校和抗大各分校,

都是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的教育方针和有关规定,以抗大总校为榜样来实施教学计划的。

毛泽东把抗大的教育方针集中概括为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指出:“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的。”他还说过:“抗大之所以最革命、最进步,是由于它有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领导,有革命的教职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先进思想哺育青年。因此,它才能像一座熔炉,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锻炼成钢,成为全心全意为民族、为社会的解放而英勇奋斗的抗日干部和共产主义战士”。毛泽东在这里揭示了抗大的性质和教育目的。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哺育青年的革命的军事学校,用形象的比喻就是一座革命熔炉。

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也着重强调“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战士,或同情者”。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和工作必须大大加强。”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为抗大的教育指明了方向,是学校制定和实施教学计划的重要依据。新四军各抗大分校及教导总队就是按照上述方针制订教学计划和实施教育的,因而成为真正的一座座屹立在大江南北、华中敌后的抗日革命熔炉。

抗大分校的教育方针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延安《解放日报》根据中央指示写的《教育上的革命》社论说:“马列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因此理论与实践联系,所学与所用一致,应该是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要求学员能够用马列主义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目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去指导实践。因此除了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又要教授中国历史与中国情

况,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使学生既懂理论又懂得实际,并把二者联系起来。”抗大各分校就是根据这一教育方针,从实际出发,分别不同的教育对象和训练要求来制订和实施教学计划的。在教学中,讲授理论知识要密切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实际,部队作战的实际,学员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善于针对学员的思想状况和特点,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善于运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丰富历史经验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善于启发诱导学员整理总结自身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又引用实际经验来证明理论。把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的原则贯串于学校的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动之中。

为此,皖南教导总队华中抗大各分校在教学中始终坚持以下三大原则:

1. 少而精

抗大教育因受时间限制,不得不严格规定范围,教最重要的部分,最有用的部分。为使教学能在预定时间以内完成全部教学计划,所以不但军事教育实行很精密的时间分配,就连政治教育也依据提纲分配教学时间,使每门功课都得到落实。要求教员所讲的课要紧紧围绕中心,不能扯得太远、太杂。但也不能误解少而精的原则,以致把问题讲得非常简单,成为条文主义。而是规定每一课或每一节的中心问题,要求教员围绕中心问题用具体事实反复讲解,讲深讲透,使大家能够彻底明了。在军事教育上,采取了循环的复习制,使学员不但了解原则,而且求得动作上正确熟练。

2. 学与做的一致

抗大的军事教育时间特别着重野外演习,对于制式教练也相当注意,使学员学了就做,做了再学,求得理论和动作上的一致。在野外演习时,常常由学员自己轮流来充当政治指导员和指挥员(从班长、排长到连长)。第一次分组上课时由学员练习判断情况和下达命令,第二次干部演习及实际指挥完全由学员练习指挥技

术。同时为了适应前方战斗需要,特别注意夜间教育和演习,白天演习过的动作往往在夜间再演习一次。

在政治教育上也特别注意学与用的一致。学校不但教最重要的部分,而且教急需的部分。研究过去,目的是为了说明现在;研究理论,目的是为了实际问题,指导实际工作。因此,教材配置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学院式的研究态度。

3. 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既是抗大的教育方针,也是抗大的教学原则。无论是军事教育还是政治理论教育都必须贯彻这一原则。如在军事教育中从战术原则联系到实际经验,用实战例子来证明原则。政治理论教育注意联系中国政治经济的实际问题来说明理论。

(二) 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 抗大分校的教育内容

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办学,决定了新四军教导总队和抗大分校教学上的一些特点。例如,学制很短而且常受战争影响和干扰,教学条件只能因陋就简,教学内容强调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注重应用。教导总队和抗大各分校是军队办的学校,学员来自部队或者地方,毕业后将要分配到部队去工作,他们是要带兵打仗的。所以,既要加强政治理论教育,又要加强军事训练。因此,在教育内容和课程设置上,总的要求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有重点,少而精,根据不同的培训对象而分别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重点。教导总队和抗大各分校都是以军事队和政治队居多,其他各队大致可以归入这两种性质的队。如工兵队、机炮队、参谋训练队等属于军事队,女生队相当于政治队。凡是军事队,以军事教育的课程为主,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的比重一般为7:3。政治队以政治教育的课程为主,比重倒过来,军事教育与政

治教育一般为3:7。上下队的情况不同,大体上是军政并重。教育课时的分配按每周五天半计算。即周一至周五上课,周六上午会操学习,这半天也作为军事教育时间。

此外,各期都有几个队有一部分学员文化水平低,不到初中程度的学员需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补习文化、提高文化,成为接受军政教育的前提,因此,要求每个学员都能够具有初步的阅读和写作能力,懂得基本的算术和自然科学常识。

政治教育包括锻炼党性、整顿“三风”的思想教育;国内外形势和任务的时事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教育;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或政治常识的理论教育;以及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党的工作教育等几个方面。这些教育渗透在学习期间的各项活动中,有一部分内容设置正式课程,其余的通过专题课、报告会、自学文件、读报活动、日常的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来进行。

在军事队,政治课有《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两门主课。《社会发展史》从人类起源讲起,阐述人类社会各种社会形态及其依次更替的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社会为何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这门课主要是帮助学员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而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

《中国革命问题》这门课程主要讲授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的基本内容,帮助学员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对象和特点等各个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和历史经验,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和统一战线等等。进行这些教育,有利于提高学员们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正确理解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增强革命的自觉性,确立坚持长期斗争的思想,巩固革命必然胜利的信心。

在政治队,政治课除了《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外,还加了一门《政治经济学》作为主课,也有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队开了哲学课。培养连级政治工作干部的队,还要增加《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等课程。各个政治队以及文化程度较高的军事队还设一些专题讲座性质的课程,如《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际问题》、《民运工作》、《敌军工作》等等。

政治课的教材,一部分有中央领导同志的著作和抗大总校传来的讲义,大部分是依靠自力更生,自己编写的。有的课先编教学大纲,讲过一两次就形成讲义发给学员。

军事教育以学习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和战术课为重点;而在战术课中,又以进攻战、游击战、夜战为重点。各门课程是讲授、演习和日常的操练结合进行的。大体上,每个政治队都有四五门军事课。军事队则要增加专题军事课和各门军事课的教学分量、操练演习时间。各队都要学的一般军事课有:(1)每个军人必须遵行的共同条令。由于当时还没有系统制订完备的条令,主要学制式教练以及有些初具雏形的规定,如内务条例和军内纪律。(2)单兵战斗动作。学习各个跃进,利用地形地物,射击、投弹要领,以及侦察、警戒、防空、防毒等。(3)战术训练。包括班、排、连、营的进攻、防御、退却、追击等。(4)战术理论。有行军概则、宿营概则,遭遇战斗概则、进攻战斗概则、防御战斗概则、夜间作战概则等。(5)游击战术。

另一门主课是讲授和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主要是:《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战争与战略问题》等。要求营以上干部多学一些,连级干部学主要内容;班、排级干部结合其他课程讲授要点,不作为专门课程。

教导总队和抗大各分校除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外,还有文化教育。主要是对文化水平低的学员进行文化补课。文化教育的内容以阅读写作为中心,其次是算术和自然科学常识。国文是文化

教育的最重要任务,主要是提高学员的阅读写作能力。预科或文化补习队每周有四次(8小时)至五次(10小时)练习阅读(上国文课),一次(2小时)练习写作。学习时间为一年。学习结束后再进各队学习。

军事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于操练和演习。全校每周星期六上午要集合起来大会操,操练从单兵到连的队列动作和刺杀动作,演习队形。每月若干次紧急集合,进行夜间战斗演习。每一期还有实弹射击和投掷手榴弹演习,有几期在毕业前还举行过团的攻防对抗演习。

毛泽东说过:“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学方针。”新四军抗大分校和教导总队的教员阵容相当强。这首先是因为军首长和军政治部的领导同志十分关心培养教育干部,不但重视对教员的培养教育、关心照顾,而且还亲自讲课。在皖南,项英、陈毅、袁国平、周子昆、粟裕等同志来教导队讲《目前形势和任务》、《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等专题报告。军政部的几位部长讲课较多,组织部长李子芳讲《党的建设》,宣教部长朱镜我讲《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基础》,政治部长林植夫讲《敌军工作》,统战部长夏征农讲《统一战线》,秘书长黄诚讲《青年工作》等。在盐城抗大五分校,陈毅在军事干部大会上讲皖南事变问题,到五分校作时事报告。刘少奇在华中党校作报告,抗大五分校学员都前去听讲。赖传珠讲《游击战术》,冯定讲哲学、薛暮桥讲政治经济学。

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的教员配置由训练部、处主要负责。军事课和政治课都有主任教员、驻队教员和集中在训练部、处机动讲课的教员。一般情况下,大队有军事、政治主任教员,也有驻队军事、政治、文化教员。有的队驻队军事教员由队长兼任;也有的教员要兼管两个队。知识青年的队不设文化教员。各队还配备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干事。在教员讲课后,学员讨论时,由教育干

事进行辅导。

在教导总队初期,政治课有两门课设置了课程的主任教员:《社会发展史》是张崇文,《统一战线》是夏征农。抗大总校派出加强五分校的华中大队也配备了军事主任教员杜剑华和政治主任教员孙达生。担任过主任教员的,还有陶白、姚耐、陈一诚、王淑明、袁慕华、石坚、方克等同志。

新四军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都拥有一批抗日战争前在上海等地从事救国运动的社会著名人士担任专职或兼职的教员。如李一氓、夏征农、罗琼、张崇文、钱俊瑞、石西民、徐平羽、陶白、朱镜我等。当时从军首长起直到队里的干部对教员都是很尊重的。教导总队初期曾经有少数老红军干部对重用知识分子干部以及在生活方面的照顾或多或少流露过某些不满的情绪。总队部和军部的领导同志很快注意到这种倾向,召集了干部大会,由袁国平讲话,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加强团结。项英则指出,在教导总队应该提倡“尊师重道”。尽管那个时候生活相当艰苦,学员每人每月只发一元五角津贴费,团以上干部每月只发四元津贴费,对教员还是给以照顾,发一点讲课津贴。其中薛暮桥、夏征农、罗琼、陶白等少数几人,经军首长批准每月发给十五元。

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不仅表现在生活待遇这些事情上,重要的是政治上给予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委以重任,关心并迅速解决入党问题,而且在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树立了一种相互尊重、团结融洽的气氛。

(三) 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 抗大分校的教学方法

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各分校在教学方法上,经过不断探

索,也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由于学员来自四面八方,不但文化程度高低不同,社会经验和思想意识也各不相同,所以必须从实际出发,因材施教,把他们编在不同的队进行不同的教育,采取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关于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分校的教学方法,薛暮桥早在1939年皖南军部教导总队工作时就写了《关于创造新干部的教育工作》一文,对于教育方针、教育方法提出了许多新见解。到了华中抗大分校时期《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下达后,明确规定:“在教学方法中,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式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薛暮桥根据中央的决定,于1942年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抗大政治文化教育报告》,在新四军军部召开的华中抗大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其中比较具体的谈了华中抗大的教学方法。现摘要介绍如下:

1. 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

我们教学方法的基本原则,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所学与所用的联系。根据中央最近指示,我们的教学方法应当是: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必须反对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教学方法。

(1)什么是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教学方法。

所谓“启发的”,便是学员自学与教员辅导的适当配合。教员提出问题、指示方法,辅导学员自己研究,反对教员夸夸其谈,学员死抄死记,那种只记不想,以致食而不化的注入方法。这里应当说明的是:教员讲解并不就是注入式;如果教员能够提出问题,引起研究动机,经过一番思索,然后作出结论,这是启发式的灵活运用。反之,学员自己讨论并不就是启发式;如果这种讨论仅是背诵教员所讲条文,这还只能算是注入式的变相发展。

所谓“研究的”,是要提倡自由思想,追求真理,发扬学习中的民主精神。反对武断盲从,思想统治等强迫方式。课堂上要提倡

质疑,讨论中要提倡争论。不要把书本的记载和教员的讲解当做教条,而要勇敢地提出疑问;教员必须与学员共同商讨这些疑问,给以满意的解答。

所谓“实验的”,是要把我们所学习的理论,拿到实际工作中,或从实际工作所得来的实际经验中,去实验、去证明,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学习。只有经过实际考验的理论,才是真正的理论;只有经过实际考验的知识,才是完全的知识。这就是我们的学习方法。

(2)为要达到上述这一切,必须做到“教与学”、“学与做”的结合。

教与学是解决教员与学员之间的矛盾。方法是鼓励学员自己学习,自己研究,教员从旁辅导。政治教育可以先令学员研究教材,上课时候提出一些重要问题来问学员,然后教员讲解,并联系许多实际问题来进行讨论。课后再令学员研究教材,互相质疑,以求彻底了解。这样久而久之,便能培养学员自己阅读的能力和自自己学习的习惯,纠正过去只会听讲,不会看书,只会坐轿,不会跑路的恶劣倾向。

学与做是解决校内与校外之间的矛盾;方法是把校内所学理论与校外斗争情形,和过去所得实际斗争经验联系起来研究。例如,运用今天所学习的理论,去讨论过去实际工作,或者研究过去的实际斗争经验来证明和充实今天所学习的理论。必要时可以组织参观和调查研究来帮助学习。例如研究统一战线和各种政策时候,可以去访问地方政权机关,地方工作同志,参加各种会议,或请地方工作同志来作报告。研究党建和政治工作可以组织学员,到部队中去调查研究(每组研究一个连或一个支部),最后讨论总结。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外来知识分子都把工作实习定入教育计划;讲了去做,做了再来研究。纠正过去理论自理论,实际自实际的分离现象。

(3) 各种方式的灵活运用。

教员讲课和学员课外学习并没有一定的方式,全在教员灵活运用,在这方面不应强求一致。首先,学员程度不同,经验不同,教学方法便不得不有差异。程度高的学员可以偏重自学。程度低的学员还得偏重辅导。经验多的学员可以组织讨论,经验少的学员还得依靠教员讲课多举实例作证。知识分子可以多抽一点时间让他们去自己阅读书籍文件,识字不多的学员主要依靠教员或其他学员来帮助。

其次,各种不同的课程,也应当有不同的教学方法。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方法,主要靠教员讲解和学员自己阅读参考书籍,其次才是集体讨论。有时则进行社会调查,但不能作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党建和政治工作的方法,除教员讲解外,可以组织学员检查过去工作经验,以及进行调查研究。前者应当多一点上课和看书的时间,后者应当多一点讨论和调查研究的时间。

2. 教员应当做的工作

(1) 要把握对象,因材施教,对症下药。

我们与普通学校不同,学员程度不齐,经验不同,这是一个极大的特点。所以要求教员必须做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调查学员的文化程度,政治认识,工作经验,思想意识,研究怎样来利用他们的长处,填补他们的缺点。尤其需要研究各种学员工作上的需要,及其学习能力,这样来决定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如果忽视调查研究,主观主义,粗枝大叶地来进行教学,是一定不能收到圆满效果的。

(2) 要认清教学要求,把握问题中心。

我们的教育是要达到一定的目的,绝不是为教育而教育。这点必须首先认识清楚。教员必须研究教育的任务和方针,研究学员的性质和程度(军事干部、政治干部,中级干部,初级干部,工农分子,知识分子),研究自己所担任的功课,定出教学上的明确要

求,以及教学中所必须解决的中心问题,把握中心,适当支配教材。反对东抄西袭,卖弄渊博,机械地堆砌材料,罗列条文,不提出问题,不解决问题,空话连篇、无的放矢的教育。

(3)要引起研究动机,指示研究方法。

平铺直叙讲解问题,会使学员索然无味。教员上课时要善于提出问题,引起研究动机。问题要有实践意义,才能够使学员感到迫切需要研究。问题深浅必须适合学员程度,勿太简单,勿太复杂,以学员能自己解决为准。还要指示研究方法,举出正确和错误的例子来说明,这样养成学员自己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要联系实际,利用学员实际经验。

任何理论只有与学员的生活经验、斗争经验联系起来,才能使学员获得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理解;把握它的实质,而非记忆它的条文。这里所谓实际,必须是学员自己从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中、斗争中得来的经验,要从学员那里去找,而非从书本上,或从教员自己的经验中去找。多同学员谈话,多参加学员的讨论,有计划地收集材料,才能达到上述的目的。^①

教学是一种艺术,教学过程是创造的过程。教学不是创造人类尚未获得的知识,而是把已经获得的知识,如何变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包括记忆、理解和应用。教员要很好地完成这个转变过程,不仅需要掌握丰富的知识,而且要研究掌握教学对象的生理和心理特征,遵循教学的规律,才能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教导总队和抗大总分校及各分校,由于正确执行了中央制订的教学方针,对不同对象的学员明确了不同的培训要求,按照军政并举、各有侧重和少而精的原则规定了各门必需的课程,又拥有一批较高水平的教员,采用了从实际出发、多样而生动的教学方法,因而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完成了培训大量军政干部的任务。陈毅

^① 参见洪学智、薛森桥:《华中抗日革命熔炉》,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同志曾在华中局和华中军分会的一次抗大会议上评价过抗大五分校和华中抗大总分校所起的重大作用,说它们“就像春风满园的苗圃”,为各分校培养了许多师资,也为部队培养了大批人才。

(四) 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 抗大分校的优良校风

毛泽东为抗大培养人才提出的明确目标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为抗大制订的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三句话,八个字,既成为抗大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又成为抗大的优良校风。华中各抗大分校和它以前的教导总队都继承和坚持了这一优良校风。在学校内部有着非常亲密的内部团结,上下级关系、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找干部、学员谈话;学员们也经常到领导同志和干部、教员的宿舍串门,大家促膝谈心,谈学习,谈思想,赤诚相见,不存戒心,毫无拘束。机关的作风也很好,基层干部或学员到校部来,无论白天黑夜,机关干部都笑脸相迎,热情接待。

抗大分校从学员入学的第一天起,就从严格军事生活入手,培养他们雷厉风行的作风。每天从起床到熄灯,出操、上课、讨论、演习、晚点名,生活既紧张又有节奏。

抗大分校师生的生活条件都很差,学员来校后每人发一套军衣和二三斤重的棉被、睡在群众家里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冬天天太冷,只好门上挂个草帘,把稻草铺厚些,大家挤一挤。到了热天,一个班、一个排睡大通铺,既闷热,又有蚊虫咬,患疟疾和痢疾的也不少。

吃的主食,有糙米就很不错了。在苏北,以杂粮为主,玉米糝子,大麦糝子、山芋干,高粱面,以至黑豆,掺些大米做饭。供应困

难时全吃粗粮。菜金是每人每天一角二分。穿的也很简单,每到秋去冬来,棉衣经费筹措无着,需要补充棉衣的很晚才能发到。穿鞋几乎全靠自力更生,每个人都学打草鞋。如果能找到破布撕成布条打草鞋,那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品。

上课没有教室,多半在露天、野外,只有雨雪天才设法在驻地大一些的屋子里挤挤。没有课桌,学员在背包上插双鞋当凳子,在膝盖上记笔记,用稻草编成圆形的草垫子也可以当凳子坐。

在军事训练方面的严格要求,仅举一两个例子即可见一斑。教导总队在皖南以及抗大五分校在盐城时,每周有半天大会操,第一个课目是跑步。每个学员全副武装,背负步枪、子弹带、手榴弹和背包,有时还加上三斤重的米袋,负荷量超过20市斤,要在操场上列队跑步20—30分钟。对于刚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来说,如果没有健康的体格和坚强的意志,很难坚持下来,更不用说接着还要做一系列军事动作和变换队形的操练了。

最紧张而且最消耗体力的是遭遇战的演习。全队都全副武装一口气从常行军变为急行军走十几里。一边走,一边教员提出各种情况,让学员回答发生遭遇战时如何下决心。要求掌握遭遇战“四点”原则,即先敌展开,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先敌发起冲击。演习中大都要抢占山头,夺取制高顶,组织火力,发起冲击。往往一次要爬几个山头,人人汗流浹背,喘不过气来。个别身体差的有时就昏倒在地,而部队仍要继续跑步前进。

尽管物质生活和军事训练都很艰苦,学员们的政治热情却很高昂,学习的内容充实而又丰富,日常生活也是丰富多彩。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气蓬勃,愉快活泼。从晨曦初照到星月当空,操场上、课堂里、行军途中、劳动工地,哪里有抗大的队伍,哪里就有嘹亮的歌声。每个队都建立了救亡室,后来通称为俱乐部。它组织本队的体育、歌咏、戏剧活动,负责墙报或黑板报,管理书报,举办一些测验或问答竞赛,主持文艺晚会等。歌咏活动相当普

及,每当全总队、全校或军直属队集会,欢迎各队轮流唱歌的拉拉队声此起彼伏,歌声整齐而雄壮,气氛特别活跃。队里的戏剧活动主要是排演小型的活报剧,有时也与批评表扬结合起来。

教导总队的政治处和抗大五分校的政治部都设立了总俱乐部,负责组织推动全总队、全校的娱乐活动。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优秀文艺工作者毛中玉担任教导总队的总俱乐部主任。沈西蒙也曾在教导总队的总俱乐部工作。举办大一点的晚会,教导总队有文化队可以演出,抗大五分校则有校文工团演出。他们不仅演唱大量革命歌曲,而且自己排练或与军部战地服务团、鲁迅艺术工作团合作演出大型话剧。如《魔窟》、《一年间》、《台尔曼》、《自由万岁》等等,当年在军直机关学校单位轰动一时,深受学员们和军直指战员的喜爱。

对学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渗透在军政教育的课程中,同时也贯穿在整个培训期间的其他各项活动中。各队的日常管理,无论起居作息,点名讲话,以及班排活动,每时每刻都着眼于养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教育与实际相结合还表现在教学与实践、与群众工作相结合的方面。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参加了反“扫荡”、反对顽固派进攻的多次战斗,五分校还配合地方进行了剿匪战斗。地方工作则经常组织短时间的民运工作队,或派人临时协助驻地群众工作。每年夏秋季节,组织各队学员帮助群众收割稻麦,参加劳动。这些,都充实了教育的内容,密切了军民关系,使学员们得到了多种多样的锻炼机会。

教导总队和抗大五分校都建立了健全的强有力的教育训练机构和政治工作机构,有一批富于军政教育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知识青年工作和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的优秀负责干部。在他们的具体主持下,教育训练和政治工作的各个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有的放矢,深入细致,从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教导总队和抗大分校,队是进行教学和一切活动的基本单

位,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一样。每个队建立了党支部。队里的干部,除队长、指导员,有些队还配备了专门负责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副指导员,或者专职的支部书记。排里有在学员中指定的政治战士,一般都由能力较强的党员担任。政治战士的职责就是通过自身的模范作用带动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关心他们的困难,随时进行日常的思想教育和鼓动工作。

在各队的政治工作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抓得很紧。它不仅意味着对发展对象本人必须进行认真的考察和细致的教育,而且需要党组织在普遍深入了解学员思想政治状况的基础上确定发展对象。同时,它对没有入党的群众有着启发、推动和教育的作用。尽管每一期在校学习时间很短,仍有很多同志在教导总队和抗大各分校入了党。各队的党组织大量吸收新鲜血液,也使得自己的工作更加富有朝气,工作方法更加生动活泼。

正是由于向广大学员比较集中地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理论的知识教育,进行了基础的军事知识教育和战术训练,又通过多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管理对学员进行了革命优良传统和抗大校风的熏陶、培育,在教导大队和抗大分校学习过的同志,他们在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军政素质上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改造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尤其是新参军的知识青年,更是经历了一次终生难忘的革命启蒙教育。许多在抗大分校学习过的同志说:“抗大既是革命启蒙教育,也是一辈子定方向的教育。”“抗大教育,对自己奠定革命立场,确立革命人生观,影响很大,终生难忘”。他们学习了革命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加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在革命熔炉中冶炼成钢。绝大多数经过学习的同志是经得起革命战争实践考验的。许多人不但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住考验,而且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皖南事变是新四军建军史上一次不应有的重大损失。

然而,在皖南敌军重兵围困之中孤军奋战的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的英雄气概,却真是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教导总队也受到了严格考验。

皖南事变中,教导总队编入中路纵队随军部一同行动。教导团成为叶挺军长直接指挥用来进行突围作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一直战斗到最后时刻。他们中有少数人突出重围,到达长江以北我军活动地区,许多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还有部分人不幸被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在集中营里,他们意志坚定,生死与共,坚贞不屈,顽强斗争,大义凛然,因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和血腥屠杀。共有近 200 人的新四军革命志士被国民党反动派集体屠杀、秘密枪决、活埋。其中就有教导总队原副总队长兼教育长冯达飞,革命先烈张太雷的儿子、教导总队的文化教育干事张一阳。张一阳牺牲时才 17 岁。

在上饶集中营,教导总队的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牢狱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英勇斗争,成功地组织了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许多人打出了集中营,回到了党的怀抱。茅家岭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是教导队毕业的李胜。暴动那天,教导队学员杨灿把卫兵关在大门外,赤手空拳和其他 26 位同志一起,夺取了看守排的两挺轻机枪、两挺手提机枪、8 支步枪和 39 颗手榴弹,冲出集中营,回到浙江四明山新四军游击中队。集中营六队在秘密党支部的领导下,当 1942 年 6 月在敌人押解近百人到达福建崇安赤石镇时,举行了有名的赤石暴动。领导和指挥暴动的是教导总队的军事教员王羲亭。在赤石暴动前后英勇牺牲的教导总队干部和学员就有教导总队的文化教员杨瑞华(女)、李捷(女),以及丁公量、陈念棣、阮世炯、赵天野等 17 人。他们的血凝聚着新四军教导总队教育成功的结晶,也是衡量干部教育质量的主要标志。

在苏北抗大五分校、苏中抗大九分校等校在抗击日伪顽的“扫荡”、“清乡”中也有不少同志在作战中光荣牺牲。这些牺牲的同志

为什么心甘情愿地抛头颅、洒热血？就在于他们经过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分校这个革命熔炉的冶炼，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决心为共产主义理想、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决心。皖南教导总队和华中抗大总分校及各分校，在抗日战争中培养了近3万名德才兼备的干部，为军队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

江泽民在纪念抗大建校六十周年大会上说：“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最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永远不会忘记抗日军政大学在那场战争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抗大最主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培养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军队干部。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抗大写下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光辉篇章。它的伟大业绩将永远留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中。”江泽民强调，“在纪念抗大建校60周年的时候，结合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实际，我们要学习抗大的经验，要把能不能培养和造就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带领和团结人民群众坚持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看作是关系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要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始终注意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奋斗，去创造光辉灿烂的未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华中解放区的抗大各分校先后停办或改名，但培训干部的任务并未终止。如抗大四分校改为雪枫军政大学，抗大九分校改为苏中公学，它们既培养军队干部，又培养地方干部。部队的抗大分校则改为随营学校或教导队，继续培训军队在职干部。解放战争开始后，华中人民解放军转至山东以后，创办了华东军政大学，继续培训军队干部。大军渡江后又在上海、南京重新创办华东军政大学，大力培训军队干部，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三、华东军政大学

华东军政大学有两个，一是解放战争中的在山东的华东军政大学，一是渡江以后在南京的华东军政大学。

1946年冬，华中军区和山东军区合并成立华东军区。11月5日，由原山东军区的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华中青枫军政大学、淮南随营学校及由广东省北撤的东江纵队干部合并组成前华东军政大学。由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兼任校长，余立金、曾生任副校长，张崇文、陈铁军任正副教育长，欧阳平、许彧青任政治部正副主任，校部驻山东莒南县大店，第一期教职员和学员近5000人。

1949年3月，淮海战役胜利后，前委决定第三野战军成立三野军政干部学校，陈毅兼任校长，由张崇文负责筹建工作，同时做好渡江准备。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后，先后解放了宁、沪、杭等大城市，全国解放已为期不远。中央和前委为了教育和提高部队干部，并培养大量青年知识分子成为新中国的军政干部，决定将渡江后住在苏州的前华东军政大学与住在常熟的三野军政干校合并，并以三野八兵团的司政供卫机构为基础，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华东军事政治大学”。中央决定，由陈毅兼任校长和政委，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任政治委员，聂凤智任教育长，刘清明任副教育长，余立金、张崇文任政治部正副主任。学校规模宏大，共有教职员工近万人。

1949年6月5日，在上海荆州路设立军大招生委员会，下设五个招生办事处，报名的有近2万人，分别在交通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等处举行考试。第一批参加考试的有7000余人，录取5000多人。

第一批录取的新生中存在着不少思想认识问题，例如“军大程

度低,不是真正的大学,前途不好”,“解放军上课,还是教授上课?”“军大是否和国民党青年军一样?”等等。为了提高新生的思想认识,特地请陈毅于7月18日在交通大学文治堂由上海民主青年联合会和学联举办的军大录取新生的联欢会上作了题为《要勇敢地清除旧事物、旧观点,在学习中得进一步胜利》的报告。他从当前的形势一直谈到军政大学的性质。他强调指出,军大既不是旧式的文科大学,也不是旧式的军事学校,军大是按照人民的需要为人民解放军培养干部的学校,能够学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革命知识。大家要看到远大的目标,要以坚定的意志接受新事物,对旧事物、旧观点要勇敢清算和抛弃。陈毅的讲话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报告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说:“这回看到有名的陈毅将军了,名不虚传,真是幸福。”“陈毅校长讲得太好了,真是能文能武。”“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和锻炼,不辜负陈校长的希望。”

1949年6月12日至25日,华东军大在上海招生的同时,也在苏州、杭州、镇江、无锡、常熟等地先后招生。各地报名的近2万人,录取青年知识分子15170人。学校共有三个总队、八个团和两个训练队,学员分别住在上海、苏州、常熟、无锡、南京等地。一总队住南京,二总队住苏州,三总队住常熟和无锡。校部住南京。9月22日,三总队由常熟、无锡陆续迁往南京。1950年1月,二总队也由上海、苏州迁至南京孝陵卫。至此,华东军大师生全部住在南京。另外,华东军大还设有三个分校,即福州分校、浙江分校、山东分校,分别住在各省。

在华东军大即将开学之际,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特地为华东军大题了词。毛主席的题词是“华东军政大学日进有功,培养大批国防建设人才。”朱总司令的题词是:“努力学习军事科学和革命理论,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华东军大学员分预科和本科二类。1949年7月下旬预科正式

上课前的预备教育正式开始,先进行形势任务和端正学习态度的教育。

10月8日,华东军大在南京校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全校教职员工共达37159人,在宁师生近2万人参加大会。陈士榘副校长主持大会。三野政治部主任唐亮、三野代总参谋长袁仲贤和各界代表到会祝贺。10月23日,陈毅专程来校向全校教职学员作《为人民服务》的报告,并为连以上干部作了同样题目但要求不同的报告。他针对学员中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如家庭与革命,生与死,苦与乐,荣与辱,个人兴趣与革命需要等方面的矛盾,抓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问题进行教育,对学员们教育很深,鼓舞很大。他说:“大家到学校来有一个共同目的,就是想求得一定的知识,能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同时也为自己争取一个美好的前途。中国青年的这种心理我是懂得的,因为30年前,我跟大家差不多,满腔热情地追求真理,对旧社会看不惯,瞧不起,不愿堕落。追求真理在以前每每使青年人失望。今天,你们找共产党,找对了,找人民解放军找对了。加入华东军大,也做对了,找到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不会使大家失望和走错路。”陈毅还说:“你们要把人民利益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认清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不管中途出现多少困难挫折,总要朝着这个方向坚定地走下去,决不能今天为人民服务,明天不高兴就不为人民服务了。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今后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都要为这个目标而奋斗!”陈毅同志的谆谆教导,对帮助青年明确政治方向,选择革命道路,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起了重要的作用。

1950年7月,正值第一期学员预科结业,陈毅又亲临学校,再一次作《为人民服务》的报告,勉励学员到工作岗位之后,要不断改造思想,经受各种考验,继续明确为人民服务的目标。

陈毅还针对青年人富于热情,勇于进取,善于幻想,易于动摇的特点,教育他们认识和掌握社会发展规律,下定决心在革命阵营

甲经受千锤百炼,始终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华东军大继承和发扬了红大、抗大的优良传统,遵循毛泽东同志亲手制定的校训:“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

学校的教学是上大课。大课以后是分组讨论,讨论会上畅所欲言,争论热烈,有时还进行大组讨论。各中队的干部既带头学习,又积极辅导,不断了解学习情况,千方百计提高教学效果。每个专题学完以后,针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做有针对性的辅导和总结。

学员的生活也是生动活泼丰富多彩。各中队都成立俱乐部,开展文娱体育活动,每逢节假日都组织文娱演出。学校校政文艺系成立了一个实验剧团,由原校政文工团、二总文工团、三总文工团合并组成,不定期地进行演出。如排演歌剧《赤叶河》以及话剧《思想问题》等。

华东军大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办了两期,为国家培养输送了近5万名军政干部。大部分是分配到军队中工作,也有小部分分到地方工作。

1950年11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以原华东军政大学和华北军政大学为基础,在南京组建以刘伯承同志为领导的军事学院。华东军大大部分改组为军事学院,另一部分改组成立第三高级步校。

1951年1月8日,军事学院正式开学,华东军政大学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第四章 华中解放区党校

早在新四军在皖南组建军部之初，军党委就重视党的干部培训教育。1938年中共中央东南局在安徽泾县丁家山成立，在曾山的领导下，由担任秘书长的温仰春负责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先后举办了五六期，接受培训的干部有五六百人。其中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员干部回到白区坚持地下工作，暴露了身份的党员干部则被送到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工作。^①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前后，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特别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他们要冯定、孟波等同志积极筹办抗大五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同时，也要温仰春开始筹办华中局党校。在抗大五分校和华中鲁艺学院开学后不久，华中局党校也于1941年5月23日正式开学。

华中解放区的各区党委、分区党委以至地委也都十分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都开办党校或党训班培训党员干部。由于各级党委的党校所培训的对象不同，因而在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时间上也有所区别。

现在就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华中解放区内所办的主要党校，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一、华中局党校

华中局党校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刘少奇亲自领导下创办起

^① 引自陈修良，《怀念温仰春同志》，1981年7月10日《解放日报》。

来的。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以后,1941年5月6日,正式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华中局(原为中原局)。华中局成立后,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即着手筹办华中局党校。第一期于5月23日正式开学。

华中局党校的校长由刘少奇兼任,彭康任副校长,温仰春任教育长(后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傅秋涛任总队长。党校的日常工作由温仰春负责。党校校址在盐城登瀛桥河南西边的一个仓库里。

在党校担任教员的有历史学家吕振羽(化名柳岗)、经济学家孙冶方(化名宋亮)和骆耕漠、江明、陈一诚、朱迅等。华中局的领导同志刘少奇、饶漱石、曾山和彭康、钱俊瑞、冯定、薛暮桥等也都为党校学员讲课。吕振羽主讲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革命史。孙冶方主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党校在课程设置上,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作为党校的一门主课。在课程设置上,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课。《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等著作成为学员学习的必读书籍。

华中局党校学员大多数是新四军团以上的干部和地方上的县区干部,他们长期在游击环境中坚持斗争,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理论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因而理论水平、政策水平不高。这和他们所担负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很不相称。因此,在党校对学员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就成为党校教育的重大任务。

华中局党校创办时,正面临着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在国际上,

论,即从理论研究中来逐渐改造我们党员的思想意识,亦是很重要的)。这时候,学生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这不独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学院派’,而且是学生的主要工作。党员埋头读书研究,这一事实并不表现为‘学院派’,而是每一个党员在从事马列主义研究时所必需如此做的。任何比较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都必须经过这样埋头读书与研究的阶段。”^①

刘少奇特别指出:“过去有人指埋头读书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学校中来强调,就更为有害。”由于在党内有这样的错误观点,“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结果,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

刘少奇还指出:“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直到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②

刘少奇还指出:中国党的理论不够,还有其他原因:“(一)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不久……;(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又由于中国当时是客观革命形势很成熟的国家,要求中国革命者立即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无暇来长期从事理论与斗争经验的总结。所以中国党一开始成立,就卷入伟大的实际革命斗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18-21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8-22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争中,各方面都应付不暇。这与中国党的理论准备不够亦是有关的。这亦是原因之一。”“由于这些原因,特别是我们党的主观努力不够。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①

刘少奇主张学员在党校学习“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并不是要学员“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像“学院派”那样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而是强调理论研究必须与实践密切联系。他批评学院派“离开实践的理论研究,轻视实践,而不将理论与实践联系,结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死板的教条,而不能成为实践的指导。”“他们不知道(或忘记了)马列主义学说要成为解决这些问题(行动)的指南。实际的有生命的马列主义,恰恰就包含在这些问题中,包含在一切人们的具体实践中,而不在书本的公式上及一切抽象的神秘的地方”。因此,他认为在党校教学中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的重要性,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和优越性。他们都没有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确解决与正确联系。”^②刘少奇在这里深刻地指出党校在教学中既要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又要密切联系当前的斗争实践,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为办好党校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华中局党校就是在刘少奇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始终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放在教学工作首位,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华中局党校根据刘少奇要求党校要适应战争环境、坚持在战争条件下办学的指示。党校实行军事化,按军队组织编制。1941年7月,日寇发动对盐阜区的第一次大“扫荡”,党校随新四军军部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1—222、218—22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从盐城转移到阜宁县的汪朱集。为了能有一个供上课之用的讲堂,党校学员自己动手搭起了一个大草棚。刘少奇讲课时,学员用背包当凳子,膝盖当课桌。由于听课的人多,又没有扩音设备,学员们推选几个笔记记得快的学员坐在刘少奇旁边,集中精力进行记录,回去再传达给其他学员或与其校对笔记。华中局机关和各地来的负责同志只能坐在草棚外边的场上听讲,场上坐得满满的。

刘少奇不仅要求党校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放在教学工作的首位,而且还住进党校亲自为学员讲马列主义理论课。对学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

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第一、二期办学过程中,在三四个月內,先后为学员讲课作报告达20余次。所讲的内容,除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外,基本上都是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即建设一个什么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为了把我们的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他根据多年来对党内生活的观察,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并且把它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了,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刘少奇为了给华中局党校学员讲课,在党校第二期开学以后,他甚至打起背包住进了党校,长达一个月之久,除处理华中局重大问题外,集中精力为学员备课讲课。

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第二期开学后住进党校的讲课情况,当时兼任副校长的赖传珠在他的日记中有比较明确的记载:

11月2日 刘政委去党校住,准备一月课程。

11月3日下午一时半到党校,刘政委报告民主集中制与官僚主义问题。

11月5日下午 继续听报告民主集中制。

11月6日 继续听党课。

11月10日 午后去汪朱集听课,政委报告辩证法。

- 11月11日 到党校听党课。
- 11月12日 听党课。
- 11月13日 中饭后到党校听课。
- 11月14日 听课。
- 11月15日下午 听课后来刘政委处汇报。
- 11月16日 到党校听课。
- 11月25日 到党校听战略与策略问题的报告。
- 11月26日 继续听战略问题报告。
- 11月28日 又听刘政委战略问题报告。
- 12月2日 到党校听统一战线课。
- 12月3日 到党校听策略问题讲课。
- 12月4日 刘政委今日从党校回来。

(注：《赖传珠日记》保存在新四军纪念馆)

从赖传珠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刘少奇自从11月2日住进党校，到12月4日从党校回来，长达一个月零二天。赖传珠本人就去党校听刘少奇讲了15堂课，其中有6次课未注明讲课内容，而且自11月17日至24日，可能是赖传珠因工作未能前往党校听课，刘少奇讲课内容也未能记载。刘少奇从党校回来以后，仍然继续抽出时间到党校讲课。如《辩证法与唯物论》是1942年1月5日讲的。《怎样进行党的斗争》是1942年1月18日讲的。由此可以看出刘少奇对党校教育工作的重视，他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培养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据温仰春回忆：刘少奇住进党校后，经常在夜晚把彭康、傅秋涛、温仰春等同志找去汇报学员的思想、学习情况。同他们讨论教学问题。他为了备好课，曾经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仔细分析学员提出的问题，然后有的放矢地进行讲课和解答问题。他为了办好华中党校和讲好课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给人留下永远难忘的记忆，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刘少奇对学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教育,不是讲高深的大道理,而是用通俗易懂的事例来阐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例如,他讲哲学从人为什么犯错误的问题讲起。有人说,人犯错误是由于觉悟不高;有人说,人犯错误是由于理论水平低;有人说,人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刘少奇就以此为题,讲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他说:人所以会犯错误,根本的问题是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主观和客观不一致,因而无法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也就无法运用这一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作风必然要犯错误。他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要认识客观世界,更重要的是去改造客观世界,革命实质上就是改造世界。要改造它,就要认识它,就要掌握它的规律。有些同志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无所知,又不经过调查研究去认识它,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讲到正确与错误的关系时,他说,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开始只是看到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和认识的深化过程,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全面和内部联系。因此,错误是难免的。问题是如何深化认识,改正错误,把坏事变好事。他举了一个生动易懂的例子:火是好东西,认识了它,运用了它,就能造福人类;如果不认识它,它就会起极大的破坏作用,甚至烧死你。

刘少奇说:认识世界到改造世界,重要的问题是革命精神。敢不敢改造世界就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敢于改造世界,敢于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之点。

新事物必然要代替旧事物,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可动摇的信念。少奇同志说,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时,虽然处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强大的围攻下,他就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种伟大的科学预见和革命气魄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刘少奇还对学员进行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教育。他说,群众观点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他引用减租减息的实例来说明依靠群众、启发群众自觉的重要性。批评有些人采取简单化的“恩赐”的方法,结果,群众还是“明减暗不减”,当你走后,粮食又送还给地主。他反复教育大家要树立人民群众在历史上重大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克服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脱离群众的思想作风。

刘少奇就是这样用通俗易懂的事例,把它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对学员进行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学员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刘少奇还从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华中敌后抗日斗争的现状对党校学员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命令汤恩伯带领 30 万大军进攻我华中解放区,我军处于两面作战的严峻形势。在党校学习的很多学员是从皖南突围到苏北来的,大家对国民党的残暴罪行无比愤恨,对当时形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存在不少模糊认识。有的说:“国民党反动派既然敢于向新四军皖南军部‘开刀’,就可能进一步向八路军‘开刀’,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已经不可避免,‘四一二’事变的状况又来临了”。也有人说:“十年内战时,我们能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又将同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两面作战了”。因此,有些同志主张:“必须先发制人才能取胜。”有些同志则认为“两面作战是要失败的”。刘少奇听了党校同志的汇报,他把这些看法归纳成三种观点:“历史将回到‘四一二’论”、“两面作战失败论”、“先发制人必胜论”。他根据学员的这些观点进行讲课。在详细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并不会因为抗战而有丝毫改变,必须引起全党全军的严重注意和足够的认识。但是,只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未变,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

义之间的矛盾总是主要矛盾,其他矛盾降为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他严肃地批判了那种“历史将回到‘四一二’”的错误观点。指出:那时党处在幼年时代,又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党在精神上、组织上和行动上,没有做任何的准备,致使在蒋介石突然袭击下,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招致了当时革命的失败。而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已经是久经考验的党,是政治上完全成熟的党,所以,不可能再出现“四一二”那时的情况了。

在讨论中,有些学员虽然在认识上提高了一步,但仍未消除“皖南事变”是不是说明国民党反动派的力量还是强大的这种疑虑。针对以上情况,刘少奇在第二讲中着重分析了抗战以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性。并指出:“皖南事变”不是说明蒋介石力量的强大,相反,通过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了某些变化,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人民则更加把希望寄托在我党我军了。皖南事变的失败主要是项英同志坚持右倾错误,违反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结果。我们更能从这次事变中吸取严重教训,揭露“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刘少奇的分析,联系思想实际,以理服人,既批判了那种右倾的观点,失掉信心的错误思想,又批判了那种“不要统一战线,要以先下手为强”的“左”的错误思想,使学员都很信服。^①

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对干部所作的一系列报告,得到党内外干部的一致好评。曾任中原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和《盐阜大众报》副社长、总编辑的王阑西在华中局党校学习后对刘少奇的一系列报告是这样评价的:“谈哲学、谈历史、谈天文、谈地理、谈古人类

^① 温仰春:《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局党校》,《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第17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学、谈生物学,常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些知识做深刻透彻的分析。少奇同志在谈理论和知识问题时,以深入浅出的语言进行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论证,像是一位教授;谈政治思想,谈群众运动,谈政治斗争时,举出许多引人入胜的、生动具体的人物和事例,不愧是位政治家;谈历史、谈诸子百家、谈文学时,对各种学说做出深刻的言简意赅的阐述,像是一位学术研究家;谈学习、谈修养、谈生活,分析问题时层次分明,提纲挈领,一语中的,是一位亲切的教育家。少奇同志知识渊博,语言生动,举例通俗易懂,特别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通俗地解释许多干部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总是能抓住要害,把问题提得非常准确、突出、鲜明,使人感到方向明确,思想坚定。”

陈毅在欢送刘少奇回延安的大会上也说:“少奇同志在华中的功绩之一是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了华中党组织。少奇同志担任华中党校校长,倾注全部心血于党的教育事业上。有一段时间,他住在党校,同学员同吃同住;在群众家里,白天找军政干部谈心,了解情况,晚上在油灯下备课,写出了《人为什么犯错误》、《人的阶级性》、《论抗日民主政权》、《论党内斗争》等不朽的著作,并在党校演讲,用马列主义提高了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陈毅和王阑西对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讲课的高度评价,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刘少奇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武装了华中的广大党员,不仅是对华中地区党的建设、干部建设的重大贡献,也是对全国党的建设、干部建设的重大贡献。

刘少奇在华中地区为了培养干部,加强党的干部教育工作,花了很多的心血和大量的精力,作了一系列报告,发表一系列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以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状况为依据,形成了很有特色的比较完整系统的党的干部教育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是对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

库所做的重要贡献。

华中局党校的第一期有学员 300 余人。成立一个总队，下分三个队。傅秋涛任总队长，李雪山任总支书记。各队设支部，支部书记和队长由学员担任。第一队是部队团以上干部队；第二队是地方县、区干部队，其中也有部分军队的营级干部；第三队是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干部队，其中有不少女同志。第一期办到 7 月，日伪军开始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党校随军部向北转移，到达阜宁县的汪朱集，在那里继续学习，直至八九月份结束。

第二期在 1941 年九月份在汪朱集开学。学员有 300 多人，分两个队。一队为团以上干部队，二队为地方县、区干部队，也有一部分军队干部。学习时间近半年，到 1942 年三四月份结束。

第三期在 1942 年五六月份开学，学员 300 人左右，分三个队。第一队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地方干部队，其中青年较多，女同志占一半左右；第二队是军队的副团和营级干部队，文化水平较低，还为他们补习文化，人称这个队为文化队；第三队是军队团以上干部队，其中也有一些县委书记。这一期的学习内容和前两期有所不同。前一阶段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后一阶段进行整风学习。学习至 10 月底，得知日军又准备对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新四军军部决定向淮南转移，党校第三期的学习也提前结束。校部随军部转移到淮南盱眙县的新铺镇。

华中局党校在淮南新铺镇经过短期休整后，于 1943 年八九月份举办第四期。这一期学员 200 多人，一、二队是机关行政技术人员及部分白区来的干部，三队是县、团以上干部。这一期的学习与过去几期不同。除了学习形势、任务和党的政策外，主要是进行整风学习和审干，党校成立整风学习委员会和审干小组领导学习。

华中局党校第四期整风学习的主要任务是提高觉悟，增强党性，坚定革命立场，解决世界观问题，同时对干部进行审查。学习

内容主要是学习中央规定的 22 个整风文件。方法是在学习、领会文件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华中局党校在整风、审干中,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康生的“抢救运动”、“坦白运动”的影响,发生过某些过火行为,但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并且较快地得到纠正。在运动中基本上始终贯彻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干部的历史问题,尽一切可能通过调查了解帮助搞清楚。对有些问题一时审查不清楚,采取相信本人交代,以后发现问题一切由本人负责的方针。许多干部经过整风、审干,既弄清了问题,放下了包袱,又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党性。在审干过程中,党校不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逼供信那一套,坚持让干部“洗温水澡”,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一些干部的历史问题,党校本着对干部负责的精神,尽一切可能做调查研究工作,如审查上海来的干部,就千方百计找熟悉上海地下党情况的人了解情况。有一个在上海白区工作过的干部,30 年代上海党遭到严重破坏时,他没有被捕过,有人怀疑他。后来党校找本人谈话,又找熟悉情况的同志调查,终于搞清了问题,做出没有被捕的结论。

其次,在审干过程中,党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轻易地怀疑干部,不随便给人“戴帽子”,不轻易把人端到大会上。对有被捕、被俘的问题,一时又无法弄清真相的,就采取相信本人交代,以后如发现问题,一切由本人负责的态度,在结论上只写“相信本人交代”,继续予以信任和使用。

第三,对曾经犯过较大错误的干部,不予歧视,而是帮他弄清思想,提高觉悟,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第四,对个别确有叛党、变节行为的人,做过危害革命的事情,又从未交代的,本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做好过细工作,如能主动“坦白交代”,就给予“从宽处理”,继续适当使用。

参加华中局党校整风、审干运动的同志,都要写两份自传,一份自己保管,一份送交组织部门,并对每个党员干部做出了鉴定。华中局党校在整风、审干运动中,没有发生一个干部由于政策过火而伤亡的,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由于把干部的历史弄清了,为许多干部做出了历史结论,放下了包袱,大大激发了干部的积极性,使他们心情舒畅地重返战斗岗位,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中局党校是在敌后的游击环境中办学的,敌伪军经常下乡“扫荡”,迫使华中局党校经常迁移地址,物质生活条件极端困难,每到一地,选校址,盖草棚,借民房;土堆当讲台,背包当凳子,膝盖当课桌;晴天上大课,雨天分组讨论;没有蔬菜吃,向老乡买些辣椒,火上烤烤下饭,有时两三个月才能吃到一顿肉。正如党校负责人温仰春所说:“天当房,地当床,糠菜树皮当主粮,这是咱们红军的老传统。今天,上战场,杀敌人需要它,咱们办党校,学马列,更少不了它。”为了改善党校生活,党校领导带领学员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荒种地,自己养猪,以改善伙食。

党校的物质生活虽然很艰苦,但精神生活却很充实和愉快。学员们的业余生活过得丰富多彩。党校有篮球队、排球队和文艺演出队。党校在汪朱集和新铺镇期间,党校排演的话剧《罪与罚》、《前线》和《甲申三百年祭》,曾经轰动党校内外。

华中局党校共办了四期,培训了近千名德才兼备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这些经过培训的领导干部,不仅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华中工委党校

华中工委党校也称华中党校,是在解放战争中由华中工委创

办的。

1947年初华东野战军在取得宿北、鲁南战役决定性胜利以后，新四军兼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为了坚持华中地区的斗争，1947年9月又成立了华中指挥部，指挥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副指挥陈庆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统一领导指挥第11、第12纵队及苏中、苏北军区所属军分区。与此同时，华东局又决定成立华中工委和华中行政公署。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行政公署主任曹获秋。

华中工委成立后，仍然面临严重的战争形势，国民党军队在华中的部分地区仍在进攻，还乡团等地方武装也很猖狂，一些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仍控制在敌人手里。为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华中地区的许多地方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和“三查三整”运动。许多地方为了坚持敌后斗争，对县、区、乡的地方干部进行精简，许多干部被撤到靠近沿海、比较安全的射阳县的农村。华中工委一方面为了安置这些撤退下来的干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提高干部，为将来开辟新区做好干部的准备，决定同时开办华中工委党校和华中公学两所干部学校。华中工委党校的学员主要是华中地区各地的县、区一级和相当县、区一级领导干部以及从上海、南京等地地下党因身份暴露而撤到解放区来的工人和学生党员骨干。华中公学是在江海公学的基础上创办的，学员主要是华中地区（特别是苏中、苏北地区）撤退下来的区、乡干部，以及上海、南京等地撤到解放区的青年积极分子。两个学校都设在射阳县合德镇周围，后来华中公学迁移到盐城县的葛武庄，华中党校仍留在射阳县耦耕乡的罾塘。1947年12月25日华中工委党校第一期正式开学，学员近500人。

华中工委党校校长由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兼任，工委组织部副部长陈一诚兼任副校长。党校设立校委会，领导全校各项工作。

校委会由陈一诚、熊宇忠、许业、盛华、周爱民、孙海光、吴志敏、顾方钥、胡叔度等人组成，书记陈一诚（兼），副书记熊宇忠（兼组织处长），并主持党校的日常工作。

党校校委会下设组织处、教育处和秘书处。1948年6月后，校委决定调整校部机构，把组织处和教务处合并为组教处，熊宇忠任处长，盛华为副处长，将秘书处改为校务处，下设总务科和直属单位。

学员分设若干队，第一期分5个队，第二期最多时曾设15个队，学员1000多人。各队的人数不等，少则六七十人，多则100多人。各学员队成立党支部，负责全队工作，支部书记一般由校委兼任。党员队长基本上由党校校委指定。各学员队实行自主管理，直接受校委领导。各队设管理员、司务长、上士、炊事员、警卫员、通讯员、医务人员、公勤人员等，由学校派任，负责全队的总务、后勤工作。

华中工委党校的教育方针是：“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克服经验主义，增强党性修养，加强政策策略观念。”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要突出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为中心，联系当时时事政治与党的政策，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教学。

教学内容主要是：第一阶段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着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概论、社会发展史、剩余价值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第二阶段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学习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统一战线和党的群众工作；第三阶段着重学习党的政策。在第一期着重学习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土地法大纲》，进行“三查三整”（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第四阶段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建党理论。第二期由于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准备随解放军渡江接管新区，因此着重学习党在新区的土改政策、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和文化教育

政策。

华中工委党校没有专职教员,主要是由华中工委领导和党校校长、校委分别给学员作报告上大课。上课后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党校领导也经常深入学员进行交谈,参加小组讨论。

党校在组织学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时,提倡有阅读能力的学员读原著。如组织学员阅读《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

在党校学习的学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只占30%—35%,一半左右的学员只有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还有15%左右的学员不识字或粗识字。针对这种特殊情况,党校采取不同的措施。对有阅读能力的学员,要求阅读原著和参考书,写学习笔记,结合辅导报告,进行深入讨论。对缺乏阅读能力的人,要求着重听讲和小组讨论,并学习看文件和记笔记。对于文化水平很低的学员,每天由队文化助教上一二小时的文化课,主要内容是:国文识字、学习如何写作文、记日记,以及地理和自然常识等。

党校在每一个专题学习结束后,进行一次测验;检验学习效果。每一个阶段学习结束后,个人写学习小结,然后进行小组讨论和支部小结。整个学习结束时,每个学员都要做鉴定。支部和学校提出综合性意见,作为各级党委任用和提拔的参考。

党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十分重视组织学员搞调查研究。每一个阶段学习中,一般都要安排一次到附近农村搞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如土改复查中,学员下乡调查写出的调研文章,对华中工委制定政策和开好华中土改会议,提供了参考依据。这种调研工作对提高学员认识水平、政策水平和巩固学习成果,增强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有着重要的作用。

华中工委党校继承和发扬延安党校和抗大的优良校风,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生活。学校对学员提出六条学风要

求：①自学为主，实事求是；②理论联系实际，提倡调查研究；③发挥自由思想，开展民主讨论；④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⑤坚持真理，修正错误；⑥走群众路线，发挥创造性。

华中工委党校处在战争的环境中，学习环境很差，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学员入学时自带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住在老百姓家里，睡的是地铺，上课没有教室，自带小板凳集中在操场上听大课。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 1.5 斤粮食和少量菜金。吃的蔬菜大部分是教职员和学员自己种的。为改善学员生活，党校成立了饲养班，建立了养猪场。为丰富学员的业余生活，学校建立了篮球场，成立了篮球队，经常开展篮球比赛。学校还成立校剧团和文工队，上演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尽管环境十分恶劣，生活相当艰苦，但党校学员的生活还是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

华中工委党校是在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向华中地区进攻的环境中创办的，处在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关键时期。华中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经过涟水战役、宿北战役之后，已进入鲁南地区作战。因此，苏中、苏北地区国民党军队相当猖狂。1948 年 1 月，国民党反动军队发起春季攻势，对华中解放区进行疯狂“扫荡”。党校所在地也经常遭到敌机的轰炸。1948 年 5 月，国民党军队出动四个整编师加地方武装 10 多万兵力，从南北两路向华中工委所在地区进攻，形势比较严峻。因此，华中工委决定华中工委党校和华中公学北撤山东鲁南地区。两个学校同时从射阳县出发，华中公学在前，华中党校在后，经过通洋港、五汛港后，抵达滨海县的八滩镇，向灌云、沭阳交界的农村前进，准备在苏北兵团掩护下过陇海铁路进入山东。白天行军有敌机扫射，大部分时间是在夜间行进，有时连续行军 100 多里，国民党的部队又尾追其后。在快要过陇海铁路的前两天，由于华中工委党校的学员比华中公学的学员年龄稍大一些，身体状况不如华中公学学员，走着走着掉队的越来越多，国民党军队又越追越近。因此，华中工委党校领导决

定,党校学员不去山东,就在沭阳农村分散隐蔽。华中公学学员则在部队的掩护下越过陇海铁路,到达鲁南地区莒南县在那儿学习半年多,在人民解放军开始反攻后才回华中。华中党校学员后来在形势好转后又回到射阳县的曹塘继续学习。

1948年9月,华东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济南市,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而这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学生运动也此起彼伏,在运动中许多地下党员和赤色群众的面貌逐渐暴露,许多人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为此,党组织决定把这些已经暴露或即将暴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的地下党员和赤色群众立即撤到华中解放区来,以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上海地下党专门组织了一支交通队伍,负责接送上海撤退的同志到苏北解放区。因此,从1948年八九月份开始,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大批地下党员和工人、学生纷纷撤到华中解放区。尤其是上海撤到解放区来的人特别多。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中有些非党人士、旧机关工作人员也自动跑到解放区来。

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工委决定:在射阳继续办好华中工委党校的同时,在盐城正式成立华中大学,由管文蔚兼任校长。凡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撤退面来的共产党员一律进华中工委党校,非党人士和进步学生一律进华中大学。从这时起,每天都有不少地下党员、青年学生和工人等到华中解放区来,到射阳、盐城来。或进华中工委党校,或进华中大学。到华中党校的地下党员有好几百人,由上海来的地下党负责人田辛具体负责领导大家学习。这时华中党校的学员共1000多人,共编成15个队。党校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一是形势和任务,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主要学习内容。二是新解放区党的方针政策。主要学习新区的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统战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和土政政策,提高学员的政策水平,为随军渡江接管新区做好思想上政策上的准备。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推翻了国民党在南京的反

动统治,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华中工委党校和华中大学的学员全部随大军渡江参加接管江南新区工作。原来从上海、南京等地来的这些地下党员和青年学生在1949年解放军渡江后,绝大部分都回到上海和江南大城市做城市和农村的接管工作,成为接管新区的一批骨干领导力量。

三、苏中区党委党校

1942年12月初,正是全党开始整风之际,苏中区党委为了集中县区以上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决定抽调干部举办区党委党校。由苏中区党委文教部长刘季平任校长。筹备就绪后于12月中旬正式开学,有学员近200人。学习内容分学习文件,提高认识;联系思想作风进行自我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整改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学习到1943年1月初,日伪军集中大批兵力开始对苏中地区进行“清乡”,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苏中区党委决定,区党委党校和抗大九分校一起渡江南下,到苏南解放区办学。苏中党政机关和部队又抽调部分干部进党校学习,由刘季平率领随军南下。1943年2月4日,旧历除夕之夜,苏中党校、抗大九分校和一师师部机关部分干部第一批先行,经过江阴附近的渡江点,先后分批乘船渡江至丹北姚家桥一带集中。

各单位在丹北地区会合后,稍事休息,准备通过运河、铁路两道封锁线。2月10日晚过了运河和铁路封锁线,经茅山地区到达茅山西南溧水地区的田佳山、云鹤山、铜山一带,胜利地完成了从苏中到苏南的转移任务。

2月26日,苏中党校和抗大九分校在溧水地区进行整编。师部决定:苏中党校与抗大九分校合并,校长仍由一师师长粟裕兼任,刘季平任副校长,杜屏任教育长,张崇文任政治部主任,姚耐任副主任,廖昌金任参谋长。校部下设一个直属的党训队和三个大

队。党训队主要由苏中党校学员和师部服务团组成。整编后,学校在溧水甘戴村举行开学典礼,十六旅政委江渭清致贺词,副校长刘季平作动员报告,教育长杜屏作了行军和渡江的总结报告。

开学后不久,日伪军开始对苏南地区连续“扫荡”,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军配合默契,也派主力部队大举向我驻地溧水地区进攻。在这次日伪顽军的包围进攻中,除我主力部队迎战外,抗大三个大队的学员均先后参战,他们浴血奋战,节节抵抗,坚守阵地,在几次战斗中,抗大一大队大队长汤万益、教导员唐昆元等先后牺牲,伤亡近200人。由党校学员组成的党训队由于跟随校部转移,没有伤亡。学校突围以后,根据师部指示,从苏南渡江北撤到淮南新四军军部地区休整。4月22日傍晚,经过70多里路的急行军。从江边营防口附近渡口渡江,次日拂晓到达长江北岸仪征县胥浦镇附近,然后再经过三天行军到达马集,稍事休整。

在马集体整期间,在一片常青松柏的树林里,为在江南牺牲的同志隆重地举行了追悼会。党训队吴镇作词,沈亚威作曲,创作了一首挽歌《英雄们还活着哩》,激励战友们为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战斗。

7月,全校移驻铜城以西的龙岗镇,全校进行整编,原由苏中党校学员编成的党训队仍然保留,继续学习。陈毅、张云逸亲自前来学校进行慰问。陈毅在报告中说:“你们是从龙潭虎穴里闯过来的,很不错。你们有一面作战、一面学习的经验,要好好总结。”

经过整编休整以后,继续进行学习,主要是进行整风。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学习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为主,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第二阶段是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一步学习整风文件,进行反省;第三阶段是系统检查,全面反省,自觉清理非无产阶级思想,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人生观。

1944年5月底,由苏中党校学员组成的党训队全体学员学习

结业分配工作,从而完成了历史任务。

四、苏南区党委党校

苏南地区的斗争形势比较复杂,斗争相当激烈。既要和敌伪军斗争,又要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就是在这种尖锐复杂斗争的形势下,苏南区党委仍然坚持办苏南区党委党校,对干部进行轮训。1941年夏,苏南区党委开办苏南党校,抽调苏南各条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到党校进行整风学习。校长是吴仲超,副校长是区党委保卫部长蓝莹玉,区党委组织部长李坚真也来党校参加领导工作。第一期学员有100多人,部队和地方干部各占一半。干部中有部队的团、营、连级干部,地方上是县、区级干部。文化程度低的编为第一队,文化程度高的编为第二队,成立两个党支部。党校住址是在苏浙皖交界处的山区里,经常转移,跟随区党委活动。

党校的学习内容是中央规定的整风文件,主要是分阶段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欧阳惠林(区党委秘书长)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和“关于立场、观点、方法”的报告。吴仲超作《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党的宽大政策的报告,江渭清作“中央关于练兵工作与今后对城市工作决定”的报告。此外,还有欧阳惠林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解答报告,蓝莹玉的《调查研究》报告等。在学习和自我反省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要反省过去的工作,有没有对不起党的事。

在学习期间,虽然经常转移,生活很艰苦,但整个学习生活既紧张严肃,又愉快活泼,学员们除练习演唱“天堂地狱”、“黄海渔民歌”、“新四军军歌”外,还观看苏南军区文工团演出的“山乡曲”和山“钦差大臣”改编的“视察专员”以及“黄河大合唱”等。

苏南区党委党校的整风学习,从1944年8月1日开学,到1944年12月22日结束,胜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五、淮南区党委党校

在淮南地区,淮南区党委于1943年下半年,为了在党员干部中开展整风学习,决定举办淮南区党委党校。党校校长由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劲夫兼任,陈修良等为副校长。

党校整风学习的内容主要是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整风文件。一个一个文件进行学习。阅读文件分初读、精读,读后按小组漫谈,交流心得体会。在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学习过程中,淮南区党委的领导同志方毅、张劲夫以及陈修良等分别对学员作了报告。

淮南区党委党校在整风学习中,由于受了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左”的做法的严重影响,在学习中搞“逼供信”,搞所谓“抢救失足者”,使不少人受到迫害。据陈修良在《浩气长存——深切怀念彭康同志》一文中说:“淮南区党委党校受到康生‘抢救失足者’的严重影响,把许多好同志划为特务嫌疑分子,监视或进行逼供,搞得人心惶惶,无心学习。整风学习遭到严重破坏。被怀疑者多数是知识分子,特别是来自敌占区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淮南区党委党校在整风学习中出现的“左”的偏差,经陈修良向彭康反映,彭康派人到淮南区党委党校调查了解之后,会同淮南区党委的领导同志到党校进行纠正,才使“左”的做法得以制止,在整风学习后期对受到委屈和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平反。

六、盐阜区党委党校

在苏北地区,1941年2月,根据中共中原局(不久更名华中局)

的决定，成立盐阜区党委和淮海区党委。盐阜区党委书记刘彬、组织部长杨纯、宣传部长曹获秋。为了加强党员干部的培训教育，盐阜区党委决定举办党员训练班，亦称盐阜区党校，抽调区乡干部进行培训。于1941年7月正式开学，地址在盐城泰山庙附近的民房里。参加学习的约百人。曹获秋分管党校工作，由尹阿根、刘阳生等具体负责。学习内容主要是当前形势和任务、建政初期党的方针政策，如“三三制”和“二五减租”等政策。盐阜区党委领导人刘彬、曹获秋都来党训班作过报告。后来因日伪军发动大“扫荡”，党训班宣告解散。1941年冬，形势逐渐稳定，盐阜区党委在阜宁硕集西边又举办党训班（党校），刘彬兼校长、陈一诚任副校长。教学工作由汪云、朗林负责。总支书记杨彬、总支委员刘阳生、祝彬、尹蒙学习时间两个月左右，学习对象为区委以上干部。学习内容一是当前形势和任务；二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主要是社会发展史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持久战》；三是党的方针政策，主要是“二五减租”政策、统一战线和“三三制”政策。学习时间为两个月。除党训班负责人讲课外，盐阜区党委的领导人刘彬、曹获秋都前来党校作过报告。这期党训班结束后，从1942年2月起，又连续办了二期，学习内容和学习时间基本上和第一期相同。

1942年11月，在苏北根据地成立了苏北区党委和苏北军区。1942年12月31日，根据中共苏北区党委的决定，中共盐阜区党委撤销，中共盐阜地委正式成立，地委书记由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兼任，原盐阜区党委书记刘彬任盐阜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不久，盐阜地委党校也随之成立，由刘彬兼任校长，校址在阜宁羊寨南边的登山马（今阜宁县马集），后迁至罗桥扬庄一带。

盐阜地委党校从1943年初成立起，正遇上全党的整风运动。华中局规定整风审干为1943年至1944年的中心任务，要求各级党委坚决贯彻执行。因此，盐阜地委决定：“凡区以上及文化政治水平较高的干部均要参加学习。”其目的在于改造全体干部思想，使

全体干部进一步掌握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地区区以上干部分批抽调到地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先后共办了五期,一直办到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每期学习时间约六个月,每期学习人数一百多人,最后两期规模较大,每期300人左右。就是这样连续举办党校,仍然不能满足大批干部整风轮训的需要。1944年为了完成整风任务,在地委党校轮训干部之外,又办起南北两片的整风队,调训各县干部进行整风。北片由许亚、冯国柱、巫敏负责,南片由熊宇忠、刘阳生负责,每期培训三个月,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全区干部整风轮训的任务。

盐阜地委党校整风学习的方法是:首先由地委领导同志作动员报告,然后阅读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弄通文件的精神实质。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进行对照检查,联系思想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剖析思想根源,提出改正办法,切实端正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通过地委党校的整风学习,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端正了学习态度,提高了思想认识,改进了工作作风,有力地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1945年12月,盐阜地委改为五地委,盐阜地委党校也改为五地委党校。1946年国民党军队向华中解放区大举进攻,整个华中地区的战争形势非常严峻,五地委党校不得不停办。直至解放战争转入反攻并取得重大胜利的1948年夏末秋初,人民解放军在盐阜地区取得“叶挺战役”和“益林战役”胜利后,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迎接即将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后对干部的迫切需要,为了提高现有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1948年8月,经中共五地委决定,恢复对党内外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在阜宁县硕集区境内,办起了党校性质的干部轮训队和盐阜干校开始对干部进行培训。

干部轮训队带有党校的性质,主要培训区委委员以上的在职党员干部。轮训队组成“中共五地委在职干部轮训队学习委员会”,由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学委会副书记黄元喜任队主持学习委

员会工作。学委会下设一个总务科外,不设其他机构,由学委会委员倪大成、陆志敏、王彤舜分工负责行政管理、组织、教学工作。刘湘任总务科长,负责食宿等生活安排。学员成立一个党支部,由学员自选支书和支委会。在学委会领导下成立一个总支委员会,殷恕(女)任专职总支书记,负责党员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轮训队只办了一期,学习三个月,结束后把培训党的干部的任务交由盐阜干部学校承担。

盐阜干部学校校长由专员骆明兼任,何平任副校长。下设三个科:组织科、宣传科、总务科。组织科长唐少波,宣传科长顾殷,总务科长刘湘。第二期何平调出,调阜东县委书记陈实意任党委书记。新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支委员会,由刘则先任书记。

校部下面设队,各队队部一般由三人组成,指导员(党内为支部书记)、队长和学习干事。指导员是队的主要负责人,队长负责行政管理,学习干事负责学习的具体工作。干校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军事化。

盐阜干校第一期就抽调一大批区、乡、村基层年轻干部和招收一批知识青年,共有学员500余人,分成六个队:一队以区委委员、县直科员以上干部为主;五、六队是县、区一般干部和乡镇干部;三队是区、乡青联会干部和社会知青;四队为区乡村妇女干部。开学不久,又抽调三、四队部分学员组成卫生队,学期一年。第二期培训对象、规模未变,五、六队主要吸收基层财会人员和部分知青,培训财经干部,学期半年。

学习的中心内容是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1947年和1948年初,根据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在盐阜区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中普遍开展了“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运动和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政策的教肓,以及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在第二期教学中又增加了城市政策的教肓内容,为今后进入城市和管理城市做好思想上政策

上的准备。

学习方法是实行报告、复述、讨论三结合。即听过报告后，以队或小组为单位，由文化水平高一些记得好一些的同志对报告进行复述和校对笔记，然后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有些还由学习干事作辅导报告，或进行个别辅导。

每个单元学习结束时，每个人都要做学习小结，讲自己在学习中的思想认识和转变过程，上升到人生观、世界观上来认识。在整个学习结束时，每人都要做学习鉴定。

盐阜干部学校和先前的党校性质的干部轮训队先后共培训了近千名干部，满足了县、区、乡和各部门对干部的需要，许多干部被提拔使用。其中还抽调七八十名学员随军渡江支援江南新区。

盐阜干部学校，1948年底迁至盐城西郊张庄。1949年3月，专员陈书同兼任校长，并招收第二期学员。同年秋，学校迁至盐城城内北门闸，改为盐城地委党校，校长黄元喜，开始了盐城地委党校新的培训任务。

七、解放初期的苏南、苏北区党委党校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了苏南广大新区。5月底江苏全境获得解放。华东局考虑到江苏解放后的特殊性，苏北是老解放区，苏南是新区，决定苏南和苏北分别组建党政军领导机构。因此在党校建设方面也分别组建苏南区党委党校和苏北区党委党校。

苏南区党委党校是在华中工委党校基础上建立的。1949年4月下旬，华中工委党校机关工作人员随大军渡江后到达无锡河埭口。6月22日，苏南区党委发出通知，决定以原华中工委党校为基础组建苏南革命干部学校，校长胡叔度。不久又将苏南革命干部学校更名为苏南区党委党校，校长由陈一诚兼任，副校长为胡叔

度。1952年5月,胡叔度调离,由李昌文接任副校长。苏南区党委党校实行校党委会领导体制,由陈一诚、胡叔度、李昌文、罗星元等几个固定的兼职校委和住校校委组成,胡叔度任校委书记,胡叔度调离后,由陈一诚兼任校委书记,李昌文为副书记。党校的管理体制分校部和学员部两个层次。校部机关设组教科、秘书室和总务科。每期培训班建立四至五个学员队,每个学员队建立党支部,负责领导全队的学习和思想工作。党支部书记由校委委员兼任,支委和队长、小组长由学员经过民主选举产生,报校委会批准。学员队的后勤管理人员由校部派员担任。

党校在解放初期的学习内容,除了形势与任务外,着重学习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如新区的土改政策、城市工商业政策、统战政策、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等,同时还进行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教育。学习中还请苏南行署的有关部门领导同志作专题报告,在有些单元学习结束后还组织到工厂、农村进行实际调查,进一步增强学习效果。

苏北区党委党校于1949年7月在泰州苏陈庄建立(后迁至扬州)。校长郑平(兼),后为高峰接任,副校长周爱民(兼)。校委会由郑平、周爱民、李坚、洪伯宪(一队支书)、许云程(二队支书)等人组成。周爱民任书记。下设组教科、秘书科和总务科。组教科科长李坚,副科长颜超。总务科长赵裕工。学员进校按分区编队,以县编组。各队建立党支部,负责全队的学习和思想工作。各队建立食堂,由学校配备管理员、司务长、工上和炊事员。

苏北区党委党校学员和苏南区党委党校学员由于有新区和老区之分,所处的环境和担负的任务也不完全相同,因而在教学内容上也各有重点,虽然在总的方面都是着重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但苏北是老区,对学员进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一方面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以提高认识;另一方面则强调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把它上升到理论上认识,这就是学习理论与总结实际

经验相结合。苏南区党委党校对学员进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则强调联系新区的城市和农村实际,与调查研究和总结城乡新鲜经验相结合,进行有的放矢的教育。

在解放初期,苏南、苏北区党委党校的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虽然各有特点,但培训的基本内容还是相同的:一是紧紧围绕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中心任务,对学员进行党的基本政策的教育。主要是学习新民主主义总政策,土改政策、工商业政策、金融政策、合作社政策和干部政策等,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二是学习党的纲领、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和党的作风。1950年后还办了整风学习班,克服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骄傲自满以及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

苏南区党委党校和苏北区党委党校办到1953年初,苏南地区和苏北地区合并成立江苏省,因而苏南区党委党校和苏北区党委党校也进行合并,而以苏南区党委党校为主成立江苏省委党校,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兼任校长,原苏南区党委党校的副校长李昌文任副校长,主持省委党校工作,苏南区党委党校和苏北区党委党校宣告结束。

第五章 华中解放区行政干部学校

华中解放区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地方政权的建立和各项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培养大批干部从事抗日根据地的各项行政和建设工作。在刘少奇、陈毅为首的华中局的领导和推动下,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像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这些行政干部学校有的是华中局直接领导创办的,有的是区党委和行政公署创办的,有的是分区党委和专员公署创办的,有些县也创办干部学校或干训班。这些地方行政干部学校为华中解放区培养了大量从事地方政权建设的干部,对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和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解放战争开始后,行政干部学校虽然有所减少,但许多行政干部学校仍然坚持办学,继续培训干部,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输送了大批干部。

华中解放区的行政干部学校,虽然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办的,有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的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但也有些干部学校贯穿于两个时期之中,难以机械划分属于哪个时期。所以下面介绍行政干部学校时,就不再区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不完全按办学先后加以介绍。

现在对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华中解放区创办的属于行政类的大学、学院、公学和政治干部学校分别介绍如下:

一、苏中行政学院

1940年下半年,苏中根据地建立不久,在管文蔚的领导下,为

了培训干部,先后开办了青年干部训练班与行政干部训练班。不久又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所培养行政干部的“高等学府”——苏中行政学院。由管文蔚任院长,周平任教育长。这所学院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以革命理论与业务课程,快速有效地训练了大批投身抗战革命事业的青年知识分子,教育培训出一批以身许国的优秀干部,促进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苏中行政学院共办了四期,每期二至三个月。培养对象是:一是知识青年,每期70人左右,共培训280多人。二是在职的乡保长,共培训2500多人。三是县区长的短期训练班,着重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

学院设置的课程和主讲人员见下列简表:

游击战争——由苏北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主讲

军队政治工作——由新四军一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主讲

政权建设——由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主讲

财政经济工作——由苏中行署民政处长宋日昌主讲

党的建设——由苏中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主讲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由行政学院教育长周平主讲

社会发展史——由彭庆旨主讲

人生观——由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长俞铭璜主讲

音乐课——由著名作曲家沈亚威主讲。

学院还根据不同培训对象进行不同内容和不同方法的教育。对于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青年,侧重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对于乡保长主要进行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而且学习时间较短。对于县区长等在职干部除了进行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以外,还采取到有关部门进行巡视、调查、总结的办法,以提高领导实际工作的能力。这些有关部

门的负责同志,既讲有关理论,又结合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对学员进行教育,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同时还请行署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领导学员进行讨论。比如今天讨论粮食工作,就由行署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领导讨论;讨论财政工作,就由行署负责财政工作的同志领导讨论,等等。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就派出去进行巡视,调查研究,回来以后再进行总结,使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进一步提高学员的理解能力和思想政策水平,然后毕业分配工作。

苏中行政学院是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建立初期创办的。虽然时间不长,经验不足。但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干部,对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有着重要的作用。

苏中行政学院办了一期以后,由于敌后形势紧张,也就停办了。

二、苏 中 公 学

1940年初,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在华中地区先后建立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抗日根据地。为了巩固和建设这些抗日根据地,迫切需要培养大量干部,以适应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党委都先后办起了培养干部的干部学校。

苏中公学是苏中区党委创办的一所干部学校,创建于1944年春,她的前身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九分校。当时的形势是,抗战已进入第七个年头,解放区的军民已经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形势空前好转。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中解放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培养抗战建国人才,中共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决定,以抗大九分校为基础,组建苏中公学。校址在宝应县金吾庄。

苏中公学,是苏中抗日根据地的一所培养军政干部的学校。

由新四军一师师长、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兼任校长，苏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兼任副校长。新四军一师一旅副旅长张藩任专职副校长、校委会书记，夏征农任教育长。1944年底张藩调出，梅嘉生任教育长，夏征农任政治部主任、校委书记。1945年8月，夏征农任校长，周蔚昌任副教育长。学校的中层、基层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大多数来自抗大九分校。

1944年6月1日，苏中公学在金吾庄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粟裕、管文蔚亲临讲话。揭开了苏中公学培训干部的序幕。

在苏中公学开学前，管文蔚特地为苏中公学校刊题词：

“假使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根据地，没有这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根据地，就不会有如此的坚强。

“又假如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根据地，没有大批的新的知识分子的涌进，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根据地，也就不会有如此的壮大。

“因之，轻视工农老干部及轻视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只有互相尊重，互相学习，才能使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根据地，百倍的坚强，百倍的壮大，才能很迅速的击败各种敌人，建设新的中国。”

苏中公学办学历时两年，先后办了五期，共组建44个学员队，其中，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的23个队，部队干部7个队，地方干部7个队。另外还有解放过来的伪军官编成的6个队和一个日本、朝鲜反战弟兄队。两年中，苏中公学为军队和地方培养输送了4000多名干部。

苏中公学第一、二期主要是进行整风教育。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在敌后根据地的普及和深入，也是在以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的干部学校中的一次尝试。

第一期学员共编为9个队。1—6队于1944年6月1日正式开学，11月7日基本结束；7—9队于同年7月组建，12月23日毕业。第二期学员编为7个队，于1944年8至10月组建，1945年3

月下旬毕业。

这16个学员队中,有8个知识青年队,4个部队排连队,4个地方区乡干部队。

苏中公学第一、二两期整风学习的基本着眼点,在于提高学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学习并掌握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明确政治方向,确立革命人生观。

两期整风学习都经过整顿学风、时事整风、全面反省三个阶段。

整顿学风阶段,主要是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三风的报告等文件,领会整风的意义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端正学习态度和入伍、入学动机,克服脱离实际,好高骛远的倾向。

时事整风阶段。是针对当时的时局和学员政治思想情况安排的。以达到统一政治思想,明确政治方向。通过学习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理论和近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史,对比抗战以来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和我党在敌后战场抗击日伪军的情况,使学员进一步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认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战才能胜利,中国才有光明前途。

全面反省阶段,要求学员在前两个阶段学习对照、点滴反省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个人的经历和思想演变进行全面的分析,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写出自传,进而找出今后的努力方向。

整风中曾出现过偏差。主要是在第一期整风的全面反省阶段,受康生的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影响,对学员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政治本质做了不符实际的分析。在指导思想上偏重于追查政治历史问题。不适当地强调“整风、审干、防奸三结合”,采用“大胆质疑,坦白示范”,搞“逼供信”,偏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伤害了不少同志。这是个沉痛的教训。

这段出现较大偏差的时间不长。在苏中区党委和苏公校委会的领导下,纠正较快。第一期整风结束不久,学校召开了整风总结大会,夏征农代表校委会做了公开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同时诚恳地向受委屈的同志道歉。对已经分配工作的同志,苏中党政、军领导人亲自召开座谈会,让他们回校或在机关重新做结论,并消除不良影响。

苏中公学第一、二期毕业的学员共 1000 余人,除充实苏中地区党、政、军各部门和少数调到新四军军部工作以外,有 452 人分两批先后随粟裕、叶飞率领的主力部队南下,为建立苏浙军区、开辟新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第三期,从 1945 年 3 月开学至同年 8 月日本宣布投降结束,前后五个多月。共有学员 1000 多人,是苏中公学的全盛时期。学员共编为 3 个大队,分辖 11 个队。其中大部分为青年学生队和地方干部队,两个部队队,一个日朝反战弟兄队。

这一期学员,处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学校遵照苏中区党委的决定,从第三期起不再进行整风,而大力加强军政教育,开展大练兵,将整风精神贯彻于各项教育之中。

为了做好练兵的思想准备,在学员中用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时事政策学习,以认清形势,迎接大练兵。

这期的政治教育,有计划地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著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等。军事训练结束后,配合思想总结,分别进行了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和反对家乡观念的教育。

这一期军事训练的内容,从制式教练和内务条令的教育入手,从日常生活抓起,事事严格要求,使大家逐步养成紧张的战斗作风和战争观念,克服自由散漫习气。然后进行军事技术训练,掌握刺杀、投弹、射击三大技术和翻单双杠、跳木马、过天桥、爬障碍等军体技能。在庆祝学校成立一周年时,还举行了全校阅兵典礼和运

动员大会,把群众性的大练兵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学校还响应党中央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每个学员都在课余,利用驻地房前屋后、河岸沟边开荒种菜,有的队还喂猪、养鸭、捕鱼,以改善伙食。学校还组织全校师生开垦了50亩荒地,及时种上慈姑,绿豆。通过大生产,使学员受到了艰苦锻炼。

在大量培训军政干部的同时,还承担了一项特殊任务,即教育改造被我军解放过来的日朝官兵。他们是我军解放、参加反战同盟的日本弟兄31人和朝鲜弟兄12人,编为第20队,直属校部领导。负责该队领导工作的是早在我军工作的一位朝鲜同志。校部还决定曾留学日本并从事过敌军工作的校政治部宣教科副科长鲍汗青兼管该队工作。这些日朝弟兄经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和时事政策,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和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他们对我军实行的优待俘虏政策深为感动,在学习期间生活待遇从优,生活得十分愉快。日本宣布投降后,新四军一师政治部通知他们调离苏中公学,待命回国。

苏中公学第三期学员较多,输送的干部也多。仅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的一个月內,就向主力部队输送了1000多名干部。

日本宣布投降后,我苏北解放区的部队,开始向敌占城镇出击。8月中旬苏中公学派出24队(军事队)和校部警卫连,参加解放宝应县城的战斗。8月底9月初,学校又先后派出战地服务队、前线工作队,参加解放兴化,如皋两县城的战地服务和支前活动。

抗战胜利后,苏中公学继续举办了第四、第五两期。第四期,自1945年9月,在沙沟开始,至12月中旬在大中集基本结束。这一期共有3、4、5三个大队和四个校直属队。三大队是第三期参加支前返校留下的,四大队是新招收的知识青年和少数地方干部。五大队则是刚解放过来的伪军军官。1945年11月初,学校由沙沟

移驻大中集。12月上旬,上级决定,苏中公学由原来培养军队、地方两种干部改为单一的专为军队培养干部的学校。为此,学校在大中集进行整编,并开始第五期教学。第五期重新编为一、二两个大队,下属一队至八队共八个学员队。其中三个队是上期留下的知识青年和地方干部队、两个队是从上期解放伪军官中选留的,一个是新成立的部队干部队,一个是新入校的江南北撤干部队,一个是专业文化队。

这两期的学习内容,一是学习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中共七大文献,着重加强形势教育,使大家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军事教育方面,增加了教学时间,加强专业训练,提高军事素质。

苏中公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校有一套适合情况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使干部和学员都有着为革命而教、为革命而学的坚强意志和不怕困难的顽强战斗精神。这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苏公教育取得成功的精神支柱。毛主席说过:“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这是一条符合实际情况的、行之有效的干部教育方针。苏中公学就是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首要任务,从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出发,针对他们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分析、阐述,以达到提高学员思想认识水平的目的,从而取得思想教育的效果。

苏中公学校长夏征农在《纪念“苏公”成立一周年》时,写过一篇《谈苏中公学的教育方针》的文章。他根据中央的精神,具体提出“苏公教育方针,是既要照顾从各种工作岗位调训的干部,又要照顾出旧式学校大门的青年学生;既要进行业务教育,又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但不管是哪一类哪一阶段教育,均以实事求是精神,根据学用一致、教做一致、需求一致的原则来进行。”“这就是‘苏公’不同于其他旧式大学的基本精神。”

“苏公”在教学中的主要经验,夏征农主要总结了两条:

第一条是“一切为了学员，一切从学员出发”。“一切以学员为主体，替学员打算。学员的喜悦，就是学校的喜悦；学员的忧虑，就是学校的忧虑。我们全体干部，都充满了和发挥了这种爱护学员如爱护自己一样的精神。”“对进步的要爱护，对落后的更要爱护。”“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使进步更前进，使落后者一同前进。”在教育内容上，“不简单取材于书本，”“而主要是取材于学员自己的实际思想活动，怎样想，怎样看，就对症下药的怎样讲。”“这样，教员所讲的，正是学员没有想通或想错而又急需要想通的问题。”“这种一切为了学员，一切从学员出发的精神，不仅表现在教育上，也表现于行政管理上。”“学员，是学校的主人翁。”

第二条是“发挥自由思想，执行群众路线”。

“正因为我们是一切从学员出发，一切为了学员，所以，我们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采取了两条主要的办法：一条是发挥自由思想，一条是执行群众路线。”

“发挥自由思想，就是对于任何问题，先让学员自己去想，你认为怎样，就怎样，应该毫无顾虑地提出来，然后集合大家的意见，共同讨论；看谁意见对，谁的意见不对。相信对的，放弃不对的。”“所以在学习中，愈是发挥自由思想，讨论愈热烈，问题的认识也就愈清楚，愈彻底。”

“执行群众路线，就是对于任何工作，不依靠行政命令，而依靠学员群众，相信学员、组织学员自动地去做。这一方面，由于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学员，只要他们懂得了道理，他们的自动性就自然提高起来；另一方面，我们深信群众的力量，只有依靠群众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发挥工作中的创造性，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文章最后概括地说：“发挥自由思想，执行群众路线，是打破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的两大法宝。”

苏中公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文化体育活动，成为教学活动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形势任务教育、学员思想教育紧密结

合,采用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育于文体活动之中,成效显著。学校成立总俱乐部,作为指导全校文体活动的机构。各学员队也有俱乐部,是开展文体活动的群众性组织。各学员队经常组织文艺晚会,自编、自导、自演,吹拉弹唱、舞蹈、秧歌舞、小话剧样样都有。有的队还能组织演出大型的戏剧,如18队演出过话剧《窒息的城》,五期一大队演出了历史京剧《九宫山》。校总俱乐部经常从全校选调文艺骨干,组织排演艺术水平较高的大型剧目。先后演出话剧《黑乌鸦》、《罪与罚》、《夜正黑》、《重庆交响曲》、《父与子》以及歌舞剧《刘桂英是朵大红花》,还演出了苏联话剧《前线》。特别是演出《甲申记》,对大家教育深刻,反响很大。李闯王由于胜利冲昏了头脑,以及政权得而复失,给大家在夺取政权问题上敲起了警钟。

这些文艺演出,紧密配合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丰富了学校的精神生活。其中,《前线》和《甲申记》的演出,给大家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实际上成为两堂形象而又深刻的政治课。

《前线》是前苏联作家考涅楚克的作品。它的主题是反对军事指挥员中骄傲自满、故步自封的思想,提倡学习新事物,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对大家很有启发和教育。

《甲申记》是根据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由夏征农、吴天石、沈西蒙改编的历史剧。该剧描写了明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反抗崇祯暴政取得胜利,而在进入北京后又为胜利冲昏头脑,骄傲腐化,最后遭到失败的历史故事。《甲申记》以历史为借鉴从明朝的覆亡中记取李自成失败的教训,胜利后要防止骄傲自满,贪图享乐,脱离群众。该剧从1945年5月4日起在苏中、苏北地区演出10场,观众达3万人左右。抗战胜利后,又继续在东台、如皋、淮阴等城市演出了几十场。《甲申记》的插曲,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1946年4月18日,第五期教学即将结束时,苏中军区政委陈丕显来校宣布华中军区的决定,苏中公学调华中军区。在学员分

配结束后,学校全部人员离开大中集到达宝应县的汜水镇。华中军区司令员粟裕宣布苏中公学与雪枫大学、苏浙军区随营学校合并。学校大部分人员并入了雪枫大学,一部分人员并入了一分区的苏中公学分校。至此,苏中公学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关于苏中公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夏征农 1987 年为《苏中公学校史》所写的序言中讲了三:

第一,苏中公学培养了 4000 多名军政干部。这些干部,不仅在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有不少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就是在今天,许多健在的苏中公学同学,仍活跃在各条战线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起着骨干作用。

第二,苏中公学是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成立和进行教学活动的;没有固定的校址和课堂,没有任何教学设备,一面战斗,一面学习。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党从来就是十分重视教育的;说明我们的教育干部和学员都有着为革命而教、为革命而学的坚强意志和不怕困难的顽强战斗精神。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取得成功的精神支柱,应该让后人知道,特别是应该让现在的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知道。

第三,苏中公学由于环境关系,在教学上也较单一化,知识面窄,是不能与现在的学校相比的,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它能够在短短的六个月中把四面八方来的,有着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志趣的 4000 多名青年引上革命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为一般人所意想不到的。它靠的是什么呢?主要靠的是思想政治工作。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客观条件。但是可以肯定,如果学校没有一套适合情况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不管客观条件如何,要取得这样的成绩是不可能的。

三、华中建设大学

华中建设大学,是华中解放区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和建设人才的新型大学,它贯穿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之中。

华中建设大学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44年冬开始筹备,1945年春节以后开学的华中建设大学,先后办了两期,办到1946年2月底时,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决定,建大校长彭康调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并率领华大师生400多人前往山东支援临沂的山东大学,华中建大的第一个时期就此结束。第二个时期是在1946年3月,经新成立的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人民政府决定,在原华中建大留下的教工人员的基础上重建了一个华中建设大学。现在就华中建大的两个时期分别叙述如下:

华中建设大学的第一个时期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形势发展很快,盟军已开始向德国本土全面反攻,日军也在各个战场积极败退。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已经根本好转。华中局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进一步巩固华中解放区,需要培养大批干部和建设人才,决定创办华中建设大学。1944年11月21日,华中局向各区党委发出《关于创办建设大学的通知》,要求各根据地抽调来建大学习的区级、县团级以上干部和每县应保送知识青年的名额以及学生到校时间等问题都做了规定。

1944年冬,设在淮南津浦路东根据地盱眙县新铺镇的华中党校,已经完成了干部整风学习的任务,即将结束。华中局决定在华中党校的基础上筹办华中建设大学。任命华中局宣传部长,并主

持华中党校工作的彭康任建大校长,调新四军二师政治部副主任、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劲夫任副校长兼管党的工作,并且抽调一些负责干部担任各系的领导职务。同时在解放区报刊上登载《华中建设大学招生简章》。

1945年春节以后,淮南、淮北、苏中、苏北等根据地抽调的干部和保送的知识青年陆续来校,上海、南京等沦陷区的地下党也选送了一批地下工作者、职员、大学生和高中学生来建大学习。建大根据师资情况和到校学生情况,设立四个系,每系100多人,另设高干班、区干班各一个。

四个系是:民运系,系主任李代耕、副主任方章;民政系,系主任贺希明、副主任姚耐;财经系,系主任陈穆、副主任陈修良;文教系,系主任陈同生、副主任张天民。各系均设政治干事和行政干事。系干部和学生中的党员合在一起成立党支部。

高干班,也称研究班,学员是华中局党校留下的各地调来的县、团级以上干部,班主任为朱达章。

区干班,学生是区委书记、区长或者相当于这一级的干部,班主任为冯二郎。

1945年5月4日,建大在新铺镇的古庙里举行了第一期的开学典礼。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治委员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军参谋长赖传珠、华中局组织部长曾山等都来参加,他们和彭康校长都讲了话。彭康在讲话中阐明建设大学的办学宗旨和任务。他说:“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反攻的前夜,为了加速培养一批有觉悟、有文化的干部,以适应各条战线的需要,所以华中局决定创办这所新型的大学,希望同学们在这里认真学习,不要辜负党的期望。”

建大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的教育方针,采取上课与讨论相结合的教育方法。整个学习分为政治教育和业务教育两个阶段,即进行马列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

业务教育两个阶段。政治课,全校统一上大课,业务课由各系分别进行。学校除设一批专职教员外,校长和各系主任都分工讲课。

在学习时间的安排上,前两个月是进行政治学习。由彭康主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后来适逢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毛主席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又增加了学习《论联合政府》的内容,由饶漱石讲课。

业务教育课程,先是由一批专家、学者编写了上百万字的教材讲义,然后由系主任和专职教员讲授。还请党政军民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专家来校作专题报告和辅导报告。例如,请梅益、钱俊瑞、范长江、刘长胜等同志作国际形势,新闻工作,党的有关政策等报告,这些报告内容丰富,事例生动,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收到很好效果。

讲课后组织小组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展开争论,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清是非,统一认识,提高学员的政治理论水平 and 政策水平。

教学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方针。在听报告时要认真记笔记,回到住处后,就动手整理笔记。在认真阅读文件、摘录要点之后,提出问题,学习组长归纳后进行讨论。有不同看法,可进行辩论,甚至进行大组或大会辩论。比如,民政系有一次讨论“小资产阶级应该为谁服务?”讨论中分歧大就进行大会辩论。辩论后由姚耐做总结性发言。他说:“小资产阶级从经济地位上来说,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一个依附的阶级,这就决定了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它不是为资产阶级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服务。在当前的革命洪流中,只有坚定地毫不动摇地为无产阶级服务,才是惟一出路,才有自己的广阔前途。”

建大是在战争环境和贫穷的农村创办的。过着艰苦的学习生活。学校大力推行延安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发扬“艰苦奋斗”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传统,领导干部以身

作则,团结全校师生,大家动手,就地取材,解决最基本的生活设施,因陋就简地改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上大课在大庙里,各系开会上课在广场上和树林里。

建大师生实行供给制待遇。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五钱油、五钱盐、五钱肉、一斤菜、一斤草、一斤米。每星期才能吃到一次荤菜。每个班都分一块荒地,学生开荒种菜,送给伙房。

建大教育学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取军队的管理方法,每天清晨列队出操,过准军事化生活。早上出操都要点名,发现迟到的晚上要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星期要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在会上每个人都要把一周来的学习、生活以及工作情况,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总结,然后征求大家批评意见,相互进行批评与帮助。

校部和各系都成立俱乐部,组织学生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丰富精神生活。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完全是革命同志的关系,互相关心爱护,相处亲密无间,政治空气,民主空气很浓,大家心情开朗舒畅,广大师生深深感到建大确是革命大熔炉,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和锻炼。

当时的物质条件和生活条件虽然很差,但校部和队部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文体活动。那时开大会都争先恐后挑战唱歌。有一次,在一个大的村庄里,校部举办了大型的文娱会演。有大合唱,有小型秧歌舞。军部文工团还为大家演出了著名话剧《雷雨》。大家席地而坐,秩序井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校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华中局组织部特派温仰春同志前来作了动员报告,要求建大的学员提前结业,立即分配工作。在8月25日前后全校学员陆续离开学校,奔赴新的工作岗位,华中建大第一期就此宣告结束。

1945年9月6日,新四军解放了苏北重要城市淮阴。经华中局决定,华中建设大学从淮南迁至淮阴。以道署街的原日伪军司

令部做校舍,立即筹办第二期的工作。

建大第二期的办学宗旨是培养解放区各种建设人才。由于当时办学条件限制,未设本科,招收的学生都编入预科。预科不分系,计划学习三个月毕业,集体分配到各地实习一个时期后,再转入本科各系学习。学校在11月10日开学。

建大的正副校长仍由彭康和张劲夫担任。后因党中央决定华中局要与山东分局合并成立华东局,在建大第二期开学前,华中局派张劲夫先去山东商洽,他就离开了建大。

本期师资力量得到了充实,有经济学家何封、哲学家李仲融、文学家王淑明、史学家刘力行、数学家孙克定、画家胡考、音乐家章枚、莫晓明和叶芳炎,裴济华等。

校部的机构与第一期基本相同。全校设一个预科部,统管各学生队的教学和行政工作。预科部主任朱达章、副主任姚耐和方章。

预科部下面设队,预科学生编为十个队,每个队120人左右。10人左右编一个班。三四个班为一个区队。队由政治干事(兼党支部书记)、行政干事(兼军事队长)和教育干事组成队委会,抓全队工作。还有一个中等教育研究班。班主任为何封,党支部书记是王淑明。

第二期的学生来源是:一是停办的原苏北公学的学生400多人;二是华中解放区调来的一部分基层政权的干部和从江南解放区北撤的干部;三是上海、南京等地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四是解放区部分中小学校的校长和教师;五是新老解放区刚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此外,还有40多名被俘日军中经过教育后参加抗战同盟华中支部的日本和朝鲜青年。

1945年11月10日,建大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等领导同志都参加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本期预科未设业务教育课程,着重进行革命理论和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学生对中国的认识,确立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预科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国革命基本理论的教育,基本教材是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还插入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专题讲座;二是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基本教材是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小册子。整个学习仍采取全校集中上大课、各队组织小组讨论和小组讨论,作辅导报告和阶段小结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彭康主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其余课程由预科部主任和教员讲授。反战同盟区队的学生,一部分学习内容同队里一起听课讨论外,由军区敌工部派人来讲课,单独组织讨论。

预科部的学生经过近四个月的学习,达到了预定的教育要求。当时由于华东局要彭康校长及早去山东主持华东局宣传部的工作,成立不久的临沂山东大学要求建大支援师资力量,苏皖边区各地也需要干部,本期预科就于1946年2月下旬结业。2月22日,建大举行第二期学生的毕业典礼,华中党政军部分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邓子恢书记和张鼎丞司令相继讲话,勉励同学要努力工作,继续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本期学生的分配是:在1300多名学生中,有500多名学生分配到苏皖边区各地工作,200多名留校工作,少数学生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工作,部分学生调往东北解放区工作,420名学生转入临沂山东大学本科各系学习。

1946年2月底,华中建设大学第二期即宣告结束。

1946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彭康调华东局宣传部工作。同时调一批建大的干部和教授去临沂的山东大学工作,如建大的干部朱达章、姚耐、方章以及教授何封、李仲融、王淑明、刘力行、孙克定、胡考、章枚等都离开建大去山东

大学。这些干部和教授以及部分学生共 400 多人由彭康率领于 1946 年 3 月前往山东,华中建设大学的第一个时期到此结束。

华中建设大学的第二个时期

1946 年 3 月,华中建设大学北上山东后,留下的部分干部和教师,经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决定,重建华中建设大学。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兼任建设大学校长。原新四军敌工部副部长李亚农和原苏中公学副校长夏征农任副校长,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白桃(戴伯韬)兼任副校长。

建大根据华中分局的指示,按照苏皖边区建设的迫切需要和可能条件,计划设立工、农、文、医、师范、社会科学等六个系和一个预科部。工学院设应用化学系和纺织系。农学院设农业系和畜产系。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和外国语文系。师范学院设教育行政系和中等教育系。社会科学院设社会科学系和商学系等。修业时间,根据各院系的要求和学生来源、水平等不同情况,分别为一年、二年、三年到四年。预科部设文、理、医三科,为学生转入本科打下思想和文化基础,时间为半年到一年。文学、教育两学院于 1946 年 3 月 22 日开始招生,其他学院下届开办。文学院分文艺、新闻、戏剧音乐三系,教育学院分教育行政及中等教育二系。学制均为二年。不久,苏皖边区政府决定将刚建立不久的苏皖教育院并入华中建大,名为华中建大师范学院。院长由白桃兼任,陆维特任教育长,校址在清江。内设教育行政及中等教育两系。另附设师范学校,由汪达之任校长,陶官云任副校长,地址在板闸。同时,苏北工业专门学校也并入建设大学,改名为华中建大附中。(1946 年 9 月,淮阴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后,建大转移到苏北阜宁、建湖一带。后建大向山东转移,建大附中留在阜宁,1947 年夏改名为苏皖五分区高级专科学校,校址在建阳高作附近。)

3月间,建大调整充实校部的机构和干部的同时,从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等地聘请了一些著名的教授、学者来建大任教。其中有朱维基、刘汝醴、黎冰鸿、关露(女)、罗稷南、屈荫生、车载、芳信、赵平生、韩国儒和赵慧琛(女)等陆续到校。还聘请钱杏村(阿英)、范长江、刘季平、黄源、沙俊等同志兼课。对教授的待遇给予照顾,实行薪给制。

建大通过各地组织和多种渠道向解放区内外广泛宣传动员招考新生。建大副校长夏征农专门写了一篇《关于华中建设大学》的文章,发表在《新华日报》(华中版)上,具体介绍:为什么要创办华中建设大学;华中建设大学的教育方针;各院系的设立和要求;学员与教授等问题。号召广大干部和城乡青年学生前来报考。文章发表后,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前来淮阴投考。从3月到5月,校部举行了21批,1200余人的新生考试,录取800多名。学校原定于5月开学,因录取的学生与计划招生数相差较大,故延期举行。将到校的新生编为五个补习班,于5月中旬开始上课。必修课以政治专题为主,选修课以中文、英语、数学为主。

正当全校同学满腔热情投入学习的时候,时局发生骤变,蒋介石背信弃义撕毁“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向淮南和苏中大举进攻,敌机空袭淮阴也日益频繁,建大不能正常上课,被迫撤离淮阴,夏征农副校长作了动员报告后不久,建大迁往淮阴东北20里的徐扬庄,分散住在农民家里,临时搭起大芦席棚上课。

建大迁移前后,新生不断来校。从淮南等地撤退的几批干部和中小学教师也编入建大学习。全校学员增加到900多名。大多数是中学文化程度,进过大学、专科高校的也有近200人。教务处举行编班测验后,将全校学生编为文预、理预、干部、中教、小教等八个班(统称预科)直属校部领导。班是领导组织学习的单位,下设学习小组,每个班100多人,学习小组在10人左右。各班设班主任和辅导员,建立党支部,负责学习、生活和思想政治工作。同时

成立校学生会和各班的分会,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管理伙食和卫生等工作。

补习教育结束后,学校根据时局变化,转变教育方针,以进行时事政治和思想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着重使学生掌握革命基本理论,认清战争的性质和时局发展趋势,增强我军必胜、蒋军必败的信心,明确青年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努力方向,转变思想,树立革命的世界观、人生观,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并为支援解放战争作好准备。时事教育由李、夏二位校长作国内外形势报告。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哲学等课程,主要由孙叔平教务长讲授。学习方法采取上大课与讨论结合,以讨论为主。最后由讲课的同志根据学生讨论的情况作学习小结和解答报告。在徐扬庄将近三个月的学习中,使广大学员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对中国革命、当前形势、个人前途等方面不少认识问题,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革命觉悟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刚参加革命队伍的同学进步尤为显著。

8月13日,华中分局给各地县团级机关发出了《关于大量动员学生来建大学习的通知》,在《新华日报》上还刊登了“华中建设大学继续招收新生广告”,并准备在9月份开学。

但时隔不久,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苏北解放区。9月3日,建大从徐扬庄转移到阜宁、建湖县高作、益林一带。9月上旬苏北地区战争形势紧张,华中分局决定建大向山东撤退。夏副校长作北撤动员,分析了战争形势,阐明我军战略转移和建大北撤的必要性,澄清各种疑虑,要求全校师生发扬团结互助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完成北撤行军任务。建大在北撤前,调出一部分干部和学员去部队,在华中坚持斗争。其余的600多名学员和教授、干部等共800人左右,按军事化组织编成三个大队,以大队为行军单位,于9月中旬开始北撤。

建大这支庞大的队伍,按照上级要求,是要从苏北撤退到山东

临沂附近,全程有七八百里之遥,还要经常在夜里行军和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北撤任务非常艰巨。但建大在校党委的领导和安排下,顺利地进行了转移。在北撤行军途中,干群、师生、同学之间发扬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同甘共苦的集体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战胜了一系列困难,完成了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任务。大家也经受了-次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上了一堂最实际的革命教育课。10月20日,建大抵达鲁南汀水,作了短期休整,进行行军小结后,转移到莒南县石村、朱楼一带住下,校部驻朱楼村。

这里是山东滨海区的偏僻贫瘠的山村,条件更为艰苦,环境则比较安定。经过修正后,建大将学生编为六个班和一个中教班,开始复课,着重进行时事政治和思想教育以及必要的业务知识教育。

学习刚开始,建大就根据上级的指示,调出近200名学生去部队和转入军事、医务学校学习。还挑选42名学生调往华东军政大学炮兵专业大队学习,挑选100多名学生转到华中医科大学学习。学校将其余的学生100余人合并为四个班和一个中教班,继续学习。大约在12月上旬,建大补行了开学典礼,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彭康,山东省政府副秘书长郭小化,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等领导同志都到会祝贺,彭康部长还作了形势报告。

时事政治教育中,在教务处的领导下,各班以驻队教授、班主任、辅导员组成领导小组,分工抓好理论辅导、学习、行政生活和思想政治工作。同学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学习中,把学习和课余生活搞得生气勃勃,十分活跃。北方的冬季十分寒冷,学生的寒衣在行军中多已精简,山东的供给又较困难,一个组只发到几条棉被和几套棉衣,有些同学就两个合盖一条薄被。山东没有大米吃,吃的是玉米、小米、高粱、地瓜、南方大城市来的同志吃不惯,硬是坚持吃下去。生活虽然艰苦,但革命热情高涨,文娱活动丰富多彩,过着既艰苦又愉快的生活。

1947年初,国民党又调集兵力进攻鲁南地区,建大调出200多

名学员支援前线并分配工作,建大师生也奉命向胶东解放区转移,这是又一次长途行军,队伍在深夜冲过了胶济铁路敌人的封锁线,冒着风雪严寒爬山越岭,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于3月18日到达东海专区海阳县。这时全校还剩200多名学生,编为一班、二班和中教班。4月初,校部召开庆功大会,由李亚农校长主持,宣布和表彰了在行军中立功的同志。夏征农副校长作了行军总结报告,动员全校师生搞好教学工作,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全校学员于5月中旬结业,分配工作。华中建大第三期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结束。

1947年上半年,华东野战军先后取得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的重大胜利,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军正准备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华东局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大量充实部队干部的需要,确定建大举办第四期的任务。要求从胶东地区招收知识青年2000名,作为预科生,经过三个月的教育,争取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学生自觉自愿地转入军事学校学习,培养成为军队干部。

1947年5月,华中建大遵照中共中央华东局的指示,在胶东海阳县继续办第四期。预科招收胶东知识青年1700多名,还有本科行政系、财经系和文艺系学生700多人。北撤的淮海联合中学也并入建大,改为建大附属中学。由淮海专署文教处长孙存楼任校长,朱澜农、姜龙楼、吴志锋、吴鸣裕任副校长。建大全校学生和干部共达3500多人,是建大所办四期中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期。

建大第四期的秘书长为李邀,教务长为沈鹰。全校设四个预科部,学生编为十六个班。每个部四个班,每个班百余人。第一、二、三、四预科部的主任分别是李庚、张一夫、陶官云、赵平生。班设正副班主任和教育干事、辅导干事。具体组织学生学习。班建立党支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学校出版《建大生活》,加强对工作和学习的指导。

7月上旬,建大举行了第四期的开学典礼,华东局宣传部长彭

康到会祝贺并作形势报告。李亚农和夏征农校长报告了建大的任务、教育方针和教育计划,要求学生努力学习,认清战争形势,提高思想觉悟,积极为人民、为解放战争服务。

本期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确定以形势和思想教育为主、文化教育为辅的教育方针。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少而精的原则。整个学习分为形势教育、土地改革教育和思想教育三大单元进行,着重解决学生的主要思想认识问题,坚定为人民、为解放战争服务的决心。

在教育方法上,坚持一切为了教育学生,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原则。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加强教学效果,启发学生发挥自由思想,通过充分讨论,明辨是非,提高觉悟,改造思想,使整个教育成为学生自我教育、改造思想的过程。在方法上采取四个结合:(一)上课与讨论相结合。每一教育单元都按四步进行,使学习逐步深入。第一步由教员结合学生思想做启发报告;第二步各班组织学生互助漫谈,联系思想提出问题;第三步由班部归纳几个主要问题,组织大组讨论;第四步教员总结,统一认识。在学习中抓好提倡发挥自由思想和开展民主讨论两个主要环节,让学员们自己教育自己,解决思想问题。(二)课堂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在形势教育中,各班都组织控诉晚会。土改教育中请当地贫雇农来做报告。组织学生参加驻地批斗恶霸地主大会,班里也开诉苦晚会。(三)一般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有少数学生的思想问题比较复杂;有些地主子女因土改影响到切身利益而思想不通。这时班干部和学习骨干就深入细致地做个别教育工作,使其自觉解决思想问题。(四)学习与开展立功,创模(学习模范)相结合。领导上提出“在学习中立功,以立功推动学习”、“以努力学习、为战争立功”等号召,定期组织学生报功、记功、评模、评功,最后由校部开庆功授奖大会。

预科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基本上达到了预定的教育要求,广

大学生树立了为战争服务的思想。许多学生纷纷到班部、预科部和校部请求提前结束学习,立即参军。经校部研究和请示华东局同意后,召开了全校动员大会,宣布预科学生除了女生和身体差有病的男生以外,都可转入军事学校继续学习,以便更有效地为战争服务。要大家慎重考虑自觉报名,由领导批准。经过几天的工作,预科部90%以上的男生全部参军,转到军事学校学习。这样就顺利地完成了预科的教学任务。

本科文艺系,是由第三期的文艺系和从预科部挑选的学生组成的。下设文学、戏剧、美术三个专业组。李业农兼任系主任,刘爽任系党支部书记。文艺系在进行形势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各组都设专业课,由教授宋之的、陆维特、关露、黎冰鸿、车载、方方和赵慧琛分别讲授,李业农也讲古典文学课。戏剧组为了结合形势教育群众、演出陈白尘编的大型话剧《升官图》,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官场昏庸腐败现象。

1947年4月,转移在海阳县的苏皖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和财经干部学校,根据华东局的指示先后并入华中建大。行政干校改为建大行政系由原干校秘书长周元斌任系主任兼系党支部书记。财经干校人事处长张敬人任教授。学生在300人左右,编为三个队,学习形势、党的基本政策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财经干校以二大队为基础成立建大财经系,受建大和华东财办领导,培养财经管理干部,为解决战争胜利后的经济建设做准备。系主任为陈先,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宋述之。学生编为政府会计队、银行会计队和商业会计队。除了学习时事政治外,各队都比较系统地进行了业务培训。

建大还集中大部分教授,由李校长负责,成立了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所。此外,还办了300多人的妇女文化班,学生是华中的部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家属,以学习文化为主。

约在1947年9月底、10月初,战火逼近山东东海地区,华东局

决定建大停办,全校师生从速向东北等地转移。校部连夜召开干部会议,夏征农副校长传达华东局的决定,宣布建大停办,领导干部和教授首批转移。确定:学校由梁云清和彭成清同志负责,留部分干部组成建大留守大队,处理善后工作;预科部的胶东学生返回原地;重病号设法就地打埋伏;全校干部和学生分批撤退。这样,历时三年的华中建设大学实际上已经结束它的历史使命。

会后,李业农和夏征农率领全校教授和县团级以上干部乘船渡海去了东北解放区。不久,校部和各科系的干部和学员也先后赶往石岛和乳山口,准备乘船向东北等地撤退。由于海上通道被敌舰封锁,除了少数同志撤往东北以外,其余的都未能转移。因此,人家决心突围,有的由部队护送,多数由兵站安排,分别组织行军突围。师生们高度发扬团结互助、生死与共的革命战斗精神,忍受饥寒苦累、夜行昼宿,爬山越岭,绕过敌人侵占的地区,历经艰难险阻,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安全抵达在鲁中的华中分局和在鲁南的华东局驻地附近。后经组织上的安排,建人的同志都分别安排了工作。至此,华中建大宣告结束。

第二个时期的华中建设大学从1945年创建,到1947年秋停办,据不完全资料统计,总共培训了5000多名干部。在建大学习过的同志,绝大多数坚决服从革命的需要和组织的分配,奔赴各种岗位。他们在革命战争和解放后的工作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的同志牺牲了宝贵的生命。许多同志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和专家、学者、教授;不少同志担任了中央和省市各级党、政、军、群各部门的领导职务,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

华中建设大学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积累丰富的干部教育经验。建大副校长夏征农曾经写过一篇《思想教育一例》的长篇文章,对建大教学经验做了系统的总结。后来又在为《华中建设大学校史》写的序言中加以概括的论述。现在摘要介绍如下:

“根据我的体会,建大的成功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不管形势怎样变化、环境怎样恶劣,紧紧抓住思想教育这一环。通过思想教育,及时纠正学生中的各种不正确思想,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学生在学习和艰苦的战斗生活中,逐步树立起要求进步、服膺真理,愿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而献身的革命人生观。

“第一,坚持形势教育。形势教育是建大思想教育的惟一课程,在办学初期是如此,在行军中是如此,在胶东最后一期的三个月的教育中也是如此。当时学生的思想问题,主要是由于对战争形势认识不清而引起的。向学生进行形势教育,既可以解决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提高他们对战争的胜利信心,还可以通过形势教育使学生懂得如何分析认识形势,也就是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第二,采用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形势教育,既是为了解决学生对形势的认识问题,就必须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因此,负责教育工作的干部的责任,首先就是让学生谈心里话,发挥自由思想,正确的意见和错误的意见都要听,而且要耐心地认真地听,不能一听到不正确的意见就加以批评和指责,这样才能了解学生的真实思想情况。然后,集中学生的各种不同意见,归纳为几个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讨论,让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经过反复辩论,互相启发,摆事实,讲道理,真理终于战胜谬误,持错误意见的学生不得不自动放弃自己的意见,站到正确的方而来。最后,教育干部根据学生讨论的结果做一学习总结。在总结中,对事不对人,进一步说明:哪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哪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具体问题进行分析,把形势问题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理解。这套做法,特别在建大最后一期的三个月的思想教育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三个月的教育中,没有伤害一个人,结束时,近2000名的学生都充满革命热情,人人争着报名到‘军大’学习,胜利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

“第三,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如开展文体活动和采用‘立功’、‘创模’的办法,在学校中造成一种炽热的紧张、活泼、团结、进步的革命气氛,使学生好像置身于革命熔炉中,感到革命光荣,而自愿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这一点,在建大的思想教育中,是与‘民主讨论’相辅相成的。

“第四,有一支坚定的教育干部队伍。建大的干部,都是经过战争考验、政治觉悟比较高、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我们对干部的工作作风的要求是:‘群众路线、民主精神、青年气概、老教授态度。’所谓群众路线,就是要一切从学生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深入了解学生,与学生打成一片,而不是高高在上、夸夸其谈。所谓民主精神,就是凡事同大家商量,而不是自以为是,独断专行;虚心听取和研究各方面的意见,而不是俨然人师,官僚气派;对人大公无私、是非分明、赏罚分明,而不是感情用事,不辨是非,或者动辄斥责,或者和气一团。所谓青年气概,就是要紧张、活泼、朝气蓬勃,而不是萎靡不振、疲沓无生气;敢于负责,大胆创造,善于接受新事物,而不是得过且过,墨守成规,死抱老一套;热情、果断、说到做到,而不是老气横秋,光说不行。所谓老教授态度,就是要一切从教育观点出发,随时随地以爱护学生、教育学生为己任,而不是‘我打你通’,一语不合即视学生为落后;不怕烦难,循循善诱,而不是急躁怕烦,只知责备,不愿诱导。建大的干部基本上都做到了这些要求,从自己的身教言教两方面去影响学生,在学生中建立了很高威信。这是建大在思想教育方面取得成功的保证。”(《思想教育一例》解放后曾由三联书店出过单行本。)

四、苏 公 分 校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军在苏中地区先后收复了宝应、兴化、东台、泰兴、靖江、如皋、启东、海门等县城,解放了大片土

地。苏中解放区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苏中公学为了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决定扩大招生,并请示苏中区党委同意,在苏中一分区建立苏公分校,吸收新解放地区知识青年参加革命。

苏公分校是以苏中三分区的干部学校和四分区的专门学校为基础合并成立的。因此,苏公分校的学生,就包含了这样几部分:三千校的学生、四专校的学生和新招的一批知识青年。后来,苏浙军区新四军根据“双十协定”忍痛北撤,有一部分地方干部随军渡江北来,为了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就让他们也参加分校学习,但主要的部分还是知识青年。

苏中公学分校在1946年12月25日在海安县的丁家所镇正式成立。由原苏中公学政文教育主任、宣教科长吴天石任校长兼党组书记。原六分区江南办事处负责人陈枕白任副校长。分校设教务部、生活指导部和总务部。苏公分校由中共华中分局一地委和苏皖边区第一专员公署领导,与苏公总校保持业务上的联系并接受其指导。

苏公分校学员共约700人,编成7个中队。第一队,是由原四分区专门学校转来的,大多数是高中程度的青年学生。第三、四、六队是苏中新、老解放区招收的初高中青年学生。第二、七队,是实施“双十协定”后从苏南解放区撤过来的地方党政干部(多数为区乡级)。第五队,是由苏中公学37队(即女生队)全建制转来的。各队除设队长、指导员外,还设有教务干事、政治干事、生活干事,协助队长、指导员分管各方面的具体工作。

苏公分校的教学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政治学习,以学习中国革命问题为中心。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为主要学习内容。要求通过学习,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本质和他们反革命的两手,认识我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所采取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阶段的学习时间为三个月。在政治学习结束时,因新

解放区工作的需要,有近400名学员经华中一地委分配到城市或乡村,组成工作队搞地方工作。余下的学员进入第二阶段,即业务学习阶段,专门学习财经、金融、会计业务。业务学习的最大困难是缺少业务教师,而懂得业务的同志又都有一定的工作岗位。为了适应这一情况,在业务教育上采取了“选师”、“就师”、“参加实际学习”的三种办法。所谓“选师”,就是在业务课程确定后,从机关单位和学校中选请一位对此有特殊研究和丰富经验的同志,在一定时间内来校教学;换一个课程,再选聘另一位教师。所谓“就师”就是课程开出之后,要选聘的教师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他不能离开岗位来校上课。那么,好在学生是军事编队,可以开到他的驻地去,就他的时间请他讲课——也就是用“留学”的办法,解决这一困难。财经队就是这样进行学习的。所谓“参加实际学习”,就是有些课程,在课堂内是学不好的,如发动群众,单讲“群众工作还不行,一定要实际去做,因之行政队就开到乡村去,从实际工作中来学习,学习一个段落,再回来总结提高。

此外,苏公分校还选调40多名有一定文艺才能和爱好的学员组成校文工队,一面进行专业学习,一面搞文艺演出。

1946年6月,学校曾组织大部分同学参加学校附近农村土改复查工作,接受锻炼。

7月中下旬,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派大军从南通方向进攻如皋,我军七战七捷中的皋南战斗发生时,苏公分校奉上级指示,派数十名干部和学员参加战场救护工作。

1946年7月23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如皋县城,学校奉命转移至海安角斜镇,办理学员的结业分配工作。

苏公分校只办了六个月的时间,前后毕业学员1000多人。到1946年7月蒋介石背信弃义进攻苏中解放区,苏中七战七捷开始后学校校部北迁,改为江海公学。

五、江 海 公 学

江海公学的前身是苏中公学校分校。1946年7月国民党反动派部队大举向苏中地区进攻,人民解放军在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以消灭蒋军有生力量为主的战略口号下,自南线七战七捷之后,主力部队就开始向北转移,10月盐城失守,于是苏中苏北地区全面转入敌后。苏公分校随着人民解放军的大踏步后退,也转移到东台、台北县以东的海滨一带。由于苏中公学校已不复存在,苏公分校的名称也必须改变,经苏中区党委决定改名为江海公学,直属苏中区党委领导。校长兼党委书记吴天石、副校长陈枕白。

江海公学的学生来源,有一部分是在抗日民主根据地成长起来的干部,有一部分来自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解放区的知识青年,也有一部分是在蒋介石发动战争之后,从两泰(泰州、泰兴县)、通(南通)、如(如皋)、靖(靖江)、启(启东)、海(海门)等地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转到江海公学来学习的学生,还有少数是从蒋管区来解放区的青年学生。此外,也有部分因对敌斗争环境紧张,从县区机关学校精简下来的干部和教师。特别是许多解放区的知识青年,尽管在紧张的环境下,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通过层层封锁线,从几百里外来投奔学校。所以,学校在紧张的敌后环境中,第一期仍有学员500多人。

江海公学原来设有师范科、土木科、商科等科系。后来由于解放战争的需要,不再为解放区培养人民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而是为军队培养基层政治工作、文化工作干部和炮兵及其他的基层军事工作人员。

在敌后的环境中,对敌斗争十分紧张,敌人对机关、学校经常进行“奔袭”,学校又回到抗战时期游击教学的情形,经常要移动,有时半夜三更得到敌情,连夜迁移。师生所带物件都进行精简,不

需要或虽属需要但带不动的东西,一律打埋伏,保证全校在很短时间内集合起来就能拉了走。学校在情况极度紧张时期,曾送走一部分学生去山东,对一部分学员进行分配工作,方法是愿回原单位的回原单位,不便回原单位的就地分配工作。留下的学员由干部带领转移到苏北新洋河两岸流动。

有一个时期,敌人占领了东台、盐城一线的城市,学校处在游击环境中,三天两次,甚至一天一次,移动住地,边游击,边教学。学校的干部和学生都武装起来,过着比较严格的军事生活,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荷枪实弹,站岗放哨,警惕着敌人的袭击和匪特的破坏。有时候,敌机临空轰炸,近处炮声隆隆,但他们仍然坚持学习。

“一切为了前线”,成为当时学校干部、学生的行动口号。在行军过程中,学生自己背背包,自带粮食,像战士一样。地方政府拨给的吃粮,学生、干部自己去运回来,自己把玉米磨成粉,并且尽量节约粮食交公。有一个时期,干部、学员还把津贴费节省下来支援前线。最冷的天气,干部、学生用冷水洗脸,节约烧草。东台海滨一带的老百姓住房很分散,一家最多只能住一个小组,全校几百人拉得方圆近十里。生活也很艰苦,饮水是咸的,粮食是粗粮,没有大米可吃,吃荤菜则更难。

江海公学办学期间正处在国民党蒋介石破坏停战协议,派兵大举向解放区进攻的战争环境中。而我们党为了发动群众支持人民革命战争,在解放区掀起了土地改革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江海公学的教学内容主要是革命战争的形势教育、土地改革的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

原在江海公学工作、解放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的刘定汉同志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革命的学校和革命的青年》,收集在《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记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出版)里。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江海公学的教学内容做了具体介绍。主要是三个

方面的教育：

1. 革命战争的形势教育。根据校委的指示,采取回忆对比的办法,对同学进行形势教育。使同学们清楚地看到,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国民党则退却在后方,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而在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却来了一个“蒋日合作”和“蒋伪合流”,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受降。通过学习,还使同学们清楚地看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蒋介石则坚持其内战和独裁的方针,乘机发动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通过大量的事实,同学们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激发了对敌人的仇恨,对人民的热爱。

2. 土地改革的教育。在进行解放战争的同时,解放区的后方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土地改革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必然在同学们思想上有所反映。当时的同学,有的出身于农民家庭,有的出身于地主、富农的家庭,他们对土地改革都很关心,也存在着一些模糊认识,必须予以澄清。当时着重对学生进行三方面的教育。一是进行土地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的教育。使大家懂得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可以充分地动员农民群众支援解放战争。二是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地主与农民“谁养活谁”的讨论,参加当地土地改革的群众大会,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水平。三是土地改革的政策教育,使大家认识到从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必要性,以及在土改中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的政策,提高了大家的政策水平。

3. 革命人生观的教育。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实质上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学生能够逐步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具有明确的政治方向,逐步具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逐步

以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

刘定汉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说:“学校里不仅做到党员与群众打成一片,而且也做到干部与学员打成一片。我们做基层工作的同志,平时同学生吃一样的饭菜,同学生一样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行军的时候,我们同学生一道跑路,有时还帮助女同学、身体弱的同学拿背包等东西。干部和学员的关系非常融洽,确是生动活泼,心情舒畅。”

江海公学的同学在学习结束之后,都自觉地服从革命战争的需要,报名入伍,或者直接参加部队工作,或者到军队干部学校继续学习,他们都成为革命的战士。刘定汉说:“青年同学那种热忱地报名入伍,以身许国的勇敢精神,深深地教育着我们。每当一批批学生离开学校,我们欢送他们的时候,看到他们那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威武气魄,感到兴奋无比。”

1947年2月,第一期学员毕业,在学习结束前举行的“宣誓”大会上,纷纷要求参加人民解放军,分配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绝不讨价还价,后来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到部队工作。

1947年春天,苏中战争形势好转,局面又重新打开,在盐城海滨一带,变成了比较稳定的后方,江海公学也就南移到东台海滨一带,并扩大招生,算是第二届。第二届招收学员1000多人。学员除了知识青年以外,也有一部分干部和教师。在干部中既有离职学习的老干部,也有一部分在上改复查中涌现出来的新干部。这一届学员的学习内容除了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外,还分别进行财经等业务教育。这一期学员学习到1947年10月左右结业。

1947年底,华中工委决定在江海公学的基础上成立华中公学。江海公学正式宣告结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六、盐阜行政学院

盐阜行政学院的前身是阜淮涟干部学校(也称阜淮涟干部学院),1941年7月,由盐阜区党委决定创办。校址在阜宁东沟镇。盐阜区党委书记刘彬兼任校(院)长、阜宁县长宋乃德兼任副校(院)长,阜宁县委书记唐棣华任政治部主任,刘丹任教育长。该院设行政(含财经)、教育、民运三个系,学员总额计划为1000人。行政系抽调在职区行政助理200名,乡保长100名;教育系抽调在职小学教师、校长300名;民运系抽调各县农救会乡保级及自卫队干部500名。余额则通过招生考试,吸收广大青年参加学习。学习时间为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免收学、膳、宿费。

阜淮涟干部学校(院)创办时间不长。1941年8月,因日伪军发动对苏北解放区大规模“扫荡”而停办。

1941年9月1日,盐阜区行政公署正式成立。宋乃德任行政公署主任、贺希明、计雨田任行政公署副主任。1942年2月,盐阜区党委和盐阜行政公署又决定在阜淮涟干部学校的基础上创办盐阜区行政学院,负责培训县、区级政府机构工作人员。院长由行署主任宋乃德兼任。教育长车载和刘丹,政治处主任沈柔坚。招生对象,由各县在新参加工作、有培养前途的地方干部中选送,自愿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经当地区乡政府介绍,亦可择优录取,不公开对外招生。学制三个月,每期300人左右。

1942年1月,第一期学员在离行署较近的边胥董(村名)开学。第一期学员280多人,全校成立一个大队,下分两个中队,每个分队有十多个班组,每个班组十人左右。学习课程主要有时事政治、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讲课多是做大报告,全体学员一起听,然后分组讨论。行署主任宋乃德、贺希明、行署财经处长骆耕漠、文教处长白桃、公安处长黄赤波和盐阜军区司令洪学智还有

新安旅行团团团长汪达之等都来讲过课。讲课最多的是沈柔坚。讲课以后分班组学习讨论,队干部参加或作必要的辅导。为配合教学,还组织学员参加社会活动,如参加陈集乡搞乡选试点,参观根据地建设成就展览等。

学员都是分散住在群众家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粗粮,学习用品和伙食由校方免费供给。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起床,集合出早操,还进行军事演习,如夜间紧急集合,迅速转移,以增强学员的敌情观念。以班组为单位,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习后期还举行答卷考试,检验大家的学习效果。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在结业时每人都做了鉴定。这批学员结业后,除留 20 多人在行署机关工作外,大部分仍回各县分配到区级机关工作。

盐阜区行政学院在第一期结业后,又办了第二期,到 1942 年底学校正式停办。

七、淮海区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1940 年秋,黄克诚同志率领八路军第五纵队东进淮海地区。拔去了大批侵华日伪军据点,摧毁了汉奸伪政权,扫除了国民党顽固势力和地主土匪武装,淮海地区大片土地获得解放,建立了淮海抗日民主根据地。

解放了的淮海地区,必须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工作,动员人民参军扩大抗日武装力量,开展财政经济工作,保障后勤供给,以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要实现这些任务,就需要培养大量的干部。而当时新建的淮海区党政群部门的干部很少,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创办干部学校,培养各类干部,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淮海地委决定开办淮海区军政干部学校。

1940 年 10 月,淮海军政干校正式开办,校址在泗阳钱街东头

大庙内。淮海区行署主任刘瑞龙兼任校长,孙存楼任教育长、俞谦、张政任政治协理员。学员有300多人。

淮海干校第一期编为四个中队,一个研究班。第一中队中队长汤化赞,指导员张政(兼);第二中队中队长任道宜,指导员俞谦;第三中队中队长吴武勤,指导员苏云;第四中队(女生队),指导员孟琳。研究班班长徐诚,指导员倪梅村。

淮海军政干校以培养军事、政治、民运、经济、文教等各类干部为宗旨。它的性质是培养根据地需要的军政基层干部。学员有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调来的排班干部,有各机关调来的工作人员,也有从民间来的青年。

该校住的是一个不大的破庙,几十个人住一大间,用砖当枕,麦草当褥,吃的是苞米稀饭、山芋、杂面饼,青菜萝卜是主菜,有时也吃一顿白面馒头。学生组织军事化,每天晚上学员们轮流站岗放哨。两人只有一支土造步枪,两发子弹。每班上岗时点一支香约2小时,烧完就换岗。早上,冰冻腊月,敲开六塘河的冰,洗脸刷牙。上课时背包当凳子,膝盖当课桌。下课时回到住处认真讨论,各抒己见。

淮海干校的教育方式主要是上大课,请地委领导作报告。内容主要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有时作国际国内形势报告。报告后分组讨论。当时到淮海干校作报告的领导人刘瑞龙、吕镇中、邵幼和等同志。皖南事变后,黄克诚师长在永兴庄为学员们作过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告。

1940年12月,日伪军向淮海区进行扫荡。干校领导立即紧急动员学员准备反“扫荡”,把背包减少到最低限度,每人留二斤重的小被,一条被单,两件单衣,一双鞋,一只茶缸。每班仅有两三支土造步枪,一盏小马灯。在寒冷的冬天,全校师生向安全地带转移,没有一个掉队、叫苦。男女同学、师生相互帮助,体弱的同志背包

背不动了,身体好的同志帮他(她)背。到黎明时,大家满头白霜,成了“白衣战士”。第一次敌人“扫荡”,学校师生一连行军三天三夜,只吃三顿饭,到了涟水的马圩才住下。敌人撤退了,全校师生又回到了学校原地。

淮海干校第一期经过约两个月的学习,便宣告结业。学员大部分分配到各县工作,留下部分学员做第二期骨干。另外又接收了一批新学员,共四五十人。后来还办了第三期和第四期,学员都不如第一期多。而且办学时间也较短,因为各方面都需要干部,一边学习,一边抽调人员出去工作。1941年4月底,为了迎接麦收季节,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干校一次就调出200多人帮助各区乡工作。

淮海干校从成立到结束,前后将近一年时间办了四期,培养干部1000多人,充实到党、政、军各条战线上去,对于开展各项工作,巩固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的作用。

八、苏北公学

1945年2月,盐阜行政公署在阜宁县益林镇召开全区文教扩大会议。三师师长黄克诚、行署主任曹获秋和文教处长白桃都在会上讲了话。提出今后教育工作的重点是抓好干部教育和成人教育。

盐阜地委和行署为了大力加强干部培训工作,决定成立苏北公学。任命王阑西为校长,何封为副校长,唐君照、孙定国任教务处正副处长。于1945年2月,在阜宁县陈头建校,在益林举行招生考试。招生对象为乡级干部、小学教师、中学生和社会青年。共录取学员五六百人。学校设行政、民政、财经、教育、文艺、工艺六个系。按系编队,编成六个队。此外,还有一个中学教师研究班,共有20多人参加学习听课。

学习的课程有《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等。王阑西讲《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何封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唐君照讲国民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报告。孙定国是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科学家，他作了关于自然科学的报告。车载作了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和《论联合政府》的辅导报告。除此，还请苏北行署文教处长白桃来校作教育问题的专题报告。

进入业务学习阶段，则由各系的主任讲课。或请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前来讲课。

1945年5月，学校迁至淮阴老闸。自己动手用篷席、竹子等搭起了一个大礼堂，作为上课之用，能容纳上千人。上课时，每人带一个小板凳，按班排坐着听课。听课既没有课本，又没有讲义，就靠两耳听，手中记。

学员都住在老百姓家里，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粗粮，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学生享受供给制待遇。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早上天刚亮就起身出操，白天上课，晚上自习，或开会检查一天的学习情况。每周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学习期间正逢炎热夏天。晚上漫谈讨论，天热蚊虫多。每人带一个小板凳到风凉的广场上去开讨论会。每人一把扇子，既扇风又扑蚊虫。有人题诗曰：“一把蒲扇不离手，胜似情侣和朋友，如若有人要借用，请到重阳九月九。”

生活虽然比较艰苦，但大家心情舒畅。虽然吃的是稻头糲子粥，麦粳子饭，都能吃饱，每周吃一顿红烧肉。为了改善生活，每组还分了一块地种蔬菜，送给伙食房。

学员的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苏北公学有一个文工团，每一单元学习结束时都进行文艺演出活动。曾演出《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秧歌剧。8月15日日本鬼子无条件投降，大家高兴得如痴若狂。全校师生参加了苏北区党委召开的祝捷大会。观看了苏北文

工团演出的《刘桂英是朵大红花》歌剧。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不久,“两淮”获得解放,不久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原盐阜区党委改为盐阜地委,苏北公学也宣告结束。经苏皖边区政府决定,原苏北公学的干部和部分学员并入华中建设大学。苏北公学办了半年以后,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九、苏北青年干部训练班

1940年8月,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奉命由淮北东进,与渡江北上的新四军在东台以北的白驹镇会师,打通了华北与华中战场的联系,开创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0月初,解放了阜宁城。苏北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奔走相告,欢欣鼓舞。阜宁城解放的第二天,八路军驻军贴出了青年干部训练班的招生简章。办学宗旨是培养初级军政干部,学习时间三个月。凡具有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的爱国青年,男女兼收。毕业后分配到军队、政府和社会工作。招生简章贴出后报名青年十分踊跃,共招收80余名男女知识青年。

学员到训练班后,班部发给每个学员灰色棉布军装一套,新棉被一条和一些日用品。每人还发一件白底蓝字的八路军臂章,这是参加八路军的光荣标志。

青年干部训练班班部,设班主任、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员、军事教员和文体干事,共七八人。郭凌担任班主任兼政治教员和政治指导员,廖一帆、申煜为专职政治教员,还有专职军事教员和文体干事等。这些人中还有几名大学生和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的干部。他们与同学同吃同住,一起出操上课,打成一片,亲如手足。有的还现身说法,讲他们自己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对大家很有启发。

青训班建立党支部,郭凌任支部书记。在学习期间经过考察,吸收了十多名优秀学员入党。每个班(组)有学员十余名,班长由

学员民主选举产生。每周开一次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班部、教员有什么意见和要求都能提出来。全班上下充满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

青训班的课程是从实践需要和青年特点设置的。主要分政治课和军事课两类。政治课包括《论持久战》、《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人生观和时事政策等。军事课包括《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及游击战术、射击兵器、队列、内务管理等军事常识。

在教学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以致用。主要采取“三结合”的方法进行教学:课堂讲授、讲评和小组讨论相结合;介绍战例和野营训练、操场演练相结合;报告、辅导和自学相结合。这种讲、做结合、互教互学、教学相长的方法,生动活泼,效果很好。

青训班物质条件简陋,生活艰苦。班部领导带头自己动手修房铺路,开荒生产,种菜养猪。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勤俭办学。教员手把手地教会学员打草鞋,洗补衣服,整理内外,剃头修面。尽管生活艰苦,学习紧张,但大家方向明确,信念坚定,教员为革命而教,学员为革命而学,思想集中,精神愉快,胜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1941年元旦前夕,在阜宁县风谷村镇上举行了青训班毕业典礼。全体学员都分配了工作。除少数学员分配到纵队和支队工作外,大多数学员分配到团属各单位,担任机要员、报务员、文化教员、文书和卫生员等职,大家愉快地走上了战斗岗位。

十、淮南行政学院

1940年初春,新四军五支队在半塔集保卫战中取得重大胜利,津浦路东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建成了路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由于形势的发展,各地特别需要干部。

在这种情况下,淮南路东省委决定筹办淮南行政学院(又称苏皖边区行政学院)

1941年1月初,学院宣布成立。淮南行署主任方毅兼任院长,省委宣传部长祁式潜兼任副院长,程曙天任教育长,李竹平任教务主任,石竹任训育主任,汪平秋任党支部书记。

学院设行政系、财经系、美术系(又称淮南艺术班,后改为淮南艺术专科学校)。这三个系驻地分散,不在一起,但统一领导。每个系约有100名学员,全院约有400人,组成一个大队,大队长朱绍清。大队下设中队、区队、班等组织。学员的来源,除路西联中的学生外,大部分是路东各县介绍来的青年学生。学员大多数是经过报名考试后录取的。三个中队是:第一中队是行政系,第二中队是财经系,第三中队是美术系。

行政学院的师生在新建的用草棚搭起的行政学院礼堂里举行开学典礼。淮南地区党政军领导人邓子恢、罗炳辉、方毅等都出席了开学典礼,并讲了话。他们分析了当前抗日斗争形势,要求学员认真学习革命理论,武装思想,提高工作能力,担负起革命重任,不仅要为驱逐日寇而战,还要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

开学不久,全体学员由教育长率领,到高邮闵塔区学习做宣传组织群众工作。白天分头找群众交谈,宣传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晚上回来碰头,交流经验。通过短期的学习工作,学员们初步学到了一点做群众工作的入门知识。

学院开始是在大通镇集中上大课,后来则按系分开教学。行政系在大通镇附近的曾家营,财经系在张公铺附近的天王寺,艺术班在大通镇西的郇家营。最后在黄花塘做结业工作。

学院很注重对学员进行政治理论教育、阶级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行政系主要学习《社会主义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在讲《新民主主义论》里的“新民主

主义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时，联系讲解根据地的“三三制”的政权形式和“三七分租”、“二五减租”的经济政策。

财经系主要学习财经理论、财政政策和财会专业知识。还组织学员学习了《帝国主义侵华史》、《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等，揭露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历史。激发学员的革命热情，坚定学员的革命信念。学院还对学员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教育学员树立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淮南区党委和行署的领导同志刘顺元、方毅、张劲夫和范长江等也常来学院给学院师生作时事报告和理论、政策报告。

学院实行抗大式的办学。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学院的校风。在思想作风和纪律制度上对学员要求很严，每周有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每天有晚点名，饭前饭后要训话。学院师生分散住在群众家里，门板当床铺、池塘当脸盆，荒地是操场，树林是课堂。学院实行供给制，每人每天一角多钱，包括二钱油、三钱盐、一斤蔬菜，一斤四两粮，每天两稀一干。每月发一袋牙粉，四两黄烟，两个月一条肥皂、三个月一把牙刷，半年一条洗脸毛巾，每月津贴费二角四分钱，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学院的文体活动非常活跃，主要是“朱德青年队”统一安排。课余时间和自由活动时，组织大家排练节目和开展体育活动。开会前、上课前、开饭前、出操前、晚点名前都组织大家唱革命歌曲。每月或节日都有文娱晚会。

学员们经过四个多月的学习和下基层锻炼后于八月底进行考试、鉴定和联系分配工作。全体学员分配到各县参加行政、财经、文化教育部门工作。行政系学员多数充任乡村行政干都，财经系学员多数充任各级政府的税收、银行和财会工作。淮南行政学院虽只办了一期，却为淮南路东根据地培养了数百名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青年干部，为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

十一、淮南公学

淮南公学是1945年春在淮南联中基础上成立。淮南区党委为了适应根据地大发展的新形势,决定在淮南中学的基础上改组为淮南公学。校长山区党委宣传部长闵廉兼任,叶锦田任校党委书记。淮南公学设六个班:一、普通班,班主任王昭铨、高景平;二、师范班,班主任山行署教育处副处长刘健飞兼任,副主任何蒙;三、政工班,班主任陈彬;四、艺术班,班主任莫明;五、财经班;六、卫生班。前四个班设在古城,财经班设在新铺,卫生班设在谢家岗。淮南公学党内成立校委会,校党委书记叶锦田,对各班实行统一领导。

淮南公学的教学内容分政治课、文化课和军事课。政治课的教学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为主要教材。校长、副校长亲自讲课,并结合组织学员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接受群众运动的熏陶。

文化课程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知识。语文教材大多选自党报的社论、新闻和文艺作品。历史着重讲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数学讲四则应用题、高年级学代数、几何、三角的基本运算规则。地理讲解放区的地理概况和国内外的地理常识。自然知识主要讲天、地、人、衣、食、住、行和自然科学常识。

军事课,主要讲游击战争课程,进行军事操练。要求学员学会使用步枪、投掷手榴弹,学会行军走路等。有时还组织军事演习,不定期的组织夜间紧急集合,夜间野外行军。生活基本上是军事化,全校按班、区队、中队、大队编队。学校的严格军事训练,使学员较好地经受了革命战争的严格考验。

参加劳动是学员的必修课。学校师生实行供给制,但供给标准是很低的。师生的伙食给养、被服和日用品的供给以及教材的

编印,加起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因此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如为学校伙房运粮、打柴、挑猪草养猪;开荒种菜、上交定量蔬菜;纺棉纱,搓棉线,缝棉衣,做军鞋。学校师生的劳动,既锻炼改造了自己,又改善了生活。

学校的校园生活是既艰苦又愉快,既紧张严肃又团结活泼,充满了青春活力。每天黄昏是学校校园特别热闹的时刻。大家充分利用晚自修前这段自由活动时间,热烈展开各项课外活动。有的在文娱辅导员指导下排练文娱节目,载歌载舞;有的在进行球类比赛;有的在练习军事动作;有的在挑肥浇水;有的在收割蔬菜;有的在找老师解答问题;有的在三五成群,促膝谈心。整个校园浸润在既有民主自由,心情舒畅,又认真思考,勇于探索气氛之中。

学校的物质生活很艰苦。用稻草、芦席铺成的大通铺,二、三十人挤在一起同睡。门窗极为简陋,难以御寒。盛暑没有蚊帐,蚊虫肆虐,不少学员染上疟疾。晚上一只小油灯周围六七个人围着看书写字。学员们在这种艰苦环境中锻炼出了坚毅的品格,不向困难低头,坚持完成了学习任务。许多人说:我们那时物质上是贫困艰苦的,精神上却是富裕快乐的。大家对这段经历,弥觉珍贵,引以自豪。

从学校输送出来的学员,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绝大多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是党的教育和他们本人努力的结果。也有有力地证明了当初引导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干部学校教育确实收到了培养干部、输送干部的效果。

1945年8月,路东几个县相继解放。1946年初,区党委决定将淮南公学改为几个专业学校,淮南公学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十二、洪山公学

鄂豫边区的洪山公学,是鄂豫边区党委于1941年创办的。由

鄂豫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兼任校长,简文任副校长,由边区党委直接领导。学校成立校务委员会,由党支部书记、校长、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各班班主任和军事大队长组成。校务委员会下设教导处。校部下面是班,设班主任和生活指导员。各班学生中有由宣传、文体、学习、民运、卫生委员组成的班委会,有沟通各科教学中师生间意见及情况的各科科代表,全校还有学生会。

洪山公学设有各种专业训练班,主要有行政班、银行班、财经班,后来又增加了教育班、税务班。学员大多是边区里读了几年私塾的土知识分子,也有从武汉、重庆来的青年学生。入学条件是拥护抗日、身体健康的青年。经地方区以上政府、部队团以上组织的介绍就可以入学。学生待遇与部队的战士一样,实行供给制,过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

学习内容的共同课程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着重讲清为什么要抗日和抗日的方针政策。历史课着重讲日寇侵华史,学校编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十大罪恶》课文进行讲授。教育班着重讲“三观”,即革命人生观、群众观和劳动观。

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开始住在荆山小华岭。学校成立不久,就遭到国民党顽军暂一师的大举进攻。当时洪山公学和行政干校都住在那里,行署决定两校师生1000多人一起转移到荆门钟祥交界的南山。师生们背着背包,摸黑沿着荆钟一带的山岭整整走了一夜,天明到达南山。鉴于情况紧张,两校人数较多,行动不便。因而决定把两校分散开来,行政干校进山里隐蔽,洪山公学随荆钟县委行动。不久,日本鬼子“扫荡”荆钟山区,荆钟县委带领洪山公学在罗家桥一带树林和灌木丛中东躲西藏,得以逃过敌人的打击。

1942年底,为了培养师资和税务干部,洪山公学又开办了教育班和税务班。教育班除政治理论课外,设有教育理论、教育行政等课程。税务班是招收从部队和机关被精简下来的年岁较大、文化

较低的干部进行培训的,首先是进行文化学习,然后再进行税务知识的教育。

1943年夏季,边区党委决定把洪山公学校本部迁往洪湖和潜江,将教育班的中学部和小学部留下,由鄂东专署代管。校本部和其他各班,由副校长蔡韬庵和周达夫带往洪湖。

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行军转移到一个地方,稻场、树荫下、坟包旁都是课堂,教师口讲手写,学生一排排坐在自己的背包上用心听讲,膝盖放块小木板或几本书当桌子,记着笔记。

学校十分重视时事政策教育,每个班都有边区党委机关报《七七报》和新四军五师政治部出版的《挺进报》,经常组织学生读报和讨论。还组织学员参加农村的减租减息运动,调查了解农村情况,加深对党在农村各项方针政策的了解。学校还请部队首长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部队还派出一个团级干部到学校担任军事大队长,负责学生的军事训练工作。

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1943年上半年改由边区政府教育处长李实兼任洪山公学校长,蔡韬庵为副校长。学校原在荆山一带活动,至1943年初转移到平汉铁路以东的鄂东地区活动。从1943年起,洪山公学扩大建制,分设行政系、教育系和经济系。经济系又分银行、会计、税务三系,并分系单独活动。

处在游击战争环境中的洪山公学,经常预防日寇“扫荡”、顽军袭击。学校领导时刻注意敌情,周密地考虑行军转移,以及过封锁线的各种问题。在党组织和军事大队长的组织训练下,每次敌顽来袭,师生都能有秩序地安全撤退。

学员们上课、学习和住宿,都是过着流动的游击生活。每个学员在生活上仅有一个背包。这个背包,包括行李衣物和文具纸张,统一规定不超过八斤。因为还要背米袋和轮流背枪支,不能负荷过重。至于生活待遇,同新四军战士一样,每天按规定是一斤半

米,三钱油,每月发两角钱津贴。没有生活来源的同学,每年还发给衣服(一件或一套)。大部分同学主要穿草鞋。有时地方政府民政部门调拨一些拥军慰劳的布鞋,经过评议,一般发给女同学或从远道国统区,沦陷区来的同学。

在游击环境下办学,学校经常转移。在根据地里转移,不可以大摇大摆的行军,而是要穿行游击区,特别是通过公路时,必须在夜晚行军。有一次学校住黄陂县境的西北地区,日伪军大批兵力向大悟山方向进行“清剿”、“扫荡”。学校在边区党委统一指挥下,与敌相背迂回。学校师生则从北山沟绕道向东,出黄陂,连续两昼夜行军,经黄陂安南到达黄冈,后又抵达安麻县境。在这里上了一段时间的课。边区局势稳定后,学校又奉命向西南转移,返回黄陂安南根据地。

随着校部驻防和转移的,经常有一个排的武装部队进行保护。凡是过公路,或是夜行军,警卫排的同志,有的在公路两旁占领上下左右的山头高地,有的领先、断后或守卫在公路两侧。学校经历了不少的夜行军,由于组织上的行动计划周密,侦察工作做得好,从来没有遭遇到敌人的阻扰和袭击,总是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洪山公学在艰苦的游击战争的环境中一直办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才在潜江胜利结束,从而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十三、鄂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

鄂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是为县、区、乡培养行政和财经干部的学校,也是一所充满战斗精神的学校。

这所学校根据边区党委的决定,于1942年2月开始筹办,同时着手招生,共招收学员700多人,分成经济和行政两个班。校长由行署财务处长刘子厚同志兼任。学校没有专职教师,只有李海波、沈瑞五等几位同志任指导员,闵兰俊任军事大队长。

学校刚成立不久,就碰上国民党顽军暂一师向我荆山小华岭大举进攻。当时洪山公学和行政干校都在那里。行署决定由教育处长李实负责带领两校师生转移到荆门钟祥交界的南山,并派行署警卫连沿途掩护。两校师生 1000 多人各自背着背包连夜出发,沿着荆钟一带山岭整整走了一夜,天明到达南山。考虑两个学校在一起,人数太多,行动不便,于是决定把两校分散开来,洪山公学交荆钟县委管,随县委一起行动。行政干校由李实带领进山里隐蔽。

学校在山里刚避过国民党顽军的进攻,5月,日本鬼子又分八路大举“扫荡”荆钟山区。行政干校师生和警卫连转移到王家大湾,当时正值阴雨连绵,吃不上菜,师生上山挖来大担小筐的竹笋、没油没盐地煮着吃,坚持了一个多星期。因恐敌寇追踪前来,决定再次转移。这时又接到行署命令,警卫连调回行署。只留下三名战士和一名排长担任警卫。学校把这三名战士和学生及勤杂人员中有战斗经验的同志组成了一个游击小组,掩护着大队师生迅速转移到朱家大湾。进村后,察看了地形,放了一个复哨和两个单哨,大家都很疲劳就地歇息了。

第二天清早,学生前来报告,日本鬼子已经到了村子前面。李实命令正在吃早饭的师生放下饭碗,立即向后山撤退。闵兰俊大队长组织游击小组坚守第一道防线,顶住敌人的火力,掩护学生从后山撤退。

向山上撤退的学生,由于慌张,许多人鞋子都跑丢了,后面的干部拾了不少鞋子,赶上了学员,才让他们穿上继续前进,翻过了山梁,才摆脱了敌人。学校全体师生就这样顶过了日寇疯狂的八路大“扫荡”。

当学校转移到张吴家冲以后,稍加安置以后,便开始上课。学校一个专职教师也没有,就由李实一个人把 700 多人集中起来进行讲课。李实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革命经验丰富,知识渊

博。他讲的内容有：《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鄂豫边区施政纲领》和中国共产党党史、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他每天上大课，由辅导员辅导学生讨论，一直搞了两个月。

后来，边区党委代理书记陈少敏同志要李实带领学生到汉川地区去督征钱粮。学校乃离开张吴家冲来到了天门。先组织学生学习土地税率、税则，然后分组去执行任务，因天门一带反共武装部队活动猖獗，每组配支把枪，保证征税任务的进行。接着又到汉川搞征税工作，一直搞到1942年9月，边区党委通知回去，学校全体师生才回到大悟山。

在大悟山，学校开始上业务课。通过边区党委把教育任务分头交给税务、银行、财政部门，由他们派人讲课。到1943年元月结业，学员分配到县、区、乡政权和财政部门工作。行政干校以后并入了洪山公学。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干部学校之所以在极其复杂的战争环境下能够办下去，并且办得很有成效，其原因除了党的领导外，就是得到根据地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鄂豫边区人民，把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看作是他们自己的事业，把革命师生当作他们的亲人，给以无私的支援和亲切的关怀。他们给学校送情报，打掩护，保卫师生的安全。有些群众甚至在危急关头豁出全家性命以保护师生安全。比如黄冈叶店一家农民，在日寇包围“扫荡”的危急时刻，把干校的学生杨争荣藏在他家床底下。这时敌人从路边草丛里找到杨争荣的背包，气急败坏地跑到这位农民家里进行搜查。这位农民拍着胸保证说：“这里确实没有新四军，如果搜出来了，我的头都不要。”日寇见他说得硬，捅破几个坛坛罐罐就到别家去了。杨争荣脱险后还写了一篇《再生》的文章登载在《七七报》上。还有一次，实验中学的副校长吴芷英是上海人，也是碰上敌人“扫荡”，来不及转移，急忙躲进附近一户农民家里，这家老婆婆连忙拿出一套旧褂裤换下她的军衣，还给她头上包块破布，脸上抹些

锅烟灰,叫他上床钻进破棉被里。敌人进来端着枪逼问床上睡的什么人,老婆婆说是她的儿媳,病了。敌人放下枪就在屋里烧火做饭吃,老婆婆始终不动声色。敌人吃完饭集合走了,吴芷英安然脱险。

十四、建 国 公 学

1945年初,鄂豫边区的政治形势大为好转,整个边区已扩展到鄂豫湘皖赣五省边界,建立了38个县政权,解放了1300多万人民。各方面都急需干部。在这大好形势下,边区党委研究决定创办建国公学。由边区政府教育处长李实负责筹办。3月份开学,学员有600多人。学生的来源,一是边区的知识青年,二是武汉等敌占区来的青年学生。

建国公学的校长由边区行政公署主席许子威兼任,副校长蔡承祖。

学校设五个系,即行政系、教育系、经济系、银行系、合作系。每个系100多人。各系均设系主任和党支部,负责管理全系的学习、生活事宜。

学校的师资很缺乏,政治课是用上大课的办法,把全体学员集中起来由行署教育处长李实讲课。政治课的内容是《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等。文学课是由陕北延安来的,在学校任教务长的龚依群讲解。政治课学习结束后,按系分开讲业务课,由边区政府各业务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主讲,学校负责组织安排讨论工作。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根据地各地急需干部,建国公学的学员提前毕业走上各自的岗位,建国公学的历史任务也胜利完成。

十五、鄂东公学

鄂东公学是鄂豫边区鄂东地委创办的一所干部学校。校长是柳植(郁野青),教导主任是刘继梁。该校于1942年2月开始创办,至同年7月即宣告结束。虽然仅仅只办了五六个月,却培养了100多名干部,充实了党、政、军、群各个部门。

鄂东公学的学生来源主要是鄂东各县沦陷区和抗日根据地的青年学生。也有不少学生是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线从河南或“大后方”来的。还有十多人是从各单位抽调来的,他们成为学习的骨干。

学校根据学员的文化水平和实际情况,分为普通班和初级班。普通班采用初中课本的内容,初级班采用高小课本的内容。

鄂东公学筹备就绪后,于3月中旬在阮家湾举行开学典礼。鄂东地区负责人程坦、刘西贵、汪心一等同志都到会讲了话。特别是鄂东办事处主任汪心一所讲的一段话,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同学们现在是学生,不但要学‘生’,而且要学‘死’。要学岳飞之死,莫学秦桧之生;要学革命烈士之死,莫学汉奸走狗之生。”给大家进行了生死观的教育。开学以后,程坦、刘西贵同志还来校视察,为学员们作形势报告和讲《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课程。

学校开始住在严家冲,后因避免敌人“扫荡”,乃转移到20多里的黄门(中)冲的两个山湾子里。这两个湾子的三角地带有一个祠堂,就成为鄂公两个班的公用教室。

学校的学习内容除语文、数学外,还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主要讲社会发展史,自然科学主要讲自然常识。讲自然科学的老师,在没有实验器材的条件下,有些部分在讲授过程中,尽可能让大家有直观感。例如,在物理课讲《光学》时,要一个同学从老百姓家里借个碗,盛满清水,在室外背太阳站着,往空中一口

一口地喷着水，立刻太阳光从悬浮在空中细小的水珠里，折射出来赤、橙、黄、绿、青、蓝、紫等色，成为一条美丽的小彩虹。从而讲光的本性、变化和折射率等等，使大家懂得了许多光学知识。

为了对学员进行无神论的教育，学校曾经开展了一次《究竟有没有鬼神》的讨论。开始同学中信鬼信神的居多数。通过大会、小组会，每个同学都发表意见，摆事实，讲道理，反复搞了两三天，涉及许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结果是无神无鬼论占绝大多数。这对于刚刚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是一次很好的教育。不但使这些青年，破除迷信，不信神，不怕鬼；而且也懂得了旧社会有贫富之分，并不是财神爷的偏爱，而是阶级剥削所造成的。这实际上是参加革命的第一课。

学习期间，生活是艰苦的。有时粮食供应不上，同学们到田野里挖野菜，按事先确定的数量交给伙食房，以补充粮食的不足。有一次，日寇向根据地“扫荡”，学校 100 多师生进行转移，行军一天只吃了一顿饭。傍晚下着大雨，来到礼南一个山沟里，只有两户人家。几十人住一间小屋，背靠背地迷迷糊糊地过了一夜。

在鄂东公学学习的学员，于 1942 年 4 月下旬，因革命工作需要，从普通班动员了 10 名同学首先“参干”；5 月又动员了第二批四五十人“参干”；至当年 7 月，鄂东公学全部学员宣告结业，先后分三批离校，所有学员都能服从革命需要，愉快地走上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鄂东公学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十六、鄂豫皖军政大学

1947 年 7、8 月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在安徽省岳西县创办了鄂豫皖军政大学。1948 年 1 月，改为中原军政大学，校长刘伯承（兼）、副校长曾绍山，教务主任方维舟。

学员编为政治、军事、司号员三个大队和一个文工团。政治大

队培训土改等行政干部,军事大队培训军事骨干,司号员大队培训司号员。这三个大队共编 11 个班,以小组学习为主,主要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有时也开大会交流,作时事报告。在行军中,学员还利用休息时间坚持学习,山林、场地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

1949 年 9 月,鄂豫皖军政大学随第二野战军到西南,1952 年停办。

十七、中原民主建国大学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到豫鄂边区。1945 年 9 月下旬,边区政府决定以原来的建国公学毕业的 100 余人组成的“武汉工作队”为基础,创办青年干部研究班。1945 年秋末,中原军区将青年干部研究班改编为中原军区工作团。团长郑位三,副团长李昌,下设四个大队。1946 年 2 月,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了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校址设在罗山县的宣化店附近陈家河、黄家寨、张家湾一带。校长郑位三,副校长刘子久,教务长李昌。学校共编三个大队。课程设置,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为主。教学方法是采取自学为主,辅之以报告和班组讨论。因为这些学员,多数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专学校,文化水平较高,采取这样的学习方法,更容易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收到很好的学习效果。

周恩来、董必武曾经来校视察工作,给全体师生员工很大的鼓舞。董必武对学校贯彻执行“和平民主团结”的教育方针作了具体的指示,希望民主建国大学师生在争取和平、建设新中国起更大的作用,给全体师生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同时,中原解放区党、政、军领导同志李先念、王树声、王震、王首道等多次到校作报告,讲形

势,进一步坚定了全体师生的胜利信心。

1946年6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原解放区的围攻,中共中央决定中原解放军主力部队突围。在这种形势下,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宣告结束。全体师生员工分散化装,随军突围。学校从成立到结束,前后四个月时间,培养了一大批干部。

十八、鄂 豫 公 学

1948年12月成立,校址河南商城县。校长王树声(兼),教育长薄怀奇(兼)。校部设三科一室,即组织科、教育科、总务科和校长办公室。

学校设六个学员队,每队近百人,每队配备队主任、指导员、教育干事等二至三人,管理和指导学员的学习和生活。学员由豫东南各县来的约500名,由鄂东一带蒋管区来的知识青年约100名,学员总数600人。学员初中、高中文化程度的占90%,大学文化占10%,年龄在18—30岁之间。

学校教学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关于学校的性质、任务的学习,第二阶段是进行理论教育和实践锻炼,第三阶段是学习总结、鉴定等。

在理论学习中,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时事政策课主要结合形势的发展,先后学习了《评战犯求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新华社社论。学习的方法是讲课、听报告和自己阅读相结合,并且在学习一个阶段后组织讨论,既有全班的讨论,又有小组的讨论,并以小组讨论为主。

为了使学员认清革命形势,提高思想觉悟,学校组织学员参加“三八”节、“五一”节等社会活动,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同年5月16日武汉解放,都组织了庆祝活动。在开庆祝会时,上街宣

传,演出自编活报剧《蒋介石演双簧》、《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所有这些社会活动,都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进一步坚定了学员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鄂豫公学从1946年12月成立到1949年7月并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为国家培养了数百名干部,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十九、湖北人民革命大学

194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创办,校址在武昌。校长李先念,副校长程坦,教育长王均予。学校从1949年6月创办,到1953年5月结束,历时将近4年,先后办了4期,共培训干部15613人。

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的教学方针始终坚持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始终坚持政治教育、思想改造为主,结合培训必要的基本的业务知识的原则。学校的一切课内与课外活动、一切组织活动,都是为了使学员达到跟着共产党走、服从组织分配、忠实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第一期,从1949年7月分批考试入学,先后共录取了3600人。分为一、二、三部,分三个阶段进行教学。一、预备阶段,半月左右,主要是安定情绪,建立教学组织。二、正式教育阶段,四个月左右,进行理论教育,以教学为中心开展各种组织活动,加强组织锻炼,提高思想觉悟。三、总结鉴定阶段,半月左右,用学到的革命理论,全面检查总结个人的思想、历史,小组鉴定,毕业分配。

第二期,从1950年2月中、下旬,先后共录取学员500人。在第二期理论教学中,摸索出了学员学习和消化理论的一般程序:第一步预习,第二步听报告,要求听得仔细,做好笔记,能根据重点,照顾全面。第三步漫谈心得体会。第四步讨论,根据题目,以互助小组酝酿准备后展开讨论。第五步总结。1950年12月结束。

第三期,从1951年1月至1951年8月,先后录取学员5000人。

第四期,从1951年10月至1952年12月,共录取学员3513人。

湖北人民革命大学1953年5月结束时,以学校一部为基础,组成了新的湖北省财经干部学校。

二十、江汉公学

江汉公学是1948年1月江汉解放区创办的一所抗大式的革命干部学校。校址在大洪山麓。院长郑绍文,副院长张斧。学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江汉解放区,二是来自蒋管区。包括来自台湾、港、澳和武汉等地20多个省市的1200多名知识青年。

教学方针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学为主,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初步树立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劳动观点,使学员服从党、服从组织,初步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

教学工作是采取听报告、学文件、组织讨论、参加群众运动和劳动锻炼等方式。许多党、政、军领导同志都来校作过报告。例如,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刘建勋来校讲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工商业政策、形势报告等;军区司令员张才千讲授当前形势等。学习文件,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础理论,如《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等。另一类是时事政策,其中主要的是新华社发表的关于当时形势发展的社论。根据报告和文件的内容,提出讨论问题,交学员集中讨论。讨论中贯彻思想自由,民主讨论,并联系实际。定期组织学员参加群众运动和生产劳动。

学校十分重视配合教学开展文艺活动,全校各队经常举行各

种形式的文娱晚会,节日多是学员自编自演的,特别是歌咏活动,课前课后,行军途中,都可以听到嘹亮的歌声。

二十一、襄南公学

襄南公学的前身是1948年3月襄南地委创建的襄南军政干部学校。1948年12月改为襄南公学。校址开始在潜江县老新口、方家桥,1949年初迁驻潜江县城。校长薛坦、副校长彭志深。

襄南公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襄南军政干部学校时期,从1948年3月至1948年12月。襄南军政干校校长李人林,政委杨殿魁。学校分为三个大队,第一队是军事干部队,第二队是青年学生队,第三队是地方干部队。

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1月至1950年10月,襄南军政干校改为襄南公学。学员分为两队,一队学员100多人,二队学员数十人,还有一个女生医务队。学校迁至监利县的扬林关。

第三阶段是培训在职干部。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襄南公学共训练在职干部300余人。

襄南公学的教学方针,随着学员对象的不同是有所区别的。但总的来说,都是用革命理论武装学员的思想,把他们培养成为有文化、有觉悟、懂政策、决心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干部。

1951年4月学校结束,学校的大部分干部转入黄石市市委干校。

二十二、中原大学

1948年8月,中原大学创建于河南宝丰县白庄。同年12月迁至开封,1949年8月迁至武昌。1953年1月撤销。

1948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解放开封后,河南大学著名教授文学院院长嵇文甫、经济学教授王毅斋,化学教授李俊甫、教育学副教授罗绳武、历史学副教授赵丽生以及河南大学部分学生,开封中等学校部分学生,共计366人来到豫西解放区宝丰县。为了给这些学生学习的机会,中原局决定以这些师生为基础创办中原大学。同年7月10日,成立了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陈毅、张际春、刘子久、嵇文甫、王毅斋、张柏园、罗绳武等七人组成筹建委员会,以陈毅为主任委员,刘子久、嵇文甫为副主任委员。中共中央任命范文澜为校长,潘梓年为副校长。同年8月2日,在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区建军21周年纪念大会上,刘伯承司令员宣布中原大学正式成立。

学校先后招收学生1.5万余人,分设财经、政治、教育、文艺等四个学院。由梁维直任政治学院院长,梁唐晋任财经学院院长,王自中任教育学院院长,崔巍任文艺学院院长。为了加强中原大学等几所干部学校的工作,应中原局要求,中共中央先后从华北联合大学和各解放区南下干部支队中抽调大批干部到该校工作。

中原大学在宝丰和开封办学时期,培养了一大批行政、财经、教育、文艺、新闻、医疗等方面的革命干部和专业人才,约4932人。后在武昌办学时期,继续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和专业干部,为中原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解放后,中原大学迁至武昌,逐渐发展成为一所新型的比较正规的文科高等学校。

二十三、苏 浙 公 学

1944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的方针和部署》一师三个团及地方干部300多名分东西两路渡江南下,打通与浙东游击纵队的联系,发展苏浙根据地。1945年1月13日宣布

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未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部队。1月25日，华中局又决定组成江南区党委，由粟裕兼书记，江渭清为第一副书记，吴仲超为第二副书记。苏浙军区下辖三个纵队，全纵队7000余人。其任务是加强江南抗战力量，扩大解放区，配合盟军在我东南沿海登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苏浙军区成立后，以长兴地区作为它的指挥中心。为了培训教育干部，于1945年初成立了苏浙公学。地址也在长兴。校长由粟裕兼任，副校长江渭清（兼）、骆耕漠，周林任教育长。

2月5日，在浙江长兴县温塘村召开苏浙军区成立和部队整编动员大会。粟裕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全体指战员加强学习，提高军政素质，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发展苏浙敌后斗争的光荣任务。

接着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各部队除了分别组织学习外，还利用刚成立不久的苏浙公学抽调营连干部进行集中培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和抗战后期的战略转变问题，以及向浙东进军，开辟苏浙根据地的重大意义。粟裕亲自在新建立的苏浙公学给连以上干部授课，讲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作战原则和山地战与平原作战的区别问题，号召大家为开辟苏浙根据地而努力奋斗。

江渭清专门讲了政治思想工作问题。要求在向浙东山区进军过程中，在开展山地训练和山地行军中要切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以保证向浙东山区胜利进军。特别指出，天目山脉，属沪杭腹地，我们部队向天目山挺进，国民党军必以重兵阻拦，一场恶战将不可避免，要求大家防止轻敌思想，保持高度的警惕性。

苏浙公学还办了一期地方干部训练班。为了开展新区的各项建设，发动群众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培养本地干部，在3月中旬开办了一期地方区、乡干部培训班，着重对地方干部进行党的方针政

策教育。骆耕漠副校长和周林教育长分别讲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以及党在新区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三三制”的政策，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要求大家认清形势，提高信心，为坚持、巩固和开辟苏浙根据地做出更大的贡献。

由于苏浙游击根据地建立的时间不长，战斗频繁，缺少巩固的后方，因而苏浙公学只办了两期，培训了几百名干部。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江南的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至长江以北地区，苏浙公学也就此结束。

二十四、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1944年底，在浙东抗日根据地，浙东纵队为了培训干部，在梁弄成立了浙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由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任校长。培训对象为军队连以上干部、地方区乡干部，以培训军队的基层干部为主。同时在《新浙东报》上刊登招生广告，招收当地和外地的知识青年，经过三四个月的学习，分配到浙东地区军队和地方工作。

浙东纵队领导对干校很重视，不但研究解决办学中的问题，而且亲自到学校作报告。浙东纵队政治委员谭启龙到军政干校作过《目前形势和我们任务》的报告。纵队政治部主任张文碧到干校讲过《政治工作经验》的报告。

干校的学习内容主要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育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以及统一战线和农村的“二五减租”政策。

学校共办了两期，每期200多人，共培训军政干部近500人。

二十五、苏皖边区行政干部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1月,经华中局建议和中共中央批准,在华中地区正式成立苏皖边区政府(驻淮阴城)。

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后,刘季平、戴伯韬任文教处正副处长,对全边区干部学校有所调整和发展。

1946年春,经过筹备,首先成立了苏皖边区行政干部学校(曾一度改为苏皖边区行政学院),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季方兼任校长,白桃(戴伯韬)任副校长兼教务长,周元斌任秘书长。学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招收初中以上水平的青年学生;二是抽调基层干部。共有学员600人左右。学习内容主要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土地法大纲》等等,以提高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

开学以后正式上课不久,解放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苏北解放区进攻。行政干校师生也开始从淮阴转移到农村进行教学。

1946年秋天,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进攻频繁,形势日趋紧张。华中局决定华中建设大学北移山东的同时,也决定行政干校向山东转移。两个学校基本上是一前一后向北前进。在转移途中行政干校接受了好多批从苏皖边区各地北撤的干部,主要是两淮地区的干部。到山东十字路时,全校学员曾达到1500多人。

行政干校转移到山东鲁南地区以后,曾集中学习了一个短的时期,主要是进行形势教育,提高大家战胜困难的信心。不久国民党军队又向鲁南地区进攻,因而学校跟随建大向胶东转移。

1947年春,行政干校由鲁南向胶东转移时,季方和白桃同志陆续调离干校,有许多学员也陆续调离分配工作,这时学校工作由周元斌负责。

1947年4月,学校转移到山东胶东海阳县,根据华东局的指示,将行政干校并入华中建大,改为建大的行政系。由原干校秘书长周元斌任系主任兼系党总支书记,干校人事处长张敬人负责教学工作。学员300人左右,编为三个队。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学习的内容是:一是国际国内形势;二是党的基本政策;三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主要由周元斌和张敬仁同志上课,夏征农副校长和沈鹰教务长也去讲过课。

1947年9月底10月初,战火逼近胶东的东海地区,华东局决定建大停办。建大的干部学员向鲁中鲁南地区转移,建大行政系的学员到达鲁南后也陆续分配工作。

二十六、华 中 公 学

华中公学是在原苏中地区江海公学的基础上创办的。

1947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华中地区军队主力北移山东。为了加强和坚持华中地区的斗争,1947年9月成立中共华中工委和华中办事处、华中指挥部。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华中办事处主任曹荻秋,华中指挥部总指挥管文蔚,政治委员陈丕显,统一领导第十一、第十二纵队和苏中、苏北军区以及淮南、淮北地区的敌后斗争。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复查和“三查三整”运动已进入后期阶段。这时由于战争,各地精简撤退到后方的区、乡干部和“三查三整”运动中调整下来的干部,还有一部分新招收的知识青年,都需要集中学习培训,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明确今后方向和任务。加之,解放战争已由防御开始转入进攻,前线和后方都需要干部。在这样的形势下,培训干部就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因此,华中工委、华中行政办事处决定在苏中江海公学的基础上成立华中公学,以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华中工委于1947年11月24日作出关于举办华中公学的决定,任命

俞铭璜为校长,吴天石、唐君照为副校长(唐没有到任)。下设校务处、组织处、教育处。校务处主任陈枕白。组织处主任童士杰,副主任王韦平。教育处主任吴天石(兼),副主任杨有德、萧本业。

原江海公学的全部工作人员及部分新学员于12月18日离开龙王庙(现属大丰县),于12月22日抵达滨海县的蔡桥镇。1948年元旦,在蔡桥镇召开庆祝元旦大会上,吴天石在会上宣布华中公学正式成立。1月6日,华中公学奉命南移,抵达盐城西南的葛武庄、尚庄一带,自此以后,大批学员陆续报到。至1月下旬,报到学员已达2600人左右。后来又陆续来了很多学员,全校总人数达3200人左右。80%以上是在职的区乡干部,也有一部分新招收的知识青年。学校按照学员原来的职务、文化程度、性别等不同情况分别编队,共编成七个大队:一大队为区干大队;二大队为知青大队;三、四、六、七大队为男乡干大队;五大队为女乡干大队。各大队配备大队长、教导员负责全面工作,配备教育干事、组织干事、管理员负责具体工作。大队下设中队,每个大队三至五个中队,每中队有学员100人左右,每中队配备中队长、指导员负责全面工作,配备教育干事、组织干事、事务长负责具体工作。全校总计编成学员中队共26个。

在华中公学筹建就绪后,中共华中工委决定成立中共华中公学委员会,任命校长俞铭璜、副校长吴天石、校务处主任陈枕白,组织处主任童士杰、副主任王韦平、教务处副主任杨有德、萧本业等同志组成校党委会。俞铭璜任党委书记、吴天石任党委副书记。各大队、各中队,也建立了党的总支部和支部,领导各大队和各中队的工作。

1948年1月下旬,俞铭璜来到葛武庄向全校中队以上干部作了“贯彻土地改革,发展自卫战争”的报告。传达了毛主席《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精神,要求大家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为办好华中公学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8年1月31日,校党委在葛武庄召开中队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吴天石作了《怎样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指出:华中公学的任务是通过教学,把学员培养成为党的好干部。教育方针是:加强阶级教育,总结土改和土地复查经验,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学校的校风是:积极学习,改造自己;联系实际,结合群众;发扬民主,团结互助;刻苦耐劳,紧张严肃。要求全校各项工作都要围绕培养人、教育人这个中心,提供政治、思想、组织和物质保证。全校工作人员都要深入调查研究,关心学员,爱护学员,为学员服务,成为学员的表率。

整个教育计划分四个单元进行:第一单元,端正学习态度;第二单元,形势教育;第三单元,土改教育;第四单元,“三查”教育(“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

第一单元,主要是统一学习思想,端正学习态度,扫清学习障碍,为完成整个教学计划创造前提条件。因为在这3000多名学员中,来自四面八方,各人情况不同,思想相当复杂。虽然其中有不少基层党、政和群众团体的领导骨干,但多数人文化水平不高,一直在本地工作,家乡观念较重,组织纪律性较差;有些人是由于政策上“左”的偏差而被免去职务的,存在着消极情绪;还有少数人犯过错误,受过处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包袱;新招收的知识青年,对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缺乏了解,存在许多错误观念。因此第一单元的学习,从端正学习思想和学习态度着手,扫清学习思想障碍,为整个教学计划的贯彻实施创造前提条件。通过第一单元的学习,基本上解决了学员中的各种错误认识和模糊观念,端正了学习态度,统一了思想认识,为转入下一阶段的学习打下了思想基础。

在第一单元学习结束时,由于淮南地区新开辟工作的需要,华中工委决定,从华中公学区乡干部队中调300人去淮南地区工作。经过动员、报名、组织审批基本上完成了任务。

第二单元的学习,主要是进行形势教育,教育大家正确认清当前形势和面临的困难。这时正逢国民党集结兵力侵犯盐阜地区,在两个多月里,学校转移四次,行军近千里,仍然按照学习计划坚持学习。

在第二单元学习过程中,华中工委发出了《关于厉行节约、清理资财、整理组织、整顿后勤、支援前方的决定》。校委为贯彻这个决定提出了三点意见:一、以整顿思想作风为主,结合进行组织整编;二、生产、节约救灾;三、动员全校人员参军。为了厉行节约,从校委成员到每个学工人员都参加开荒种菜,女同志给后方被服厂做鞋子、缝衣服、被子,男同志配合锁纽扣。每个学工人员每天节约大米一两,有的学员还捐献财物救济春荒的老百姓。4月中旬,吴天石副校长在陈洋镇向全校学工人员作了动员参军的报告。报告刚结束,就有20多名学员走上主席台报名,要求批准参军。大会之后,组织讨论、表态和报名,最后经组织批准的干部、学员共700人参军,后来都去了部队的教导大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47年4月左右,国民党军队正积极部署“全面扫荡苏北”,实行所谓“总体战”,形势十分紧张。于是中共华中工委决定,华中公学必须尽快转移,北移到环境比较安定的山东滨海地区继续办学。学校北移前,校委会决定组建留守处,由陈枕白任留守处主任,负责处理和安排留下的身体欠佳的同志和不能随校转移的档案和物资等工作。

1947年5月26日,华中公学2000多师生员工从陈洋镇出发,到达滨海八滩镇。这时华中工委为了加强华中公学的领导力量,任命于仲儒为华中公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并决定第九分区十校的近200名学员和第五分区干校100多学员转来华中公学,并一起向山东转移。

6月初,华中公学2300多人,每人都精简了行李物品,背着背包、米袋,从八滩出发向山东转移,开始了十多天的长途行军。有

好几天在白天行军中,国民党飞机在空中侦察和机枪扫射,一个渡船工人被打死。于是改为夜间行军,白天休息。小组学员轮流烧饭。特别是有好几天华公的学员在前面走,国民党的部队在后面追,最近时仅相差20余里。这时就整夜行军,每天行军100多里。有近百名体质弱的学员不能再走了,于是就派干部带领这些学员到当地淮海地委去就地打埋伏。

到山东去必须过陇海铁路。而这时陇海铁路已经全部被敌人占领。为了确保安全过铁路,校领导经过周密研究,请苏北兵团掩护,学员分成几路于夜间同时快速越过铁路。并下达命令:行军时不得发出任何声响和亮光;不能掉队;有孩子的同志要精心管好,不能哭闹。后来苏北兵团用火力牵制敌人,并在铁路上打开了一个口子,才使华中公学的队伍顺利通过。6月16日,华中公学全部人员抵达目的地——山东滨海地区莒南县曲柳河,胜利地完成了长途转移的任务。

学校住下以后,校委要求全校进行行军总结。董士杰向全校干部、学员作动员报告。要求:在学员中进行行军总结,表扬好人好事,批评缺点错误;在干部中进行思想和工作作风检查,肯定成绩,克服缺点。

行军总结以后,全校进行组织整编。把全校学员编成三个大队,13个中队。一大队为区干和知识青年队,二大队为区乡干部队,三大队为乡干大队。

学校安定下来以后,即开始了第三单元——土改教育单元的学习。这一单元的教学要求是:认清土地改革的意义,明确划分阶级的标准,弄通土改中的政策,了解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在本单元的学习过程中,着重强调两点:一是认真阅读文件。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土改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任弼时《土地改革中

的几个问题》等。二是切实组织好重点问题的讨论。

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还发动学员开展学习竞赛活动。小组每周小评一次,每半月大评一次,学习结束时进行总评选举,并在墙报、校刊上公布。

土改教育开始时,还对文化低的部分学员要求他们在政治学习中划出一部分时间进行语文学习,以提高他们的语文水平。

在本单元学习期间,曾经两次抽调学员出校分配工作。一是分派搞支前运输工作的 100 多人。二是分配到淮南、淮北地区工作的 360 人。

第四单元是“三查”学习。“三查”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

所谓查阶级,其内容是:一、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应定的阶级成分;二、本人参加革命前的简历和经济状况,本人应定的家庭出身或本人成分;三、自己主要的社会关系;四、家庭、社会关系对自己的影响。

所谓查思想作风,其内容是:一、自己对战争的认识和在斗争中的表现;二、对土地改革的认识和在斗争中的表现;三、处理享受与贡献、名誉与地位、艰苦与享乐、家庭与婚姻等以及有关公私关系问题的思想认识和表现;四、处理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关系上的认识和表现;五、在执行党的政策和对待人民群众、对待同志问题上的认识和表现。

最后写成自传,进行总结鉴定,并在小组内自我介绍,征求意见才算完成。

第四单元从 8 月 15 日开始,分动员酝酿、查阶级、查思想作风、总结鉴定四个阶段,至 11 月中旬结束。通过“三查”,使学员提高了觉悟,增强了阶级观点,划清了阶级界限,改进了思想作风。

华中公学从 1947 年 6 月 16 日到达山东莒南县,直到 1948 年 10 月 20 日离山东回苏北,在山东待了半年多。学习虽然很安定,但却过着艰苦的生活。山东地方政府为了照顾南方来的人吃不惯

高粱小米,尽量多供给面粉,少吃些高粱小米。炎热夏天,住在老百姓家里,蚊虫很多,许多人用被服做成长方型的套子支撑在门板上,以挡蚊虫。住地没有河流,用水受限制,夏天没法洗澡,只是用少量的井水擦擦身子。但大家仍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胜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华中公学是华中解放区地方干部学校培训人数较多的一所干部学校。3000多名学员来自四面八方,处在严重的战争环境中,经常行军转移,长达数千里之遥。学校仍然办得井井有条,生气勃勃,培训任务胜利完成。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学校党委自始至终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有的放矢地做好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华中公学的干部和学员打成一片,处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关心学员如亲人。发现学员的思想问题,总是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善于利用文艺形式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比如华中公学向山东转移的途中,部分学员思想较混乱,这时吴天石副校长作了一首《船夫曲》,告诫大家在斗争复杂的形势下,“不能走错路”。并由学校文工团谱曲,让学员学唱。这首歌词是:

“割尽了芦苇,放宽了河,吃饱了风的帆下,有人坐着在唱歌。只有艄公啊,他知道得清楚,虽是顺风顺水,总还要掌稳了舵。

天黑下来了,前面有灯火,告诉你村镇已近,再忍一会饥和饿。只有纤夫啊,他知道得清楚,虽是只差一步,也不能走错了路。”

到了山东以后,为了教育大家安心学习,吴天石又作了《这儿是学习的好地方》和《华公,你是育种的苗床》的歌词,叫文工团谱曲,让学员天天唱。学校文工团还排演了大型歌剧《王贵与李香香》、《翻身乐》、大型话剧《血衣》和小型活报剧等教育学员,使广大学员受到了寓教于乐的深刻教育。

华中公学在山东进行了近半年的学习教育,按照预定的教育计划完成了教学任务。随着1948年9月的济南解放,10月辽沈战

役的开始,11月初淮海战役序幕的揭开,全国战争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华中公学奉命自山东南返,于11月23日安抵阜宁县北沙镇。随后就办理学员分配和学校结束工作。

三大战役的开始,整个战争形势大变。人民解放军外线作战不断取得胜利,内线也收复了原先失去的中小城市,苏北苏中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正准备向江南进军。华中公学培训老区干部的历史任务已基本完成,面临的是培训解放江南,接管新区干部的任务。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和任务,华中工委决定将华中公学改组为华中大学。华中公学的工作人员在1948年12月初,从北沙出发,经阜宁、上岗到达盐城,与原华中公学留守处为主体的华中大学筹备委员会会合,正式成立华中大学。

二十七、华 中 大 学

1948年9月,华东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山东省济南市,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平津、淮海战役的相继开始,整个战争形势发生了更加有利于我的新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已成为必然趋势。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进军和新区的解放,需要大批干部去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和乡村。党中央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新形势,及时地向各解放区党政军领导部门提出迅速培养大批干部的要求。1948年《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够随军前进,能够有秩序地管理大约3000万至1亿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决议》估计战争开展后,干部的缺口大约在5.3万名左右。《通知》要求华东地区培养1.5万名干部的任务。要求各中央局、区党委和

各大军区立即采取措施培训干部。“在可能开设大学的地区应立即开办正规大学。培养将来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工作所需要的较高级的人才。”^①

华中工委根据中央的《通知》精神，研究决定立即筹办华中工委党校和华中大学。通知在山东的华中公学副校长吴天石回苏北筹办华中大学。吴天石于9月29日离开山东回到苏北盐城与原留守苏北的陈枕白一起做筹备工作。

华中大学成立于战争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三大战役已经胜利结束，解放军正积极准备渡江南下，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做垂死挣扎，加紧镇压爱国民主运动，肆意逮捕和杀害地下共产党人和爱国青年学生。上海、南京等城市党的地下组织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因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身份逐渐暴露，甚至已列入国民党特务黑名单的地下党员和党外青年积极分子，分期分批转移到苏北解放区来。也有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看到革命的大好形势自发前来的。同时，苏北老区和新解放的城市和乡村也有大批知识青年要求参加革命工作。这就为华中大学提供了大量生源。华中大学就是在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既有需要又有可能培养大批干部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48年10月，华中工委决定在原华中公学基础上组建华中大学。管文蔚兼任校长，董希白任教务长，吴天石、唐君照任副教务长，陈枕白任秘书长。董希白是安徽青池县人，法国巴黎大学法科毕业生。1939年5月离开上海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新四军教导队任教员、战地文化服务处任研究组长。新四军东进后，1941年3月至1948年9月先后任苏中行署秘书、泰东、东台县县长，苏中一分区专员。华中大学成立后调任该校教务长，主持学校工作。吴天石是江苏南通人，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毕业，文学造诣很深，是有

^①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建设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和诗人。历任苏中四专署文教科长、苏中公学校政文教育主任兼宣传科长、苏公分校和江海公学校长、华中公学校长、党委副书记。华中大学成立后调任该校第二教务长。唐君照是江苏建湖县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上海任社联复旦大学支部书记,参与组织了上海的爱国学生运动。1941年回苏北,先后任建阳县长,射阳县委书记,盐城地委组织部长、社会部长,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十二纵队支队政委,盐城城防警备司令部政委。后任苏北公学校长。华中大学成立后调任副教育长。

华中大学校址设在盐城。华大的组织建制是:学校设校委会,校委会又是党委会。由董希白(教务长)、吴天石(副教务长)、唐君照(副教务长)、陈枕白(秘书长)、鲍汗青(一部主任)、王伟平(二部主任)同志组成。董希白任校党委书记,吴天石、唐君照任副书记。在校党委领导下,各部成立党总支,中队成立党支部。

校部分教务和行政两大部门,由教务长和秘书长分别领导。教务处分教务、辅导二科。教务科长张普青、辅导科长兼团委书记冒进、副科长苏风。行政处分秘书、队列、供给、财务、管理四科。秘书科长叶云,队列科长何朗然,供给科长朱伯年,财务科长严士瑤,管理科长张梦龙。校部还有一个文工团,袁硕任团长。

学校分四部。一部主任鲍汗青,二部主任王伟平,三部主任张普青,四部主任李铮、邓洁(住淮阴)。附设中教研究班,主任钱一鸣、马友白。另外,在南通还有一个华大工学团,团长由南通地委宣传部长钱静人兼任。在泰州、扬州也设有华大工学团。在淮安还设有在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基础上成立的华大新闻系。

一部开始分四个队。一队队长邵贵民,二队队长张锴,三队队长金士贵,四队队长柳爽。开学以后从各地又来了近千名新学员。于是一部又新设10个队,共14个队。5至14队的队长有章仁哲、何德润、秦宇奇、林子秋、梅展、蒋嘉善等同志。

一部学员有1300多人。他们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其中早

期到校的一、二、三、四队的学员绝大部分是从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等地来的大专学校的青年学生,很多人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迫害,由地下党组织把他们撤退到解放区而进华大的。也有的是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现实不满,为了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而来到解放区的。他们有较强的文化水平,对新鲜事物比较敏感,接受能力较强,有较高的革命热情和向往光明、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但他们对于革命基本理论懂得不多,对党的方针政策缺乏深刻的理解。后期到校的近千名青年学生,大多数是苏北沿江的南通、泰州、扬州等新解放区的青年学生,一般是初高中文化水平,思想单纯,要求进步,革命热情很高。但他们文化水平一般,接受新鲜知识有一定的限制。

二部共有学员 300 多人,设三个队。一队队长徐觉,二队队长张高翔,三队队长孙希。二部学员主要是区乡干部。一部分是原华中公学留校的学员,一部分是新来的区乡干部,还有少数原在江南解放区县、区工作撤退到苏北来的干部。这些学员的特点是:他们绝大多数是工人农民出身,深受三大敌人的压迫,有较强的革命性,思想觉悟较高;他们参加过游击战争和群众运动,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但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缺乏深刻的理解。

三部共有学员近 300 人,设三个队。一队队长戴干云,二队队长许庭美,三队队长蔡铃。三部学员主要是一些 20 岁以下的初中和小学程度的学生,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主要是培养他们学习机要、技术工作的。这些学员的特点是思想单纯,富有朝气,学习积极性高,但文化水平较低,理解能力较差。

四部设在淮阴,共有学员 400 人左右,分三个队。一队队长胡斌,二队队长石继泽,三队队长孙文宽。学员主要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专院校学生和解放区的知识青年。主要培养接管江南新区的工商管理干部。

中教研究班原是华中教育处创办的,负责人是陶白、陈剑鸣。华大创办后,就并到华大,直属教务长领导。班主任和支部书记由钱一鸣、马友白担任,陈克良、赵崇桂任支委。学员主要是解放区中等学校的负责人和优秀教师,共有六七十人。他们文化水平较高,政治素质较好。

华中大学工学团,设在南通地区,是在原九分区干部学校的基础上筹办的,开始为华中大学南通分校,后改为华大工学团,由九地委宣传部长钱静人负责领导。全团先后成立五个队,每队有50—100名学员,共400人左右,学员主要是南通地区的知识青年,也有少量在职教师和基层干部。设在泰州、扬州的华大工学团也由扬州地委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

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原是以华中新华日报社为主创办的,两淮解放后迁至淮安。华中大学创办后,该校也改为华中大学新闻系,学校领导人为汪海粟、徐进,罗列任教育长,有学员120人。学校随大军渡江至无锡后改为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华中大学以上各部,再加上淮阴、淮安和南通、泰州、扬州各部、系的学员,总数达4000人左右。

华中大学于1949年1月10日补行开学典礼,华中大学校长管文蔚同志专门从淮阴赶到盐城,在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华中大学的教育方针和培养目标,就是培养既懂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又有好的思想作风并能掌握一门业务技术的人才。1月13日,管文蔚同志又对全校师生作了时事报告,指出:辽沈、平津、淮海战役的胜利,改变了整个战争形势。号召大家努力学习,再加一把劲,把革命进行到底,为渡江作战、解放江南广大新区打下思想基础。

华中大学的教育方针,是通过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提高学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树立革命人生观,为解放江南、接管新区做好思想上、政策上的准备。

华中大学四个部一个班的学员虽然各有特点,但在教育目的和要求上却有共同点,就是要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树立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鉴于各部学员的特点不同,在具体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又有所区别。

一部学员着重进行理论、政策教育,了解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教学内容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教育,主要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弄清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和目的,着重解决革谁的命和靠谁革命的问题。二是政策教育,着重弄清新解放区的土地政策、城市政策,工商业政策、统战政策等,提高政策水平,为进军江南,接管新区做好思想上、政策上的准备。三是革命人生观教育。主要是学习和领会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思想和实事求是、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培养革命的集体主义精神,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由鲍汗青主讲,分四次讲完。革命人生观由吴天石同志主讲。董希白和唐君照为大家上党课,进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

二部学员由于他们大多数是区乡地方干部,准备培养他们成为将来接管新区的懂政策会管理的干部。因此对他们主要是进行两个方面的教育:一是政策教育,主要是学习和弄清新解放区的土改政策、城市政策,包括工商业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以及知识分子政策。弄清新区工作的基本特点和应该注意的问题。二是革命人生观和思想作风教育。主要弄清如何做一个共产党员,树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思想作风上着重进行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的教育。树立好的思想作风,克服错误的思想作风。

三部学员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在学习内容上,是先学习文化基础知识,提高文化水平,然后再进行业务技术的学习,培养他们成

为机要工作干部和其他专业技术干部,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结合在文化教育中进行。

四部学员主要是培养接管新区城市的工商管理干部。在学习内容上,除了形势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育和党的基础知识教育外,主要是进行接管城市的基本知识和工商业政策的教育。

中教班学员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基本理论、政策和业务教育,提高他们的理论、政策和业务水平,培养他们成为接管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骨干。

华大在教学中特别强调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一切教学活动都是密切联系当时的斗争实际和学员的思想实际而展开。正是由于在教学中正确地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在短短几个月的学习中,就使学员很快地提高了思想觉悟和理论政策水平,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了根本性的改造和提高。一部二队的女学员林愚真是复旦大学的学生,她在学习小结时写道:“革命人生观的教育,对我们这一批在白区生长的知识青年犹如久旱逢甘露,滴滴润心肺。不得不对自己的人生观做严肃的思考、反省,对自己的过去,做重新估价,决心与旧我决裂。所以我在自我总结中写道:‘家英已死,愚真再生’。”(她原名张家英,到解放区后改名为林愚真)许多学员说,华大的学习,是一生中的重大转折,对于树立革命人生观、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华中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虽然比过去的游击战争环境好得多,住在城市,生活较稳定。但物质条件仍然很差,生活仍然很艰苦。学员来校以后,每人发一套棉衣,一条二、三斤重的棉被,睡在群众家里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平时吃的是素食,只有星期天吃一次荤,每人每月的津贴费是一斤猪肉钱,一元多华中币。教学条件也很差,既无课堂,也无课桌,是在一个破旧的大仓库里上课。每人发一张小板凳,上课时就坐在小板凳上以膝盖当课桌做记录。

学习生活是这样紧张、艰苦,但大家的精神非常愉快,情绪相当高涨,大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学习情绪。

华中大学从校党委到队支部,都将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各级干部事事带头,以身作则,既言教又身教。干部和学员的关系非常融洽,亲密无间。各级干部经常深入队组,找学员促膝谈心。大家赤诚相见,不存戒心。学校领导也亲自做学员的思想工作。一部二队有一位从上海复旦大学来的对音乐很有造诣的大学生,他化名李大东,真名司徒汉。开始,他对党的文艺工作有一些错误认识。吴天石同志知道后,曾经两次找他到家里谈话,耐心细致地对他进行教育,使他很为感动,他的思想也很快得到了转变,这个同志后来成为上海有名的音乐指挥家。

华大的干部与学员,学员与学员的关系十分密切,互相关怀,亲密无间。谁有了困难,谁生了病,大家互相帮助,互相照顾,体现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一部二队一位从上海来的学员华平患了重病,连续高烧一个多月不退,骨瘦如柴,神志不清。同学们对他精心照顾,轮流护理,洗脸擦身,端屎倒尿,喂粥送饭。校部医务所姓吴的女医师把她珍藏多年的一枝人参送给他吃,使他深受感动。后来他终于恢复了健康和大家一起渡江南下回到上海,走上了工作岗位。

华大的党团工作和学生会工作搞得也很好,特别是一部二队比较突出。该队学员大多数来自上海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学生,很多人又是来自上海学生运动的堡垒复旦大学,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有些人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和骨干,许多人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列入黑名单而撤退到解放区来的,思想政治素质较好,成为学校领导重点联系的队。笔者曾在一部二队做过组织工作,对该队情况较了解。学校成立学生会,推选出席解放区重要会议的代表都从一部二队产生。比如全国学联即将在北平成立,华大也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全校学生联合会,选举一部二队参加上海“五二

○”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的马骏(张希文)为主席,并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被选为全国学联领导成员。全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时,也从一部二队选派丁麦(张瑞宓)为代表出席大会。华中妇女代表大会召开时,华大也选一部二队的张振民为代表出席大会。华中大学在学生中建党也是以一部二队为重点,发展了十多名新党员,例如来自上海的林愚真、沈惠英、张振民、赵杰等,由于他们在上海学生运动中经过锻炼,在华大学习中又表现较好,都被发展为新党员。

华大一部二队学员中文艺人才较多,他们在吴天石同志和学校文工团的指导下,文艺活动搞得特别活跃,丰富多彩。他们除经常唱歌跳舞外,还到大街上演出《蒋家朝廷的末路》等活报剧向群众宣传。在春节文艺晚会上演出了四幕德国著名话剧《自由万岁》,轰动一时,受到大家的好评。

华大在吴天石的亲自指导下,成立了文艺研究会,开展文艺研究工作,指导学员开展文艺活动。出版了《东方红》歌集。在1942年2月,华大学员即将提前毕业奔赴江南新区时,吴天石特地作了一首《希望你》的歌词,由学员李大东(司徒汉)谱曲,教学员们唱。这首歌的歌词是:“你告诉我,你要去开辟新区,创造幸福的乐土,我把我的希望敬致于你:希望你,勇敢如海燕;希望你,矫健如雄鹰。希望你,山一样高,沉着而坚定;希望你,海一样深,谦逊而不盈;希望你,对同志要和顺,对敌人铁面无情;希望你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永远战斗不息。我希望你,希望你,再见的时候,你更坚强壮健。”这首歌词表达了一个文艺家、教育家对毕业学员的深情厚望。

由于革命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渡江,向江南进军,解放全中国。因此,学校决定全校学员提前毕业,整个学习在3月10日前结束。绝大部分学员由学校派干部率领,分别送往苏北沿江的南通至扬州江边的港口地区,准备在大军渡江后随军进入苏南的镇江、常州、苏州、松江等地区负责接管工作。原

从上海来的学员基本上都回上海分配工作。

华中大学在学员离校之后,学校领导率领全校工作人员也从盐城出发,到达长江北岸八圩地区等待随大军渡江。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以后,华大工作人员随后陆续过江,经江阴到达无锡荣巷,改名为苏南公学,迎接新的历史任务。

华中大学的历史虽然较短,办学不到半年,但它处在全国解放的前夕,为大军渡江接管新区培养了3000多名干部,为渡江后顺利接管江南广大新区准备了干部条件。这些华中大学的学员渡江以后,分别到达苏南的松江、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和上海等新解放的城市和农村参加接管工作,他们在解放后的各项工作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在各种运动中经受了考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十八、苏南公学

1949年4月下旬,原在苏北盐城的华中大学,在学员全部分配以后,华大机关工作人员随军南下,跟随解放军渡江进驻无锡市西郊荣巷。

中共苏南区党委和苏南行政公署决定,以华中大学工作人员为基础,创办苏南公学,承担培养苏南新区干部的任务。

苏南公学的首任校长是原华中大学的教育长、国际法法学家董希白,副校长是原华中大学的副教育长、教育家吴天石和原山东胶东地委副书记李仲林。校部设教务处、辅导处、秘书处,处下设科。苏公实行校党委集体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党委由三位正副校长及教务处负责人鲍汗青、辅导处负责人王伟平五人组成。同时,相应地建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南公学委员会,由王伟平任团委书记,冒进任副书记。

1949年底,董希白、李仲林调出后,由吴天石任校长,王韦平任副校长。学校建立校委会,由吴天石、王韦平、冒进、别效先、程工斧、李维俊、张子嘉、沈阶平、马友白等为委员。校部下设大队,大队下设中队,中队是实施教学的基本单位。

5月27日起,苏南公学在《苏南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原定招生2000人,由于报名人数多达10410人,所以在发榜前又把招生名额增至5000人。后来由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华东军政大学也已公开招生,所以实际人学报到注册的2300多人。他们与由苏南各机关分别介绍入校学习的300多人一起,编成4至12大队,共9个大队。加上在这之前苏中、苏北干部随军渡江的1000多人编成的第一、第二大队,以及苏南行署调来的原苏南地区的各大专院校提前毕业的学生800多人编成的第三大队。全校共有学员3400多人,编成12个大队,每个大队编成三个中队,按中队组织学习。

7月15日举行盛大的开学典礼,苏南行署刘季平副主任作了报告。大会中途,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组织部长赵明新、副部长陈一诚、宣传部长汪海粟,都冒雨到会讲了话。要求大家努力学习革命理论,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苏南公学第一期的教学计划原分为:“时事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各项基本政策”、“革命人生观和知识分子改造”四个阶段进行,并且在一些大队已开始实施。不久,苏南区党委把校党委成员找去开会,传达中共中央华东局的决定,要苏南公学动员1000人去西南服务团,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去解放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等省,参加建设大西南。在这种情况下,校党委研究决定,改变原来的教学计划,在深入学习党政领导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之后,学习三个专题,即:“对旧中国的批判”、“新中国的展望”、“建设新中国青年应有的态度和责任”。在学习过程中,许多学员在揭露旧社会罪恶时,讲得十分具体,又十分沉痛。不仅自己

痛哭流涕,有些听的人也都哭了。各队部因势利导,组织控诉大会,很快,一个控诉旧社会的运动在全校形成。这时,《苏南日报》登载了要求青年参加两南服务团的消息,学校组织大家阅读,并发出报名下西南的号召,很快全校形成了一个报名下西南的热潮。两三天内,报名者达1500多人。最后批准1010人。后来由于家庭拖后腿等原因,实际人数是700多人。编成两个大队,去南京市向第二野战军总部报到。7月下旬,学校又接到苏南区党委下达的任务,要求从学员中动员1000人或者再多一点,到苏南农村开展工作。董希白校长立即向全校作了“到农村去,改造农村,改造自己”的动员报告。仅两天,就有1700人报名,最后批准1205人,由校党委委员鲍汗青带队,编入苏南农村工作团到农村工作。

随后,校党委决定将留校的600多名学员,重新编组为第十一、十二两个大队,继续进行学习。重点学习“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中国革命与中国知识分子”。确定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为主要读本,分为若干专题,由校党委成员分工讲解。在学习讨论、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决心运动和忠诚老实运动。每个学员对自己的政治观点和思想认识的形成和演变过程都做了全面的回顾,批判其中错误的东西,有些学员还交代了隐瞒的政治历史问题,甚至有些人把私藏的枪支都交了出来。

这批留下来的学员,除青年学生外,有不少国民党机关的旧工作人员,政治历史比较复杂。笔者当时在十一大队一中队任队长。在这个中队中,多数是青年学生,但也有国民党机关人员,有特务,还有大学教授。有一个原在国民党军统局工作的特务,是上海人,他有一支日本手枪,在解放后仍藏在家中。在学习后期的忠诚老实、坦白交代问题时,他主动找我谈了自己的历史和藏有手枪的问题。我当即鼓励他,相信他的交代,并让他回家把枪拿回来交给学校,学习结束后一样分配工作。但也有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特务

分子继续进行活动,学员中有一个姓韩的特务,是江阴人。他在学习中不仅不交代问题,还在学员中发展特务组织。他勾结一个国民党党员共同发展了一个思想落后的青年参加他们的特务组织。在学习后期的忠诚老实坦白活动中,那个新参加他们组织的青年主动坦白交代了问题。学习结束后,把那个姓韩的处理回家,其他二人分配工作。

苏南公学在学员中以中队为单位成立俱乐部。俱乐部是学员的群众性组织。俱乐部设学习、墙报、文娱、体育、生活膳食等股。在各队队部和校青年俱乐部指导下开展各项工作。

为了活跃学员的文娱生活,除了俱乐部开展文娱活动外,学校还在原华中大学文工团的基础上组建了一个140余人的新的文工团,配合教学进行文艺演出,开展各项文娱活动。

苏南公学第一期从上到下,从工作人员到学员,除极个别专业人员外,都实行供给制,即供应全部伙食及部分日常生活用品、学习用品,每月发放少量津贴费及换季时发放衣被鞋袜等,过着统一平等的集体生活。宿舍借农舍,听课上广场,干部与学员平等相处,生活上与学员同吃同住,劳动中能够带头苦干,思想上对学员热情关怀帮助,受到学生们的一致好评,学员称赞苏公的干部是“政治上的启蒙老师”,“革命的引路人”。

1949年10月8日,第十一、十二大队的500多学员举行结业典礼。全部分配工作,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至此,苏公第一期办学胜利结束。

1949年12月,董希白、李仲林调出学校另有任用,吴天石任校长,王韦平任副校长。学校开始举办第二期。学员一部分是苏南行署机关调训干部,一部分是新招收的青年学生。共编成四个大队,队下设班,共1600名学员。

第三期是调训苏南行署机关在职人员,共600名左右。

第四期学员是从苏南行署直属机关和苏州、无锡两市机关中

被整编下来的人员,共 1690 余人。

第五期是新招收的银行系学员,共 980 人,编成三个大队,每队下设三个班。

第六期学员,除苏南行署各单位调来学习的人员外,主要是新从社会上招收的第二期银行系学员 907 人。后来又建立企业财务管理系,从社会上招收学员 187 人。

第七期学员是来自苏南行署直属单位,各分区和南京市各机关,分三个部,共有学员 700 多人。

苏南公学从创办至 1953 年 1 月为止,历时三年八个多月,共举办七期学习班,总计培训 13555 人。许多毕业学员称苏公是“革命的熔炉”、“育种的苗床”,是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的“一盏启明的灯”。认为自己在苏公的一段生活是“人生的新起点”、“自己生命史上最有一价值的一页”。1953 年春,苏南地区和苏北地区合并成立江苏省,苏南公学和苏北建设学校也实行合并,成立江苏省行政干部学校,学校迁往扬州,苏南公学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苏南公学是华中解放区在渡江以后创办的最后一所干部学校。校长吴天石分管教学工作。吴天石是有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和诗人。他在华中解放区长期从事干部教育工作,有丰富的干部教育经验,渡江后又在苏南公学教学的实践中有新的体会。因此他在总结苏南公学教学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写了一本著作《政治思想教育一例》(教育书店 1951 年出版)对苏南公学的政治思想教育做了较为系统的总结。特摘要介绍如下:

“我们革命干部学校的任务是:给青年知识分子与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要达到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培养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目的。这一任务是艰巨的,是思想战线上的解放战争,要经过艰巨的斗争过程。要完成这一任务,不是把书本摊在桌子上做计划所能成功的。必须从调查研究学生的思想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着手,找出其主要的思想问题,予以解决,解

决了主要的思想问题,就有了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必然性。

“江南新区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上主要的还是‘正统合法’思想,是他们接受真理的障碍。反映在思想意识上,就有‘雇佣思想’、‘单纯技术观点’、‘自由主义思想’、‘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但他们也存在有利的因素。这就是进取心和正义感。因此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就是针对思想特点,首先在于使他们明辨是非,分清敌我;进一步使他们认清前途,决定方向。而主要的方法,在于促成他们进步的和落后的思想进行斗争,用革命的理论来推动、帮助进步思想,使进步思想能战胜落后思想,取得胜利。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就能初步的建立革命的人生观。由于他们的思想改造过程,是一个斗争的过程,因此他们从落后到进步的思想发展规律,常常是这样的:最初来校时,对学校抱着怀疑态度,生活学习各方面都不习惯。经过初步教育,稳定了学习情绪之后,对学校是不怀疑了,但对革命理论,还是存在着抗拒,不愿意接受。只有在‘正统合法思想’经过理论教育,开始动摇、削弱之后,才能面向真理,对革命的理论,开始听得进去。等到了了解自己的出路在那里,怎样才有自己的出路的时候,那就热情蓬勃、意志昂扬起来,表现为愉快、兴奋。”

掌握了这些思想特点和思想发展规律后,我们就进行“旧中国批判”和“新中国建设”的教育。将其“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引导向“新爱国主义思想”,将其“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引导向“革命英雄主义思想”。

“这些思想基本解决以后,我们就进行人生观的教育。用革命者的品质与修养的标准,用革命者的英雄故事为范例,引导他们对照检查其政治立场与思想意识,把旧的思想加以批判,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初步建立起来。”

执行这一教学计划时,我们在教学方法上有一点体会:

“第一,理论原则的启示。每一个学习的开始,或者读文件,或

者上大课,这都是把理论原则交给学生,这也是进行革命的政治教育开始的时候的两种方法。我们的经验:在学习当中,理论原则不是教条,是改造思想的武器,这就要结合他们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必须处处掌握他们思想上存在着的改造自己的进步因素加以发扬,以促进他们的内心斗争。

“第二,联系实际的体会。在政治教育上,讨论是重要的过程,倘使说,上课或者读文件,是提高认识,那末讨论则是解决问题。但讨论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理论原则联系思想实际,一种是从思想实际体会理论原则。这两种方法都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讨论方法。要根据具体的要求、时间,来确定采用哪一种方法。

“第三,联系自己的检查。学习政治理论,目的是为了改造思想。方法是把提高认识与改造思想作为一个统一的过程。提高一步,即改造一分。每一单元进行学习总结,逐步改造。最后在全面总结时,系统地进行检查。最后,到革命人生观学习阶段,再进行全面总结。”

我们就是这样进行以近30年历史为重点的新旧中国的教育的。在这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学习社会发展史。我们是以社会发展史作为新区知识分子提高认识、巩固前进方向的课程的。

“学习社会发展史,要树立五大观点,即:唯物主义观点、劳动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组织观点。那末如何通过学习,把这五大观点树立起来呢?我们的经验是:在学习过程中,要自始至终,贯彻这五大观点。在思想酝酿阶段,要用这五大观点,来建立正确的学习观点;在教育阶段,要重点地说明这五大观点,用这五大观点来批判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的胡说;在总结阶段,要用这五大观点,作为理论武器,来改造思想。

“学习社会发展史,要树立五大观点,但根本的观点是两个:一个是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一个是阶级斗争的观点,解决了这两个根本观点,其他三个观点,也连带解决。

“学习社会发展史要联系实际,第一是历史实际,第二是社会实际,第三是思想实际。也就是说:要和过去的历史相结合,当前的时势相结合,个人的思想相结合。

“学习社会发展史,为了建立革命人生观。所以在学习了社会思想意识之后,就进入了全面思想总结。学习一章就进行一章的总结,也就是用掌握到的理论武器,进行点滴改造。最后则进行全面的总结,亦即全面检查我们自己原来所有的对于社会、历史、或人类生活的看法。”

吴天石在谈到发挥政治教育的战斗作用时说:“政治教育与思想教育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必须把两者结合起来,使之成为政治思想教育。”

“提高认识是政治教育的任务,改造思想是思想教育的目的,但两者是有机的结合,而且是辩证的发展的。即认识提高一步,必须思想改造一步,思想改造一步,必须认识提高一步。提高—改造,改造—提高,在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的交互作用下,被教育者就这样步步前进。

“有的教育者,把政治教育与思想教育机械地分割,主张先提高认识,后改造思想。这样做,在政治教育上,必然放松或忽视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在思想教育上,必然放松或忽视还要进一步提高政治认识。结果是认识并不能真正提高,思想也不能愉快地改造。我们要把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进行,而且有意识、有目的地来进行。要把课堂作为‘思想战场’或‘政治工场’来办。”

谈到辅导,有人说,这是属于怎样“教”的范围,不属于怎样“学”的范围,是教师的事,不是学生的事。但是,以我的体验,新学习方法中的辅导,是教师的事,也是学生的事。因为这里的“教”,是为了“学”。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教”,不是主观主义的“教”,是出主意、指途径的“教”,而实际做、实际走还是靠学生自己来“学”。

顾名思义,辅是“辅助”,导是“引导”。这就是说,为了在学习上,要以最经济的时间,收到最大的教育效果,学生没有经验,须靠教师的帮助,好克服困难,不走或少走弯路。所谓与自学、互学相结合,这就是说,学生在自学的时候,需要辅导,在互学的时候,也需要辅导。自学没有辅导,会变成“自流”,互学没有辅导,会变成“摸瞎”。而辅导如果脱离了自学、互学也就完全落空。因此,学习什么?需要辅导;怎样学习?需要辅导;学习中有哪些偏向和缺点?如何纠正偏向和缺点?需要辅导;解答问题,需要辅导;总结提高,也需要辅导。这些都是和自学、互学分不开的。

以上是从吴天石的《政治思想教育一例》著作中摘录的主要内容,是对苏南公学教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对长期干部教育工作的经验总结。这些经验虽然带有历史的局限性,但有些思想内容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二十九、苏北建设学校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江南广大新区后,为了培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干部,按照华东局的部署,在江苏的苏南地区成立苏南公学,在苏北地区成立苏北公学。后来苏北区党委又将苏北公学改称为苏北建设学院,再后又改为苏北建设学校。它于1949年5月筹建,由苏北行署主任贺希明兼校长、行署文教处副处长孙蔚民兼副校长,主持筹备工作。

在筹备过程中,一面调配干部,一面着手招生。到8月中旬,校部干部也逐步调齐到任,教育长成克坚,副教育长郑白,办公室代主任顾理东,教导处长夏华,生活指导处长嵇井田,总务处长钱伯英。

校党委的分工是:孙蔚民任党委书记,成克坚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郑白任宣传部副部长,嵇井田任组织部部长,冯嘉玉任中国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苏北建校委员会书记。

招生工作在各地区展开后,到8月中旬,录取学生1450名。学校于9月18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学员来自五个方面:一是解放前夕被迫集体迁往苏南青浦、苏州、无锡的泰兴师范、淮北联中和梁溪中学200多名学生,成立两个教育队。二是原苏北财政干部学校合并过来的200多名学员,成立两个财经队。三是苏北供销总社等系统选调的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基层领导干部近80名,吸收报考相关专业的学员,成立一个供销合作队。四是以前导淮委员会附设南京水利专科学校的70多名学员成立一个水利队。五是面向社会,主要是苏北地区,公开招考的800多名具有高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学员,编成八个队。

学员报到入学后,于9月18日隆重举行开学典礼。中共苏北区党委第一书记萧望东、苏北行署主任兼苏北建设学校校长贺希明、苏北军区司令员张震东等苏北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了开学典礼。

苏北建设学校是一所多学科的综合性的干部学校。专业设置有马列主义、文艺、教育、财经、工商管理、供销合作、行政管理、医务、新闻、水利十个方面。而在组织形式上则以抗大为模式,下设3个大队,13个中队。一中队为马列主义研究班,二中队前期称文艺队,后期称社会教育系,三、四两个中队为教育队,五、六两个中队为财经队,七、八两个中队为工商管理队,九中队为供销合作队,十中队为行政管理队,十一中队为医务、新闻队,十二中队为女生队,十三中队为水利队。

办学之初,学校住在泰州农村,居住分散,条件很差。学员们继承和发扬抗大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住草房,睡地铺,吃糙米饭,穿粗布军装,过着艰苦的学习生活。

正式开学后,首先进行思想、形势教育,以提高思想认识,端正学习态度。然后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主要课程是哲学、政治

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哲学讲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政党的学说。《政治经济学》采用薛暮桥的课本，哲学和《社会发展史》采用艾思奇的课本。

上课没有教室，采用上大课的形式。没有礼堂，用茅草、芦柴搭成一个可容 1000 多人的大草棚，学员们就在里面听课。

1950 年 1 月，苏北建校继苏北行署迁往扬州之后也迁往扬州，分别住在扬州中学和赞化宫。

学校有一个文艺队，为了配合教学常常进行演出，如演出过《群猴》、《不屈的人们》、《刘胡兰》、《思想问题》等话剧和歌剧。深受师生们的好评。

在学习结束前，校部原拟举行一次“控诉旧中国”的活动，后来改为以整风的形式，启发学生进行新、旧社会的对比，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从思想到行动上摆脱旧社会的羁绊，达到与旧思想旧观念彻底决裂。通过这一活动，使大多数学生提高了认识，从而坚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为走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政治教育以后，本打算分别进行业务教育，但由于形势变化，迫切需要干部，行署决定建校提前毕业。由行署文教处、财政处、工商处、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分别进行业务培训，于 1950 年 5 月中旬提前分配工作，大部分学员走上了经济建设岗位，一部分学员参加土改工作。

苏北建设学校只办了一期，培训了 1450 名学员，大部分成为苏北地区各条战线上的建设骨干。

三十、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势如破竹，急转直下。为了准备大军渡江后接管新解放区的城市和农村，

中央决定华东地区准备 1.5 万名干部,以便随军南下。大军渡江前华东地区虽然从各解放区抽调和培训了大批干部,准备随大军渡江接管江南新区,但仍然不能满足各方面对干部的需要。随着江南宁、沪、杭等大城市的解放,一方面需要大批接管新区的干部,另一方面新解放区的广大知识青年,迫切要求参加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于 1949 年 5 月在镇江新丰镇正式筹建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华东革大”)。

华中革大是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党校为基础,以山东渤海区的一部分南下干部为主体组建而成的。原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任校长,原渤海区区委副书记刘格平任副校长。校部设秘书长。总部下设五个处、三个部,各部下设组织、教务、秘书、行政、卫生等五个科。另有校部文工团、警卫部队和医院。部下设班,每班设正副主任。全校干部总数 1280 人。

上海解放后,学校就随军进入上海。学校没有自己的校舍,是趁上海各大学放暑假,借了同济、暨南、复旦、光华等大学和复兴中学的校舍开办的。

1949 年 7 月 10 日,华东革大在上海招收第一期新生,报名的有 6100 多人。第一期入学的 4000 多人。分别在三个部进行学习。一部是由上海市学联保送来的各大学理、工、农应届毕业生 1200 多人。通过报考录取的上海及其他城市的知识青年分别在二、三部学习。革大干部是比较强的,部主任由地委、专署级干部担任,部下面设班,班主任由县一级干部担任。

1949 年 8 月 22 日,在光华大学隆重举行了首次开学典礼,陈毅、饶漱石、冯定、范长江和舒同都在会上讲了话。会后还演出了文艺节目。

学校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没有教室,就变礼堂为课堂,没有礼堂,就在露天上大课,柳荫树下,绿草坪上,都成了同学

们自学讨论的地方。尽管吃的是霉米饭,睡的是大通铺,条件简陋,生活艰苦,大家不以为苦,引以为荣,并且更加激励了大家的革命热情,积极认真地进行学习。

第一期学习的内容主要是革命基本理论和有关政策,除学习革命形势外,主要是学习《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在新区的基本政策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第一期学习时间最为短促,只有一个多月。因为解放的新区日益扩大,需要的干部也较迫切,特别解放大西南需要的干部较多。为此,华中革大缩短学习时间提前结业。第一期学员的分配工作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有 540 余名参加西南服务团,跟随刘邓大军踏上解放大西南的征途。二是有 540 余名分配去东北,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三是有 1300 多名分别去华东各地和各部门工作。

1949 年 8 月,刘格平同志调出另有任用,华东局又先后任命温仰春、李正文任副校长。

华东革大第二期学员较多,共设五个部和一个政治研究院。一部是为了给解放台湾做准备,从各地抽调的 275 名县团级干部进行培训学习。除由冯定讲授《社会发展史》外,潘汉年、许涤新、李士英、夏衍等分别为学员讲了接管上海的全面经验和财经、公安、文教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及有关政策。后来由于中央对解放台湾有了新的考虑,6 月间学习告一段落,除部分学员调到华东一级机关外,大部分调到二期二部继续学习。原来的一部则另行接受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所给的任务,即训练上海、南京、杭州三地文、法学院千余名大专同学和上海市教育局保送的 800 名高中毕业生。

华东革大二期二、三部主要接受了从山东、苏南、皖南、浙江招收的 3000 名左右青年知识分子的任务。二部还接受山东胶东、渤海地区千余名区乡干部进行整党和学习土改政策的任务。

二期还增设了五部,主要是教育训练来自苏南、皖南千余名初

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新干部,其中有部分是渡江前就已参加学习和工作的。另有一部分是文化教育方面的在职人员。来自皖南干校300多名学员亦并入该部。

根据统战工作的需要,华东局又决定在华东革大增设“政治研究院”,前后办了两期,第一期330名,前来学习的是各民主党派成员和大学教授。开始由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陈同生主持该院的工作。后来,由新到任的副校长匡亚明兼该院院长。李佐长任副院长。对这批学员在生活上给予了一些照顾,如享受中灶待遇和睡单人床铺等。

华东革大还设了俄文学校,由姜椿芳、涂峰分别担任正副校长。学校第一期招收了400名学员,学习时间一年,把他们培养成为专门翻译人才和俄文工作者。后来,学校改名为“外文专修学院”,1951年又招收新生450余名,共设五个班,其中英、俄文的中级班各一个,俄文初级班三个。

附设在华东革大的还有“工农速成中学”,由赵平生担任校长。

1950年初,上海遭到美蒋的封锁和轰炸,华东革大决定撤离上海,事前曾派人去无锡、苏州、芜湖、安庆等地多方选择校址,最后决定搬到苏州。一是考虑苏州有不少原国民党军队的营房,还有蒋介石、顾祝同、钱大钧的公馆,都可充作校舍;二是离上海较近,来往比较方便。上海只留俄文学校和一部。不久,一部也迁往苏州。苏州校舍,除了一部分是公共房屋外,都是利用原有兵营、仓库、寺庙,略加修补后应用的,还因陋就简地利用芦席、毛竹搭起了几座礼堂。

华东革大第三期是1951年3月在苏州开学的。当时正处在抗美援朝的离潮,近6000名学员,大部来自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的中小城市和农村,结业时,全校掀起了报名参加国防建设的热潮,有些学员为了表达保卫祖国的坚强决心,咬破手指,写了血书。后来,有2800多名学员被批准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继续学习,1100余

名学员被批准直接参加国防部门工作。

革大第四期学员绝大部分是华东军政委员会直属、财经、文教、政法四大部门在沪的各机关经过清理的中层留用人员。计1216人,占绝大多数。少数学员来自各地机要部门或其他机关,共89人。四期学员多数是中年人,长期在旧社会工作,旧的习气比较严重,经验世故较深,文化水平较高。其中1100多人在政治上有这样那样的历史问题。不少人曾在国民党的党、团、特务组织中担任过领导工作。因此,不少学员在入学后,对学校性质、学习目的、个人前途都有顾虑。通过两个月的学习,问题较少的学员,一般都消除了各种疑虑和误解,谈出了许多新的历史问题。当然,也有少数人,虽经教育,仍然顾虑重重,患得患失,不暴露思想,不谈问题,甚至抗拒学习和改造。

从四期起,革大取消了原来六个部的建制,下设四个班,由校部直接领导。

由于工作需要,华东革大的副校长温仰春、李正文、匡亚明等先后调离,革大从第四期起,华东局决定由吴仲超担任副校长。

华东革大第五期学员,绝大部分是华东军政委员会机关抽调来的在职工作人员,共980多人。学习目的是使学员在参加“三反”运动的基础上,通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学习,划清工人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思想界限、提高觉悟,放下包袱,树立廉洁的、朴素的、联系群众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做一个好的人民公务员。经过五个多月的学习,他们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胜利地完成了学习任务。

华东革大是一座“抗大”式的干部学校,当时正处在革命大发展时期,各方面迫切需要大量干部,不可能对学员进行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主要进行短期的政治训练,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有关著作,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使其初步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树立革命人生观。

开宗明义的第一课是《改造我们的学习》，使学员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领会学习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是学习的重要内容。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教材。目的是使学员通过学习，明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几个基本观点：劳动观点、阶级观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观点。使学员了解社会发展规律，旧社会必然灭亡，新社会必然胜利，初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

“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也是学习的重要内容。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为基本教材，目的是培养学员树立爱国主义思想。

此外，还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组织纪律教育，使大家认清形势，懂得政策；加强组织观点，服从组织分配，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华东革大的师资来源，主要是聘请华东局的领导人和华东党、政、军、民各部门负责人上大课。学校的正副校长、处长也兼任教员。华东局和上海市的领导同志，都十分重视培养造就人才，非常关心和支持华东革大的教学工作，尽管工作异常繁忙，但只要学校去请，都欣然同意，挤出时间，前来讲课，从不推辞，陈毅曾经四次到革大讲课。他讲课，深入浅出，尖锐泼辣，最受大家欢迎。一次，虽然天色已晚，大雨倾盆，在露天听课的同学，仍鸦雀无声，秩序井然。曾到革大讲课的还有饶漱石、粟裕、刘晓、潘汉年、马寅初、陈丕显、魏文伯、刘瑞龙、章蕴、冯定、夏衍、范长江、李士英、骆耕漠、许涤新、陈同生、周而复、金仲华、唐守愚、沈体兰、管文蔚、刘季平等，部队领导有宋时轮、唐亮、袁也烈等，作家艾青、叶以群等。

华东革大的教学总方针是：“把理论学习作为改造思想的武器，把改造思想作为理论教育的目的。”具体要求是：群众路线的、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发挥自由思想与修正错误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采取讲课、自学、讨论三者相结合的方式。学习的过程，一般是：以班为单位的预习课，以部或校为单位的上大课；

以互助组或小组为单位的自学准备；以小组、联组或班为单位展开讨论；以班、部、或校为单位的解答课。在某些特定的学习单元中，学校还组织学员参加实际劳动，结合教学要求开展多种多样的辅助活动（如放电影、请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作报告等）。

比起“抗大”来，华东革大的物质条件已有很大改善，但是，革大仍然没有令人神往的精微校舍和丰富藏书，在修建芦席毛竹结构的大礼堂前，还不得不在露天上大课。吃的是粗菜淡饭，睡的是通铺，过的是半军事化的生活，对城市青年来说，毕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学校的领导骨干都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他们勤恳踏实，平易近人，和同学朝夕相处，不但承担了从教学、政治思想工作到校务管理等一系列重要任务，而且对学员循循善诱，促膝谈心，查铺盖被，体贴关怀，无微不至，深受同学们的爱戴。

革大每期对学员都无例外地组织他们帮助食堂运粮、打水、洗菜，或进行修沟、垒墙、种菜等公益劳动，培养同学们的劳动观点，有的同学入学时对劳动还有怨言，后来却转变为奋身跳人猪圈打扫，爬入井底挖泥掏水的劳动能手。二期四部仅一个季度就收获各种蔬菜近万斤。

学员还民主推选学习代表，组成学代会，成为班部组织实施教育计划的有力助手。在班部和学代会的组织安排下，学员们出版墙报，定期举行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各班都成立文娱委员会，开展歌咏、舞蹈、球类等活动。每天早晚，高唱激动人心的革命歌曲，洋溢蓬勃向上的革命精神。学校有一个文工团，除自己演出外，还担负对基层文娱活动的辅导任务。

第六章 华中解放区专业干部学校

华中解放区的建设是多方面的,不仅需要培养党政干部和军事干部,而且需要培养从事解放区各项建设的专业干部。这些专业干部除了在一些大学、公学和学院进行培养外,还开办了各类专门学校,培养各类专业干部。现将华中解放区的各类专业干部学校介绍于后。

一、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

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是新四军到达盐城以后,在刘少奇、陈毅亲自关怀和领导下创建的以鲁迅名字命名的高等艺术学院。

1940年10月下旬,刘少奇率中原局干部离开淮南来苏北盐城之前,就对孟波、陈岛等讲到,去苏北后要办些干部学校,争取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刘少奇到达海安后,又和陈毅一起约请丘东平、邵维、陈岛、莫朴、刘保罗等人会面,研究办学校问题。后来刘少奇、陈毅采纳大家的意见,决定办一所像延安鲁艺那样培养文化艺术人才的学校。

11月中旬,刘少奇从海安回到盐城后,召集丘东平、陈岛、莫璞、孙湘、孟波去开会,刘少奇同志临时因事未出席,由秘书刘彬传达他的指示。大意是:苏中、上海以及大后方有许多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要来盐城,上海的许幸之等一批文化人到了海安,现在又回上海去动员文化界知名人士。华中局决定要在盐城办抗大分校和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并宣布到会的同志为鲁艺华中分院的筹备委员。以后又由刘彬和华中局宣传部长彭康同志主持会议,讨

论系科设置、干部配备以及选定院址等工作,确定学校设在贫儿院旧址,暂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学制六个月,第一学期招生400人。并初步讨论了各系师资和干部的配备。随后以鲁艺华中分院筹委会的名义在《江淮日报》等报刊上刊登招生启事,向各地印发了招生简章。规定“凡具有中等教育程度以上或同等学历,年龄在十七岁到三十岁,身体健康,愿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对艺术有兴趣者,不分性别均可报考。”学校经过考试、考查,录取学生近200人,大部分来自上海和苏中、苏北地区的知识青年,还有来自大后方重庆、桂林以及广东、福建等地的知识分子和南洋归国的华侨。

1941年1月初,正当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即将开学之际,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华中党政军领导全力投入粉碎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开学日期也因此推迟。直至1941年1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以后,刘少奇、陈毅来到分院听取筹委会的汇报,审定了干部名单,才于2月8日正式举行了华中鲁艺成立大会和开学典礼。成立大会上,丘东平报告了筹建经过,刘少奇、陈毅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广大师生努力工作,好好学习,把鲁艺分院办成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艺术堡垒。最后由刘彬宣读了分院组织机构和负责人名单。就此,鲁艺华中分院宣告成立。

鲁艺华中分院院长由刘少奇兼任,教导主任丘东平。并以丘东平为主,由何士德、陈岛、孟波、莫朴、刘保罗等六人组成院务委员会,负责对全院日常行政、教学工作的领导。院部下设教务、总务两个科,教务科长孟波、副科长戴英浪;总务科长卢良诚。为适应战争环境,全院学员合编为一个军事大队,大队长汪星,副大队长胡辛人,教导员孙湘、军事教官王培臣。下面按各系、班编成中队,各中队均设队长、指导员。党内成立总支委员会,总支书记孙湘。

全院共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后来又增设一个普

通班和一个少年班。全院学员达 400 人左右。

各系的教师和干部配备是：

文学系主任陈岛，教授戴平万、林珏、蒋天佐、丘东平（兼）、戈茅（徐光霄）。中队长许铭，指导员屈成梁（后为李锐）。

戏剧系主任刘保罗（后为许晴），教授许幸之（兼）、邵维、许晴，中队长陈友仁（扬柏桐），指导员袁万华。

音乐系主任何士德，教授章枚、孟波（兼），后期增加贺绿汀。

美术系主任莫朴，教授许幸之、戴英浪（兼）、刘汝醴、庄五洲；音乐、美术两个系合编为一个中队，中队长田平，指导员王学冉。

普通班主任孟波（兼），教授由各系主任和教授兼任。学员 200 多人，分编为二个中队，一中队队长田平，指导员屈成梁；二中队队长陈友仁，指导员王学冉。

少年队 30 多人，大部分是三师七旅、八旅宣传队和文工团送来培养的少年儿童。他们的队长是朗林，指导员刘桂英，政治教员周石谷。

为了宣传演出，院部还成立了一个由戏剧系加上其他各系有戏剧特长的学员组成的实验剧团，团长孟波，副团长刘保罗。还有一个以音乐系为主，吸收其他系有音乐特长的学员参加的合唱队，由何士德担任总指挥。

学院的课程分政治课和艺术课。政治课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以及形势教育等。政治课采取上大课的形式，请党政军领导同志和抗大五分校的理论工作者来讲课。

在专业艺术课方面主要讲授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如文学系设有文学概论、现代文学史、世界文学史、文艺鉴赏、创作方法等课程。戏剧系设有戏剧概论、戏剧史、表演、编导等。美术系设有素描、速写、木刻、宣传画等。音乐系有声乐、乐理、作曲、指挥、名曲欣赏等。艺术专业课均由各系教

授担任讲课。

鲁艺虽有教室,但没有课桌椅,学员每人发一张小板凳和一块小木板,坐着听课,小木板放在膝盖上记笔记,行军时将木板和小板凳扎在背包上背着走。

教学器材非常缺乏,美术系没有石膏像,就把庙里的小菩萨搬来涂上石灰,作为练习素描的模特儿。音乐系只有一架旧风琴、几只口琴和几种民族乐器,还有一个自己用火油箱做的低音二胡。戏剧系学化妆时用的是自己调制的土油彩,实习演出的服装道具,都是临时借用的。文学系的图书资料也很少。

4月中旬,刘少奇、陈毅和彭康来院检查教学情况,听到缺乏必要的教学器材时,就决定派孟波和刘汝醴随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的杨斌去上海购置,采办的器材经过地下交通陆续运到盐城。

鲁艺虽说有几间教室,但无法容纳众多的学员,贫儿院西边靠沿河一带坟堆很多,又有一小片树林,于是就成为各系和普通班经常上课的地方。敌机来袭时就用坟堆作隐蔽的场所。一解除警报又继续上课。上午主要是专业课,下午是政治、军事、文艺理论等共同课或专业课,晚上主要是自修。

鲁艺学员大部分住在贫儿院附近的兜率寺,供三宝佛像的正殿是女学员宿舍,前面供四大金刚和两厢供五百罗汉的旁殿是男学员宿舍,普通班的学员大部住在居民家里,大家睡的都是地铺,每两平方米要睡三四个人。没有大米吃,经常吃玉米糊糊和红高粱,有时还要吃发了霉的山芋干。每天黎明起床号一响,就迅速整理好内务,然后集合跑步上操。有时在午夜大家睡得正熟时,突然进行紧急集合,几分钟内打好背包背上所有东西行军。但大家生活也充满乐趣。每当集合或开会时,歌声此起彼伏。晚饭后常以分队为单位做集体游戏。每逢周末晚会,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文艺节目丰富多彩,引人入胜。

鲁艺实验剧团和各系师生经常排演剧目在抗大五分校附近的

大众剧场进行演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演出的节目主要有:《皖南一家》、《重庆交响乐》、《一个打十个》、《惊弓之鸟》、《王玉凤》、《撤退以后》、《人约黄昏后》、《扬子江暴风雨》、《反投降》等,这些节目都是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歌颂人民群众与敌人作斗争的故事。

1941年3月15日,鲁艺华中分院发生了一件悲痛的事。那天下午,为准备第二天在龙岗为新兵团成立大会进行慰问演出,实验剧团副团长刘保罗带领剧团在龙岗南寺庙里排演《一个打十个》独幕话剧,排到枪毙伪军时,由于扮演新四军战士的演员事先忘记检查枪支,谁知枪里的子弹已经上膛,扳机一扣,“砰”的一声,扮演伪军的费民杰应声倒下,子弹从青石板上弹跳起来,又打中了正蹲在砖堆上导演的刘保罗左颊,这颗子弹又从刘的后脑穿出去,击伤了站在他身后看排戏的一位参谋的左腿。一颗子弹造成两死一伤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两天后,鲁艺全院师生沉痛地开了追悼会,把两人的遗体安葬在院部西边的沿河边上,墓前树立了由丘东平书写的石碑。

1941年7月,日伪军集中兵力,向盐阜区进行大“扫荡”。军部获此情报后,立即作了反“扫荡”的战斗动员,把盐城的机关学校进行疏散。鲁艺师生撤到盐城以西20多里的黄家港一带,后来又转移到湖垛乡下,分住几个村庄。

7月20日左右,敌人从盐城、上岗向湖垛、建阳一带进攻,那里是水网地带,狡猾的敌人经常乘汽艇来搞突然袭击,情况相当紧张。鲁艺领导商量决定分两个队转移,一队为院部、文学系、美术系的大部分和戏剧系、音乐系的少数同志,由黄源、何士德负责。二队为戏剧系、音乐系的大部分和文学系、美术系的少数同志及普通班,由孟波、丘东平、许晴三人负责。

当天晚上,二队由军部派来的参谋带路,朝东南方向的北秦庄转移,由周占熊、金庸等带上仅有的六支步枪,每支枪只有四五颗

子弹,组成一个战斗班,行军作前哨,宿营作守卫。7月24日凌晨,到达宿营地北秦庄,大家疲惫不堪,吃罢晚饭洗了脚,一个个躺下呼呼大睡,丘东平带领鲁军到庄西小桥头放哨,又派欧阳道云去和驻在附近的建阳县政府及主力部队取得联系,要他们发现敌情立即通知。丘东平、许晴、孟波刚躺下就听到一阵“嘟突! 嘟突”的汽艇马达声。三人一分析,决定还是马上离开北秦庄为好,通知大家紧急集合,开始急行军。出庄不远,天已露出曙光,看到前方远处有一群人在走动,以为前面是自己的部队。走不多远,突然一排枪响,发现敌人已向队伍冲来。许晴临危不惧,带着有枪的三人跟着他,凭借一堵土墙阻击敌人,掩护在家突围。子弹打完后他们被迫退到河边芦苇丛里,冲过来的敌人发现了许晴,一枪击中他的头部,许晴壮烈牺牲。北秦庄周围都是种的旱稻,长得很高。许多同学就躲在稻田里,敌人用机枪向稻田扫射,有些同学就牺牲在稻田里。章枚撤退时见敌人已冲来,他就躺在路边稻田里装死。敌人过来踢了他一脚,他一动也不动,敌人又用枪托打他,还是一动不动,敌人以为他死了,就没有再动他。

丘东平来到离北秦庄一里多路的一座小桥旁,沉着地指挥逃出来的同志冲过桥去,不少同志脱险了,丘东平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他遗体旁的挎包里,还放着他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在茅山下》的手稿。

敌人走后,孟波等同志从稻田里爬出来,到附近的张庄找到了主力部队,请他们派人找鲁艺失散的同志,并到北秦庄去打扫战场,将牺牲的30余位烈士的尸体进行就地埋葬,其中还有来军部请示工作的新安旅行团的张平、张杰二人。丘东平和许晴的尸体用船运到张庄,找了地主家的两口棺材将他们入殓,在他们的棺材前由孟波主持开了追悼会,安葬在新河庙附近一处高地上。

8月10日左右,鲁艺师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永兴寺的三师七旅旅部驻地,然后往废黄河边上的周门军部驻地,刘少奇亲

切地接见了鲁艺二队师生，号召大家继续战斗，为死难烈士报仇。同时要求鲁艺为了适应艰苦的战争环境，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决定将鲁艺分散，组成两个工作团。一个属军政治部，叫军鲁迅文艺工作团，又称江淮鲁工团，团长何士德。一个属三师政治部，叫师鲁迅文艺工作团，又称黄河鲁工团，团长孟波，指导员吕冈之（后是毛健）。除分配到军、师鲁工团之外，有一部分学员派回上海做地下工作，其他的同志分配到部队和地方做文化宣传工作。

全国解放后，鲁艺师生牺牲 30 余人的北秦庄的地方政府——庆丰乡政府为了纪念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牺牲的烈士，集资了万余元，在北秦庄前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原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题写了《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殉难烈士纪念碑》碑名。中共建湖县党史办和文化局等单位，举办了华中鲁艺殉难烈士馆陈列室，刊印了《华中鲁艺殉难烈士纪念册》，张爱萍同志为陈列室、纪念册题名：“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永垂不朽！”

二、江 淮 大 学

1942 年 9 月至 1944 年 6 月间，在淮河之滨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了一所新颖的、革命的综合性的大学。陈毅亲自命名为“江淮大学”。

江淮大学是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贯彻党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培养高级建设人才而创办起来的一所“高级学府”。

早在 1940 年底，刘少奇在苏北参议会上曾明确指出：“在根据地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要创办大学，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陈毅在 1941 年秋发表的《四年抗战与新四军现状》一文中说：本军地区“有专门培养文化干部之鲁艺华中分院，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有三，东南最高抗战学府之江淮大学，正计划创办，明年今日，即当开

学。”可见，江淮大学是在刘少奇、陈毅为首的华中局直接领导下经过认真准备后创办的。

在筹办江淮大学时，华中局决定由地下党江苏省委在上海（当时上海地下党由江苏省委领导）协助落实这一工作。当时的形势是：华中抗日根据地比较稳定，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各项工作的开展，迫切需要培养大量干部，特别是培养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技能的干部参加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同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占上海租界，原在租界从事抗日宣传的报刊被勒令停刊，从事爱国教育的大专院校被勒令登记，实施奴化教育，或禁止开办。各校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的危机，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很多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纷纷要求到自由、民主、光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去学习或工作。一些进步教授和在大、中学校工作的地下党员，处境更为艰险。因此，江苏省委认为应该借创办江淮大学的机会，动员上海大中学校的进步师生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去，支持创办江淮大学。这样既保存了地下党的力量，又为抗日根据地培养了干部。

江淮大学于1942年9月创办，至1944年6月结束，这是在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淮南新铺创办的一所新颖的、革命的综合性大学。创办这所大学，新四军军部和二师、四师及淮南、淮北区党、政、军机关在人力、财力上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淮南根据地人民腾出了房子，作为课堂和宿舍，宿舍里用竹竿、芦苇编起了床铺，准备迎接江淮大学的师生。参与江淮大学筹备工作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不止一次地亲赴军部商讨办学事宜。梅益和张本在上海负责组织动员师生的工作。

经江苏省委推荐和华中局批准，任命韦恂为江淮大学校长，韦恂原是之江、大夏、复旦等大学的教授，曾留学美国，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辛亥革命，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和广东省教育厅长。抗战时期是上海进步刊物《译报》和《上海周报》的创办人之一。知名的经济学教授何封和哲学教授李仲融也响应党的号召，自愿到

江淮大学任教。应韦恣聘请的还有教育家张宗麟,复旦、大夏大学土木工程系主任孙绳曾,之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陈端炳,交通、清华、大夏等大学的姜长英、叶稼祥、黄镇、王书伦、郑邦彦和李洪钟等十余位教授。还有十余位助教,以及校医、护士四人。他们的工资均由专人定期送给他们留沪的家属,本人在根据地的生活待遇从优。

江淮大学的学生,主要来自上海和之江、大同、大夏、沪江等大学和苏州工专学校以及部分中学生,都是各校地下党组织动员来的。如之江大学地下党就动员了14名学生前往江淮大学。到江淮大学的学生,大体上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已受到日伪的注意,被组织转移的地下党员;二是参加过党领导的进步活动,又是党的培养对象;三是不甘心做亡国奴,要求抗日,向往光明的爱国青年;四是在进步亲属的影响下,带着天真美好憧憬的年轻学生。他们尽管家庭出身、政治觉悟程度不同,但要求抗日、向往光明则是一致的。如学生中有一对兄妹,他们的祖父曾任清末兵部尚书,家庭生活条件优越,妹妹更是娇生惯养,但为追求光明,毅然离家奔赴解放区的江淮大学。不少同学和老师,除了受到日伪政府的迫害,民族意识觉醒外,大都是冲破社会、家庭、学校的重重阻力,放弃舒适生活,甚至放弃即将毕业的大学文凭,毅然投向江淮大学这座革命的大熔炉。

在秘密交通的精心安排和引导下,上海100多名师生,通过日伪军的重要关卡,历尽艰险,安全抵达淮南抗日根据地。当时的秘密交通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由镇江过江到扬州,经高邮、宝应,转乘船到淮宝的岔河镇,再到仁河集;另一条由南京过江,经六合到淮南的新浦集。当师生们到达根据地临时招待所时,都受到校领导和工作人员的亲切接待,宛似回到了温暖的大家庭。

1942年9月,韦恣校长及孙绳曾、陈瑞炳等教授到达淮南,受到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和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沙文汉等领导同志的

亲切会见。10月12日是新四军成立五周年，张云逸邀请韦恣和已到达的师生参加了庆祝大会。由张云逸主持大会，二师政委郑信之和韦恣以及几位教授都讲了话，表示一定要把江淮大学办好。

江淮大学的校址在淮宝仁和集，先期报到的江淮大学师生，受到四师党政军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彭雪枫、邓子恢、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和区党委宣传部长冯定，都分别向师生们作过形势报告。1942年11月，在淮北的师生被邀请到半城参加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活动。观看了四师骑兵团和土坦克攻碉堡等军事表演。彭师长还让同学们到骑兵团练习骑马，体验骑兵们横戈跃马、驰骋战场的战斗生活。后来又邀请师生参加四师政治部举办的联欢晚会，观看拂晓剧团演出的精彩节目。彭雪枫还特准发给每人一件棉大衣（这是连以上干部享受的待遇），给韦恣配备了警卫员，送来专用马匹。

庆祝盛会结束后，师生们乘船返回仁和集。几天后的一个傍晚，韩述之由淮南来到淮北，通报日伪军即将发动大规模的“扫荡”，要全体师生立即转移至淮南。当晚启程，第三天晚上到达淮南的张洪营，与在淮南的师生胜利会合了。

在淮南期间，陈毅军长十分关心江淮大学的建设和师生们的思想情绪，为欢迎师生们举行会餐，共度除夕，并作形势和任务的报告，给师生们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张云逸、谭震林、罗炳辉、郑位三、方毅、汪道涵、潘汉年、钱俊瑞、范长江等同志，也先后来校和师生见面、作报告。罗炳辉讲长征，钱俊瑞讲皖南事变，潘汉年讲国际形势和敌占区的斗争，方毅、汪道涵讲党的政策。他们的讲话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使大家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认识。使大家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42年冬天，日伪军准备对淮南地区进行大“扫荡”，根据地的军民投入紧张的反“扫荡”准备。江淮大学目标太大，行动不便，决

定暂时疏散到农村“打埋伏”。韦恣校长及教授们随军部机关转移。后来,日伪军未敢轻举妄动,江淮大学的师生又重新集中,并恢复教学活动。

江淮大学在淮南期间,由党代表梅益,负责领导全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学校里设有党支部,开始受华中局直接领导,后由淮南路东地委领导。党的工作重点是组织师生的时事政策学习,稳定学生思想情绪,开展民主生活和谈心活动,组织学生到农村调查研究,向贫下中农学习,逐步树立革命人生观。

为了迎接日伪军大规模的“扫荡”,经请示淮南区党委同意,决定动员师生暂时返沪隐蔽,待情况好转时返校学习。由于师生们与根据地的军民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纷纷要求留下参加反“扫荡”斗争。经过党支部的耐心说服,大家才表示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除六名同学确实不宜返沪外,其余均流泪告别,返回上海“打埋伏”。

这些返沪“打埋伏”的同学,学校党组织对他们有明确要求:一要隐蔽好,不出问题;二要原地下党员和交通员与大家保持联系,做好思想工作;三要继续学习,尽可能学一技之长,为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1943年六七月间,根据地的形势开始好转,江淮大学重新集中复课,留沪同学迅速返回根据地,共88人。有位女同学,她父亲是梅林罐头食品公司经理,当她回家隐蔽时,其父要她去香港,但她毅然自动返回根据地上学。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学在淮宝县仁和集,补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到会的有陈毅、张云逸、彭雪枫、刘瑞龙、潘汉年、范长江、季方等领导同志。韦恣校长主持会议,陈毅、彭雪枫、季方等领导同志作了重要讲话。会后,首长和来宾参观了宿舍、教室。当晚举行联欢晚会,同学们自编自演《雾重庆》的歌剧片断和其他文娱节目,直到深夜尽欢而散。

新的学期开始后,相继开课的有普通科、教育科和土木系、生物系。韦校长亲自教英语,李仲融教授讲哲学课,请抗大四分校的孙叔平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还请梅益讲国际形势。同学们不仅学到了科学文化知识,也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坚定了革命的信念,树立了革命人生观。

在学校党组织方面,中共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刘子久宣布了学校新的党支部委员会的组成,并委托抗大四分校党委领导。当时党支部不公开,党的工作通过学生会进行,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学生会工作做得很出色,每逢节日或纪念日,组织学生进行座谈讨论;发动有医学常识的同学和护士,下乡为农村妇女接生、治病;组织同学开荒种菜,改善伙食;帮助开展冬学运动,不少同学晚上到农村上文化课和时事教育课;组织部分同学参加地方政府领导的治淮水利工程和减租减息工作,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抗大四分校常和江淮大学举行联欢会。江大同学也经常到抗大四分校参观学习,举行篮球、排球比赛活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抗大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成为江大同学学习的准则,起着巨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1944年春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苏联红军沉重打击下,希特勒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中国战场特别是敌后解放区转入局部反攻,华中地区形势空前好转,仅四师部队就拔除了日伪军据点40多个。根据地扩大了,新区工作急需补充大量干部,于是,军部决定江淮大学结束,全体同学由军部及四师、淮北区党委分配工作。1944年6月,同学们怀着对母校的难忘感情,告别校长和老师,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江淮大学仅存在两年,学生人数不多,但为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批人才,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三、南通学院

南通学院原系南通大学，是清末状元张謇所创办，旨在培养技术人才，举办地方实业。早在1902年，张謇在南通办起了通州师范学校，后又办起了十多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医科出名，以后分别扩充为专科学校，1920年合并为南通大学。抗战爆发后，学校迁沪，医学系因缺乏师资和设备而停办，仅存纺织和农业两系，所以改名为南通学院，由郑瑜代理院长。

1942年春，经中共江苏省委和郑瑜商议，将南通学院迁往淮南。江苏省委建议他先到根据地去参观访问。郑瑜亲眼看到根据地军民抗日爱国的情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更加坚定了到根据地办学的决心。在梅益的陪同下，他见到了中共华中局负责人，本着团结抗日的原则，谈妥了有关迁校的几个问题：①郑瑜任院长，学校的行政干部和教学人员由郑负责聘请，新四军不加干涉。②学校经费由新四军负担，学校免收学费，膳食按当地脱产工作人员标准由公家供给。③校址暂时设在天长县铜城镇。

1942年10月，南通学院60多位学员全部安抵天长县铜城镇。郑瑜院长和他聘请的十多位教授和讲师也都先后安抵铜城镇。

当时，南通学院在铜城镇的校舍是毗邻的四个大庙，往返方便。这些庙宇经过修缮，相当整洁，分别用作教室和师生宿舍，在抗战根据地的环境中，还是过得去的。

1942年11月1日，南通学院正式开学。当时，共分七个班级，仍以纺织和农业为主，除一年级教农纺混合的基础课外，有纺二、纺三、纺四和农二、农三、农四等班。师生情绪稳定，生活也有规律。为了御寒，新四军发给每人一套黑洋布棉袄、棉裤，师生们都很高兴。

同年11月底，情况突变，淮南地区周围的日伪军大量集结，妄

图袭击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华中局决定,南通学院立即分散隐蔽,最后决定停办。1943年春节过后,护送师生回上海。

动员上海的教授到根据地来办江淮大学和将南通学院迁回根据地,这两件事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对干部教育事业和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关怀。

四、华中卫生学校

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刘少奇和陈毅指示组建新四军卫生部。原新四军军部医务处处长沈其震,被委任为军卫生部部长,戴济民和崔义田为副部长,齐仲桓任医务主任。戴济民还兼后方医院院长。并要求各师、旅和军分区也都建立卫生部,迅速开展医疗卫生工作。军、师卫生部成立后,医疗骨干和医务人员十分缺乏,因此,创办卫生学校,大力培养卫生干部和医务人员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一项重要任务。

华中解放区先后创办的卫生学校较多,这里只介绍以下几所卫生干部学校。

1941年秋,军部在盐城首先创办了一所华中卫生学校。由军部卫生部长沈其震兼任校长,崔义田任副校长,主持教学工作,校址在盐城东门硕陶图书馆内。全馆是一座两层小楼,大约有500平方米。全校有教职工二三十人,学员300余人,大部分是抗大的学生转来学医的,分成两个学习队,设医疗、药剂、检验三个专业。卫生学校定于1941年7月20日开学,这正是日寇发动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的关键时刻,师生们都以为陈毅不能前来参加开学典礼了。可是,陈毅同志还是准时到校给大家讲话。他精辟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形势,要求全体师生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同时谆谆教导大家要学会在战争环境下坚持学习,要学好医疗护理基本知识,掌握治伤治病的技术,做到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陈

毅还为卫生学校题了词：“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间的桥梁，对人的治疗，药物方面是属于自然科学，而精神安慰和救护方面必须借助于革命的社会科学。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同志与一般医生不同之点在此。”他的讲话与题词，是建设新四军卫生工作的基本原则，给大家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华中卫生学校的教学内容，除了政治理论课之外，重点是进行医学知识的教育。先后学习了生物学、解剖学、药理学、急救学、绷带学等。没有教科书，教师自编讲义；没有标本，教师自己制造；没有挂图，教师自己绘制。

由于学校经常随军卫生部转移，又靠近军部后方医院。因而教师讲授有关课程时，常常带领学生到医院参观实习，结合伤病员的病例进行讲解，学习效果更为显著。

为华中卫生学校讲课的除了崔义田等医学专家以外，国际友人、奥地利著名医生罗生特也常来学校为学生讲课。他从医药基础理论、生理解剖、内外科、药理、护理到战时救护知识，都精心讲解。

华中卫生学校的学习内容，并不是专学业务，同时也学习政治、军事等课程，如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并进行军事训练，早晨天刚亮就打起背包、整理好内务，上操场出操，学会射击。学校的两个队，每个队有四五十支步枪，每班有枪三四支，平时进行训练，战时保卫学校的安全。

1941年7月，日寇对盐阜地区进行大“扫荡”，学校离开盐城，分两个队行军，开始向盐东，后向盐北、阜宁农村转移。在行军途中每到宿营地由男同志站岗放哨，女同志烧水煮饭，处处充满着革命的友情。

在转移中，有一次，一个队在湖荡与日寇周旋，不到十里的范围内，走了五六个村庄。一天中午日寇在村中搜查，这个队百余人掩藏在一大块玉米地里，情况十分紧张。傍晚敌人向西开去，才脱

离了危险。校部根据此情,果断决定,连夜突围,安全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反“扫荡”胜利后,华中卫校随军部转移到阜宁的西北部,军部驻停翅港,卫校驻附近的范家荡,学校住定后,按照原定教学计划,重新开始学习训练。经过一个冬春和夏季的整训学习,于1942年8月完成了教学任务,第一届华中卫校的学员就胜利结业了,学员们分别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后因战争形势紧张,华中卫生学校暂停举办。

五、华中军医学校和白求恩医学院

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刘少奇和陈毅提出要组建军、师、旅卫生部,并要大量培训各类卫生干部,军卫生部要创办医科大学。军卫生部部长沈其震根据军部首长的指示,除1941年7月在盐城创办了华中卫生学校之外,在1942年10月,在淮南大柳郢又创办了第一所医学院——华中医学院。由宫乃泉主持教学工作,学制暂定两年,学员共40余人。都是由各师抽调的有一定医疗经验的卫生干部。1943年初,由于日、伪军对根据地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形势十分紧张,部队实行精简,华中医学院暂时停办。大部分学生回原单位工作,少数参加卫生干部高级研究班,在二师卫生部领导下,坚持学习到1943年10月。华中医学院虽因战争条件限制,未能如期完成学习计划,但为以后创建新四军军医学校积累了经验。

1943年抗日战争形势越来越好,华中地区大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军卫生部为了适应这一形势,一方面积极举办各种医务短训班,以轮训提高在职医务干部的水平,一方面筹建学制为四年的军医学校,招收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知识青年,培养具有大学水平的军医。经军部批准,于1944年10月10日正式开始建校工作。为

了解决学校的师资问题,经过军卫生部和上海地下党的努力,动员了一批又一批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家教授来到军医学校任教。其中有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江上峰(江炳炎)、比利时冈特大学医学博士沈霁春、法国留学化学博士钱静等。学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部分是报考华中建设大学医学系转入军医学校的;一部分是由部队、地方政府和江淮大学输送来校的;还有一部分是根据地的高中毕业生。到1945年5月初学校开学时,陆续到校的学员共60名。全体学员分成七个班,组成两个排。既是学习组织,也是战斗建制,从一开始就过着严格的军事集体生活。

学校住在军卫生部所在地的天长县长庄,军卫生部为学员们盖了一间大草房作为教室,一排草房作为寝室,有一个不大的图书馆,馆内藏有中外医学书籍和政治文艺书籍数百本,供师生们借阅。

军医学校由江上峰任校长,宫乃泉兼任副校长,设政治指导员一人,教育干事一人。

5月12日国际护士节,军医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当时陈毅去延安参加“七大”未能出席,饶漱石政委、张云逸副军长和江淮大学校长韦恂、军卫生部部长崔义田、副部长宫乃泉等都出席了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勉励学员们努力学好专业,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救死扶伤,做一个红色的卫生战士。

正式上课之初,为了使学生对人体生理解剖有一个初步了解,组织学员学习“人体知识”,然后由宫乃泉给学员讲《急医学》,薛和讲《绷带学》,崔醒讲《解剖学》,江上峰讲《微生物学》,钱静讲《组织学》,邢其毅和严真讲《有机化学》,这些课程的学习,为学员以后学习病理学和临床学打下了基础。

学习医学必须做各种实验,但缺少标本,只有自己想办法。如学解剖学,没有骨骼标本,就发动学员自己动手挖“野坟”的人骨作标本。这种采用土办法既有标本,又做实验的学习,效果很好。

学习三个月以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初,苏北重镇淮阴解放,军直机关,军卫生部迁往淮阴,军医学校一同迁去,驻淮阴外国教会办的“仁慈医院”,少部分学员去淮安前线参加伤员临时收容所工作,工作不到一个月,又继续上课。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新四军军部和一部分部队北上山东,接防山东八路军开创的根据地。11月份,军医学校也跟随军卫生部一起北上山东,江上峰校长因另有任务而离开军医学校,由宫乃泉兼任校长。学校在北上山东时,学员们第一次随部队远距离行军,最多时一天要走100多里路,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封锁线,终于到达山东鲁南解放区。不久,国民党又大举进攻鲁南,卫生部决定军医学校全体学员去滕县野战医院参加工作。鲁南战役胜利后,1946年元旦后不久,学员们又再次集中到临沂复课,临沂环境相对安定,军医学校在临沂持续学习半年,这时学校的学习条件大大改善,有较好的教室和实验室,也有电灯,还有教学用的显微镜,各种标本,实验器材等教学设备。

陈毅从延安回来后不久,还特地到学校为师生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报告,勉励学员努力学习,做一个有高超医术的红色医生。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学校条件的改善,卫生部决定军医学校招收第二届学员。学员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山东大学医学系转来的;二是华中建设大学转来的;三是山东各地政府和部队转送来的。第三届学员共50人,分成六个班,合编为第三、四排。由许高群兼任政治指导员,张己克兼任教育干事。

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发动对华东解放区的全面进攻。7月上旬,战火逼近鲁南,华东军区各机关、学校开始疏散,军医学校随卫生部撤离到临沂以北的亭子头,开始了新的课程,由上海地下党新动员来的三位名大夫方春望(聂崇铭)、黄志尚(王士良)和陶煦(胡鸿慈)任课,方春望讲授《物理诊断学》和《实验诊断学》,黄志尚讲授《胚胎学》、《微生物学》和《寄生虫学》,陶煦讲授《应用解

剖学》。

第二届新学员则由宫乃泉讲授《急救学》，苏醒讲《解剖学》，刘球讲《绷带学》，黄志尚讲《组织学》。

为了加强对学员的政治教育，学校领导请卫生部政治处副主任郭力军给学员作形势报告，请经济学家何封作政治经济学的演讲，请军直机关政治部副主任周林作政治报告。

1946年10月，国民党部队逼近临沂，军医学校又随卫生部北迁到沂水县的苗家庄，不久又随军卫生部撤退到沂水县北面山区李家河北。1946年底，军医学校正式改名为华东白求恩医学院，仍由宫乃泉副部长兼任院长，并在李家河北西边新建一所医院，命名为“山东国际和平医院”，作为军医学校的临床见习基地。

1947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向莱芜、新泰、蒙阴、沂水一线进犯，军区后方机关又再次向胶东转移，白求恩医学院也随卫生部向胶东撤退，行军半个多月，4月下旬来到海阳县夏村，后又迁到滕甲庄。稍加休息后，学校立即复课，开始上临床学科，第二届学员则主要学习基础课。

1947年9月初，国民党军队对胶东地区发动进攻，9月30日占领烟台，企图围歼我军。这时形势比较紧张，学校暂时分散，一部分学员跟随许世友、谭震林指挥的山东兵团第九纵队转战，大部分女学员和体弱的男学员，分组参加胶东军区后方医院工作。学院的部分教师和家属则从胶东乘船去大连。胶东战役胜利后，这批教师和工作人员又从大连返回华东军区卫生部，继续参加学校的工作。

去九纵队的学员就在纵队分配工作，一部分学员分配到纵队卫生直属手术队，大部分到各师的医疗队工作。

1947年12月，山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的指挥下，取得了胶东战役的全面胜利。1948年2月，学院第一二届学员又全部集中到诸城县的赵家辛庄，重新复课。

第一届学员复课后,由宫乃泉继续讲授战伤外科,张学彬讲授外科学,张静北讲授内科学。第二届学员也跟第一届学员一起听临床课。

1948年3月初,根据上级指示,第一届学员被抽调组成手术医疗队,结束了在校学习三年的学习生活,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第二届学员继续留校,随卫生部学习和工作。

1948年9月12日,济南战役打响后,第二届学员又随宫乃泉副部长到济南附近,收治伤员。济南解放后,学院进入济南后,与原山东省立医学专科学校合在一起,仍称华东白求恩医学院。第二届学员在济南三个月,学习病理学、内科学、外科学等课程,同时去山东省立医院见习。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后,第二届学员又奉命参加淮海战役的伤员医疗工作。

1949年3月11日,第二届学员和药科学学校师生100余人奉命随军区卫生部一起南下准备接管上海。5月27日上海解放,学员们分批先后进入上海参加对上海市卫生系统的军事接管。

1949年底,经华东卫生部批准,第二届学员除少数工作离不开外,又集中到上海医学院学习,1952年由上海第一医学院毕业分配工作。

六、淮南新医进修班

1944年7月,淮南行政公署为了培养医务人员,决定创办淮南新医进修班。名义上是进修班,实际上是一所卫生学校。

进修班校址在盱眙县张洪营。进修班的校长由新四军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兼任,副校长由军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兼任,夏俊(营级医务人员)任教导处主任,主持学校工作。全校教职工十多人,学生120名,这些学生分别从路东八县(盱眙、嘉山、天长、高邮、六

合、仪征、扬州)招来的,有三分之一是民间医生,三分之二是从学校来的青年学生。

校舍在张洪营大庙内,五六间大殿为学生宿舍,100多人都住在里面,每班一个大通铺,大殿对面的五间瓦房为教室。师生们过着艰苦朴素、因陋就简的集体生活。上课没有课桌,学生就坐小凳上,把讲义夹放在大腿上看书写字;没有黑板就用门板当黑板;睡觉没有床,就用泥块垒起土墩子放上木板搭成大通铺;没有课本,教师就自编讲义。这样,学校就办起来了。

淮南新医进修班的教学内容,既有政治课也有业务课,政治课每周一节,业务课每周7节,政治课由政治指导员汪恭良和武蕴藻讲授,政治课主要是讲《新民主主义论》,结合讲近百年史,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以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业务课则由夏俊讲解剖学、外科学,教师潘予之讲卫生学、内科学、药物学和战地救护学等,上课时,同学们边看讲义边听课;如果没有讲义,则由教师口授,学生记录。

上业务课,教师一般都使用心脏、骨骼模型和图片等直观教具,有时则在黑板上绘图来进行讲解,在学习中,还坚持与实践相结合,教师经常带学员到二师卫生部医疗队、军分区卫生处医疗队参观学习,看医生做手术,看尸体解剖。

理论学习结束后,学生分成两部分,分别由教师带到铜城,旧浦两个保健堂去实习,这两个保健堂病者云集,门庭若市,求医者络绎不绝,这既解决了患病群众的痛苦,又锻炼了学生,积累了临床经验,真是一举两得。后来学生又编成三五人一小组,走乡串户,到老百姓家给病人治病。轻病就地治疗,疑难病症带回来请教老师,或大家在一起会诊解决。这样做,不但把学的理论用到实践中去,锻炼了自己,更重要的是在群众中造成良好的政治影响。

进修班教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勤奋。当时学生年龄不一,文化水平更是参差不齐,有高小毕业生,有中学生,还有大学一二年

级的学生。有一部分学生,在课堂上记下教师讲的内容,晚上便开小组会,进行校对笔记和补笔记,教师也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补课。为了促进学习,还经常进行考试,在课堂上进行口试,或由教师提问、抽测,每周还要进行一次测验。整个学习气氛很浓,早晨,校园内到处可以听到琅琅读书声;自学时聚精会神做练习,讨论会上个个踊跃发言,全校呈现一派愉快而又紧张的学习景象。

师生们生活既紧张又严肃,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天刚亮就起床,五分钟内打好背包,到操场集合跑步。为了安全,每天晚上派学生轮流站岗,每人一班,两小时一换。

学生的课外生活也丰富多彩,经常进行篮球、排球比赛活动,召开文娱晚会,唱歌、演奏,讲故事,还到二师文工团观看苏联话剧《前线》的演出。

为了改善师生的伙食,学校组织学生养猪、种菜,因此生活大大改善,一般能做到三天一小荤,每星期一大荤。饭也是吃得饱饱的,先是两稀一干,后是两干一稀。

进修班的学制为一年,毕业前,学生要到二师师部医院进行实习,进行实验教学,做尸体解剖等。

进修班第一期学生是1945年2月毕业的,学校发了毕业证书,毕业生由淮南行署统一分配,有的分到区、乡保健堂任助理医生,有的分到县卫生所、专区医务所等单位工作,还有的分到部队从事医务工作。

进修班第二期于1945年1月招生,学生60多人,学校由张洪营迁到半塔集的鲁店。学习一个时期以后,因战争形势紧张,学校转移到路西,不久编入部队,投入战斗,进修班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华中抗日根据地除了新四军军部卫生部直接创办的华中卫生学校、华中军医学校和白求恩医学院外,1942年在二师住地还成立华中医学院,由宫乃泉主持工作,主要培训团以上医务骨干,只办

了一期就停办。同年,在苏北陈港镇也创办了一所苏北卫生学校,由齐仲桓任校长,招收学员 200 名,学习时间六个月,后因敌伪“扫荡”,只学习了三个月就提前分配工作,学校也宣告结束。

新四军各师都开办短期的卫生学校或培训班,旅、团一级也因陋就简培训卫生员,参加培训的卫生人员主要是互教互学,边学边干,这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办法。团卫生队经常利用战斗间隙,开办卫生员训练班,有的几天,有的十几天,最长个把月时间。那时办班无任何教具,学习解剖无尸体,就弄来敌尸的骨头架,经过煮沸、清洗,作为骨骼系统的形象教学模型。除了学习生理解剖外,还要学习外科、内科的医护知识、预防知识、战伤急救的四项技术(包扎、止血、骨折初期固定、休克的早期预防和治疗),以及一般的药物知识等。

新四军还在连队的实践中培养卫生人员。连队在每个班中设有卫生战士,由文化水平较高、热爱卫生工作的战士担任,这些卫生战士是连队卫生救护工作的基本群众,也是卫生队伍的细胞,它是由连队每个班中选出一名战士来兼管的,协助连队卫生员做些卫生救护工作,业务上受卫生员指导,战时除完成自己的任务外,负责本班的伤员急救,实施简易包扎、止血、骨折临时固定后迅速后送,战前由营医务员和连卫生员对他们进行业务培训。卫生战士如遇伤亡,由班里及时补选文化水平较高,热爱卫生工作的战士接替,经连卫生员同意即可。

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这些卫生干部学校和医务人员培训班,培养训练了大批卫生干部和医务人员,满足了部队和地方的需要,对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原新四军军部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在回忆文章《新四军重建军部后的卫生工作》一文中说:“从 1941 年 1 月 29 日成立军卫生部起,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华东军区医务人员发展到 4 万余

人,在解放战争期间,先后收治的伤病员 31 万余人(次),治愈归队的达 21 万多人(次),这对于提高部队的健康水平和战斗力,保证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①

新四军卫生干部学校的创办和卫生事业的开展,不能不提到国际友人、奥地利著名医生罗生特。罗生特于 1903 年 1 月 1 日出生在奥地利的加里西亚梭堡。他以优异成绩考入著名维也纳大学攻读医学,是著名的泌尿科、妇产科专家。1938 年冬,罗生特从欧洲辗转来华,在上海法国租界开设了一个小诊所,登门求医者络绎不绝。1941 年春,罗生特在上海结识了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沈其震向他介绍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后,他很兴奋,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参加新四军。他装扮成德国传教士,佩戴德国徽章,带了一大箱医用器械,随沈其震乘船从上海来到苏北解放区,3 月 21 日到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陈毅、刘少奇亲切地会见了罗生特。他在盐城先后出席了抗大五分校举行的大会,纪念“五卅”运动 16 周年大会,盐城县参议会等,在会上他都作了演讲,他还参加了苏北文化协会成立大会,在会上作了《关于欧洲文化》的报告。

罗生特在苏北通过短期考察,看到新四军医务人员十分缺乏,向陈毅建议创办一所培训医务人员的学校。陈毅对此十分赞同,并亲自筹措,不久就创办了上面介绍的华中卫生学校。学校开学后,罗生特定期到校上课,传授知识。在他和学校领导的努力下,学校很快培养出了一批医务人员,分配到各部队中为伤病员服务。

罗生特经常要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奔走在华中新四军各部队之间。不管是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天,他都在所不辞,甚至冒着枪林弹雨,到火线上救护伤员,人们亲切地称呼他是“新四军部队里的白求恩”。

1941 年夏,日军对盐阜区发动第一次大“扫荡”,军部转移到阜

^① 《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第 532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宁陈集停翅港后,物质条件很差,起初罗生特不习惯吃玉米、山芋等杂粮,不习惯睡地铺……生活的艰苦、工作的劳累,使他瘦了许多,陈毅得知后指示供给部门专门给罗生特配给一些面粉,给他增加了适当的津贴。为了便于他行军出诊,陈毅送给他一匹从敌人手中缴来的大洋马,还常送来从敌人手中缴来的香烟、咖啡、食品罐头等。

军部领导无微不至的关怀,罗生特深受感动,他说:“我是来消灭法西斯的,不是为了享受。”发给他的津贴,他总是拿出来买营养品送给新四军的伤病员。配给他的马,行军时总是让给伤病员和身体弱的同志骑。

罗生特在军直医院工作期间,尽心竭力为新四军伤病员服务,不论在门诊室里,还是在手术台上,或是在病房中,他都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在卫生学校给学员讲课也十分认真,他教育学员说:“做一个好医生光有高明的医术还不行,还应该像鹰一样的眼睛,音乐家的耳朵,以精确地观察去认识病人,辨别病情;要有一双灵巧的手,手术时才能缩短时间,尽量减轻病人的痛苦;还要有戏剧家的嘴巴,以明快的语言安抚病人,减轻病人的精神痛苦。”

1943年初,党组织根据罗生特的要求和表现,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考虑他是外国人,将他列为中共特别党员。

1943年4月,山东军区政委罗荣桓身患重病,陈毅邀请他来苏北请罗生特治疗,使罗荣桓病情大为好转。后来陈毅又派他去山东继续给罗荣桓治病,从此离开了战斗和生活了两年的新四军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0年,罗生特要求回国,经党中央批准后,他回到了离别13年之久的祖国,不久因心脏病突然发作,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

七、浙东鲁迅学院

1944年春,中共浙东区党委为了培训地方干部,特别是宣传文教干部,决定开办鲁迅学院。区党委任命曾与鲁迅先生在文艺战线上并肩战斗多年的有名望的左翼作家黄源任院长,楼适宜任副院长,陈成刚(尧林)任教育长,李健民负责具体教学工作。同时,又抽调在县、区搞文教工作有经验的四位同志来学院任中队长和指导员,经过紧张筹备,浙东鲁迅学院第一期于1944年9月正式开学。

第一期的学员主要是三北和四明地区的在职小学教师,约160人,学院没有固定的校址、校舍,随区党委行动,开始时设在余姚县陆埠镇附近的杜徐岙山村,后迁到梁弄镇上。均以民间的祠堂、庙宇作为校舍,桌子板凳都是向群众借用的。过的是供给制生活,一切按部队战士、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待遇。学员按三北和四明两个地区分别编为三个大队,一大队队长兼指导员李健民,二大队队长鲁山,指导员章海兰;三大队队长王伯暄,指导员蔡秋。

1945年3月初到7月初,学院又办了第二期,这一期是公开招生的。《新浙东报》登了招生简章,介绍学院的宗旨和招生的对象和条件。设民政、财经、文教三个系,招收学员120名,后来经过考试筛选,最后录取160余人。学员分别编为男生一、二队,女生一、二队。男生一队队长兼指导员王伯暄,二队队长兼指导员董楚光。女生一队队长黄吟斌,指导员章海兰,二队队长翁郁文,指导员蔡秋。于1945年3月11日正式开学。校址先是在梁弄镇,后改在横坎头的甘地畈,以后又移到大岗上的陈家岩,到第二次反顽战斗时,又搬到上虞县下管镇附近的山村,因形势需要,把原来的财经系,改为财经训练班,由学院和行署财经处双重领导。班主任兼指导员陈乃平、副指导员毛剑。这一期毕业学员,由浙东行政公署统

一分配,多数去县、区做党政群工作,也有少数分配在区党委、行署的直属单位和连队,财经班学员则分配在财税部门。

1945年5月1日,浙东鲁迅学院又通过登报招生报名之后开办第三期,设民政、财经、文教、民运四个系,根据学科的划分,设初级班与高级班,初级班不分系,高级班分系。名额为男生300名,女生120名,在第三期筹备过程中,学院还派人去沪、杭、甬等大中城市秘密招生。区党委还与上海地下党联系,聘请当时在上海有名望的作家、戏剧家姚克、芳信、章泯前来任教。学员于1945年7月15日报到时,正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浙东解放区有很大的发展,急需大量干部补充,因此,区党委决定对刚来报到的160名新学员进行短期集训,然后输送到地方和部队。所以,学员报到后只进行一个月的学习,就分配工作走上工作岗位。

浙东鲁迅学院共同的学习内容是形势和任务、《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以及世界观、人生观问题,联系社会实际和思想实际组织讨论,在进入业务学习时,则按照不同的系学习不同的内容。如文教系则重点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民政系和财经系则分别学习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学习中引导大家自觉地联系家庭和个人的思想状况,以及耳闻目睹的社会现象,进行阶级分析,提高自己的觉悟和水平。在学习中还组织来自根据地和敌伪顽统治区的学员代表,联系自己的所见所闻在全院大会上现身说法,用以教育大家。

学习期间还组织学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搜集材料,编排节目,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向群众宣传,如学员排演的小秧歌剧《代耕队》和《打野猪》,深受群众的欢迎。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形势急剧变化,根据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浙东军民开始向敌伪军发起大反攻,解放了浙东大部分城镇,学院的干部和学员也组成随军工作团准备接管新解放的城市。9月20日,华中局转来中央决定,命令新四军浙东纵队

及地方党政干部,除留下秘密工作者和少数武装人员外,必须全部撤离浙东,开赴苏北。鲁迅学院的干部和学员,大部分随军北撤,鲁迅学院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八、华中新闻专科学校

抗战胜利后,为了培养解放区的新闻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意范长江的建议,创办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并决定新闻专科学校领导人员是:校长范长江、副校长包之静、教育长谢冰岩。紧接着,由《新华日报》(华中版)编委兼采编主任谢冰岩牵头,积极筹办新专的各项事宜,并于1946年2月3日在《新华日报》(华中版)报端上刊出《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招生简章》。宗旨是“培养新民主主义新闻专业各项人才”;学科“设编辑、通讯、电务、印刷、新闻行政五科”;名额暂定200名,条件是年满18岁以上男女青年,具有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华中新专于1946年2月9日开学,实到学员140人。

华中新专的校址在淮阴市,和新华日报社、新华社华中分社住在同一院落里。

学员都是住在老百姓家里,大家学习讨论和睡觉都在集体宿舍的地铺上,过着艰苦朴素而又紧张愉快的学习生活。

给大家上课的是范长江、恽逸群、谢冰岩、庄重等同志;学习内容是时事政治和新闻业务知识。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讲课后组织学习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充满着平等、民主、自由的气氛。在教学中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边学习边实践,锻炼写作。

1946年夏,华中解放区的形势日益紧张,国民党飞机不断骚扰淮阴市,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因而华中局决定华中新专提前结业,学员们学习了三个月就都分配了工作,走上了新闻工作岗位,

华中新闻专科学校第一期也就结束了。

1948年春,华中解放区局势好转,《新华日报》(华中版)开始恢复。华中工委决定新闻专科学校恢复办学,决定华中工委宣传部长俞铭璜兼任校长,新华日报社长徐进和正副总编秦加林、冯岗兼任副校长。负责主持校部日常工作的是罗列(后任教育长),陈方协助教务工作,戴光、孙葵君先后任党支部书记,这一期共有学员60余人,其中女学员14人,校址在射阳县千秋港附近的农村,处于穷乡僻壤的黄海之边。

6月底在千秋港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俞铭璜校长和徐进副校长都到会作了重要讲话。

开学后的日子过得很艰苦,政府为了救济淮海地区的灾民,曾有一个时期生活上伙食只发粮不发菜金,学校组织生产委员会,领导种菜、捉小蟹、挖野菜来维持,每天吃的糝子、粳子,一个月难得吃一次大米和猪肉。60多个人挤在一个小房子里听报告,这里是教室、是食堂、是图书馆,是医疗室,又是墙报陈列室。

尚未开课,蒋军黄伯韬兵团,对华中解放区疯狂进行梳篦式的全面“扫荡”,学校立即辗转北移,与敌周旋,于6月底才返回原地,7月初正式开学上课。在开学典礼上,校长俞铭璜作了《怎样做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动员报告,后来徐进等领导同志也来校作报告。他们都是在树荫下站着讲课,没有教材,自列提纲,讲话条理分明,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又好记录,深受大家的欢迎。

每次上大课之后,都组织自学、讨论。选读有关报告、资料和范文,帮助消化报告精神,为小组讨论做准备。如业务课后,选学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等。这对提高大家的政治、业务、理论知识和写作水平有很大的作用。

在学习期间,学校还组织大家到附近农村参加劳动,调查访问,以增强群众观念,改造思想意识,培养艰苦朴素的作风。

校领导对政治思想工作相当重视,抓得紧,做得活,以党支部为核心,党员为骨干,思想工作大家做,党支部定期召开党员大会和小组生活会,谈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发现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苗头或问题,即时在大会上提出以教育大家。

10月,淮海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淮阴、淮安解放。年底,华中新闻专科学校也迁到两淮市郊的板闸镇,新专第二期同学在这里毕业分配工作。

第三期华中新专改名为华中大学新闻系。因为这时在盐城成立了华中大学,华中行政公署主任、司令员管文蔚兼任校长,华中新专也挂上华中大学的牌子,成为华中大学的新闻系,由华中工委宣传部长汪海粟和新华日报副总编徐进任正副校长,罗列任教育长,党支部书记是孙葵君,稍后汪克之来校任教并担任支委。

这一期学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华中党校的学员,华中党校第15队是个学生队,他们是上海、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撤退到苏北来的地下党员,在学生运动中经受过锻炼和考验,文化水平也较高,分别来自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沪江大学、上海法学院、民治新专、圣约翰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苏州社教学院、杭州浙江大学等院校,华中党校从中挑选了约40人,其中约有30人是15队的大学生。二是华中大学的学员,他们也是从上海和江南其他城市撤退到苏北解放区的大学生,是我地下党领导的反蒋爱国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具有一定觉悟,素质好、文化高,朝气蓬勃,多才多艺。1949年1月,是阴历岁末,党支部书记孙葵君特地去盐城华中大学,带回50多名华中大学的男女学生,在风雪漫天、滴水成冰的冬天,从盐城长途行军来到板闸镇华中新专学习。三是新招收的青年学生。1948年1月19日在《新华日报》(华中版)上刊登了华中大学新闻系招生广告,有不少当地的青年学生前来报考而被录取进入新专学习。但华中新专的学员主要是来自华中党校和华中大学的男女学员。

这届华中新专共招收学员 120 名,分成九个学习组。每组都有三至五名党员,他们严以律己,吃苦在先,起着模范带头作用。

学员的生活条件仍很艰苦,住在泥糊芦墙、嗖嗖透风的棚屋内,睡在芦笆下垫几块砖的通铺上。当时限于条件,每组只发给一只脸盆,男女学员早洗脸、晚洗脚、三餐盛菜都用它,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

华中新专的住地紧靠《新华日报》(华中版)社,既可以听学校领导 and 专家抽暇为新专学员讲课,又便于学员就近到该报社进行实习。副校长兼该报副社长徐进为新专学员主讲《辩证唯物主义》,秦加林讲授《报纸的大众化》,凌建华讲授《时事报道》,高斯讲授《采访工作和通联工作》,等等。校部领导组织学员有系统的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还有《列宁是党报的编辑和组织者》、《加里宁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等。当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解放军正在准备渡江,解放全中国的胜利已经在望。学校组织大家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新华社社论,学习城市政策、新区土改政策等,为解放江南、接管新区做好思想上,政策上的准备。

在学习方法上,采取集体上大课,分组讨论、大会讨论,然后由新专领导人作总结报告。罗列、孙葵君、汪克之等都为学员作过总结报告。

华中新专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上海、南京、杭州等江南大城市的大学生,他们经受过爱国民主运动的锻炼,不仅文化水平高,思想觉悟高,而且多才多艺,擅长搞文娱活动。开学以后,新专领导因势利导,从学员中挑选演员、选手,排演以陕北信天游为基调的《王贵与李香香》,由汪克之任导演。正当排演而未演出的时候,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人民解放军正准备渡江南下,需要大批干部随

军渡江接管新区,华中工委决定华中新专师生随军南下。4月初,学校开始向南移动,连续400余里行军,到达苏北长江北岸,随军渡江至无锡。到达无锡不久,继续排练《王贵与李香香》,并在城中公园的无锡剧场进行演出。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和苏南军区司令员管文蔚都赶来观看演出,一时轰动了无锡城。

新专到无锡后,改名苏南新闻专科学校。6月中旬开始招收新生,学校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九、淮南艺术专门学校

1941年初春,津浦路东各地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需要干部较多,淮南路东省委决定创办淮南行政学院(又称苏皖边区行政学院)。内设行政系、财经系、艺术系(又称艺术班)。开学不久,艺术系从行政学院划出独立建校,改称淮南艺术专门学校,直属淮南路东省委宣传部领导,宣传部长祁式潜兼淮南艺术专门学校校长,副校长莫明,训育处主任张泽易,教务处主任孙琤,总务处主任保明。

学校开始住盱眙县大通镇附近的曾家营,后迁至大通镇西部的乌家营,全校100多人都住在一个姓邬的地主家里,有30多间房子作为师生的宿舍,三间大瓦房作为教室。

在战争期间办学,对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全校成立一个大队,大队长何秋征,副大队长赵迪。大队下面编为四个区队,区队下面分设小组。集中上课,分组进行学习讨论。

全校140名师生员工,大部分来自津浦路东宣教团,训育处主任张泽易,原来就是路东宣教团团团长,宣教团的艺术骨干担任专业教员。宣教团的团员则成为学校的学生,也有少数学生来自新四军五支队的战地服务团,另外就是各地前来求学的知识青年。

学校开设戏剧、音乐、美术三门专业课,但学员不分专业,三门课程都学,100多名学员集中在一起上大课,每个学员根据自己的

条件和爱好,在个人作业和课外实习上则有侧重点。

在学习内容上,政治课主要是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时事政策等。音乐课是从教简谱入手,教《作曲法入门》;同时结合当时形势,教唱《流亡三部曲》、《黄河大合唱》等具有时代精神的革命歌曲。美术课侧重教写美术字、画漫画等实用美术,也教点素描。戏剧课也从实用着手,教学员调配化妆油彩,为各种不同类型和性格的人物化妆的基本技法。教师现场示范,挑选不同脸型的男女学员,当场为他们造型,化妆成不同性格的各种类型的角色。总之,教学的特点是从当前工作需要出发,紧密联系实际,以实用为原则进行授课。教师讲课后,当场指定学员轮流实习和操作。这种教法,很受学员们的欢迎。

淮南艺专除教学外,很重视排练演出的实习活动。除排练演唱《黄河大合唱》、《农村曲》等歌剧外,还排练其他音乐、戏剧节目,如排演反映德国共产党党员反法西斯斗争的大型话剧《自由万岁》,在淮南根据地演出,产生了很大影响。

淮南艺专还利用暑假,把全校师生编成十个分团,分赴各县农村进行实习宣传演出,暑假后再返回学校继续上课。

艺专第一期学员于1941年8月结业。根据淮南路东区党委宣传部的指示,将学员组成一个总团,八个分团,一个美术队。总团归区党委领导,分团归各县领导。分赴各地进行宣传演出活动。总团则对分团进行指导,交流经验,帮助解决困难问题。

1941年秋,淮南艺专开始办第二期,学员近百人,学校仍分戏剧系、音乐系、美术系三个系。为配合教学,教师创作了《盘查哨》、《三江好》等小歌剧,创作的新歌曲有《我们一定会胜利》、《中苏人民对口曲》等。

淮南第一届学生运动会在艺专驻地邬家营召开,有淮南联中、财经训练班,淮南艺专等校参加。淮南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刘顺元、方毅、李世农出席大会。艺专教师特地为运动会作了会歌(张

泽易作词、莫明作曲)。运动会期间,艺专师生演出了德国话剧《自由万岁》和苏联《古堡之暮》,还演唱了《抗敌歌》、《胜利进行曲》等革命歌曲。

1942年春节过后,艺专第二期学员结业。毕业学员分配淮南路东大众剧团,大众剧团由一个团改为两个团,还有些学员分配到各县工作。

淮南艺专在1942年春又开办第三期,招收学员200多人,校址迁至张洪郢,后因战争环境紧张,提前结业而停办。

十、苏中四分区专门学校

苏中四专校的全称是苏中第四分区专门学校。这是一所苏中四分区培养革命和建设人才的学校。

1944年冬,四分区的反“清乡”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处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为了培养一批政治、文化素质较高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人才,1944年末,苏中四地委和四专署决定筹办苏中四分区专门学校,简称四专校,以原四分区联合中学高中部为基础,由四联中高中部教职员负责着手筹建工作。

学校采取公开招生和县、区党政组织动员推荐相结合。招收对象以青年学生为主,文化上要求中学程度或同等学历,对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入学文化程度可适当放宽。

地委要求将四专校办成抗大式的学校,既学政治,又学业务,以教学为主,结合进行军事训练和生产劳动,努力办成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学校。

地委决定将校址选在东台沿海的陆子苴,利用盐垦公司空着的仓库开大会,上大课,学生则住在周围群众家里。

学校校长由老教育工作者孙蔚民担任,原四联中的教导主任高景芝任教导主任(高调走后,由马友白接任),许淦任生活指导处

主任兼任学校党支部书记(许调走后,由裴定接任)。地委陆续调给学校一批干部,任学校各部门和学员队的干部。

学校公开招生不久,从根据地和敌占区四面八方来了许多学员,与原四联中高中部学生一起编队,全校学员编成三个队,分别由辛夷、易斌和顾瑜、顾克英任正副队长,后来吴遐、林晴、李辛之、李振平等又陆续调来加强各队领导,任各队队长。

1945年春节后,学校在陆子直举行了开学典礼,学员经过五个多月的政治学习后,开始按业务专业重新编队学习。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部队和地方都急需大批干部,学校决定抽调60名学员组成政治队,由顾瑜带队,转军分区分配工作。随后又抽调100多名学员组成工作队,由李振平带队转到地委组织部分配工作。余下的学员分成工商队和会计队继续学习,由易斌和吴遐分任队长。就在这时,四专校又进行第二期招生。招收新学员100多人,组建为四队,由顾克英任队长。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地委和四专署领导机关转移到如皋县(今如东县)掘港镇,四专校跟随地专机关迁到掘港镇的胡家园,在这里又招收了一批学员,组建学员第五队。

四专校是一所抗大式的学校。教学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进行政治学习,除进行国际国内形势教育外,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第二阶段是进行革命人生观的教育,正确处理家庭、恋爱、学习、工作、苦乐、生死等问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工商队和会计队还进行专业学习,专署财经处长马一行、工商局长金逊经常来校讲课。政治队还专门进行军政训练,然后转到军分区分配到各连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和文化教员工作。有的分配到县、区、乡政府参加地方工作。

学校学员都享受供给制待遇。过着军事化的集体生活,以队为单位每天出操(星期天除外),进行军事训练,还要参加生产劳

动,开荒种菜,集体养猪,以改善伙食。学校的文娱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生动活泼。还经常排一些小戏和各种文娱表演,常向当地群众宣传演出。

1945年10月下旬,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华中行政区划有所调整。12月前后,苏中三、四地委合并,成立苏皖边区一地委;苏中三、四专署合并成立苏皖边区第一行政公署。这时的苏中公学,为了迎接新时期的到来,决定扩大招生,并请示苏中区党委的同意,在苏中一分区建立苏公分校,苏公分校是由原四分区的专门学校和原三分区的联合专门学校合并成立的。至此,四专校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十一、苏中一分区建设专门学校

1945年春,苏中一地委和一专署决定创办建设公学,培养建设根据地的干部,并在高邮县甘露进行筹备。4月初迁至环境比较稳定的宝应县郑家渡正式开学,并改名为建设专门学校。

建专校长由专员韦永义兼任,专署教育处长沈维岳任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还将专署人民剧团并入建专,作为骨干。先后聘请了知名度较高的谭亚成、朱白齐、张汉文、周文华等担任教师。学员大部分是本地区的,也有江南根据地北撤过来的,还有来自敌占区的,有在职干部,还有由县、区保送的知识青年,共约百人,编成两个队。

建校初期,未分专业,课程设置主要是进行政治、文化课基础教育。政治课的内容,主要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以及俞铭璜的《新人生观》。讲课的方法主要是上大课,专员韦永义、地委副书记俞铭璜多次到校作过报告。大课之后分小组组织学习讨论。文化课分班上课,讲授部分中学课程。

学校学习坚持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从出早

操到晚自习,遵循抗大的集体生活制度。饭前和部队一样,先站队、唱歌,后就餐。每周按组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学校师生都实行供给制待遇,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学生入学发给毛巾、肥皂、牙刷。伙食标准包括油、盐、酱、醋、米全部在内,约为一斤多大米一天,每天保持一干两稀的生活水平。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学习热情很高,充满着革命乐观情绪。

在战争年代,地方党的基层组织不公开,建专的党组织亦如此。除了积极慎重地个别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外,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解放队,青解队的活动也不公开。

建设专门学校在培养干部的同时,根据形势需要,不断为地委、专署输送各类干部。日本投降前后,曾从学校抽调一批学员组成工作队,开展城市工作。当年九十月间,地委、专署决定,将学员分别编为财经干部班、文教干部班和初中班。不久,又以建专初中班为基础,组建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校址迁至高邮县临泽镇。建专本部迁往兴化,后又迁至高邮城。1945年底和1946年初,学校又接受了一批从苏南北撤到江北的干部入学,学员人数扩大到近200人。专署任命苏南来的县级干部顾维衡为建校副校长,童时晓为教导处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原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建立了苏皖边区政府。原苏中一专署改称为苏皖边区二专署,一建专也改称二建专。孙蔚民任二专署教育处长兼建专校长。

1946年夏,解放战争开始后,建专师生员工分赴各战斗岗位,仅保留教干队,后撤至高邮东部农村一带,10月份,教干队并入二联中,建专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十二、苏中三分区联合专门学校

1944年春,日伪军集中兵力对苏中地区进行“清乡”、“扫荡”,

斗争形势十分紧张。苏中三分区(包括泰州、泰县、如西、靖江四县)的中学和师范学校遇到很大困难,难以坚持正常教学。为了对付日伪军的“清乡”、“扫荡”,三专署决定把两泰的乡村师范、高级师范和其他中学的高中部合并为三分区联合师范学校,由三专署专员刘伯厚兼任校长。学校有教职员 600 多人,为了避开敌伪“清乡”、“扫荡”,学校迁往一分区宝应县办学。学校迁到宝应县后,由刘季平兼任党总支书记,李承烈任总支副书记。学生除学习政治、文化和师范专业外,还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做群众工作,学校办了半年多,为三分区培养了近 600 名干部。

1944 年下半年,苏中三地委决定将三分区联合师范学校改为三分区联合专门学校,仍由刘伯厚兼任校长。学校设政治、生建、民武、师范、财经五个科。除吸收各种基层下部外,又公开招考了一批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

学习内容除共同的政治课选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以外,主要按五个科的各自专业,进行有关业务知识教育。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三地委又决定将“三联专”改为苏中三分区干部学校,调训在职干部和专业人员,仍由专员刘伯厚和分区司令员陈玉生兼任校长,蒋峻基任副校长。设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等班,并设预科一班,公开招考初中毕业的知识青年,毕业后再转入各种训练班。

以上从“三联师”到“三联专”再到“三干校”,名称虽有不同,但都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学生均享受供给制待遇,毕业后均分配工作。

十三、苏皖边区财经干部学校

1945 年 11 月,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培养解放区财经管

理干部,于1946年初创办了财经干部学校。任命陈先为校长,宋达之为副校长。学校主要是培养会计人才,分设政府会计、银行会计和商业会计三个班,有学员300多人。学习内容主要是会计知识。

学校开学上课才三个多月,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学校乃转移到淮阴附近的农村办学。1946年秋天,苏北地区形势十分紧张,边区政府决定财经干校北移山东,与边区行政干校同时北移。到达山东后,先是在鲁南地区进行学习。但到1947年初,国民党又调集兵力重点进攻鲁南地区。3月初学校跟随华中建大之后向胶东解放区转移。1947年4月,转移到胶东的海阳县。根据华东局的指示,将苏皖边区财经干校并入华中建设大学,成为华中建大的财经系,受建大和华东财办领导,培养财经管理干部,为解放战争胜利后的经济建设做准备。财经系的系主任是陈先,副主任宋达之兼系党总支书记。学生仍编为政府会计队,银行会计队和商业会计队。学习内容除了进行时事政治教育外,主要是较系统地学习业务知识。

1947年9月底10月初,国民党军队向胶东地区进攻,华东局决定华中建大停办。财经系的学员也先后分配了工作,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十四、苏皖边区教育学院

1941年秋,在刘少奇的建议和支持下,在阜宁郭墅张庄创办了一所规模较大的盐阜联立中学。校长由县长宋乃德兼任,副校长许德良。这所学校实质上是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学校除普通班以外,还设师范部。1942年秋,联立中学的师范部划出,创建盐阜师范学校,由陆维特主持校务工作。学生100余人,在阜宁孟大关开学上课。1943年8月,盐阜师范迁至涟东锹营,1944年夏迁入

阜宁风谷村。学校也逐渐扩大,学生增至 200 余人,教师的数量也有所增加,教学质量也有所提高。

1945 年 11 月 1 日,苏皖边区政府在清江市(即淮阴城)成立,李一氓任边区政府主席,刘瑞龙、季方、韦恽、方毅任副主席。刘季平、白桃(戴伯韬)任文教处正副处长。1945 年 12 月,苏皖边区政府决定将原盐阜师范改为苏皖边区教育学院,院长白桃兼任,陆维特任教育长。学院暂设中等教育和教育行政两个系。学校也从阜宁风谷村迁至淮安。学校还附设实验学校和幼儿班。

1946 年 4 月 14 日,苏皖边区政府决定苏皖边区教育学院并入华中建设大学,名为华中建设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仍由白桃担任,陆维特任教务长,校址在清江。仍设教育行政和中等教育两系。另附设师范学校,由汪达之任校长,陶官云任副校长,校址在板闸。苏皖边区教育学院就此结束。

第七章 华中解放区中等学校

这里说的中等学校，是指华中解放区创办的中学和师范学校。在抗日战争期间，华中解放区创办和改造的中学和师范学校，虽属普通教育范围，但实际上是培养干部的学校。这些学校的学生一经毕业，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被地方政府分配工作。所以，笔者把这些学校也列入干部学校的范围，从中选择一部分加以介绍。

华中解放区濒临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大城市，文化教育相对地说比较发达，中等学校较多，但很不平衡。苏中和苏北地区的教育比较发达，而淮南淮北地区则比较差。华中获得解放的地区，急需培养大量的干部，除创办各类干部学校外，还利用原来的中等学校或新创办的中等学校来培养干部。这些中等学校包括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华中解放区却成了培养干部的学校。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以后，为了大力培训干部，刘少奇和陈毅不仅积极创办了杭大五分校和鲁艺华中分院等干部学校，而且还积极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中小学，特别是中等学校。1940年10月，刘少奇在苏中根据地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在深入的教育工作中吸引数百万基本群众与青年儿童，使他们不论在什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跟随我们走，那我们就要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1940年10月，新四军刚到盐城不久，陈毅就找地下党员曾任国民党盐城县十四区区长兼上岗中学校长的赵敬之谈话，要他筹备和恢复盐城中学。由盐城县县长贺希明兼任校长，宋泽夫任副校长，具体工作由赵敬之负责。1941年春正式开学上课。开学后陈毅还亲自来盐中对师生作了报告。

1941年7月,日伪军发动对盐阜区第一次大“扫荡”,盐城被迫放弃,盐城中学也解散了。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阜宁县停翅港,刘少奇找戴伯韬、刘彬、宋乃德谈话。他说:“你们要建立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要成立政府。这个地区,知识分子很多,青少年也很多,但学校已经星散。为了避免这些人流到敌伪地区去,或者流落到荡西摩擦‘专家’韩德勤那里去,或者向大后方跑,我们应该开办学,团结他们,使得他们有书可读,有地方可教书。首先希望你们办一所联合中学,要从初中一直办到高中,然后在每个县里办一所初中。教育这些青少年很重要,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依靠青少年。要巩固根据地,开辟根据地,要依靠他们;要看到他们有抗日进步的一面,他们是勇于接受真理的。你们没有人,军部可以调一些给你们,但主要是团结地方知识分子。对他们的待遇要提高一些,使他们可以赡养家属。我们拿供给制,刻苦一点为好。”^①

这次谈话以后,华中解放区的各级领导对恢复和创办中等学校开始重视起来,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原有的中等学校,创办新的中等学校,为培养后备干部创造条件。

华中解放区的中等教育发展很不平衡。戴伯韬在《华中教育的一般概况报告》中曾经这样说:“华中各地区人民生活状况和文化水平不同,因此各地中学的发展也不平衡,课程内容和学生程度也参差不齐。一般说苏中和苏北地区的教育比较发达,旧中学多,知识分子多;淮南和淮北地区则比较差,各地区中学的发展和改造的道路也不相同。”

华中解放区的苏中、苏北的教育比较发达,仅苏中地区就有各类中等学校70余所,苏北地区也有10余所,刚解放时,这些学校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政治倾向。一些学校受到国民党的控制,但大多数人拥护抗日,不甘心做亡国奴。因此,党的政策是对

^① 戴伯韬《为纪念重建新四军军部四十周年而作》,盐城新四军纪念馆收藏。

这些中等学校实行改造的政策,对学校的教师实行争取团结教育的政策。对中等学校的改造方法主要是:第一、对国民党办的公立学校和有党派背景的私立中学,采取逐步接管的方法;第二、对于无明显党派背景的私立中学,采取认私为公的办法;第三、对于一般的私立中学,采取私办公助的办法,在师资、经济上予以适当资助;第四、对一些特殊的学校(主要是办校人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则保持其原样,但派进步的教师进入学校,逐步掌握学校的领导权。

中等学校改造的关键问题是正确执行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争取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积极转变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政治上予以信任,在工作上予以重用,在生活上予以照顾。对于有条件的中学则派政治思想强、工作作风好的干部去加强领导,把它改造成为培养干部的学校。

这样,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华中地区先后恢复和创办了 80 余所中等学校,其中 70% 在苏中地区和苏北地区,淮南和淮北地区的中学多系新办。由于抗日根据地干部缺乏,绝大多数中学都以培养干部为主,以适应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当时到中学上学的学生一律不缴学费,甚至连伙食费也不缴或少缴。其经费来源,一是政府补贴,二是学校组织生产。至于师范学校是全部免缴一切费用。

抗日根据地的中学和师范学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学校,而是一种抗大式的中等干部学校,它们都是实行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方针,采取抗大式的教学方法,直接担负着培养抗日人才的任务。

1948 年召开的华中教育会议,进一步重申了今后华中解放区中等学校教学的方针,“应在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的目的下,大量培养与改造知识青年,使他们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和当前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所需要的各种干部和人才。”可见,中等教育

从华中解放区建立政权初期一直到建国前，一直担负着培养干部的任务。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地区开办的中等学校较多，这里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以培养干部为主要任务的中学和师范学校分别介绍于后：

一、苏中四分区联合中学

苏中四分区的联合中学，简称“四联中”，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在苏中抗日根据地创办的一所抗大式的培养干部的新型学校。它经历了栢茶中学——二联中——四联中三个发展阶段。

1943年下半年，日伪军在我苏中地区南线南通、如皋、启东、海门地区进行“清乡”，致使在这一地区的学校无法上课。苏中区党委决定将这些地区的中学转移到北线二分区东台县继续办学。1943年夏，二地委、二专署决定，首先将“清乡”区的栢茶中学迁至东台县三仓区古鲁乡鲁灶庙，坚持敌后办学。校部设在鲁灶庙内，办公室、教室大部分利用原来的旧庙房，一部分教室是借的鲁灶庙附近地主家的房子，学生分散住在群众家里。学校住定后开始招生，学校设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简师、速师各一个班，共200多人。

栢茶中学的校长何晴波，教导主任兼党支部书记高景芝（女）。何晴波早年投身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擅长诗文，尽心教育。高景芝是东北人，1936年的清华大学毕业生，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她分工抓学校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教师中党员有徐静渔、尹卜甄、施子扬。徐擅长古典文学，造诣甚深。给师范班上语文课，讲高尔基的《海燕》，形象生动，深受学生欢迎。尹卜甄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社”的成员，她在担任速师班班主任时，给学生讲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教

育即生活”和“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施子扬文学造诣甚深，给普通班讲语文课，很受学生欢迎。

1944年春，因日伪军继续“清乡”，四分区的邱升中学、如皋中学一院、如皋中学二院和紫石中学，又先后迁至鲁灶庙，和耕茶中学合并，改名为二分区联合中学，简称“二联中”。原校长何晴波调出，由原邱升中学校长顾祝予任校长，高景芝仍为教导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罗洛为生活指导部主任，副主任裴定。高中部负责人刘笃，师范部主任徐静渔。顾祝予是晚清举人，知名人士，治校有方，是我党统战对象。国文、英语教师吴景陶，系1932年清华大学毕业生，为抗日救国，不畏艰险随邱升中学来到四联中任教。数学教师吴遐，大学尚未毕业，为投身革命来到苏北，后到二联中、四联中教学。语文教师顾尔盖、数学教师纪汉光、朱经之、地理教师陈长坤、杨得心，历史教师罗云昭、生物教师吴北晨等都是热心抗日救亡运动的大专毕业生。负责学生管理工作的有裴定、林琳、雪友等。

由于几所中学合并，学生人数增加较多，有十多个班，学生达300多人。

1944年11月，苏中区域调整，东台县划归四分区。学校又改名为四分区联合中学，简称“四联中”。不久，从原四分区又转移来了南通中学、东南中学的师生也并入“四联中”。有些敌占区的学生，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辗转来到四联中来读书，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学生最多时增加到900多人。鲁灶庙周围五公里的学生为走读生，外地和本地离校较远的学生为寄宿生，都分别住在学校周围的群众家里。无论是耕中、二联中、四联中，学校生活都比较艰苦，学生大部分睡草铺，多数班级上课没有课桌，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一张小板凳、一块木板，凳子和木板均用绳于系上，可以背在身上，上课时带进教室，木板放在腿上做桌子，下课时各人带回宿舍。有时因情况紧张，就在野外上课。师生还要开荒种菜养猪，以改善伙

食。学生吃饭排队唱歌,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师生关系亲密无间,同甘共苦,尊师重教,教学相长,体现着新型的师生关系。

从耕中、二联中到四联中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办学,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实际,配合党的工作进行教学,并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多样的社会宣传活动。如组织冬令营、夏令营,举办识字班,参加乡学工作。学校为了配合减租减息运动,专门编排了有关“二五减租”的文艺节目在农村演出宣传。他们还排演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话剧《夜正黑》和动员参军的小戏《叶兰英劝夫参军》等节目,在农村进行演出,引起了强烈反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从耕中到二联中到四联中是苏中区党委和苏中行署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各级领导对这所学校非常重视,十分关心,苏中军区司令员粟裕、行署主任管文蔚、二分区专员陈扬、四分区专员梁灵光、苏中区党委宣传部长俞铭璜等都曾经先后到校给师生作报告。1943年鲁迅逝世七周年时,《苏中日报》社长兼总编林淡秋专门来校作了介绍鲁迅先生生平的报告。

在耕茶中学时期,学校开始设党团(相当于党委会),党团书记高景芝,党团成员先后有何晴波、徐静渔、林琳、王本英等。党团下设甲、乙两种党支部。甲种党支部两个,教职员党支部书记徐静渔,学生党支部书记罗洛,乙种党支部1943年9月成立,它是在学生中建立的一种秘密党组织。主要任务是:①了解落后学生政治面貌,掌握敌特活动情况;②学习党内文件,坚持抗日救国;③发展乙种党员,参加抗日活动。乙种党支部对外严格保密,由地委秘密工作部特派员黎溯岩直接领导,特派员与支部书记、支部书记与党员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党员之间互不了解,与甲种支部不发生任何关系。普通班的乙种支部第一任书记是万洵,第二任书记是朱宝谷。党员有缪子江、万国富、鲁天民、万里程、陈文璜、陈亚明、张复等。简师班的甲种支部党员有潘祝平、朱卫中。速师班的乙种党员有林子秋、薛太和、朱兆玉,直接与地委秘密工作部联系。1944

年四联中的乙种支部与甲种支部合并,党员转至甲种支部过组织生活,学校党组织全部公开。全校设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先后是裴定、朱可常。

从栟中到四联中,为了做好青年学生工作,学生中先后建立了两种组织:一种是从栟中开始,建立了学生自治会,设主席,为学生的自治组织;一种是1944年初建立的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先锋队,它是联系学生,发展壮大进步力量的一种形式。

从栟茶中学的创建到二联中、四联中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鲁灶庙建校初期充满了激烈的斗争。学生中的进步力量逐步壮大,但混在学生中“三青团”骨干分子也日益猖獗,伺机捣乱。1943年底,学校师生为纪念“一二·九”学生运动,学校决定放假一天以示纪念。但遭到学生自治会主席、隐藏在学校内的“三青团”骨干分子蔡晶雷为首的一伙人反对,要求放假五天,停课练歌排戏搞纪念活动。当他们的无理要求被学校拒绝后,他们在各班搞串连活动煽动罢课。高三和初三的学生大都参加罢课,师范部的全部师生则坚持上课。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由师范部的潘祝平、朱卫中等党员带头团结进步学生与他们进行了斗争。先后闹了近十天时间的罢课风波终于结束。复课后改组了学生自治会,选举师范部的潘祝平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并对蔡晶雷以留校察看处分。蔡晶雷后来擅自离校回家,解放战争期间当了还乡团的骨干,被我政府镇压。

这次罢课风波,惊动了苏中行署、二专署和东台县三级党政领导。复课后,苏中行署文教处长刘季平、二地委书记陈扬、东台县委书记胡辛人、县长董希白先后到校了解情况并对师生讲话,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从栟中到四联中是苏中四分区培养干部的一所抗大式的干部学校,它不断地向外输送人才。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分配了工作,有的参加民运工作队,做群众工作;有的参军参战,到

部队工作；有的充实到区乡地方政权和到县级机关工作；有的从事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四联中创办三年时间，先后为党培养输送了 2000 多名干部，许多人成为建国后各条战线上的领导骨干，有的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苏中四联中不愧是苏中地区的一座革命熔炉，是培养输送革命干部的摇篮。

二、界首乡村师范学校

界首乡村师范是苏北地区小有名气的学校，创建于 1924 年，学校位于苏中一分区运河线上的界首镇。1937 年 10 月与其他师范学校合并。1945 年秋，一批“界师”老校友王开文、蔡公正等人向苏中一地委、专署建议，重建界首乡村师范。地委、专署十分重视，决定以建设专门学校的初中班为基础，重建界首乡村师范学校。

1945 年 11 月 16 日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界首乡村师范学校在宝应县郑家渡正式建立（苏皖边区政府成立后，将苏中第一行政区改为第二行政区），后又迁到高邮县临泽镇。二专署任命朱白吾为校长，陈六中为教导主任。先后到校的学员有 70 多人，分为两个班级，于 11 月 26 日开学上课。

“界师”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的优良传统。到临泽镇后，先住何家大楼，后迁到临泽西南角的净土庵、崇宁观中，又将关帝庙、文昌阁扩为教室，经过师生自己劳动，教学、生活条件有所改善。

“界师”是二地委、二专署在抗战胜利后培养革命建设人才与师资力量的一所初级师范学校。课程设置较全，基础课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政治课讲授《民主建设讲话》，历史课讲授《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教育课讲教育概论。还有劳动课、音乐课和艺术课。

“界师”的党支部是不公开的，以生活指导员的名义开展思想

政治工作,培养发展党员,开展各种群众性的活动。

学生按年级编成班、组,过着集体生活,按时出早操、就餐、学习及活动。每周按组开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学习的自觉性。不久又成立了俱乐部,搞好生产、生活,开展文体体育活活动。

学校围绕各项中心任务,组织学生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如庆祝抗战胜利、庆祝高邮城解放等,全校出动,参加提灯祝捷游行和群众庆祝大会。学员们还利用晚间在临泽镇儿童团、妇女班、店员班分别宣传时事、反对内战,学文化教唱歌。还参加了临泽镇的禁烟活动。暑假期间,有些学员分别参加了当地支前、反奸、土改等活动。全校呈现出一片生动活泼的局面。

第二学期开始,教室迁到关帝庙、文昌阁后,宽敞明亮得多,校内各种集会都在关帝庙大殿内举行,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学校都举行庆祝活动。五四青年节那天,校长朱白吾在两天前就绘好了一幅北平简图,挂在会场墙上,他在作五四运动重要意义报告时,绘声绘色地讲述他1919年在北京亲自参加集会游行、反对“二十一条”、火烧赵家楼,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的经过,来宾和学生代表也讲了话,决心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为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而奋斗。

“界师”学员全部享受供给制,生活较艰苦,吃饭无餐厅,大家就地围着菜盆就餐。1946年春,为了支援前线,菜金减发,就发动学生生产自给,开荒种菜,自己养猪,以改善伙食。

“界师”是二专署直属的学校,其筹建、教学、生活都是在专署副专员杜干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二分区司令员韦永利、专署副专员杜干全、专署文教处长孙蔚民都先后来校视察,给全校师生作报告。

1946年下半年,解放战争开始后,由于形势的变化,二专署决定“界师”与江都中学、高邮中学合并为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联合

中学，“界师”也就宣告结束。

三、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联合中学

解放战争开始以后，我军在苏中地区虽然取得了七战七捷的巨大胜利，但随着我军的北撤，苏中地区的形势相当严峻。因此，苏皖边区二地委和二专署决定，将界首乡村师范与高邮中学、江都中学合并为苏皖边区第二行政区联合中学（简称二联中），校址暂驻临泽镇。任命专署教育处副处长鲍汗青为校长，朱白吾、符天游为副校长，陈六中为教导主任，孙锋为党支部书记。

二联中开始时设初师班，由原“界师”学员加上新招收的和高邮、江都两中学合并过来的学员按文化程度编为三个班级。后来江都县简师班并入后即为“二联中”简师班。这时全校学员100多人，大部分为干部子弟、烈军属和知识青年。他们入校后皆过供给制生活。9月16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鲍汗青校长在讲话中要求学员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化素质，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不久，我军主动放弃沿运河城镇后，敌人又继续向运河东部地区实行“清剿”，形势更加紧张。专署决定“二联中”立即从原地撤至兴化、盐城交界处进行游击教学。9月24日全校师生分乘数十条小船离开临泽镇，前往兴化县农村，开始过着敌后游击教学的艰苦生活。28日到达兴化县唐港区，初师班驻周良浩村，简师班驻李冀庄。不久，原二专区“建专”撤销，其教干班也并入“二联中”。10月中下旬，宝应中学、兴化中学，也先后撤出县域，为便于领导，避免损失，11月下旬，专署决定全区各中学都并入“二联中”，并重新调整领导人员和班级设置。由专署教育处长孙蔚民兼任校长，鲍汗青任党总支书记。分设教干班、中教研究班、初师班、简师班四个班。

1946年10月30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台县城，不久又占领兴

化,形势进一步紧张。专署令学校北撤至盐城县境内,后撤至建阳、阜宁一带,不久我军主动撤出盐城,涟水又相继失陷,苏北主要城镇及交通线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地委、专署于12月22日决定“二联中”随地委、专署北撤山东。部分老弱教师和干部家属到阜宁东部地区打埋伏。全校师生在年过花甲的孙蔚民校长带领下,冒着敌机的扫射,辗转在敌人的包围圈中。结果北撤未成,专署又决定“二联中”回二分区坚持游击教学。只有年龄较轻、体力较强的教师约20人,由郭建兰、陈六中带队北撤去山东驻滨海地区的华中行政干校。其余师生返回二专区后,分为两部:兴溱分部在兴化、溱潼县境内活动;高宝分部在高邮、宝应县境内活动。由教师带队,分散吃住在群众家里。在此期间,因战争需要,部分学员被调到运河部队卫生队学医和二连队当战士与敌作战,学员张济、徐民秀、邓祝三、耿长柏同志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7年初,我军在山东战场先后取得了鲁南、莱芜两大战役的胜利,迫使苏中、苏北的敌人只能守住交通沿线,广大农村逐渐又掌握在我们手中,特别是盐城、兴化、宝应三县交界地区敌人更是无能为力。到3月中下旬,“二联中”高宝、兴溱两部先后分别集中教学,各编成两个年级上课。到7月中旬,两部转移到盐城县的浦顾庄会合,正式合并上课。校长仍由孙蔚民兼任。学员重新编班分组,分为初一、初二两个班级教学。不久,学校又返回兴化县的孙定村。学员们经受了紧张环境的磨炼,战斗生活的洗礼,在思想觉悟、政治素质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为树立革命人生观打下良好的基础。

1947年夏季以后,随着刘邓大军挺进中原,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整个战争形势开始好转。苏皖二分区大片地区获得解放,并开始了“土改复查”、“三查三整”运动,学校师生也投入这些运动,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为

了培养更多的区、乡干部，专署又建立了工农兵学校（后改为干部学校）。到12月中旬，专署决定将“二联中”并入工农兵学校。原学员中年龄稍大的调离学校分配工作，年龄较小的编为工农兵学校第四队。至此，“二联中”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任务。

四、盐阜联立中学

盐阜联立中学是在刘少奇倡导下创办的。1941年秋，刘少奇在阜宁乡下约见白桃，刘彬和宋乃德谈话，提出要争取团结地方知识分子，使他们有书可读，有地方教书，希望创办一所联合中学。盐阜区党委根据刘少奇的指示，进行积极筹备，于1941年9月在阜宁郭墅张庄创办了一所盐阜区联立中学。它虽然名为中学，实际上是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校长由盐阜区行政公署主任宋乃德兼任，副校长许德良，生活指导部主任林珏，副主任赵敬之，社会服务部主任顾崇实、师范部主任朱泽甫（后陆维特）、总务部主任顾迺湘（女）。

为了办好这所学校，选择校长很重要，需要在教育界有声望的人士当校长。当时有一位原中央大学毕业生，曾在盐城中学任教导主任的江重言。他一方面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另一方面对共产党又心有疑虑，因而在家观望等待，不愿出来工作。盐阜区行署主任宋乃德曾三次亲自登门邀请江重言出任联中校长，前两次都被他婉言谢绝。学校开学后，宋乃德第三次登门邀请江重言出山，江终于为宋乃德真诚所感动，欣然应允，不久，宋乃德备马送江重言到校赴任。宋乃德“三请江重言”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联立中学的师资力量比较强。担任副校长的许德良是建党初期的老党员，长期在上海地区及上海大学从事学运工作，在知识分子中有较高的威望。担任生活指导部主任的林珏毕业于北师大，“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先后担任师范部主

任的朱泽甫、陆维特，均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学生，是生活教育社的主要骨干。当时学校人才济济，师资力量雄厚。

学校设高中部、初中部和师范部，有学生四五百人。同时在张庄还办了一所实验小学，陆维特兼任校长。

1942年1月，盐阜联立中学决定举办艺术专修班，分文学、戏剧、绘画、音乐等班。同时增设职业教育科，分测量、会计、文学、工业四组。为了贯彻“教学做合一”的办学宗旨，先后筹办了纺织和造纸厂，使学生边学习边实习，能够学到实际技能。1942年，联立中学按照盐阜行署的决定，将职业教育科正式划出，单独成立盐阜职业中学，校长江国栋。

学校在寒假期间还组织服务团，在农村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服务团由顾崇实担任团长，团内分文艺、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组，每组皆有专职教师领导，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1942年秋，因敌人准备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行署决定联立中学采取分散教学的办法，分为季庄、射东、吴滩三个补习团坚持教学，设在射阳县吴滩区的初中补习团计有四个初中班，学生170余人。设在射东的补习团则有高中部，设在东季庄的补习团也有数十人。直至1944年2月，日本侵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结束后，三个补习团又集中到阜宁县空寺阴庄，开始复课，师生达500余人，教职员工近100人。学校为了实行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立了附属肥皂厂和纺织厂，化学教师徐以达任厂长，生产肥皂，并搞土纺土织。由于生产搞得很有成绩，在1944年盐阜区召开的劳模代表大会上，徐以达在这次大会上获得“模范生产者”的光荣称号。

1944年2月，盐阜区联立中学改名为盐阜联立第一中学，仍由江重言担任校长。另在阜东县蔡桥东墩，由新滩补习团和五汛补习团合并组建盐阜区联立第二中学，校长由阜东县县长冯梯云兼任，生活指导部主任罗芒（钱君洪）。

1945年8月初,苏北行政委员会为了培养新民主主义科学建设专门人才,改一联中为苏北工业专门学校,设土木工程、化学工程、电器机械三系;改二联中为苏北盐垦专门学校,设农业、纺织、盐业三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9月两淮解放,盐阜师范、苏北工业专科学校迁至淮阴板闸和清江市。

1945年11月1日,苏皖边区政府正式成立。12月,苏皖边区政府决定将原盐阜师范改为苏皖教育学院。次年4月,边区政府又决定将苏皖教育学院并入华中建大,名为华中建设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由白桃担任,陆维特任教务长,校址在清江。内设教育行政及中等教育两系。另附设师范学校,由汪达之任校长,陶官云任副校长,校址在板闸。同时,苏北工业专科学校也并入建设大学,改名为华中建大附中,校长仍为江重言,生活指导部主任李庚,副主任李克。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向苏皖边区进犯,建大附中被迫转移到运河北岸农村教学。不久,建大指示附中随建大向山东北撤。江重言校长和徐以达老师负责留守,他们也带领部分师生员工向苏北撤退,后来在阜宁县招收新生400多人,继续坚持办学。

五、盐阜联立第二中学

盐阜联立第二中学于1944年春创办。校长由阜东县长熊梯云兼任。校址设在阜东县东墩子。熊梯云原是上海暨南大学的毕业生,1942年回盐阜抗日根据地参加领导抗日武装斗争,任阜东县长。他服从组织决定,兼任联立第二中学校长。决心办好以培养干部为目的的联立第二中学为己任。处在敌人严密封锁、经费相当困难、校舍和教学设备全无的情况下,他以亲戚的关系,向左姓地主借了三大院落30余间瓦房作为校舍。他无偿捐献自家的

许多田地和财产资助办学。又向开明绅士募捐借贷,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因陋就简地在1944年办起了联立第二中学。

熊梯云在建校之初就提出要打破旧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进行一系列改革,向旧的教育章程、体制、方针、内容开刀。提出了“以生产养学校”、“以劳力换智力”的办学方针。用自己的劳动来解决包括伙食费在内的一切费用。

为了解决学生的吃饭问题,学校向开明绅士募捐到十几顷长草不长粮食的海滩,虽然远在海边,可是每年师生劳动收割的茅草,除了供给学生食堂做燃料以外,还可以卖掉一部分换回一些粮食。学校还在附近搞到五亩地,种上瓜菜,解决了吃菜的问题。另外又向政府贷了一些钱,办起了手工业造纸工场、织布工场和磨坊,这样就勉强维持100多人的伙食。

学校上午很安静,大家都在上课,一到下午,学校里就热闹起来了。磨坊里的筛面声,织布工场里的织布声,吱吱咯咯,响成一片。学校院墙外糊满了造纸工场生产的土纸,所有较光滑的墙都成了晒纸墙。地里,上粪的,浇水的,来来往往,也是一片忙碌景象。学校请了两位技师教学生造纸和织布技术,学生白天仔细观察技师的操作,晚上开夜车自己练习。在小菜油灯下,他们学习捞纸、织布、浆纱,经常弄到深夜。同学们以极大的热情、毅力和耐心,终于逐步掌握了技术。

二联中办学是处在敌后的游击环境中,因而对学生在日常生活管理体制上打破了年级和班主任管理体制,实行组织管理体制军事化。全校成立一个大队,各个班级成立中队,每8—10人为一组,在学生中产生大队长、中队长和组长,每周由中队长轮流值周,协助学校领导管理学习、生产和生活。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一早就起床出操,进行基本的军事训练,有时在夜里还进行紧急集合,进行军事演习,以增强敌情观念,加强组织纪律性。在战争环境中,敌人经常下乡“扫荡”,在反

师范科从联立中学划出,单独成立盐阜师范学校,陆维特任校长兼支部书记,严峰任生活指导员兼支部青年委员。学生 100 余人。地址在阜宁孟大关,1943 年迁至涟水锹营。1944 年又迁至阜宁凤谷村。这时学校开始恢复招生,校长为江国栋、副校长为陆维特。1945 年 11 月,苏皖边区政府正式成立。12 月,苏皖边区政府决定将原盐阜师范改为苏皖教育学院,学校也迁往淮安。

在盐阜师范迁入淮安不久,1946 年 3 月,苏皖边区第五行政区(原盐阜区)重新成立区立师范学校。开始这所学校校址设在阜宁城区。解放战争爆发后,该校解体,继由苏皖边区第五行政区区立中学师范部及后来的苏皖边区第五行政区高级专科学校师范部承担师资培训任务。直至 1948 年 3 月,又在高级专科学校师范部的基础上,重建区立师范学校,校址在建阳县秉文区东进庄。学校设有初师班、高师班、教育行政班。同年下半年,又易地至建阳县秉文区陈村重新办理。这时,学校设有师范部、初中部、师训部,共 12 个班级,学生 440 多人。另外还在学校附近开办了一所实验小学,供师范生见习、实习之用。1949 年底迁往淮安,易名为苏北淮安师范学校。

七、淮 涟 中 学

苏北淮海地区的淮涟中学是在淮海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不到一年的 1941 年,由淮海区党委、淮海行政公署决定开办的。校址选择在涟水县境内的丁庙。它是原涟水县中的校址,有校舍 40 余间。

淮涟中学第一位校长是朱润农。教职员多数是当地的中小学教师,也有少数是上海等地来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开学以后上级党委又派俞谦来校任政治指导员,并任党支部书记,以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

经过考试录取入学的第一批学生 200 多人。他们来自根据地的涟水、淮阴、灌云、涟东、滨海等县。全校分为四个年级,初一两个班 140 多人,初二班 50 多人,初三班 30 多人。1942 年又先后招收学生 100 多名,总数达 300 余人。他们大都是上过一、二年中学的,也有少数是从敌伪区来的。

为了满足青年人学的要求,1942 年春,又在离丁庙五里远的苗荡设立分部,招收春季班学生 130 人。1942 年秋季除校部招收两个班外,又增设 60 人的补习班,这时学校教职员工 30 余人,学生总数达 400 余人。

淮涟中学是一所新型的中等学校,也是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它是团结争取青年和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因为这所中学办起来以后,既把一批闲在家里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为根据地培养人才出力,又争取团结了根据地的广大青年学生,使他们有书可读,有学可上,打消了他们想到大后方和敌占区去读书的念头。更重要的是为根据地培养党、政、军、财、文等各个方面的干部创造了条件。

淮涟中学办学的方针宗旨,在招生广告中明确提出:为培养造就抗日民主根据地各方面干部,以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根据这一宗旨,学校采取开门办学方针,学校与社会密切联系,改变了旧学校关门教书,脱离实际的现象。在校内组织了学生会,成立了救亡室(后改称俱乐部),有墙报组、歌咏队、戏剧组、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在校门口搭台进行文艺演出,组织学生到农村参加夏收劳动。还请当地驻军淮河大队长吴觉来校作苏德战场和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

在课程设置上,除文化课以外,增设政治理论课,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是一门主要课程,通过讲课和学习讨论,明确了党的抗日斗争的战略战术,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增强了抗战的胜利信心。

1942年1月,敌伪军对淮海地区开始了大“扫荡”,敌人到达学校住地了庙之后,对学校进行了很大破坏,并在学校周围地区安了据点。学校无法继续上课,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暂时疏散。经过大半年以后,形势虽有所好转,但集中办学的条件仍不具备,县委指示决定分散办学。1943年春夏之际,先后办起了六个分校,每个分校一般两个班,各分校设主任一人,教师数人不等。有情况时,各自回家,敌情解除,及时复课。

1944年春,随着时局的进一步好转,环境进一步稳定,县委决定相对集中办学,将淮涟中学与县境内的私立茂公中学合并,改名为涟水中学。校长由县长朱一苇兼任。下设三个分校,高中部按专业分班,除普通高中外,还增设一个师范班,一个行政班。师范班培养小学校长、教师;行政班培养区乡民政、财经干部。

学校还在高中部的学生中加强建党工作,党员约占学生总数的20%,这些学生很快被党政机关抽调出去当干部了。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涟水中学改称淮海区第一中学,朱润农、张景文任正副校长。1946年自卫战争开始后,学校师生分别参加支前工作。涟水战役以后,上级通知学校随军北撤山东。总计北撤师生450余人。经上级批准动员150人参加第一后方医院和卫校,其余300人与淮海其他中学合并建立淮海区联合中学。不久,上级决定联中并入华中建设大学,成立建大附中,孙存楼任校长,朱润农、姜龙楼、吕志铎任副校长。8月,附中学生200余人调到华东军大参加学习。其余学员跟随华中建大撤到山东胶东地区,后又转移到鲁南鸡山华中第十兵站集中待命。在那里进行“三查三整”学习。春节后全体同学和部分教师在张履冰、张笑吾的带领下报名参加中原机动的干部大队,淮海联中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八、淮海区第二中学

淮海区的第二中学是在1944年春,由淮阴县委决定创办的。校址设在淮涟交界处的大雄庵。由淮海区参议员蒋伯韩任校长,徐季刚任副校长,俞谦任生活指导部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学校于1944年2月正式开学。当时只有一个师范班,共有学生53人,7月下旬结束,分别走上工作岗位。

从1944年秋开始,学校扩大为八个班,一个师范科,一个行政科,学员400多人,教师20余人,职员10余人,党内设总支、下设三个支部。

淮海二中实行二年制,初中以上多采用短训班形式,如师范科、行政科、师训班,一般半年结业。而且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出去。

教学内容除数理化、美术、音乐之外,有政治课,学习形势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中国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还有一些军事课。

学校除大雄庵的大雄宝殿及几间附属用房外,别的一无所有,没有桌凳,每人用马夹子当坐凳,自带一块小方板当课桌,教室不够,师生自己动手,用树条、柴巴等搭成简易教室。没有黑板用门板,没有粉笔自制土粉笔。后来在国民党军队进攻下,把教室全部烧光,师生们自己动手利用原来的土墙再建草房,或在树荫下上课。为了改善师生伙食,师生们自己动手平整了一个40多亩地的“乱坟坑”,种上了瓜豆,成为蔬菜地,逐步改善了师生的伙食。

学校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组织上除设班主任领导学员的学习活动外,各个年级都配备政治指导员,担任年级党支部书记,班干部是党支委,并兼任党小组长。各个班级都有“学习园地”、“生活园地”,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良作风。

因淮海地委来电,要保存一批干部回淮海地区坚持斗争,因而没有同意淮海二中师生全体入伍的要求。1947年淮海二中北撤山东的师生170人。除120人参军之外,其余50多人在1947年10月以后,分两批回到淮海地区,由组织分配工作,少数年纪小的学员继续留校学习。

由淮海地区各中学合并的淮海联合中学,1947年春,转移到胶东解放区海阳县后,经华中军区邓子恢政委的批准,并入华中建设大学,改为建大附中。由淮海六专署文教处长孙存楼任校长,原各校校长朱润农、姜龙楼、吕志锋、吴鸣裕等任副校长。直至1947年底华中建大停止办学分配工作为止。

九、淮南联合中学

1940年3月,半塔集保卫战胜利后,津浦路东各级人民政权相继建立。为了巩固政权,加强根据地建设,迫切需要培养和造就大批人才。在这种情况下,1940年10月,路东区党委决定创办一所淮南路东联中。刚办不久,淮南路西联中因敌人“扫荡”撤至路东地区。因此,路东区党委决定将两个联中合并成立淮南津浦路东路西各县联合中学,简称淮南联中。校长由方毅兼任,副校长吕惠生,吕调离后王昭铨接任副校长。1941年区党委决定校长改由郑伯川担任。

学校校址开始设在来安县半塔集。学员的来源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根据地的知识青年;二是党政军干部子弟;三是地方基层干部和小学教员;四是敌占区地下党动员来的爱国青年。名为“联中”,实际上是培养干部的干部学校。学员在校学习,有的自费,有的免费,有的享受供给制待遇。淮南路西、敌占区来的和调干学习的学员,除供给伙食外,还发给被服和津贴费。

联中设中学班、师范班、政治班、预备班,共有学员200多人。

学校设教导、训育、总务三处，分别负责教学、军训、后勤工作。由于路东经济比较落后，加之敌人经济封锁，学校的物质条件很差。几十个学生住在一间大屋里，夏天睡芦苇，冬天打地铺，伙食是一干两稀，吃的是粗粮，学生还要养猪、种菜以改善伙食。在学生中流传一个顺口溜：“两粥一饭香又香，青菜萝卜是家常，黄豆烧肉月终吃，同学长得胖又壮。”

联中的任务是培养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基层干部。在课程设置上，政治课包括社会发展史，唯物辩证法，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军事课包括军事常识、队列教练、武器使用等；文化课包括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外语等。尽管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但通过学习和训练，大家进步很快，不但学到文化科学知识，而且也懂得军事斗争常识，加强了组织纪律性，锻炼了吃苦耐劳精神。

联中的生活、学习实行战斗化、军事化，早上五六点起床，打好背包，跑步集合出早操。饭前集合排队，分班就餐，有时夜里紧急集合，进行转移演习，大家过着紧张而有秩序的学习生活。

1941年到1942年期间，日伪军对淮南地区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扫荡”。学校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与敌人周旋，一般以班为单位，由老师带队进入山区、农村，白天隐蔽，晚上下山，在偏僻村庄宿营。

淮南地区在1941年春，由天长县抗日民主政府在铜城镇李家长庄创办了一所天长中学。校长由天长县县长陈舜仪兼任，有学生100多人，全部来自淮南路东八县。1942年春，在天长中学的校址上，以淮南联中师范班为基础，加上原天长中学的初一、初二两个班，并招收在职小学教师一个班，共200余人分四个班，成立淮南师范学校。校长由淮南津浦路东行署文教处长郭兆元兼任，副校长为王昭铨。1942年12月，因精兵简政，淮南联中和淮南师范奉命停办，淮南师范学生部分从军、从政，走上工作岗位，一部分回

原籍原单位,由地方政府分配工作。

1943年,淮南区党委决定在天长县属的铜城市举办一个青年补习学校,吸收原淮南联中、淮南师范学校的部分学生以及当地知识青年入学。后来淮南区党委又决定在天长铜城和六合竹镇两地分设淮南中学和来六中学,青年补习学校的学员被吸收入淮中。淮南中学校长由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劲夫兼任。来六中学校长由郑伯川兼任。9月,淮南中学在铜城城隍庙旧址开学,学员按文化程度编为六个班,初一两个班,初二两个班,还有初三、高一各一个班。设在竹镇西仇庄的来六中学设三个班,后来还开设了师范班,在校学生100余人。1944年春,区党委决定将两所学校合并,仍称淮南中学,并把合并后的学校迁回古城镇。校长仍为区党委宣传部长张劲夫兼任,副校长王昭铨。后来淮中还继续开设师范班,全校学生最多时达300多人,为淮南解放区培养了一批后备干部。

1945年春,区党委为了适应根据地发展的新形势,曾决定将淮南中学改为淮南公学(淮南公学在第四章中已有介绍,这里不再叙述)。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路东几个县相继解放。1946年初,区党委决定又将淮南公学改为几个专业学校。政工班改为淮南建设专门学校,校长由路东副专员周元彬兼任,副校长刘泽民、支书陈彬。师范班改为淮南师范,校长由专署文教处长刘健飞兼任,副校长叶锦田,支书尹敏。普通班改为天长中学,校长王良才,副校长兼支书高景平。建设专门学校与天长中学设在天长城,淮南师范设在盱眙城。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解放区进攻,三校北撤至淮北后停办。

从1940年秋到1946年夏,淮南地区战争频繁,淮南区党委在路东地区创办的以培养干部为主要任务的各类学校,由于战争原因曾经几易其名,初期为联合中学,1943年改为淮南中学,1945年改为淮南公学,1946年改为淮南建设学校和淮南师范学校等,但它

的任务只有一个,都是为了培养干部。这些学校前后六年,共培养输送干部有上千人之多,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十、淮 北 中 学

1941年六七月间,淮北区党委和淮北行署做出决定,在扬景庄筹建淮北中学,全称叫“淮北苏皖边区公立淮北中学”。当时区党委和行署决定办淮北中学的指示,其大意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政府,要想在淮北地区扎下根来,发展壮大这块解放区,党从政治上、军事上与敌、伪、顽作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从教育上、从培训干部上做出努力,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基层干部。由于这个地区敌、伪、顽随时都可以来窜扰,如公开以干部学校名义来办,则不仅敌、伪、顽可能前来奔袭,某些群众及其子女也会有顾虑。所以区党委和行署决定,这个学校以普通中学的名义和形式来办,其性质和任务,其方针和方法,则必须明确是为淮北解放区培养所需要的基层干部。所以,刘瑞龙同志说:“淮北中学是我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一所很有代表性的学校,它是淮北地区党委和行署直接领导的一所干部学校,为了更广泛地吸收根据地内外各阶层青年参加革命工作和抗日斗争,而采用‘淮北中学’的名称。”^①

为创办淮北中学,区党委和行署为淮北中学调配了一批领导骨干。校长任崇高,是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副校长张宇瑞,是毕业于北大的老党员,教导主任徐子佩毕业于清华大学,也是个老党员。淮中的教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具有大专学历,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是比较强的,有着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有一定的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

淮北中学仍沿用普通中学的学制,分作高中和初中两个阶段,

^① 《刘瑞龙谈淮北中学》,见《淮阴老解放区教育回忆录》。

又附设师范部,分设高师班和初师班。高、初中和高、初师的学制,一律定为二年,工作需要时可以提前调出。学生入学一律免收学杂费,学校供给食宿费。来自敌占区或家庭确有困难的还可以补助服装费和零用钱。学生学习结束时成绩合格者,一律发给毕业证书,其工作则由政府统一分配,党和政府需要时,也可以提前分配工作。

在课程设置上,初中初师有公民、语文、英语、数学、历史、地理等课程;高中、高师,将公民、史地等课合并,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将化学、物理、生物等课合并,讲授自然科学概论。对高中、高师还增设一门哲学概论。由于处于战争环境,各班增设一门军事课程。淮北区党委特派一位老红军任学校军事教官,除系统讲解我军战略战术的基本知识,还经常带领学生到野外瞄准、射击、投掷手榴弹,进行军事基本常识的训练。

淮北中学参考解放区军政干校的经验,实行抗大式的军事化组织和半军事化管理。学生每日吃饭、睡觉、上课、休息,都必须保持高度机动状态。学校规定,所有学生都必须在班组长统一指挥下,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进行课内外活动。学生每天早上起床,既要服装整齐,更要打好背包,所有书籍、文具、零星用品,都要放进挎包内随身携带,遇有紧急情况时,便于随时列队出发,迅速转移。学校还建立师生轮流站岗放哨制度,夜里在教师带领下,以小组为单位,荷枪实弹,前去村头路口站岗放哨。为了保卫淮中师生安全,淮北军区还把4师骑兵团布防在学校周围一带。

学校还组织学生参加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曾经两次组织淮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曾多次组织征粮工作队,分赴淮北各县,征收爱国公粮。在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推动下,淮中师生也有计划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生产劳动。除参加田间劳动外,还开展专业生产如编席、榨油、养猪等。还组织学生开荒,1944年曾以半个月的时间,组织师生开出了240多亩

荒地。

此外,为了活跃学生生活,在教师的参与和指导下,利用课余时间,广泛开展群众性的体育锻炼和歌咏、演戏活动。多次到附近机关学校和附近村镇进行演出,得到各方面的好评。

淮北中学从1941年筹建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淮中搬进泗县城里,改为淮北师范,1946年夏解放战争爆发,泗县落入敌手,淮北师范在我军北撤途中被撤销。

从淮北中学成立,到易名为淮北师范,前后共有五年时间。在这五年中,来淮中学习的学生,总数在2000名左右。这些在淮北中学毕业的学生,绝大多数都被分配到党政军财文各个部门工作,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十一、邳睢铜灵联合中学

1939年4月到1940年8月,八路军陇海支队第一梯队(苏皖特委)开展邳睢铜地区游击战争。1939年12月,邳睢铜地委成立,公开机关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后方办事处。1940年9月,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邳南行署。

为了培养根据地的斗争,邳南地委、行署决定办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开始叫邳南公学,后改名为邳睢铜灵联合中学。开始办的邳南公学有小学班、中学班各90人,于1940年9月开学,校长是王健民,后为李觉民,学校党务工作负责人为严白山,学生指导员为彭朋。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政治、语文、算术、历史、军事、音乐等,以政治教育为主,按抗大的办学方式,过军事化的生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校没有固定校舍,住在群众家里。除教学外,很重视住地的群众工作,经常召开群众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帮助群众生产劳动,帮助村里办识字班,组织儿童团,教唱革命歌曲、排演小型节目,活跃学校和农村文化生活。第一期学员90

余人,经过四个月的学习,于年底前毕业,由地委分配到地委机关工作。

第2期于1941年春季招生,学员近百人,学习内容与第一期基本相同,于年底毕业分配到部队和地区机关工作。

邳南公学虽然只办了两期,但成绩显著,为邳睢铜地区的机关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邳南公学在办学过程中,地委领导相当重视,地委书记李云鹤、组织部长张道平、宣传部长梁浩等领导人经常到学校检查工作,帮助解决困难,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王仲廉等部妄图乘机向津浦路东淮北地区进犯,新四军4师9旅进行反击,取得了反顽自卫战的胜利。建立了铜山、睢宁的民主政权,10月,在淮北区党委和行政公署的指导下,成立了邳睢铜灵四县联防办事处(相当于专员公署)。联办主任纵汉民,副主任果益斋。“联办”成立后,决定邳南公学停办,成立邳睢铜灵四县联合中学(简称联中)。邳南公学大部分教职员工分配到联中工作。校长纵汉民,副校长刘瑞林,教务主任陈焘。1942年2月招生,4月正式开学。学校设初中班、师资训练班和行政人员训练班。修业期限是:中学班一年,师训班六个月,行政班一个月。各班由于对象和要求不同,教学内容也有所区别。中学班、师训班以文化课为主,行政班则以政治课为主。

联中无固定校址,过着军事化生活,课堂是露天地或树荫下,用群众的门板当黑板。没有现成的教材,全是教师编的讲义,教学方式老师讲,学生边听边笔记,课后互相校对笔记,小组讨论。学生过着军事化生活,早晨集中出操,夜间轮流值班站岗放哨。联中开办的第一年,也是邳睢铜地区进入艰苦斗争的1942年,周围敌伪顽合流,不断对解放区进行“扫荡”、“蚕食”,根据地逐步缩小,形势日益紧张,学校天天转移,环境虽然紧张,学校仍然坚持教学。副校长刘瑞林抱病坚持上课,教师努力教,学生认真学,保证了教学计划的按时完成。学校师生还利用敌人“扫荡”的空隙,组织师

生做驻地群众工作,进行演出宣传,参加驻地的征粮工作,让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进行锻炼。

1943年,邳睢铜地区形势开始好转,不仅巩固了中心区,而且扩大了解放区。暑假期间,联办调配10余名水平较高又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和机关干部到联中任教,王绍良任教务主任,学生班级设指导员,还成立了学生会。

1945年春,联中迁入古邳镇原旧城小学校址办学,使联中进一步正规起来。同年7月,睢宁县城解放,联中奉命一分为三:校部和师范班师生由刘瑞琳率领随三专署迁到灵北高楼一带农村;李敬岩率一部分师生进入睢宁县城,接管敌伪办的睢宁中学,隶属睢宁县政府领导;王绍良和一部分师生在古邳筹办邳睢铜中学,隶属邳南县政府领导。当年暑期三校各自招生。9月,三专署奉命进入泗县城,整个淮北路东奉命改称为苏皖边区第七行政区专员公署。11月,三校奉命合并,汇集于睢宁城东关书院内,校名改为苏皖边区淮北第一中学,学生有500多名,校长为刘琳,副校长李惠远。

邳睢铜灵联合中学创办四年半的时间,先后培养了1000多名初级干部走上各种不同的工作岗位,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二、淮 宝 中 学

1939年冬和1940年初,我党在淮宝地区建立政权后,淮北中心县委就决定办一所培养干部的中等学校,派葛明筹办。葛于1941年7月招收了100多名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少年学生。校长是葛明,训育主任是郑康,教师有10余人。校址设在岔河东滩。1942年又招考了100多名青年,这时初中部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四个班。淮宝中心县委把培训干部的任务交给淮宝中学,并加强了淮宝中学的领导班子,县长李斌兼任校长,副校长沈启之

主持学校工作。学校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书记沈启之。当时因宝应、盱眙和两淮的日伪军经常下来“扫荡”,学校人员多行动不方便,县委决定将淮宝中学分为南北两校,校本部设在韦集区的严家渡,分部设在黄集区的大陶庄。上课大多在树林里,背包做板凳,膝盖是课桌,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1943年学校增设师范班(后改为文教班),县委抽调乡、村有文化的年轻干部200多人进行培训,又抽调50多人学习财务管理,叫财会班。这时淮宝中学有师生员工七八百人。县委进一步加强了淮宝中学的领导班子,由淮宝中心县委书记方原兼任淮中校长,副校长沈启之主管学校工作。学校党支部改建为中共宝应中学总支委员会,各部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班级建立党小组,各班党小组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行政上设立五部(行政部、师范部、初中部、附小部、生产部)、四处(训育处、教务处、总务处、油印处)、一室(医务室)。行政部管理群干班和财会班;师范部管理师范甲班和师范乙班。初中部有六个班,小学部一个班。生产部管理学校的生产自给,学校湖边滩地六七百亩,收入用于学校师生生活。

淮宝中学的学制虽有规定,但不一定等到学生毕业后才分配工作,而是根据党、政、军各部门的需要,按学生的思想政治表现和文化水平随时可以分配工作。

淮宝中学除了进行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外,很注意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政治课的内容有: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共党史、联共党史、《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课程,还经常进行时事政策教育。除校长每周给学生作一次时事报告外,淮北军区的首长和县委领导同志也常来校作时政报告。1942年冬天,因学校一度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曾在学校搞反特运动,伤害了不少师生。彭雪枫知道此事后,亲自来校了解情况后对全体师生讲话,并表示向大家道歉,许多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1943年春,陈毅军长、张云逸副军长、彭雪枫师长、邓于恢政委来到淮宝仁

和集,给抗大四分校、江淮大学的师生作形势报告,淮宝中学全体师生也参加听了报告,使大家进一步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希望。

淮宝中学的学生在分配工作之前,大多数被派到县工作队参加减租减息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以及大生产运动,在运动中培养自己的实际工作能力。1942年10月份,学校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学习南泥湾精神,开荒种地,大搞副业生产。先后开荒种地六七百亩,生产的粮食蔬菜用来改善师生生活。学校还搞了不少副业,如自己打油,磨面,磨豆腐,漏粉丝,自己养猪养羊养鸭,既增强了学生的劳动观点,又改善了师生的生活。

淮宝中学从1941年夏开办,到1946年秋因国民党军队进攻随军北撤到盐阜区改为盐东中学的五年多的时间内,为党培养了军、政、财、文等干部2000多人,对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人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锻炼,除牺牲的以外,幸存的有不少成了中、高级干部,这是值得永远回忆的。

十三、沐宿海抗日中学

1939年,苏北的沐阳、宿迁等县先后被日寇占领。新四军东进后,在淮海区的沐阳、宿迁地区成立沐宿海中心县委。在县委领导下,办起了沐宿海抗日中学。

新办的抗日中学,像磁石一般吸引着抗日根据地的广大青年。当时进抗中学习的,大体上是四方面的人:一是刚参加军队和地方工作的干部;二是要求革命的工农群众子女;三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爱国青年和进步学生;四是得罪地方恶势力而又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这些人有的是党政军组织保送来的,有的是经过考试录取的。但大家都是在抗日的旗帜下,聚集到抗中学习的。

抗中的领导人和教师,大都是立志救国,热心培养抗日人才的有识之士。其中,有的是我们共产党内优秀的知识分子,有的是社会上有知识的爱国者。如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公开的职务是生活指导员)郭云,是山西晋城县人,曾在山西长治师范读书。1940年,在晋冀豫区党委党校学习。同年根据党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由党组织调出支援华中。他与同时被抽调的20个学员,长途跋涉,越过海河、黄河、平汉路、津浦路、陇海路,步行六个多月,吃尽千辛万苦,来到淮海区。教育长李仲祥、副校长郁华民和后来任副校长、校长的程剑鸣等,都是热心传播抗战主张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再如,抗中第二期女教师叶宪英,出身地主家庭,原是淮师高二的学生,因战乱失学在家,忧虑国难,有抗日救国的热忱,经袁孟九介绍,欣然来抗中任教。她来了以后,又把叶明启、张霞、童少文等一班有志抗日的青年带来抗中学习。抗中第一、二期校长袁孟九。本人是个地主中的开明人士,赞成抗日。在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出来担任抗中校长。但在1949年环境紧张时思想动摇,投奔国民党反动派。

由于抗中是一个培养抗日人才的学校,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进入这个学校的爱国青年越来越多。一些开明地主、富农的子弟,也都先后进抗中学习。

抗中的第一、二期,并没有固定的学习课本。大都是油印讲义,当时的文化课,主要是学习国语,内容大都是和抗战联系得很紧的新文章。许多是从报纸、杂志上选的有关抗战的通讯和社论。这些紧密联系形势的新内容,既使学生提高了文化水平,又增强了他们抗战的信心。

政治课的内容,贯穿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抗战联系得很紧,教材有《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还有统一战线,群众工作方面的内容。政治课主要是

由李仲祥、郭云、程剑鸣、郇华民、胡鼎全等同志讲授。这些同志抗战的觉悟都很高，讲课的时候，把他们的抗战热情全部灌输进去，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又震撼人的心弦，效果很好。郭云同志在讲授毛主席《论持久战》时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给我们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乍看起来，好像中国就要亡国了。实际上，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虚弱的。目前的中国，只是乌云暂时遮住一部分蓝天。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我们的力量就超过日本帝国主义许多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团结成有力的拳头，打败日寇，驱散乌云，重见光明。”他讲课深入浅出，科学地阐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和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本质，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把毛主席人民战争的思想讲得深刻而明白。

抗中还设军事理论课。军事理论课主要是学习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任务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还有军事技术训练的内容。学习这些知识，就是为了随时参军作战。有些学生在学习中途，就抽到部队去工作。总之，当时抗中在教学上严格实行了学以致用原则，一切围绕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个总目标去教、去学，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当时，敌人经常下乡“扫荡”。因此，抗中不可能有固定的校址，但总是在和沐宿海办事处（后来是潼阳县政府）相距不远的地方转来转去。曾经住过黄善宅、穆墩、贤官亭、青石坊、桑墟、后河头、张弯、牛盘墩等许多村庄和阴平街。有一段时间想在杨庄安定下来，盖了几间夹板泥土墙的草房，用土坯支了座位。后来情况紧张，又迁移走了。在环境恶化、情况紧张时，常常一昼夜移动好几个地方。有时半夜或正在上课时，遇到敌情，就紧急结合转移。

1941年麦收前，抗中驻桑墟槽坊一个多星期。有一天，文艺队正在排演节目，准备逢集时上街宣传，其余的同学在听教育长李仲祥讲课。突然，一个老百姓万分火急地跑来向我们喊道：“你们还开会，鬼子已进西圩沟，包围你们了！”师生们立即集体转移。校部

的警卫班长袁永信,带领警卫班战士鸣枪报警,掩护师生们从槽坊后门撤出。好在那年春旱,桑墟圩沟水浅,有利于学校师生突围。学校师生撤出槽坊才几分钟,敌人就把槽坊包围起来了。学校师生撤到桑墟墓地时,日伪军已在槽坊后边架起机枪盲目地扫射。当时正值“小满”前后,麦子齐腰深,师生们顺着麦地撤走。敌人的子弹在师生们头上乱飞。大家清楚地望见后边敌人的装束和阵势。学校师生经刘寨撤到华冲,当晚又赶到下湾。第二天整顿一下队伍,又就地上课了。

这次袭击抗中的日伪军是从沭阳城来的。后来知道是当地汉奸报的信。这也说明,在日寇、汉奸眼里,抗日中学是他们的心腹大患。

敌人的袭击,引起抗中师生的高度警惕,学校的流动性变得更大了。形势好些时,才借群众的房子上课。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树林里或者找个背风的地方,把黑板朝树上、墙上一挂就上课。可以说,村头田野、树林河旁,都可以是抗中的课堂。上课时,背包就是凳子,膝盖就是课桌。下雨后地烂,就站着听讲。晚上没有灯火,有的教师要准备第二天的讲课内容,就常给老百姓烧锅,借着灶前那点亮光看书备课。这个方法后来传到学生当中,好多人在晚上就在灶门前利用火光看书,真像古人“凿壁借光”一样。有时候,抓把草,点起火着看书。环境虽然十分险恶,但大家的学习劲头都很足。

学校师生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吃、穿、住都很困难。每人一床小被子、教师由公家发给,学生自理。学校师生转移到那里,借老百姓的房子,打个地铺或者借个门板,被子一放就睡觉。有时,情况紧张,就睡在田野里、河堤旁。伙食上,虽然教师和学校工作人员都实行供给制,但是标准极低。教师和学生一样,主要是吃高粱、玉米面、山芋干、玉米煎饼。少数学生从自家带口粮到学校,多数人吃公粮。有时,到老百姓那里凑些霉煎饼,以公粮计算。1941

年麦收前,青黄不接,许多老百姓断了粮食,学校生活更困难了。有的同学回家,把尚未成熟的大麦、元麦捋下来,加上点玉米磨成糊子做煎饼,带到学校里来。每人每月一钱油,实际上没有办法做菜。中午,一碗清水煮白菜。早晚,炒黄豆粒子或端白饭碗。地方老百姓关心抗中师生,常常给师生送点萝卜干、酱豆子,作为下饭菜。学校偶尔吃一顿饺子、馒头,这就是“特殊犒赏”。有人记得,抗中在六个月中,只吃了三次饺子、四次白面馒头和十几次小麦拌和玉米做的馍馍。条件虽差,学校领导和老师都很关心集体伙食,经常到学生中征求意见。所以,师生们虽然吃得很孬,但大家都感到吃得很香。

学校师生们穿的用的同样困难。学生衣服自理。校长、教员则由公家发些灰色粗布自做衣服,但往往新旧接不上,许多人衣帽不周。党支书郭云因是外地人,家庭没有接济,常年只穿公家发的几件粗布衣服。有时衣服破得露肉。有一次,他的一只棉裤脚坏得要掉下来,女教师胡鼎全看见了,向老百姓要了块旧布给他补上。当时,每人每月发一块多钱津贴费,一袋牙粉。牙粉不够就用食盐来代替。有的男同志抽烟,但津贴费不够买烟的,就只好用干树叶揉碎拌在烟末子里抽。生活虽然这样艰苦,但是大家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大家胸怀救国的壮志,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更不把艰苦放在心上了。学校里上下平等,校长、教师在艰苦生活中,处处起着表率作用,从不搞特殊,带动全校形成艰苦奋斗为荣的高尚风气。

抗日中学的学校内部,党的政治工作抓得很紧,组织生活很严密。党员每20来天到一个月开一次支部会,学习党内文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学生中也按月召开民主生活会,总结学习生活,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良倾向。平时,一天有几次集会,站队,唱歌,政治空气很浓,生活紧张有序。

沐宿海抗日中学,不仅是培养抗战人才的学校,也是一个为抗

日战争服务的宣传队、工作队。校部除去抓学校本身的教学和政治宣传工作,还十分重视对社会上开展政治工作。当时学校的指导思想是:培养人才为了抗日,而人才又必须在抗日工作的实践中培养。因此,学校围绕抗日中心,开展很多社会活动,第一、二期主要的社会活动有:

一、组织抗日文艺宣传队。运用文艺的形式到街头村头宣传抗日思想。师生们常到街头演唱革命歌曲。如《黄河大合唱》,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歌,演短剧《放下你的鞭子》、《痛斥汉奸》等。后来还利用《小放牛》等民间演唱形式,编演了《送郎上战场》、《伪军反正》等许多小演唱,到处表演。1941年春,沐宿海中心县委从抗中抽调一批文艺宣传人才到主力部队文工团学习。他们回来后,县委又以这批人为骨干,组成沐宿海宣传队,调颜集区区长吴石坚任队长,吕智泽任政治指导员。这个宣传队在抗日救亡宣传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到1944年底,宣传队提升为淮海实验剧团,影响更大了。

二、组织学生参加减租减息。1941年夏收后,在中心县委统一安排下,抽调一部分学生,协助沙河区委减租减息。同学们宣传党的政策很下劲,把贫雇农紧密地团结到区乡党组织的周围,使一些地主服服帖帖地按照政府的政策减租减息。

三、组织学生参加征粮工作。1941年冬,抗中组织绝大部分学生,到潼阳、东海参加征粮工作队。由于政策宣传得力,工作做得细,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当时有些乡村干部反映说:这些学生到底是经过学校教育的,工作有水平。

抗中的学生毕业后都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有的还没有毕业就被沐宿海县政府调去安排工作。抗中先后为地方培养了300多名干部,对抗日斗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四、东灌沐边区中学

1940年夏,八路军苏鲁豫支队湖西大队首先进驻淮海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东灌沐(东海、灌云、沐阳)办事处。1941年秋,原灌云中学从汤沟迁至西河拐。为了取得和行政区划名称一致,遂改称为东灌沐边区中学。这个学校学制为二年,吴鸣九、孙存楼先后被任命为学校校长。办学经费由淮海行政公署拨给,但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所给经费少得可怜。

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室,没有课桌。办学初期只能借汤沟小学上课。当敌人“扫荡”时,学校只能进行游击教学。在宿营地则背包当凳,膝盖当桌。就在这样设备简陋、环境动荡的条件下,不到一年,学生由不足20人增加到200多人。当时来校的学生,一部分是敌占区投奔过来的爱国知识青年。1941年冬,由于学生不断增加,学校又迁到汤涧、徐大庙一带。不久,学校又增设了师范科,各地选拔一些具有初等文化水平的进步青年进师训班学习。这些学生结业后,分配到有关乡村从事小学教育工作。

办学中,学校教师生活十分艰苦,而且处在敌伪军经常“扫荡”、顽匪不时骚乱的情况下,学校往往一夜三转移,有很大的危险性。然而,在学生人数日益增多的同时,教师也日益增多起来。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学校党组织把团结、教育知识分子,发挥教师专长,当作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学校领导从政治上团结教师,从生活上关怀教师。他们请淮海区行政公署主任李一氓、东灌沐中心县委书记张克辛等领导同志到校向教师作报告,讲述国内外形势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前途问题。通过经常性的思想教育,不仅使在旧社会报国有志、工作无门的知识分子,到学校当教师后大大提高了政治思想认识和工作积极性,就是原来持有到边中看看,合则留,不合则去态度的教师,以及为了婚姻问题,为了个人宿怨,为了

避免政治怀疑等而到边中当教师的知识分子,也都逐渐地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思想,把教育工作当作抗日救国的工作。因此,一些知识分子以到学校当教师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击,表示对党的倾心,表示与旧思想、旧生活习惯的决裂。例如,有人对一位曾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中学教过书,即将去边中任教的知识分子说:“你跟国民党干过,不怕共产党把你当敌人吗?”他回答说:“我是共产党敌人的敌人,我恨透国民党反动派,它践踏了我的良心,我要把良心交给共产党。”一位曾在旧社会当过小学教师的教师说:“在旧社会我当小学教师,官老爷、地主看不起我,把我当作他们宴席上的鸡肋;新社会我当中学教师,共产党器重我。我甘心做人民的老牛,一辈子耕耘在党的教育园地。”

在那顽敌封锁、交通阻塞的环境里,学校纸张奇缺,报刊无几。四开的《淮海报》发行量很少。学生没有课外读物,教师也很少看到大城市中新出版的书籍,偶尔看到一张油印的《拂晓报》,都当作艺术品传阅,一本铅印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视为至宝。罕见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死魂灵》等书,被传来传去,面目全非。因此,教师只有选编讲义,从自己读过的课文或保存的篇目中取材,或节选自加题目。而学校的教学方式、组织教学则从战时实际情况出发,大课夹小课,小课到个人。

在学生逐渐增多,急需教室又无民房可借的情况下,师生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盖房子。支部书记、校长、主任、教师和学生一起劳动,由大家授衔称“统帅”的总务主任武天孚指挥,脱土坯,垫地基,打墙,只邀请两三位有建房经验的农民指导垒土、上梁、盖草,不到一个月时间,建成五间教室,并用土垒成长长的泥台当课桌,学生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数理化和文史地知识。

夏季,柴米河是天然的大浴池。师生不在一起洗澡,倒不是师生有别,而是同学惯于“水战”——互相和稀泥,抹黑脸。就是女学

生,在暮色苍茫、月光溶溶时也到河里洗澡。冬季,到了严寒时刻,师生拾干枝烤火,或是到农民牛屋里取暖和农民聊天;学生还在课间跳绳踢毽子。有一次演出,后台设在庙里,冻得不得已,只有请菩萨“施温”,让小菩萨“涅槃”,火花炽热,檀香浓浓。校长孙存楼诙谐地说:“看来菩萨见怪,我们要头痛了。”

春秋两季,是师生们最愉快的季节。“春风柴米琴书暖,河畔壕坡种菜瓜。”课余之暇,河滩上,麦田里、战壕边,三五成群,拉胡琴,吹箫笛,弦歌四野。师生种菜吃菜,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园地。青菜、萝卜样样都有。用汗水浇灌的果实,吃起来津津有味。

1942年冬,日本侵略军调集了3万多兵力。扬言要一举扫平苏北平原,消灭新四军于黄海之滨,对淮海区进行了疯狂大“扫荡”。学校师生在上级党的统一指挥下,经受了严峻的战争考验。学校领导人根据毛主席“敌进我退”的战术,经常带领全体师生和敌人周旋。那时学校有十支步枪,每支枪有十多发子弹,这些枪大部分是新四军从敌人那里缴获的六五、七九步枪。还有十几颗手榴弹。这点武器也壮大了全校师生的胆。在夜里行军时,前面几支枪开路,后面几支枪断后,防止敌人埋伏袭击。扛枪和挂手榴弹的大都是年龄较大的男同学,也有几个勇敢的“娘子军”。到了宿营地,政治指导员还要布置岗哨,发下秘密口令,为了保卫师生的安全,同学们也像新四军战士一样,坚守岗位。不管风里、雨里、冰天雪地,都严格执行军事任务。有时,师生在宿营地站岗,还望见敌人碉堡里的灯火,听见几声冷冷的枪声。有时是树梢冷月,天上星稀,万籁俱寂,但谁都准备着随时可能发生炮火迸发的猝然情况。紧张的战斗生活锻炼了每一个师生,考验了每一个师生。大家就是在这样严峻的战争烽火中逐渐锻炼成为坚强的抗日革命战士。

当时,日寇继续疯狂“扫荡”苏北平原。为了回避敌锋,应对敌人梳篦式的反复“扫荡”,避免伤亡,上级党和政府指示学校师生临

时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或家住敌占区的投亲靠友“打埋伏”。很多同学到了地方,他们并未“埋伏”,而是在区乡政府领导下,人在哪里就战斗在哪里。很多同学参加了地方工作队,担任后勤工作,带担架队,为新四军送军鞋,送粮送草,或参加群众性的反“扫荡”斗争。

1943年下半年,由于我地方武装和民兵坚持反“扫荡”,使斗争局势得以稳定,学校复了课。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和上级党委的要求,学校成立了文工团,并对外演出宣传。在学校组织了文工团以后,东灌沐边区的文化宣传工作就进一步开展起来了。学校文工团重视戏剧内容的政治思想性。为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演出的剧目着重于教育群众和鼓动群众。如农村开展民主反霸运动时,演京剧《打渔杀家》,没有服装,就用各色被面勾勾缝缝,没有道具,就用各色软厚纸糊糊扎扎。演现代戏,在那时是没有现成剧本的,只有自编自演,不但老师编戏,学生也编,有的是两人分工执笔,一人写上半截,一人写下半截。当时流传较广的有《攒碗》、《三星落》、等等。除戏剧宣传外,文工团还大唱革命歌曲。那时唱得最多的不仅是《新四军军歌》、《八路军军歌》、《黄河颂》,还有《流亡三部曲》、《南泥湾》、《义勇军进行曲》等等。

东灌沐边区中学的学生毕业后都由边区政府分配工作,有些学生还没有毕业因工作需要就走上了工作岗位。

十五、青少年干校——新安旅行团

新安旅行团简称新旅。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革命工作团体。最初由江苏省淮安县新安小学的一批革命师生组成。

新安小学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创办。它是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的一个实验基地。陶行知曾兼新安小学第一任校长,后由汪

达之任校长。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宣传抗日的少年儿童团体,又是实践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革命教育团体,还是在社会实践中培养青少年干部的一所学校。

1935年10月10日,新安旅行团一行14人(年龄最大17岁,最小12岁)在该团顾问新安小学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怀着“开展中国儿童抗日救亡运动”的愿望,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阻挠,毅然走出学校,深入到社会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出发时,他们每人只有一身单衣,一双草鞋,一把雨伞及简单行装,全团仅50块钱的一套电影剧院放映设备,几部黑白无声抗日影片(电影放映设备及影片大部分是陶行知捐赠的)。他们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向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国民党军队士兵进行抗日宣传。

1936年7月,新旅到上海后,即参加地下党通过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救亡活动。鲁迅先生逝世,新旅担任出殡大游行的挽歌队。1936年冬,参加上海文化界绥远前线慰问团到绥远百灵庙前线慰问抗日将士。他们又从归绥出发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1937年冬,新旅到达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党员干部牟永春到新旅帮助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最早的三个党员是徐志贯、张杰、张牧,徐志贯是第一任支部书记。诗人塞我、作曲家王洛宾为新旅谱写了《新安进行曲》。

1938年6月底,新旅到达武汉,受到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多次接见、教育和鼓励。他们发动武汉市儿童参加“写30万封慰问信”慰问保卫武汉的前方将士,积极参加保卫大武汉的工作。陶行知在庆祝新旅三周年的会上做了一首诗:“人从武汉散,他在武汉干。一群小好汉,保卫大武汉。”

在武汉,经过周恩来向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交涉,每月发给新旅45人的生活费和宣传活动费1045元,保证了新旅独

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后来新旅转移到长沙再到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同志的指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4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无端停发新旅全部经费。新旅在桂林进步文化人士的帮助下,通过演出歌舞剧《春的消息》等剧目,解决了部分经费。新旅最多时曾达到100人,因经费问题又减至40多人。

皖南事变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决定让新旅转移到敌后新四军地区。从1941年2月开始,新旅途经广州湾(湛江)、香港、上海,先后到达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新旅从1935年10月从淮安出发,到1941年2月的五年多的时间里,途经江苏、安徽、浙江、山东、河北、察哈尔(现分属河北与内蒙)、绥远(现属内蒙)、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广东、福建、江西18省,南京、上海、北平3个直辖市和香港,行程5万余里,在中国青少年儿童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在炎热的南国,美丽的江南水乡,荒漠的黄土高原和塞外的大草原;他们在城市、乡村,在伤兵医院,在军队,在学校,凡所到之处,即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放映电影,组织青少年学生或士兵歌咏会,推销进步抗日书报,受宣传的群众达250万人。

新旅到达苏北抗日根据地后,受到军民的热烈欢迎。刘少奇、陈毅多次亲切接见。鼓励他们发扬民主精神,把抗日根据地的少年儿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主中国的实现奋斗到底。并向他们提出组织盐阜区10万儿童参加抗战的任务。

新旅遵照刘少奇、陈毅的指示,在盐阜区党委的领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儿童工作。他们深入到乡村集镇,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们分赴阜宁、盐城、淮安、建阳、涟水、盐东、射阳等县组织儿童团、少先队,开办儿童干部培训班。他们走到哪里就工作到那里,他们当小先生,开展扫盲活动;他们教唱革命歌曲,进行抗日宣传;他们演出舞剧、秧歌和皮影戏等,慰问新四军和抗日烈军属,动

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他们用了两年时间即组织起盐阜区十七八万儿童参加抗日斗争,超额完成了刘少奇、陈毅交给他们的组织10万儿童参加抗战的任务。新旅也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发展壮大,团员发展到120人。1941年日伪军对盐阜地区发动大“扫荡”中,新旅总干事张平和团员张杰在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新安旅行团的团员们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始终坚持刻苦学习。他们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利用行军和工作的间隙,背包作凳子,膝盖当桌子,一有空就坐下来读书做笔记,或听领导讲课,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在这个战斗集体里,团员们过着充分的民主生活,又有严格的纪律。他们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艰苦战斗生活养成他们不怕困难、自力更生的美德。他们自己烧饭烧菜,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们在艰苦斗争的生活中茁壮成长。新安旅行团称得上是一个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战斗集体,是一所培养青少年干部的学校。

1945年底,新旅全体同志决定向毛主席写信,汇报新旅到苏北以来的工作情况。毛主席在日理万机的紧张工作中,亲笔写了复信:“新安旅行团各位同志们:来信收到,极为感谢!祝你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毛主席的亲笔复信,给新旅全体同志以极大鼓舞。

解放战争期间,新旅随解放军转战南北,工作也逐步转化为全部做文艺宣传的军队文艺工作团体。1948年9月,新旅随军参加解放济南战役。1949年5月上海解放,新旅随军参加解放上海的人城仪式,后留上海工作,改名为“华东新旅歌舞剧团”。

第八章 华中解放区在职干部教育

一、在职干部教育的重要意义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表现在创办各类干部学校大力培养干部上,而且还表现在组织广大干部在职学习上。华中解放区的各级各类干部人数众多,面广量大,仅靠干部学校进行集中培训是远远不够的。解放区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机构的干部并不多,而工作量却很大,不可能抽调很多干部离职进干部学校学习。而这些在职干部又肩负着抗战救国和抗日根据地建设的重任,又是党的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如何,直接影响着抗日战争的胜负和根据地建设的成败。由于在职干部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同时又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把他们组织起来,坚持平时的在职学习,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最好的学习形式。因此,在职干部需要迅速提高,而提高的最好办法就是大力开展干部在职学习和教育。

华中解放区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从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始,就很重视机关、部队在职干部的学习,把它作为提高在职干部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特别是1942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之后,华中解放区的机关部队干部的在职学习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极大地提高了各级机关干部的政治业务水平。

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的比重,应是第一位的。而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

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它放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鉴于“在人力财力与工作需要上目前又不可能办理很多的干部学校,因此,对在职干部,就其工作岗位上,施以必须的与可能的教育,实是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第一位工作。应该引起党政军各级领导机关及其宣教部门的充分注意。”

二、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

华中解放区在职干部的学习内容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进行安排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

(一)“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不论从事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宣传、组织、民运、锄奸、财政、经济、金融、医药、卫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与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每一部门的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必须指导所属干部有秩序地进行学习。”

(二)“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其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项。……政治教育之目的,在于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必须指出,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是不对的,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是不对的。”

(三)“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对

于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其教育与学习范围,暂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在环境许可的地方,必须一律开办文化补习班或文化补习学校。”

(四)“高级及中级干部之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等)者,于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

《决定》还指出:“在职干部教育是长期的,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一律坚持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在情况许可的地方或部门,学习时间可以伸缩。”“一切为着在职干部教育而耗费的时间,均算入正规工作时间之内,把教育与学习看做工作的一部分。在鉴定干部的时候,学习情况如何应作为鉴定标准之一。”

关于在职干部的学习内容,华中局根据中央的《决定》提出了具体意见:在一般情况下,所有在职干部要学习政治、学习业务;文化水平低的干部还要学习文化;领导干部还要学习理论。学政治,主要学习形势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上级党政机关的有关文件、政策、指示、法令或会议决议。学业务,主要学习有关业务方面的理论知识,或参加调查研究,进行典型试验等,在实践中进行学习。学文化,主要根据干部的文化水平进机关业余文化补习班或机关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学习。学理论,主要是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著作。

这种在职干部教育的特点,是一种学习无一定期限,长年坚持,从不间断的教育,是一种机关是学校、干部是学员、人人参加的普遍的教育运动,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干部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

三、在职干部教育的形式和方法

华中解放区在职干部的教育形式是机关单位平时的在职学

习。由于在职干部担负的工作任务特别繁重,同时又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把他们组织起来坚持平时的在职学习,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最好的学习形式。刘少奇在主持华中局工作期间就亲自抓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机关的学习。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学习的影响和推动下,整个华中地区各级机关干部的学习很快形成了热潮,就是在斗争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在行军途中或驻营休息,到了规定时间只要有可能就学了起来,这种在解放区从建政初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得到坚持和巩固,直到建国以后以至今天,仍然加以继承和发扬。

在职干部的学习方法,一般是以自学文件、阅读马列、毛泽东著作为主,结合上课或听报告展开讨论或辩论,写读书笔记,联系思想或工作实际进行总结等。有阅读能力的干部,以自学为主,辅以报告、讨论;文化水平低的干部以听报告或上课为主,辅以学文件、讨论。每一阶段学习前,进行学习动员,端正学习态度;学习中,及时检查交流学习情况;学习结束,进行学习总结。在学习的过程中,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空洞的教条主义学习,以达到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目的。

在职干部的教育在军队中也十分重视,为了抓军队的在职教育,军队中军、师一级都建立了教育委员会,专门抓在职干部的教育,其中又特别强调抓业务教育和文化教育。陈毅甚至提出“以增强业务教育、文化教育作为建军干部教育的中心。”他明确提出“在职干部应以业务教育为中心,做什么学什么,为工作而学习,使学习与工作密切联系,以造成大批专家为目的,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专门干部比较百个无专长的干部,其作用更大。”“我们不能拥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大批专门家,我们的革命要想成功是不可能的。”“我们鼓励干部党员努力去做专门业务的研

究。”“因此我们除使党员干部具有党的一般知识外，还应该使他们每个人具有特殊专门的知识。”^①在陈毅同志的号召下，新四军全军开展了学习军事技术、开展技术练兵的热潮，有力地提高了新四军的军事技术水平。

部队经常采用的集中整训的方法，也是一种在职学习训练的方法。部队整训不仅是对战士的整训，更重要的是对干部的整训。陈毅提出“用整训部队的方式来进行根本的军事建设。”“干部间，部队间均采取轮训制度。每个干部每一年均应受训三月，每个部队每季至少整训一月，一般行军作战期间的整训还不算在内。整训部队要求有计划性，要求有自觉性。”^②

在职干部教育中的训练班，是对在职干部教育的又一种形式。这种训练班的举办，一般是根据某个特定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急需解决的某个政策问题而举办的。它往往是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干部的实际情况以及某个时期需要完成某项任务而定。例如，为了征收公粮而举办财粮干部训练班，为了民兵组训而举办的武装干部训练班，为了实行土改复查而举办的乡村干部训练班，等等，这种训练班是短期的，一般只有一个月、半个月，主要学习有关方面的党的方针政策，传达有关文件，领导同志做一两个报告，以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目的。

训练班的特点是时间短，内容少而精，集中解决一两个问题，由领导做报告，分组讨论，最后小结。训练班往往是围绕中心任务，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而开办的。这种训练班的特点是时间短、收效大。

从1942年起，华中地区各级党委和各级机关干部都先后开展整风学习运动。1942年中共华中局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整风的

^{①②} 陈毅：《论军事建设》，《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第138—13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决定,发出《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及讨论中央决定的通知》,华中军分会也发出《关于各战略单位整风的决定》。《通知》和《决定》要求华中全体党政军机关干部认真阅读中央新规定的 22 个整风文件,领会其精神实质。从 6 月起,经过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逐步开展整风。整风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同时对干部进行审查。整风的方法是在学习规定文件的基础上进行自我对照检查如下内容:政治上厌倦疲沓情绪、享乐主义、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整风对象是党政县区级以上干部和县区以上机关干部、军队营连以上干部。

从华中局到区党委、分区党委和县委都成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领导同志亲自挂帅。在军队团以上党委也成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或整风领导小组。领导本单位在职干部的整风学习和指导下级单位的整风学习。

1943 年,整个华中地区各级机关干部都先后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除了抽调部分干部进各级党校(地委以上党校)进行整风学习外,县以上机关在职干部也都在本单位进行整风学习。学习的文件也是中央规定的 22 个整风文件。要求各人学习文件要在粗读、精读、领会和贯通文件精神与实质的基础上,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深入地进行反省,并按文件精神写出自我批评笔记,也就是运用文件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省与检查自己过去实际工作中的问题。每个人都要写出反省笔记,在小组里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华中解放区各级机关干部通过在职的整风学习,对于存在机关内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对于改进机关干部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

华中解放区的党政军干部的整风学习,由于是在战争环境中,从 1941 年下半年起,日伪军经常对解放区“扫荡”、“清乡”,整风计

划常常被打乱。因此整风学习的时间较长,一般地区和单位总在一年左右,有的长达两年之久。

这次华中地区全党的整风运动,包括各级机关干部在职的整风运动,始终贯彻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收获是很大的,效果是显著的,对于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干部的思想水平,改进思想作风,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整风过程中也曾受到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左”的影响,出现过一些偏差和过火行动,产生了一些副作用,但很快得到了纠正。

第九章 华中解放区基层干部教育

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的华中解放区日益扩大,至1941年底总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0万,在这范围广阔的解放区里,基层组织遍布城乡,基层干部人数众多。这里所说的基层干部,即刘少奇所说的“下层干部”。他们包括区乡一级和区乡以下的所有干部,即包括区、乡、保长及民兵、财粮、民政、文教等所有基层干部。直接和人民群众接触较多的是乡保长。在建政初期,基层组织虽已逐步建立,但基层干部十分缺乏,许多地方只好利用原来的乡保长来从事征粮征草、维护地方治安和动员民工支前等工作。这些乡保长思想落后保守,不懂党的政策,更不懂民主的工作方法,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至于区级和区级以下各条战线的基层干部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对党的方针政策懂得很少,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基层干部生活在群众之中,是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他们的思想作风和政策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关系到党的方针政策能否贯彻执行。因此加强对基层干部培训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少奇对区乡以下的基层干部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在华中工作期间,除了抓各级领导干部教育以外,也很强调加强对中下级干部(包括基层干部)的教育。他在离开华中去延安的途中还写信给陈毅,提出要加强中对中下级干部(包括基层干部)的培养教育问题。他在信中提出当前各项工作任务之后说:“为了实现这一切,目前必须经过一个关键,就是经过我们的中下级干部。而中下级干部的状况,则不是令我们完全满意的。他们还很幼稚,没有成熟,没

有必要的理论基础,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党的政策,作风也有很多不正的。这是我们目前一个很大的弱点。因此,用心来逐渐解决这个问题,有极重大的意义,然而目前一下根本解决是不可能的,不解决,一切工作任务又难于完成。因此,除开办党校、组织在职干部学习、整顿三风等外,还必须设法派遣一些较强的干部去任县区工作。还必须在某一个工作任务提出以后,在干部中做充分的动员与教育,使干部理解之后,再去进行工作,并由高级负责人经常检查他们的工作,通过总结工作来教育他们,对于某些专门的问题(如战略策略,战后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等),负责同志应多做讲读,来提高我们的干部。因为他们是直接实现党的政策与执行任务的人,是直接联系人民与士兵的人,如果他们不懂得政策,不了解任务,工作是无法做好的。而过去对他们的教育又太少,故许多问题是由他们发生的。因此,轮流召集他们来比较系统地谈清一些问题,是完全必要的。提高他们,就是提高我们的工作。过去我们许多报告都是对直属机关干部作的(这固然也要),以后应多向下层干部进行教育,才能解决问题。”^①

刘少奇同志在这里所说的“下层干部”,即基层干部。他在这封信中以很长的篇幅来谈对“下层干部”即基层干部的教育问题,说明他对基层干部的了解和对基层干部教育的重视,完全符合华中解放区基层干部的实际情况,也说明加强对基层干部培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华中解放区各级地方政权建立以后,各级党委除了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培训教育以外,也都重视抓基层干部的培养教育。现在以苏中、苏北为例,介绍基层干部的培训教育情况。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32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一、苏中地区的基层干部教育

苏中地区在建政初期对基层干部培训教育工作就非常重视，抓得很紧。管文蔚在苏中第二届行政扩大会的报告中，公布了这样一组基层干部培训的数字。

“全苏中今年一共办过 163 次训练班，受训过的干部 6178 人。这中间：区员以上干部训练班共办 25 次，训练了 379 人。乡保级办事员训练班共办 116 次，训练了 4292 人。小学教师、塾师及社教人员训练班共办 22 次，训练了 1507 人。乡保长训练以四分区各县所办次数为最多，一共 53 次，训练了 1407 人；小学教师及社教训练班以三分区为最多，一共 10 次，训练了 746 人。全部干部训练中，时间最长的是三个月，最短的只有三天。县区以下办的，时间一般很短，次数则较多。”^①后来，管文蔚在 1945 年的工作规划中明确规定：“每县办好一所县学，每区办一所区学，每乡办一所乡学。”用以培训基层干部。具体要求是：“乡学以民兵为对象，着重时事教育和生产、作战技术教育，使得对于时局发展的方向有一般认识。区学是教育村级干部和民兵小队长、民兵英雄和劳动英雄。教育内容，以时事教育、政治教育为主，政策教育为副。县学是教育乡级党政干部和部分区学毕业的民兵英雄、劳动英雄，以政策教育为主，同时也进行时事教育和政治教育。至于教育方法，以联系实际、检查、反省的方法来进行，非万不得已时候，才辅以灌输的方法。”其最终目的是“将我们苏中解放区全部基层干部都提高一步，大量地培植出一批与实际联系着的干部。”^②

1944 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

^{①②} 《一年来苏中政权工作的总结》，《管文蔚传》第 182—183、377 页，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题》的社论,提出“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的问题。为了贯彻这一精神,苏中行署召开了为期70余天、与会代表达100多人的“苏中教育会议”。刘季平主持了大会。大会针对教育是什么、教育应该为谁服务等重大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会议最后阶段提出了一套新学制的方案。建议政府采取施行。据原苏中行署文教处副处长杭苇在《苏中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片断》^①一文中说:“这套新学制的要点是:

1. 新学制的体系及其分工办理。

乡学(基层机构),区学(第二层机构),县学(第三层机构),专门学校(第四层机构),大学、研究院(所)(第五层机构),并规定:

乡学:本乡人民自行办理,乡文教委员会指导,区政府领导。

区学:区政府办理,县政府领导。

县学:县政府办理,专员公署领导。

专门学校:专员公署办理,苏中行政公署领导。

大学:行政公署办理并领导。

2. 新学制的教育对象及其培养目标。

乡学:教育对象为全乡男女成人、儿童;使其能具备必要的社会斗争知识与生产斗争知识。

区学:教育对象为村级干部、优秀群众;培养能在一村范围内起模范作用、推进社会斗争与生产斗争的优秀人才。

县学:教育对象为现任乡级干部或具有实际工作经验可以培养为乡级专门人才者;培养担任或领导一乡范围内各种斗争与建设的专门人才,以及有较高修养的乡级专门人才。

大学:教育对象为专门学校毕业生或同等程度参加实际工作二年以上者,以及任职一年以上的现任县级干部和任职二年以上的优秀区级干部;培养为能担任或领导一县范围内各种斗争与建

^① 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

设的专门人才。”

在苏中教育会议后,全区加强了对基层干部的培训教育,使广大基层干部提高了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改进了工作作风,使基层政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也使许多基层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苏北地区的基层干部教育

苏北盐阜区党委从建立政权初期起,就很注意抓基层干部的培训教育,抓基层政权的建设。盐阜区是以刘少奇、陈毅为首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在刘少奇和陈毅的关心和支持下,盐阜区党委抓基层干部的培训教育很有成效。他们从基层政权建立的初期就狠抓基层干部的培训教育,采取长期与短期结合、正规与非正规结合的方针开办训练班培训基层干部。他们开办的盐阜区党委党校比较正常,除敌伪军“扫荡”外,坚持常年办学,轮流对基层干部加以教育训练。他们还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讲习会和冬学来培训基层干部。干部短训班、常常是盐阜区党委和政府为了完成某一项任务所经常采用的一种基层干部教育形式。

1944年,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的社论,提出“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方针。盐阜行政公署于1945年在阜宁县益林镇召开了文教扩大会议。提出新学制方案,把培训基层干部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现摘要介绍“关于新学制之规定”如下:

1. 村学

(1)将初小一律改为村学,村学为教育之最基层组织,以之进行普及国民教育。

(2)村学之目的,在培养新民主主义政治下之男女新公民,使能具备实际的生活与抗日民主斗争的知识。

(3)村学以教成人为主,儿童为次。

2. 初级干部学校

(1)将高级小学改为初级干部学校,为新学制第二层结构。

(2)初级干部学校之目的在于培养村级以下或村级各种军政民干部及推进生产、民主与战争之各种优秀人才。其尚未及龄之少年,得继续升中级干部学校。

(3)初级干部学校招收两种学生:一为在职的村级干部和村级以上各种干部,其次为村学毕业之儿童,但以教育在职干部为主。

(4)初级干校由区政府负责办理,受县政府领导。

(5)初级干校毕业年限,在职干部为一年至一年半,少年班为二年。

3. 中级干部学校

(1)将初级中学改为中级干部学校,为新学制之第三层机构。

(2)中级干部学校之目的在培养村级及区村之间的各个部门的干部,及推进抗日民主与生产事业的优秀工作者。其尚未成年之青少年得继续升入专科学校。

(3)中级干部学校招收两种学生:一为村级干部,由县保送入学;一为青少年。

(4)中级干部学校毕业年限,实行弹性制,在干班为一年至一年半,青年班为二年。

(5)中级干部学校由县政府办理,受行署领导。

专科学校和大学(略)

这次文教扩大会议以后,为了培训基层干部,盐阜区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二年内做到每村有一所村学,每区有一至二所初级干部学校,全盐阜区开办一些专门学校。1945年上半年,各县要举办三至五所以在职干部为主的初干学校,全盐阜区要有二三所以在职干部为主的中干学校。在下半年,全区的中干学校要转变

为以培训在职干部为主,青年为次的改革。”^①

盐阜区在这次教育改革中,各中小学都把培训基层干部作为主要任务。许多中小学都开办了干部班,培训乡村一级干部以及民兵队长和群众团体的干部。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3月至1946年1月,全区小学中设有成人班的570所,约占小学校数的26%,全区有初级干校108所,在校干部学员7100多人。

盐阜区的这次教育改革,对于培训基层干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过分强调中小学培训基层干部和成人教育,影响了儿童教育,造成有些地方“儿童无学上,干部成人不上学”的现象。这些偏向和问题,在教改实践中不断暴露出来。从1946年上半年,各地开始注意克服和纠正这些问题,逐步得到了解决。

三、培训基层干部的形式和方法

华中解放区除了利用中小学实行新学制培训基层干部外,还利用“冬学”的形式来培训基层干部和教育群众。从1941年冬季开始,在华中解放区,特别在苏中地区和苏北地区掀起了举办“冬学”的热潮。开始办的冬学,主要对象是农村的基层群众,也有基层干部。利用冬春的农闲时间,组织他们进冬学学习文化和政治,其声势之大,热潮之高,人数之多,确实亘古未见。苏中地区在1942年的冬天,行政公署组织中小学教师及党政军干部3337人,前往85个区1035个乡,办起了冬学识字班1437所,识字站60个,用以培训教育基层群众和基层干部。仅仅一个冬天,参加学习的人数就达到12万人以上。整个苏中大地掀起了全民学习的热潮。^②据苏北盐阜区1941年冬学统计,入学者达7万余人。1942

^① 《盐阜区教育资料选编》。

^② 《管文蔚传》第375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年冬形成了更大高潮,入学者将近40万人。^①

1942年以后,各地的冬学逐步扩大到基层干部,把开展冬学运动,作为培训基层干部的一种方法。1943年11月25日,华中局发出了《关于今年冬学运动的指示》,要求“开展冬学运动,广泛教育干部党员与群众。”“确定今年冬学中心内容为政治教育,纠正过去过分强调国民教育,而放松干部教育的偏向,但同时应当不放弃国民教育。”“确定教育中心内容为政治教育,纠正过去某些地方过分强调群众识字教育,而忽视政治教育的偏向,但同时应当不放弃群众识字教育。”同时,还根据各种不同的对象,规定了各种不同的教育内容:“对区委干部与连排级以下干部与党员,应以加强阶级教育为主;对一般群众应以时事教育与生产教育为主”。“指示”还提出了三条要求:“①地县委直接领导与主持军、政、民、学干部与区乡支部教育工作,在较巩固的地区,区党委与地委应开办冬学干部与知识分子党员的短期训练(十天至十五天),经过他们去普遍开展各地冬学。②各区党委与地县委应组织冬学巡视教育团,到各区乡领导督促检查并进行冬学工作。③各级行政部门应开办中小学师生的冬令研究班,动员他们去做进行各区乡的群众教育的干部……”^②

华中局的指示下达后,华中各地区凡形势比较稳定的地区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冬学运动,大力培训基层干部和教育广大群众。在苏中地区,开展的冬学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收到了很好效果。苏北区党委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完成,在苏北盐阜区的各县、区、乡都成立了冬学的专门机构——冬学委员会,编写辅助教材,组织训练冬学教师,组织区际冬学竞赛等。苏中、苏北地区通过这次冬学运动,对广大基层干部进行了普遍深入

^① 《盐阜区教育史》第115页。

^② 《华中局关于今年冬学运动的指示》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的教育,收到了很大效果。

大力培训中小学教师也是培训基层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小学教师本身就带有基层干部的性质,把他们培训好了,又可以成为培训基层干部的教师,有利于培训基层干部工作的开展。

在苏中和苏北地区,对中小学教师的培训非常重视,每年都要利用寒假或暑假举办讲习会、文教研究会、教师研究班等形式,用以培训提高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政治思想水平,澄清思想上的模糊认识,帮助他们转变立场观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中小学教师在抗日根据地的作用,不仅是教育学生,也担负着教育群众以至干部的任务。所以,每年通过讲习会、文教研究会等形式,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对于办好中小学校,教育青少年学生、基层干部和群众都有重要的作用。

每年文教研究会、讲习会等,一般都是以县为单位进行,县委领导同志都要去讲形势和任务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盐城县在1940年底举办的小学教师研究班,刘少奇亲自到会为教师作报告。他说:“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自古以来一直是被人尊敬的。你们都看到,许多人家悬挂的‘天地国亲师’中堂当中,不就有你们一尊吗?可是你们在名义上虽受人尊敬,但待遇却很低薄,犹如老牛一样,吃的粗草,挤出的都是营养丰富的乳汁。”接着他就讲到当前抗日战争形势问题,指出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号召大家要切实搞好抗日民主教育,反对封建教育和奴化教育,要做到为政治服务。

第十章 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

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央苏区和抗日战争的延安时期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干部教育思想。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延安开办了许多干部学校,不仅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而且还创办了许多其他干部学校,培养了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毛泽东对这些干部学校的办学方针、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学校校风都做了一系列指示,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干部教育思想。党中央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出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同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他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干部教育的实践中有许多新的创造,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

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这里所论述的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主要论述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工作的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干部教育思想。抗日战争中,刘少奇在华中局工作期间,对党的干部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十分关心,躬行实践,积根探讨,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干部教育思想,是刘少奇干部教育思想发展的高峰时期。刘少奇在华中工作虽然时间不长,只有两年多时间,但他在干部教育和党的建设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留下了许多重要思想,是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刘少奇关于干部教育和党的建设方面的论著很多,但大部分是在他主持中原局、华中局工作期间写成的。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主要是他在华中工作期间所体现出来的干部教育思想。

1939年7月,刘少奇从延安来华中之前,张闻天曾邀请他到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这个报告第一次论述了他的干部教育思想和建党思想,强调党员干部要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和加强思想意识修养,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他在1939年9月抵达华中地区以后,又多次讲述这一问题。他始终关心培养教育党的干部和加强党的建设,把它作为发展壮大新四军和建立发展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项重要任务。

刘少奇到达华中地区以后,紧紧抓住培养教育干部这个决定性环节。他所到之处,都不遗余力地举办干部训练班和创办干部学校,大力培训教育干部,为开辟新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好干部的准备。

1939年11月刘少奇到达豫西澠池,在第十八集团军兵站内秘密开办的党员训练班上又讲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1月下旬,他到达皖北涡阳县新兴集,用一整天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1940年7月1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在半塔集举行建党19周年报告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报告。并在二师党委机关报《抗敌报》上全文加以发表。号召广大党员努力学习,加强思想修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

1940年10月底,刘少奇到达盐城后,11月中旬组建了新四军和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叶挺、陈毅分别任正副指挥(在叶挺未抵达江北前,陈毅任代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刘少奇在到达盐城之前就开始抓干部教育。他在海安时就和陈毅找有关同志商谈创办干部学校培养干部问题。到达盐城后,他又和陈毅先后找

冯定、孟波等谈话，刘少奇说：“我们党的事业在苏北又有一个大发展，需要培养很多干部，现在要办抗大分校，马上还要办党校，还要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要他们立即着手进行筹办。

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从1940年11月开始到1941年5月先后创办了抗大五分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和华中局党校。

首先是创办抗大五分校。1940年11月抗大五分校正式成立，陈毅兼任校长，赖传珠兼任副校长，冯定任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谢祥军任教育长，谢云晖任政治部副主任。刘少奇特地为抗大五分校题词：“为正义，为自由，为民族的社会解放而战斗到底！”

刘少奇对培养教育军队干部极为重视。他在1941年召开的华中局高干会议和华中军分会上特别强调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养，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的重要性。会议决定，加强抗大五分校建设，并要求各师、各根据地也要开办抗大分校、军政干部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大力培训军队干部。

1941年2月8日，华中军分会又召开会议，着重讨论如何加强军队建设问题。刘少奇在会上提出了建设正规化“党军”的号召。要求新四军要做到：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和命令，完成党的政治任务；要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和坚强的战斗力；严肃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等等。他要求通过对军队的整训教育和抽调干部到抗大分校学习，建成一支在党领导下的能战斗的正规化军队，更好地坚持华中敌后的抗日战争。

其次是创办鲁艺华中分院。刘少奇在领导筹办抗大五分校的同时，也在积极筹办鲁艺华中分院。11月中旬，刘少奇召开了鲁艺华中分院第一次筹委会，商讨学校校址、办学方针、学科设置、招生名额以及师资和干部配备问题。确定学校设在盐城贫儿院旧址，暂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学制六个月。刘少奇兼任院长，丘东平任教导主任。第一期招生400人，于1941年2月8日正式开学。在开学典礼大会上，刘少奇、陈毅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勉励师生努力工作,好好学习,把鲁艺华中分院办成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艺术堡垒。

再次是创办华中党校。在刘少奇的领导下,经过短期的筹备,华中党校正式成立。刘少奇兼任校长,彭康任副校长,温仰春任教育长,傅秋涛任总队长,党校的日常工作由温仰春负责。党校校址设在盐城登瀛桥西南的大仓库里。教学、生活条件很差。于1941年5月23日正式开学。刘少奇对党校师生说:“党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为了使党校能够适应战争环境办学,我们的党校也要军事化,背起背包,拿起枪杆,打仗走路,放下背包学习,农村田间是我们的课堂。”1942年7月,日寇发动对盐阜区的第一次大“扫荡”,华中党校转移到阜宁县的汪朱集,党校师生自己动手盖起了供上课用的大草棚,学员把背包当凳子,用膝盖做课桌,就这样上起课来了。党校第一期开学后,刘少奇经常到党校讲课。第二期开学后,他打起背包住进了党校,长达一个月之久。在华中党校一、二两期内,先后为党校学员讲了20多堂课。他在住进党校期间,一面调查了解学员的学习思想情况,一面对学员讲课,还要处理华中局的重大事宜。为了办好党校,教育党员干部,他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给人留下永远难忘的记忆。

刘少奇在华中地区工作两年半的时间里,是他的干部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高峰时期。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始终抓住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这个决定性的环节,通过作报告、上党课、写文章,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理论。有很多文章是在当时的《江淮日报》和《真理》杂志上发表的。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就有23篇,都是关于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方面的重要文献。刘少奇的这些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理论是很有创造性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所做的重要贡献。这些报告和文章既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又以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状况为依据,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完

整系统的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理论,丰富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理论的内容。它是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的好教材,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

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或干部教育理论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这里对刘少奇干部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做简要的介绍。

一、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是刘少奇干部教育思想的出发点

刘少奇加强党员干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进而取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

刘少奇认为,由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我们党的党员大部分长期处在农村,党员的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家庭,工人成分很少。这些人加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他们中的多数人改变了原来的思想,成为无产阶级战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他们入党以后,不能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改变他们原来的观点和作风。这就必然在党内引起各种错误思想和分歧。因此,对于他们必须进行思想上的教育和改造。

刘少奇说:“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只有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因此,我们党的建

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而斗争,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干部,是刘少奇干部教育思想的中心内容

1939年7月,刘少奇在来华中解放区的前夕,在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号召共产党员“做马克思列宁的好学生”。到华中解放区后,又多次作报告,号召党员干部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不可能的。”^①

刘少奇到达华中抗日根据地之后,特别在盐城重建军部以后,就着手开办华中党校和各类干部学校,花大力气狠抓党员干部的培训,对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

刘少奇亲手创办的华中局党校开学以后,在华中局党校工作的宋亮(孙冶方)写信给刘少奇,提出在党校加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建议,刘少奇很快写了《答宋亮同志》一文,肯定宋亮的意见是对的。并说:“党员在党校学习,应当埋头读书,埋头从事理论的研究。这不独不能因此就叫他作‘学院派’,而且是学生的主要工作。”“过去有人指埋头读书为‘学院派’是完全错误的。”^②在华中局党校开学以后,他亲自住进党校,对学员上课,进行理论教育,前后达一个月之久。

刘少奇要求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做马克思列宁的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15—116、218—21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好学生,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要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也是不可能的。”^①他还指出:“在一些共产党员中,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认为只要自己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就完全行了,学习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进行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都没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只靠家庭出身好,本人成分好,用不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有的同志,虽然一般地承认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工作 and 斗争中,却从来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有这些想法,显然都是不对的。”^②因此,他告诫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甚至可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③“如果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修养,要在革命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上,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要在情况复杂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在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都能够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都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体利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④

刘少奇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在革命实践中形成又服务于革命实践的理论。只要我们密切联系革命实践,去学习它,运用它,掌握它,我们就能够了解周

^{①②③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15、115—116、117、116—1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我们就能够有确定行动方针的能力,能够对革命运动的前途具有信心。”

“正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具有这样伟大的作用,所以列宁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共产党员必须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绝不应该使两者分割开来。”^①

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他说:人所以会犯错误,根本的问题是由于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主观与客观不一致。因而无法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也就无法运用这一规律去改造客观世界。革命实质上就是改造世界。要改造它就要认识它,就要掌握它的规律。有些同志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一无所知,又不经过调查研究去认识它,怎么能不犯错误呢?

三、加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锻炼,是刘少奇干部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刘少奇对党员干部的培养教育,非常重视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他在华中地区不仅先后两次对干部作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在华中局党校还作了《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报告,成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重要补充。

刘少奇指出:“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共产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的。每个党员都是从中国社会来的,并且今天还是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还经常和这个社会一切不好的东西接触,不论是无产阶级或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①

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修养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大家都无例外地需要进行上述各方面的修养。”^②所有这些修养都是必需的,但主要的还是思想意识的修养和组织纪律的修养。

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首先是思想意识的修养。刘少奇说:“我们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这在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主义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我们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要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共产党员怎样进行党性锻炼和修养呢?刘少奇认为一是学习,二是实践。首先是学习。党员在党校的学习过程,就是一种用无产阶级意识去克服以至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的过程。“在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03、10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这样的学习、反省和自我检讨中,去肃清自己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残余以至某些不适合于共产主义利益的最微弱的萌芽。”^①可见,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用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战胜和克服非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过程,是一个思想改造过程。

其次是实践。刘少奇说:“我们是革命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是说,要在革命实践中修养和锻炼,而这种修养和锻炼的惟一目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②

刘少奇为了提高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自觉性,在华中局党校对学员又作了《人的阶级性》的报告。他说:“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是由人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共产党员的党性,是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也是无产阶级利益的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因此,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是党员本质的改造。”^③他把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锻炼,提到理论的高度加以阐述,很有说服力,进一步提高了党员自我改造的自觉性。

刘少奇认为共产党员不仅要加强思想意识的修养,还要加强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为此,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作了《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的报告。他说:“党员在组织上的修养反映着党员个人与党的关系及党员与其他党员的关系。党员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方法和态度,去对待党和其他党员,这就是党员在组织上的修养。”^④

刘少奇首先从党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讲起,他说:“党的组织结构是怎样的呢?这同其他事物一样,是矛盾的结构,是矛盾的统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21、109—11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225页。

④ 刘少奇:《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单行本。

一体,即两个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新的东西而存在。”一切东西都必须是矛盾的统一体。“支部书记和支部成员的结合,或者组长和组员的结合,都是矛盾的结合,即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结合。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有了这种统一的组织才有力量。这种统一的组织就是党——这就是党的基本组织结构。”^①

党的具体的结合形式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结合的具体形态,反映着党内的组织关系,确定党内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所以,“民主集中制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党思想上的一致,保证党组织上的统一。”“党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反映党员与党、下级对上级、上级对下级的矛盾关系。”“只有民主或只有集中都不能达到统一团结。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同时,没有集中,也不能有真正的统一。”^②正确的结构是民主集中制。

刘少奇批判了对民主集中制的错误观点。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但是有很多人却认为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他分别批判了上级正确才服从、上级能力强才服从、上级地位高才服从、上级态度好才服从的错误观点,指出,“所有一切附有条件的服从都是不对的,应该是无条件,绝对的服从。”要反对不服从多数,不服从组织,不服从上级,不服从中央的自由主义。

为了教育党员干部加强组织观念,刘少奇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讲了“愿意”与“强迫”的统一和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他说:“愿意和强迫是矛盾的,同时是统一的;愿意即是强迫,强迫即是愿意。”人的一切行动都是有意识的行动,都是为思想所指导的,就是说,都是自由的,但是人的行动又常常是被迫的。比如农民在炎热的日光下种田,汗流如雨,这不是出于他的自愿,而是被迫的。同

^{①②} 刘少奇:《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单行本。

时这也是自愿去做的,并没有人强迫他,工人的做工也是一样。又如打仗的冲锋陷阵,流血牺牲,但革命战士都自愿去这样做。“所以,愿意和强迫是矛盾的,同时又是统一的。农民种田,工人做工,是被迫的,同时又是自愿的。干革命事业是被迫的,但同时又是自愿的。我们打仗是被迫的,同时又是自愿的。”刘少奇就是用这些深入浅出的道理对党员干部进行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

刘少奇还用“自由与必然”的原理来说明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必要性。他说:有的人害怕党的纪律,怕到党内来不自由,因而不参加党。有些已加入党的同志,要求党给他以自由,这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的自由要求。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不能实现的,客观上是不自由的。“恩格斯说,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就是说,认识了必然性就有了自由,否则就没有自由。”主观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只有认识了必然性,把握了客观的规律,依照一定的规律去行动,方才能得到自由,否则是不自由的。人的自由是有限度的,认识了事物发展的必然性,并且会依照事物的规律去行动就是自由的。超过了这个规律以外,就不能自由。比如中国革命要经过民主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再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中国革命的必然性,认识了 this 必然性,我们就有进行革命的自由。可见,只有按照客观规律行动,才有自由,否则就不自由。

刘少奇也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说:“革命运动是有必然性的,但不能否认主观的能动性。主观的能动性,虽然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但主观的努力可以加速和提早革命成功,可以缩短革命的过程,减少革命斗争中的牺牲,所以主观的能动性也是很需要的。”

刘少奇就是这样用愿意与强迫的统一,自由与必然的原理来教育党员干部加强组织纪律性,收到了很好效果。

四、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克服党内不良倾向, 是刘少奇干部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1941年7月2日,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对学员作了《论党内斗争》的报告,后来又对干部作了《怎样进行党的斗争》的报告。对于为什么要进行党内斗争,怎样进行党内斗争,以及在党内斗争中要防止什么偏向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论述。

刘少奇说:“为了加强我们党员的党性锻炼,我们就要在党内开展一些具体的思想斗争,来反对各种违反党性的不良现象。”他从我们党所处的斗争环境来说明开展党内斗争的必要。他说:“党从出生的那一天起,便没有一刻钟不是处在严重的战斗环境中。党与无产阶级是经常处在其他各种非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甚至封建残余势力的包围之中。这些其他各种阶级,便在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或同无产阶级的联合中,经过党与无产阶级内部不稳定的成分,侵入到党与无产阶级的内部来,在思想意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理论上,在行动上,经常影响党与无产阶级。这就是党内各种错误和不良倾向的来源。这就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这也就是党内斗争的来源。”^①

刘少奇正是从党内的这种情况出发,提出开展党内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党不进行这种斗争,不经常在党内进行反对各种不良倾向的斗争,不经常在党内清除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左’的右的机会主义,那末,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就会在党内发展,就要影响与支配我们的党,就要使党不能巩固发展,就要使党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要危害党,使党腐败下去。……所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8—179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以这种党内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①

但是,“这种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和对立。”“党内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党与教育犯了错误的同志。所以党内斗争本身就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教育;而党内的教育也是一种党内斗争,一种比较温和的斗争。因此教育与斗争是不能分开看的,斗争即是一种教育,教育即是一种斗争,机械地分开是不对的。”^②“只要犯错误的同志不是有意的,并且真正在了解错误,改正错误,那我们就应该欢迎,就不应再去斤斤计较。在党内斗争中,对干部和同志的打击政策,攻击别人和打击别人的政策,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政策是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检讨。”^③

可见,党内斗争不是什么你斗我,我斗你的无原则斗争,更不是去进行机械的过火的斗争,而是“同志间的互相帮助和互相检讨”,也就是一种批评与自我批评。其目的是为求得思想上和行动上一致。刘少奇说:“有些同志还不了解,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斗争,是要在思想上求得一致才能保持与加强党内政治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是要从思想上原则上去解决问题之后,才能在组织上、行动上解决问题。”^④

“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和对立。……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所以没有思想原则分歧的党内斗争,同志间没有原则分歧的相互倾轧,就是一种无原则的斗争,无内容的斗争。这种无原则无内容的斗争,在党内是完全不必要的,对党是有害无益的,每一个党员都是应该切实避免的。”^⑤

刘少奇还指出:“我们的党内斗争,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同

①②③④⑤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8—179、193、212、194、180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时又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必须向这两方面斗争,才能保持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只进行单方面的斗争,如果我们疏忽对任何一方面的警戒与斗争,非无产阶级思想就可以,而且一定从我们疏忽的一方面来进攻党,那就不能保持党的纯洁与独立,不能巩固党。所以党是在不断的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巩固与发展起来的。”^①

刘少奇说:“总而言之,党内斗争基本上是一种思想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在党内一切要讲道理,一切要讲清道理,一切要有道理可讲。否则不行。道理讲清楚了,一切都好办,都容易办。我们要在党内养成讲道理的作风。判别各种道理是否正确的尺度,是党和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利益,是部分利益服从整个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一切道理,一切主张,对于党和无产阶级的战斗长远有利益的,都是对的;不利的,都是不对的。无道理可讲的斗争,讲不出道理的斗争,就是无原则的斗争。”^②“我们同志应该依照这些方法去进行党内斗争,去反对党内各种不正确的倾向,去检查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干部的党性,使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更进一步地巩固起来,这就是我们的目的。”^③

五、用党的战略与策略教育干部,是刘少奇干部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

1940年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指出:“党内至今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他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各种错误便从此发生。因此,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把问题简单化的现象,党应当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并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标准。”随后,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

^{①②③}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16—21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加强党内策略教育的一些具体决定》，规定“在全党的在职干部教育中，党校和党的训练班中，及党领导的干部学校中，把党的策略教育列入正式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考察成绩的重要标准。”

刘少奇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为了系统地提高党员干部的战略与策略水平，在华中局党校专门讲了党的战略与策略问题。他认为党的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懂得党的战略与策略，要学习和掌握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战略与策略，以团结更多的人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他详细阐明了战略与策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位置，以及战略、策略的基本内容及其在革命斗争中的运用等问题。他说：战略是一个政党在一定时期内的总方针、总任务。策略则是指实现这一总方针、总任务的手段。战略有相对的稳定性，在规定的时间内是不变的。策略则有灵活性，主要体现在手段上的多样性。策略属于战略的一部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战略。

刘少奇说：“党的战斗的战略与策略，就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打倒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并且把革命进行到底；在完成民族民主革命以后，经过必要的步骤，毫不停顿地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为此，“这就更加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使用策略上的灵活性”，“必须善于使用各种斗争形式与组织形式，提出适当的口号来实现策略上的进攻、防御和退却。”他说：“为了保证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在进行各种斗争中，必须是能够发展自己与巩固自己，联合大多数，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敌人内部，打击敌人中的极少数，实行对敌人的各个击破。”后来，他又把这种斗争策略用毛泽东的四句话来概括：“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各个击破。”并且在斗争中“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刘少奇认为正确的战略，必须正确处理以下四个问题：（1）弄

清当前革命阶段、性质和任务；(2)弄清在当前革命阶段中谁是革命的领导者；(3)弄清当前革命阶段的主要打击方向；(4)弄清当前革命阶段内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和可以争取的同盟者。这四项要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就是要在认清现阶段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分清敌我友这个革命的根本问题。

刘少奇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学习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战略与策略，不是背诵马克思列宁的词句，而是运用它的精神实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和解决革命问题。

刘少奇还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仅仅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读物上的词句，而在实际工作中一筹莫展的思想懒汉。他说，他们认为地主就是地主，封建势力就是封建势力，再无分析；而毛泽东同志认为地主阶级中必须区别在朝和在野的，区别开明的和恶霸分子。比如说：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再无分析，而毛泽东同志认为必须区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区别大资产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再如，对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也必须做具体的科学分析。如果没有这一科学的分析，也就没有党的战略策略了。还有什么“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界限呢？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区别就在这里。

刘少奇还用对比的方法批判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和王明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阐明毛泽东的“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斗争”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策略的正确性。

刘少奇在华中党校关于战略与策略问题，共讲了四次，说明这个问题的特别重要。他还讲了战略与策略问题在马列主义中的位置，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他阐明了战略与策略的不同内涵及相互关系。“策略是战略的一部分，策略(部分)受战略(全体)的指

导,策略服从于战略。”“在战略决定之后,策略就决定一切”。他还指出由于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以及斗争的复杂性,多样性。“这就更加要求中国共产党在使用策略上的灵活性”。在进行各种斗争中,“必须是能够发展自己与巩固自己,联合大多数,争取中间分子,孤立顽固分子,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分化敌人内部,打击敌人中的最少数,实行对敌人的各个击破。”并且在斗争中,“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些都是刘少奇从战略与策略原则的高度阐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党员干部提高贯彻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①

六、教育党员干部发扬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是刘少奇干部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少奇在华中局工作期间,经常教育干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建立抗日根据地初期,国民党以至敌伪军都在明里暗里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和上层党外人士。因此,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成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在根据地的政权所以要实行“三三制”,要有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政权,就是为了争取团结党外的民主人士。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刘少奇经常教育党员干部:“要抗战,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因此,我们的干部一定要气量大,能容人。”他提出“少树敌人,多交朋友”的口号。教育干部应该重视做好开明士绅、地方名流的工作,尊重他们,照顾他们。华中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1941年11月发出了《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

^① 以上引文均引自温仰春《少奇同志在华中党校》见《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示》，明确指出：参议会是政府的权力机构，不是招牌，政府要办的事情必须参议会讨论通过后，方可执行。

刘少奇强调抗日根据地内要贯彻执行“三三制”的原则，在政权人员的分配上要做到：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雇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大体上各占三分之一。他认为“三三制”原则是“一定阶段上的政治制度”。为了贯彻“三三制”的原则，刘少奇反复强调要加强党政干部的教育和训练，使他们“具备民主精神，学习民主，在各阶层中运用民主”。他认为民主政权建设，行政干部队伍就成为决定性的一环，只有向他们灌输民主观念，他们才会在工作中运用民主，养成民主作风。他要求各级宣传科、教育科，应在关于发扬民主的研究及宣传教育中进行必要的努力，多写文章，多宣传，多作报告。刘少奇也在《江淮日报》和《真理》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党的统一战线和“三三制”政策。

当时，在华中解放区有一些干部不愿意和地主士绅打交道，刘少奇总是耐心细致地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大家，使大家自觉地做好民主人士的工作，使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刘少奇还亲自筹划成立盐阜区各县参议会。他和陈毅派人用轿子、木船等交通工具，把开明士绅和各界知名人士接到军部所在地盐城，共商抗日大计。在他的直接关怀下，盐城县参议会首先成立，刘少奇出席讲话。同年4月2日，盐城县参议会举行第二次会议，各界知名人士济济一堂，共商抗日大计，刘少奇到会作了《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的报告，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受到与会参议员的热烈欢迎。刘少奇的讲话和他团结民主人士的身体力行，是对广大干部的一次生动而具体的教育。

刘少奇在华中局党校专门作了《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的报告，要求党员干部发扬民主精神，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刘少奇说：民主精神是什么？也可以说是平等精神。我们革

命者要有平等的精神,即权利、义务上的平等。“民主精神很重要。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人没有经过民主训练,不懂民主。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有些同志到地方去工作,不懂民主的一套,结果弄成了一个‘官僚’。所以今天来讲一下民主精神很必要,在我们党内也必要。”^①

他说:“我们现在的革命叫民主革命,政府叫抗日民主政府,根据地叫抗日民主根据地,干事情都要讲民主。”但是,“民主有几种。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不仅在形式上不相同,而且在实质、内容上也不相同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不仅要求法律上、政治权利义务上的平等,而且这是最紧要的——要求经济上的平等,要求资本的取消,私有财产的消灭。……有了经济上的平等,于是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法律上、教育上及其他各方面都有了平等。”^②

刘少奇具体分析了革命队伍中缺乏民主精神的问题。他说:“八路军与新四军是真正有民主精神的。在这个部队里,要分出官长与士兵并不容易。”但是在我们队伍里,还有人“不但不去发扬和保持我们的民主传统,而且故意要表示自己与人家不同。我们要去掉把自己爬得高高的,爬在别人头上的等级思想,这是反民主的,要不得的。”“我们干民主革命,如果想要站在人民头上,那就不是革命的胜利,而是革出大批官僚来了。因此,干民主革命,首先应该自己就具备民主精神。我们要在政治上、组织上实行民主,提高党员的民主精神,革去自己的不民主精神。”^③

他说:“在我们同志中并不是个个都能够真正深刻了解民主、具备民主精神的。能懂得民主,而且真正在工作中,以民主精神对待旁的同志、旁的党员的并不多。特别是以民主精神对待党外民主人士的党员干部并不多。”他反复强调要加强党政干部的教育训

①②③ 《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单行本。

练,使他们“具备民主精神,学习民主,在各阶层中运用民主。”他认为民主政权建设,行政干部队伍成为决定性的一环,只有向他们灌输民主观念,他们才会在工作中运用民主,养成民主作风。

刘少奇认为要在干部中发扬民主精神,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因为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很大,“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文化程度不高。官僚主义在今天存在,今后还会存在。所以要肃清官僚主义,是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事情。”“官僚主义寄托在群众的愚昧、落后那种情况上,群众的文化程度低,就有被欺骗的可能,官僚主义也就有可能存在。”因此,“提高群众的文化程度,特别是提高民主精神,进行民主教育,这是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①

刘少奇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是民主精神的反面,没有民主的精神就是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不仅在剥削阶级队伍中存在,甚至在无产阶级队伍中,在共产党内,在无产阶级国家也存在。特别当无产阶级的队伍及其政党成为当权的政党时,官僚主义也严重起来。”为了克服官僚主义,“特别要提高民主精神,进行民主教育,这是我们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办法。”刘少奇认为,发扬民主精神,反对官僚主义,是一个干部作风和党的作风问题。它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关系到党和军队在抗日民主根据地能否站稳脚跟、长期坚持抗战的问题,是必须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

关于刘少奇在华中期间对于教育党员干部,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情况,这里引用原上海市委副书记胡立教在《怀念少奇同志二三事》一文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问题。胡立教在盐城时,和刘少奇住在一栋房子里,在一起吃饭,因而对刘少奇很了解。他说:“少奇同志自律很严,学习十分刻苦。他不下棋,也不打扑克,

^① 《民主精神与官僚主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单行本。

除了处理文电,就是学习,写发言提纲。他从不和人闲聊,和他一谈,就是谈工作,谈政治,谈思想。他在华中,到处办学校,办党校,而且很多课都是他亲自讲授,特别是对华中党校,他自兼校长。他认为中国党从成立伊始,就遇到革命高潮,实际斗争很繁重,没有时间对马列主义理论做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大革命失败转入地下后,也没有抓住时机,理论上准备是不足的。因此,在华中党校他讲了很多课,有一段时间,他干脆把铺盖搬到党校去,和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他讲党的战略策略,讲思想组织修养,讲党内斗争,讲人为什么犯错误,等等,都从实际出发,提高到理论高度进行具体分析,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使广大学员不仅获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受到系统的理论教育,而且极大地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他的《论党内斗争》,就是教育我们如何认识、如何正确对待党内斗争的,他特别反对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和斗争会,指出了它的危害,并提出克服的办法;又如他在《人为什么犯错误》中,指明人由于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不可能不犯错误,但可以要求人少犯错误,不故意犯错误,不重复错误和迅速改正错误。为了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他还概括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少奇同志的这一系列的讲课,对于提高华中地区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从而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和党的战斗力起了巨大作用。”^①

以上所说的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是指他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对党员干部教育中所体现出来的干部教育思想,不是刘少奇干部教育思想的全部,但是他的干部教育思想的主要部分。他后来在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以及建国后关于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对干部教育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这里就没有论述。

^① 《刘少奇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全面系统的干部教育思想。是对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党的干部教育史上的伟大创造,也是党的干部教育思想宝库中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它的许多内容和精神,对于今天的干部教育也有值得继承和借鉴的地方,学习借鉴刘少奇的干部教育思想仍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十一章 陈毅的干部教育思想

陈毅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也是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和外交家。陈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对于培养军队干部，加强军队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和精力，积累了丰富的军队建设和军队干部教育的经验，在军队干部教育理论上有许多新的建树和新的创造，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干部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华中地区和刘少奇一起，在建党建军建政等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干部教育方面，特别在军队党的建设和干部教育方面，有许多新的创造，对于培养军队干部，加强军队建设，提高军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陈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刻体会到培养教育军队干部的重要性。他说：“有了干部，就有人有枪，有钱有粮了。”他还说过：“大江南北有‘三多’，即人多（人口密度高）、枪多（国民党军队在沪宁等地和徐州战区撤退时，遗弃了大批武器弹药于民间）、钱多（经济富裕），对发展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十分有利。但这‘三多’能不能为我所用，就看我们有没有干部派出去发动、组织和领导。”所以，他很重视军队干部的培养教育。

1940年7月，陈毅、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所属主力，从镇江、扬中之间渡过长江，在与先期到达苏北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后，指挥机关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部队改编为三个纵队，同时成立苏北抗日军政学校，陈毅兼任校长，开始培养军队干部。

黄桥决战胜利后,新四军北上进驻盐城。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他和刘少奇一起筹划创办了抗大五分校,他兼任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各师、旅也先后办起了抗大分校、随营学校、教导队和训练班,大力培训军队干部,为发展壮大新四军,建立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创造了前提条件。

陈毅兼任抗大五分校校长后,亲自参与讨论、决定学校的干部、教员的选聘调配,制定教学方针与教学计划,过问学校的重大问题,常到学校对师生作形势任务和重大政策的报告,保证了抗大教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特别是1942年8月召开的华中抗大工作会议,陈毅在会上作了《对抗大工作的建议》报告,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校校风,充分体现了他的干部教育思想,对于发展和提高华中地区的军队干部教育有着重大意义和指导作用。

陈毅的干部教育思想主要是军队干部教育思想,但有一些思想也适用于地方干部教育。陈毅的干部教育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为建设正规化党军而斗争是 陈毅干部教育思想的出发点

1941年7月,陈毅写了《论建军工作》一文在《真理》创刊号上发表。1942年2月,陈毅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军事建设》的报告。这两篇著作是关于新四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集中体现了陈毅的干部教育思想。陈毅在《论建军工作》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建军任务是加强党对本军的政治领导。我们的建军口号是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他说:党军就是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党依靠这个军队去完成政治任务,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党军中必须确保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不断增强这个领导。

1942年2月,陈毅在华中局扩大会上作了《论军事建设》的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正规化党军的任务”,“号召全党全军在思想上组织上为建立正规化党军作严重斗争。”他说:“军部重建之际,指明新四军游击兵团阶段的结束,开始正规化阶段,今后则要求正规化之继续提高,走向铁的党军的伟大的前途。”因此,建军首先是“从政治入手,并先保证党在本军中的绝对领导权”,使新四军成为正规化的党军。

陈毅在《论建军工作》一文中,具体分析和论述了新四军组建后的情况和本身仍然存在的许多弱点和严重现象。“主要的是:①障碍部队正规化的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正规化的程度不够。②只看局部不顾全军总的利益的本位主义。③只顾私人利益忘记革命利益的个人主义。④对党的政策不能完全把握,只是片面的执行,甚至有违反党的政策的过左过右的现象。⑤留恋过去,回忆过去,对新事物毫无感觉,自满自足不求进步创造的保守主义。⑥长期脱离阶级,脱离生产,脱离群众后,使个人架空游离,接受外来影响,冲淡了自己的革命意识,变成资本主义的思想追随者,于是形成生活上的腐化堕落,甚至干部开小差以及个别叛变蜕化的严重现象。这说明干部的党性不够坚强,个别的亦已另找出路,有的正在腐化中,有的正在动摇中,这是最严重的现象。”^①因此,只有依靠大批坚强干部在党领导之下提高党性,力求自己进步并纠正上述严重现象,本军才能前进。这些现象在全军各部队说来只是程度上的不同,绝无根本例外。这说明本军现有力量尚未达到组织得更好,教育得更好,训练得更强,必须要求更进一步来建设自己,改进自己。

陈毅还进一步分析了新四军组建以来的情况和问题。他说:“本军是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集合体,抗战以来吸收了成千整万

^① 《谈建军工作》,《新四军军部在盐城》第78—7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的新成分。这些新成分来自不同的地域,各有不同的历史,出身于不同的阶级,其来本军又各有不同的动机;而部队又处在经常作战不断消耗不断扩大状态中,新的训练尚未成熟,而老的坚强的骨干业已部分伤亡,这些伤亡都是本军的精华,是短时间内所不能弥补的。特别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环境中,斗争极其复杂,外界的不良影响不断于无形中侵入本军。此时不加强党的政治领导与教育,则将发生极大的危险。这是应特别警惕的。”“因此建军便从加强党在军中的政治领导,保持和加强本军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下手。我们的建军不仅是单纯的技术建军,而且是强大的政治建设工作。不是轻视编制组织和技术本领,而是用强有力的党的政治领导去保证一切部门的健全。因此我们的建军任务是加强党对本军的政治领导。我们的建军口号,是为建立正规化党军而斗争。”^①

陈毅提出建设正规化党军的五个条件:一是在政治上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养成全军服从党的领导的天性,执行党的政策的完整性,执行命令的坚决性。二是在军事组织和技术上的优越性,要求达到并超过现代中国军队的军事水平。三是在纪律上要求军事纪律、群众纪律两者并重,提高自觉遵守纪律的热情,做到模范遵守纪律的地步。四是在行政上、编制上、工作制度上、事务处理上,都有计划有组织合乎规律地进行工作,分工是严密的,科学的,同时是极负责任的。五是在作风上充满革命热情,建立宏大的规模,具备雄伟的气派。要“锻炼全军十几万人都有远大的眼光,开阔的手面,丰富的学识,健全的体格,充分的学习精神,严格有规律的生活,这样来造成我军先声夺人威震四方的革命气派和工作作风。”^②

为了建设正规化的党军,必须加强军队的政治建设。陈毅说:

^{①②} 《论建军工作》,《新四军军部在盐城》第81、85—8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政治建设是建军的中心,其主要内容包括五大项:①提高干部的党性;②强化政委制度;③加强政治工作;④健全军队党的组织工作;⑤加强军队的政治教育。这五大项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五个环节,政治建设必须从五大项做起。只有做到这五大项,才能建设好正规化的党军。”

二、加强军队干部的党性教育,提高干部服从党的自觉性,是陈毅干部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陈毅在《论建军工作》一文中说:“‘干部决定一切’的真理,在集中组织集中领导集中指挥的军队中,更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此,加强干部教育,提高干部党性,是建设正规化党军的首要任务。

陈毅从建设正规化党军出发,特别强调对干部的党性教育,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干部的党性。他说:“军队是交给干部去指挥的,是主张坚决执行命令的,几万人的进退生死都决定于一个或几个干部之手,军队的干部是有权在手的干部,是掌握兵权的干部,如其服从党拥护党,运用政策灵活,自己党性坚强时,于革命于党真是无价之宝。反之,党性不强,打个人算盘,领导错误的时候,于革命于党的危险性最大,常常造成危害全局不可挽救的失败。在军队中不仅要重视一般干部的党性问题,而且更特别重视高级干部的党性问题。”^①

陈毅对什么是党性,军队为什么要加强党性教育做了具体论述。他说:“党性是什么?本军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回答得最明确,就是‘一切服从无产阶级的与革命的战斗利益,就是一切服从党,

^① 《论建军工作》,《新四军军部在盐城》第8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服从组织,牺牲个人’,而且这种服从是在多年的革命斗争中,变动的环境中,党的政策策略的灵活运用中,去表现和体认的。胜利环境、和平环境,短短时期不容易作一个同志的党性结论,但在长期斗争中,任何人也不能掩饰的。根据上面的干部情况,所以我们主张本军政治建设以干部教育为中心,干部教育又以提高党性为重心。”^①

陈毅认为党性锻炼就是要求党员养成一种服从党服从革命利益的性格,并使之成为党员的天性,成为极其自然的,毫不做作的。他要求党员干部都向才德兼备方面去修养,提高自己的党性(即党德)。

陈毅还认为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不论是干部中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通过教育增强党性。他说:“在军队中不仅要重视一般干部的党性问题,而且更特别重视高级干部的党性问题。”他在《论建军工作》一文中还对新老党员干部的党性分别作了分析。

首先是对老党员干部的分析,指出:“本军今天掌握了一批优秀的负责干部,能独立领导,掌握路线,于任何情况下,坚定不移,为党奋斗,这是本军的骨干,是经过长期考验的人物,是不怕火烧的真金,是全党应该尊敬的人物。但确有一部分干部尽管是老资格,尽管干革命很久,到今天对斗争感觉疲倦,感觉难以继续支持,残留在思想中的旧社会意识并未肃清,在统一战线的新环境下,与外来资本主义影响遇合,便立即起共鸣作用。这样的分子尽管资格老,地位高,而实际他的心事,早已不在继续革命,他是逐渐腐化,对党对革命正在起离心作用,其结果必然会走到离开党性离开革命的危险道路。”^②

其次是对新党员干部的分析。指出“有更大数目的新党员新干部加入我党我军,这同样是我党我军宝贵的财产,这些新成分有

^{①②} 《论建军工作》,《新四军军部在盐城》第87、80—90、78—7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革命热情,有学习求进步的情绪,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有接受新事物的锐敏感觉,本身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党特别看重这一方面,特别鼓励他们努力服务,但他们的理论与实践均不够用,党性不强,没有经过锻炼,党是希望他们在长期斗争中去锻炼自己的党性。但必须指出这些新成分当中,亦有一部分人存在着不正确的倾向: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不服从组织,强调个人自由,喜争地位不愿埋头工作,喜欢闹无原则纠纷,挑拨是非,无组织的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自高自大不尊重老同志,自以为本领强,服从个人,不服从组织等。这都是小资产阶级习气,随处都与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发生矛盾。牺牲个人呢?还是服从革命组织呢?在他们仍然未能解决这一革命根本问题”。^①

陈毅在对新老党员的党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要求新老党员都要加强党性锻炼。他说:“党性锻炼是要求养成一种服从党服从革命利益的性格,并使之发展成为党员的天性,成为极其自然的,毫不做作的。”

陈毅在分析了新老党员干部的状况以后说:我们有许多忠实于革命、才德兼备的干部;然而从多数干部说来,则无论在党性方面,在知识方面,在能力方面,都极不一致;而且都表现不够坚强不够成熟。因此,提高干部党性,提高干部知识与独立工作能力,是目前部队政治工作的中心方向。

三、加强部队的整训和学习,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是陈毅干部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陈毅从新四军的实际状况出发,强调要加强部队的整训工作。

^① 《论建军工作》,《新四军军部在盐城》第78—7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他说：“本军十多年来创造了强大的革命军队的基础，皖变以来的锻炼，更加巩固和增强了本军的力量，这是一面。另一面本身仍然存在许多弱点和严重现象，这些弱点与现象不纠正是足以障碍本军的进步和执行其政治任务的。”他列举了新四军存在的弱点主要是：(1)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正规化的程度不够；(2)只看局部不顾全军总的利益的本位主义；(3)只顾私人利益忘记革命利益的个人主义；(4)对党的政策不能完全把握，只是片面的执行，甚至有违反党的政策的过左过右的现象；(5)留念过去，回忆过去，对新事物毫无感觉，自满自足不求进步创造的保守主义；(6)生活上的腐化堕落，甚至干部开小差以及个别叛变蜕化的严重现象；(7)执行命令不坚决，工作凌乱无计划性，行动配合不密切；(8)部队纪律要求不严格，仅仅重视群众纪律，对军事纪律忽视的倾向；(9)军事技术落后，战术理论缺乏，军事教育及行政工作薄弱等。这些现象“说明本军现有力量尚未达到组织得更好，教育得更好，训练得更强，必须要求更进一步来建设自己，改进自己”。^①

陈毅从新四军存在的这些问题出发，提出了要加强部队的整训和学习。他“号召全党全军以扩大部队发展部队的前进精神，来进行整训工作和学习工作”。他说：“我们的干部长期生活于游击环境，流动游击，广泛发展，独立应付，大刀阔斧地下是其所长。但另一方面养成不习惯于做耐心的教育整训工作的情绪。”必须通过整训和学习来纠正这些不良倾向。

陈毅指出：过去部队也有过整训，但有许多不足之处。“华中部队差不多都经过初期整训，但时间是短促的，因此整训工作是短期突击，对应付临时情况上获得经验，对根本的建设并无经常工作，一曝十寒，并未能改变现状。”“过去我们的部队整训，一般趋向是注意战士的整训，全部精力用在战士身上，对干部整训反面忽

^① 《论建军工作》，《新四军军部在盐城》第78—7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略。由于干部的军事、政治、文化水准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影响到对战士的整训,不能在质量上有日新月异的提高。师不高弟子也不强。”“过去我们的干部整训一般的注意到政治学习,党性锻炼,军事学习竟被忽视,文化学习更未提起。由于文化水准低,使学习工作仅在门外摸索,不能接近更高的水准。军事学习既被忽视,自然影响到军事技术不能提高。”^①

陈毅批判了军队中不耐心做教育整训工作和不耐心做组织建设工作等偏向,以及不习惯于做耐心教育整训工作的思想。如“我愿意到前线去打仗冲锋,不愿搞整训工作。”“整训整死人,整训无用,过去不整训有了大发展,今天这样整训,整不出金子银子。”陈毅指出:这些观念是我们军事建设的大障碍,必须耐心去克服。他“号召全党全军以扩大部队发展部队的前进精神,来进行整训工作和学习工作。奖励整训有成绩、学习有成绩的干部,处分逃避整训、逃避学习的干部。把整训捷报、学习捷报提高到与战斗捷报一样高的地位。学习、整训、建设工作的落伍者,等于战场上的逃兵。”^②

陈毅在指出过去整训工作的缺点以后,明确指出:“我们今天的整训工作,是抓住整训机会,用整训部队的方式来进行根本的军事建设。”“干部间、部队间均采取轮训制度。每个干部每一年均应受训三月,每个部队每季至少整训一月,一般行军作战期间的整训还不算在内。整训部队要求有计划性,要求有自觉性。”^③

在陈毅的加强部队整训和学习的思想指导下,全军掀起了整训和学习的热潮。通过集中整训和学习,使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军事素质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①②③} 《论军事建设》,《陈毅在盐城》第353、352—353、353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四、加强军队在职干部的业务教育和文化教育,全面提高军队的素质,是陈毅干部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毅在军队建设上除了重视政治教育、军事教育以外,也很重视军队的业务教育和文化教育。他要求新四军各部队建立教委工作,以使业务教育、文化教育作为建军干部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他要求各部队应办文化补习班使所有文化较低的干部轮流入学。可编订专门文化材料使能一期读毕。一直把文化程度提高到能自由阅读和写作为止。在职负责干部的文化教育,可指定专人担负文化教员,每日教二小时,从写信、作文、修辞、写日记、阅读新闻报纸及文学作品等做广泛的指导,要在半年即可达到比较熟练的程度。

陈毅指出:在职干部应以业务教育为中心,做什么学什么,为工作而学习,使学习与工作密切联系,以造成大批专门家为目的。他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一个专门干部比较百个无专长的干部,其作用更大。一个人想深入各方面,想使自己成为多方面的人才,这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我们的革命运动是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伟大的社会变革工作,我们不能拥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大批专门家,我们的革命要想成功是不可能的。我们鼓励干部党员努力去做专门业务的研究。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发动学习军事的热潮,在学习军事时更要进一步去学习总的军事学中的某一个专门业务。”“因此我们除使党员干部具有党的一般知识外,还应该使我们每个人具有特殊专门知识。”“所谓‘在一行说一行’,‘把本行弄好’,‘三句话不离本行’,‘家财万贯不如薄艺随身’,这些俗话均有一部分真理存在。党员和干部都有专门知识,结合千万专

自大的情绪便障碍着我党与一切非党同志的合作。党员应了解我们共产党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绝不仅是党本身的力量,我们共产党员之所以受人尊敬,绝不由于他的自高自大。共产党能完成一个革命,除依靠党本身力量而外,还要依靠千千万万的非党群众的共同努力和共同奋斗。共产党本身是先锋队,任何革命只依靠先锋队是不可能胜利的。先锋队的伟大处不仅在于他能冲锋陷阵作英勇牺牲,而且在于他能领导千百万群众作自己的后备队,共同前进。先锋队脱离于与自己后备队的联系,自己必然失败,这是列宁留给我们党员最宝贵的指示之一,是不应该忘记的。”

“第二,非党干部,和尚未取得党籍的同志也常常有一种偏向:因为看见共产党内尚有某些弱点,某几个党员的落后行动,便因而对党对党员有着轻视的心理。同时又因为自己尚不能立即取得党籍,便误会党的组织对他歧视。特别在军队中,党的会议不能参加,便误会是不相信他。某些党员对他采取不正确态度,他以为是党也在怀疑他,这些情绪都是不正确的。这只能证明一事实,即他们对党和本军的认识 and 了解尚差。我们以为非党同志应该放弃急躁心理,应该努力自己的修养,充实自己的工作。党不仅不歧视非党同志,而且随时想在非党同志中去选拔人才。只要你自己修养到家,工作够份,党一定能发现你的。”

“第三,党领导机关为了健全党员与非党员间的关系,应依照下列原则:新老干部发生纠纷责备老干部,党的干部与非党干部发生纠纷应多责备党的干部,党员与非党员发生纠纷应多责备自己的党员。这里是强调党员的模范作用和领导作用,所以是正确的。党的机关还应多注意非党干部的教育,本军的各种会议尽可能让非党干部参加,关于政治形势和任务的讨论会议等亦尽可能让非党同志参加。”^①

^① 《论建军工作》,《新四军军部在盐城》第91—9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陈毅的这种对非党干部的政策和态度,体现了他的深远眼光和伟大胸怀,体现了他对非党干部的体贴和关心,体现了党对非党知识分子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六、努力办好抗大,大力培训军队干部,是陈毅干部教育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1941年12月17日,党中央做出了《关于干部学校的决定》,对干部学校的教学方针、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贯彻中央决定的精神,陈毅先是在1942年2月召开的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在《论军事建设》的报告中提出“加强抗大工作”的任务,接着又在1942年8月专门召开了华中抗大工作会议,陈毅在会上作了《对抗大工作的建议》的讲话,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抗大的教学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抗大的校风。这两次讲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陈毅的干部教育思想。他根据中央决定的精神,创造性地提出了办好抗大,加强干部教育的思想主张。

陈毅早在《论军事建设》的报告中,就提出“加强抗大工作,建立抗大教育系统,以抗大为训练军政干部、创造军政干部为中心”的思想。要求“抗大各分校以训练连排干部为中心任务,军属抗大分校以训练团营干部为中心任务,各旅团教导队以训练班排干部为中心任务”。同时指出:“抗大性质从政治上说是党领导的学校,锻炼党性整顿党风为基本任务;从业务上说是军事学校,培养军政指挥干部,是建军的推动机。要把过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抗大,提高到建立正规军干部大学的新阶段、要求各地抗大来一个彻底的转变。”^①

^① 《论军事建设》,《陈毅在盐城》第361页,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陈毅在华中抗大工作会议上所作的《对抗大工作的建议》^①的讲话中,对抗大的性质和任务,抗大的教学方针、原则和方法,以及抗大的校风做了系统的论述,对如何进一步办好抗大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现将其要点介绍如下:

(一) 抗大的性质和任务

陈毅指出:“抗大是党领导的革命学校,它与一般政治学校不同。抗大是党领导的革命军事学校,又与一般的军官学校不同。”抗大是“为训练军队的军政干部而创办,为训练大批军事工作干部、政治工作干部以及其他军队业务干部而创办。”抗大在“政治上发扬我军的工农武装的革命特质,通晓我党政策执行我党政策,忠实于我党的革命事业为主要教育任务。”他还指出:“抗大性质从政治上说是党领导的学校,锻炼党性整顿党风为其基本任务;从业务上说是军事学校,培养军政指挥干部,是建军的推动机,要把过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抗大,提高到建立正规干部大学的新阶段,要求各地抗大来一个彻底的转变。要加强抗大工作,建立抗大教育系统,以抗大为训练军政干部、创造军政干部为中心任务,军属抗大总分校以训练团营干部为中心任务,各旅团教导队以训练班排干部为中心任务。军政干部必须经过抗大一期始为合格,建军首先从改造和提高干部入手,抗大应负起这一任务。轮流调全军干部入抗大受训,受训期间延长到一年至二年,学生质量严格选择,质量不合格者勒令退学,宁缺勿滥,纠正某些部队首长专送不好的学生入学的倾向。”

陈毅在谈到抗大的教育任务时说:“学校为训练军队的军政干部而创办,为训练大批军事工作干部、政治工作干部以及其他军队

^① 参见洪学智、薛霖桥:《华中抗日革命熔炉》,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业务干部而创办。政治上发扬我军的工农武装的革命特质,通晓我党政策,执行我党政策,忠实于我党的革命事业为主要教育任务。在军事上以研究和通晓军事业务、掌握军事技术为主要教育任务。抗大是党领导的革命学校,它与一般的政治学校不同。抗大是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学校,又与一般军官学校不同。政治上发扬我军工农武装的革命特质,军事上精通军事理论和技术,两者互相结合,便是抗大的基本教育任务,而在这基本任务中又以提倡军事学习,训练军队干部为其主要特点。学校内注重政治教育,不仅不妨碍其军事教育,更是使军事教育增加。正确的完整的马列主义的政治教育,绝不会有轻视军事学习的观点的发生,更不会在党领导的抗大军校中有忽视军事学习与军事教育脱离关系的现象的发生。”

(二)抗大的教学方针

陈毅在《对抗大工作的建议》的报告中首先提出“要求彻底执行党中央的新的教学方针,彻底审查和转变抗大教学方针,是今后华中抗大工作的中心任务”。

陈毅说,党中央指出:“一般干部学校教学上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践脱节、所学非所用、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存在。”因此,“理论与实际一致,所学与所用一致(做什么学什么)、教育与作战联系,这是我们军队教育上学习上应该采用的三大原则。”他引用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说:“马列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因此理论与实践,所学与所用一致,应该是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要学生能够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目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去指导实践。”“这是我党中央提供的完

整的教学方针。”

陈毅指出：“这一方针运用到军事教育与学习上，就是要学生通晓一般的战略战术原则和马列主义的军事原则。从军事理论的学习，把握军事科学中的规律性。而同时又要使学生能够根据一般的军事原则去研究目前的实际的作战经验，总结中国革命中过去各时代的战争经验，去发现和体会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去提高学员指挥实践的能力。不仅能够讲，而且能够做，不仅懂得大的问题，而且学会小的动作和技术。不仅能在讲堂上背诵讲义，回答问题，而且要在出校后在战场上真正能够指挥部队打胜仗。”

“但是，这一方针，仅是一般的原则说明，运用到华中总分校与各抗大分校，则应分别学员对象，如团级营级连级等职之不同而应有所去取。又要根据教员学员的理论程度、工作经验多少，采取灵活的运用。”如果好高骛远，把延安学校和抗大总校的课程教育计划照样做下去，虽然口头上空喊执行中央的教学方针而实际上违反它，于是不管你学校和教员如何努力，而学员一是听不懂，二是记不清，三是出校之后不能用。因此华中各抗大应根据实践去讲授理论，根据理论去总结实践，作为教育与学习的总方针。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教员的任务不仅限于讲解书本，而在于帮助学生如何去运用书本知识，以总结其本身的工作经验。学生的任务，不仅限于熟读讲义和课目，而在于能领会课目讲义所包含的精神和实质，并能进一步启发他对实践经验的了解，并提高他今后指挥作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总之，“是为了实践而学习理论，为了打胜仗提高工作而进学校，为了养成一批军队工作干部而办抗大。”

为了贯彻执行抗大的教学方针，抗大的教学工作必须“在教员和学生两方面均应反对学习与教授时的教条主义。教员的教条主义，不在于他根据书本而在于脱离实际的照抄书本，死背死诵书本；学生方面的教条主义不在于他喜学高深理论，而在于他只记字

母只满足于文字的表面,以此沾沾自足,忘记为实践而学习的目的。”

(三)抗大的教学内容

华中抗大以训练团营连排干部为教育对象,在教学内容上,一是政治教育,二是军事教育,三是文化教育。陈毅指出:“政治教育应该以整风教育,时事教育,党的政策,政治工作建设和办法,根据地情况,民主政府法令,华中局通知和决议,我军革命传统为具体教材,而以党的政策、政治工作建设,作为政治教育的中心。以毛著《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整顿三风文件为基本读物。马列主义的专门研究,我以为只适合于团以上有独立研究能力的高级干部,而不是目前华中各抗大的事,如认为必要,只可列为专题报告。我们应该以党的政策为中心,帮助学员去了解马列主义的方法和理论。由具体问题逐渐上升到原理问题,而不应该倒转逆行,从空中掉下,弄得不着边际。”

“军事教育应该分成理论教育与技术训练两大部分,理论教育包括战役战斗,指挥原则。讲一般战术原则,而以毛著游击战略及步兵战斗条令,步兵操典为基本读物,以总结华中各实践经验为具体研究的方法。技术训练注意适合近战要求的需要,战斗指挥注重班到营的指挥方法,以营连为中心。”“军事教育和学习应多进行演习。军事技术,应多做少讲。军队干部应首先懂得军事。军队干部于懂得和注重党的一般政治政策之外,应以专门研究军事把自己造成军事家为根本学习任务。军队政治工作干部首先自己要学军事并应提倡和领导其他同志进行军事学习,转变忽视军事学习的恶劣空气”。

“文化教育是开辟我们工农干部研究军事政治的蹊径。不首先打通这条路,自己将永远为高深研究的门外汉。同时本身所积

累的经验,也无法总结,无法外传。”“文化学习应放在入校初期,应创造半年为一期的文化学习的突击计划。”“文化课应以帮助学员读、写、做为主要办法。多读多写多做,是学习文化的无二法门。”

(四)抗大的教学方法

陈毅对抗大的教学方法也做了精辟的讲解。他指出:“教授方法的毛病,是以讲授为中心,而不是以帮助学员了解和运用为中心,讲授只根据书本,而不是根据学员理解程度。讲授只根据教员的本领,而缺乏照顾学员的具体情况。忙于使学员背诵和抄录书本的字句,而不能使学员去领会和运用书本内容。不去变书本知识为学员知识,而使学员永远站在书本之外作书本结论与条文的奴隶。教课前的准备,教课时的部署,以及课后的指导,没有造成完整的联系,不了解课后的指导如复习、问答、漫谈、个别质疑和讨论,发动和组织学员的争论,乃是教授的重心,不了解课堂讲授只是教育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终结。”

陈毅还认为,教师不仅要在课堂上讲好课,还要对学员进行学习指导。在指导学员学习上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要“善于启发学员的自觉学习精神。任何学习上的成就主要依靠个人去钻,要提倡钻的精神。个人能够钻,教员的帮助和集体学习才有根据,不应该使集体学习和互助学习来代替个人努力钻研研究的地位。个人主义的学习应该反对,而个人专心学习则应该提倡”。第二,“有人提出反对分数主义的口号,这是片而的、不正确的提法。学校根据测验以鉴定学员的学习成绩,以鼓励学员的学习,这是可靠的方法。因此在校学员应该以领会课程为主要学习任务。如因此而得到优等的分数鉴定,应该是学习的模范。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则根本取消了入学受训的目的。”第三,“对在校学员的思想意识的锻炼,应该是主要的教育目的之一。学员入校前、在校时与出校后均

因情况不同因而表现不同。因此学校教育工作、政治工作对待这一问题,宜依据学员的历史的发展,做深刻的帮助和思想指导,不能以其在校的短期表现为标准。要使学员懂得在校学习即可表现他的党性和他的思想意识,学校还应从学习表现方面去检查学员的思想意识和党性。”第四,“学员的时间和健康应特别爱惜。上课时间、自习时间、休息时间、课外活动时间应严格分开。纠正以课外活动侵占休息游戏时间的不健全现象。一个紧张学习者每日给他一小时到两小时休息徜徉,让他停止思索,恢复疲劳,或让他个人去对学习内容做独特的咀嚼,对于学习效果帮助很大的。”第五,“对各级干部学员应有分别,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生活管理和教育训练。将将与将兵方法是两样的,因此教育干部的方法与带兵的方法也是两样的。”

陈毅认为“不管是学员学还是教员教都是解决接受别人的经验问题,因为不论是马列主义理论,还是军事科学,都是前人经验的总结,教员的任务是把这些经验总结——理论输入学员头脑中。但在灌输中,学员有容易接受和不易接受之分,不懂得不理解是难以避免的。这时教员的任务就是对学员进行辅导,释疑解惑,解决这一学习中的矛盾。”他还指出:教学过程是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他说:“学员除他本身的革命经验外还努力想获得新的知识,而课堂讲授的一些知识,都是以往的革命经验的总结,对学员来说都是别人的,或前人的经验总结。教员对讲授的课目,也是自己来讲别人的东西,与学员不同处是在他接受和了解多一些。学生努力学与教员努力教,便是共同努力去解决接受别人的经验的问题,去经过接受别人的经验以改造自己的经验的问题。这一工作过程,是艰苦的思想锻炼和精神活动过程。教员与学员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一过程是一致的。但前人和别人的经验要灌输在教员的头脑中,再由教员输入学员头脑中,其中有容易接受与不易接受的各部分,无形中构成一种拒抗性,即构成学习中的矛盾。学习中的问答和

质疑即是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不多多启发这种矛盾,不能正确解决这种矛盾,学习过程的根本完成是不可能的。又教员与学员有共同解决学习困难的一致性,可是在其解决学习困难的过程中,又因教员学员的观点思想方法个性之不同,事实是构成不能完全吻合的矛盾。因此正确的教授法和正确的学习法,均应深刻调查研究双方情况,适当的具定出办法,以适应学习上的思想锻炼和精神活动的过程。这便是我们革命军队干部学校的教授方法的研究出发点。我们的教员学员的师生关系,是建筑在同志的关系上,建筑在为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共同政治要求上。不仅应该如世俗所说的尊师重道的精神在学员方面应该提倡,而同志们互相学习教学相长的精神,同时也应该提倡。每每我们的学员在实际斗争经验方面一般比较教员要丰富,此为我们的学校比一般旧式学校的教学生活根本不同点之一。耐心仔细去进行思想指导和思想合作,这就规定教员学员间的正确关系。这里有任何粗枝大叶,任何马虎儿戏态度或带着一些雇佣性格,均与教育任务之完成是根本妨害的。”

(五)抗大的革命校风

毛泽东曾为抗大制定了三句话八个字的“三八”校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作风。

陈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抗大提出创造优良革命校风的号召。他说:“创造优良校风仍是抗大工作中的斗争任务,严格的军事生活之锻炼,我军传统作风之解释和叙述,军队铁的纪律的遵守,军队指战员间的革命的友爱,革命军人的自觉的学习和工作精神,这是创造优良校风的具体内容。”“学校生活应该有其严格紧张的一面,即对工作任务是负责的,对纪律制度是严格遵守的,对课

日和操场是以与战场同等的紧张精神去对付的。敌情观念在学校生活中,仍不应去掉,而养成古人请缨杀敌、击楫中流、闻鸡起舞的志趣和决心。学校生活在严格紧张负责任守纪律的条件之下,应该养成活泼团结重视民主的优良习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帮助同志,尊重战友,不损人利己,不同俗自媚,不争功自大,遇事虚心请益,不矜骄自私,忧国忧民,这是革命军事干部应有的德性和风度。工农革命武装为我军的特质。这一特别品质,即是我军传统作风的基点。创造校风,更应以发扬和保持这一特质为主要依据。校风之创造,是造成良好的学习与修养的环境,更加熏陶和提炼干部的优秀政治品质,更加提高和增加干部的实用的军事技术,使每一干部踏足校门,即有新鲜的感觉,而便利他从事学习和修养。从正确的教学方针上,正确的教学方法上去创造良好的校风,这里就需要学校的主持者,教职员们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工作关系,能正确配合提高到可资师法的程度。在这些方面值得华中各抗大工作同志去努力奋斗。”^①

陈毅《对抗大工作的建议》对于干部教育做了一系列论述,全面系统,寓意深刻,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是一篇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学。陈毅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陈毅《对抗大工作的建议》一文,刊登在新四军军部出版的《军事建设》第二期上。在这篇文章中,对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做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他从战略高度阐明了加强军队干部学校教育训练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干部学校的教育路线、方针、原则和方法,他的这一系列指示开阔了学校工作人员的眼界,明确了教学工作的方向,使军队干部教育工作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① 以上均引自《对抗大工作的建设》,《华中抗日革命熔炉》第47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陈毅为了办好各抗大分校,经常深入到各抗大分校去了解情况,检查工作。当时,华中各抗大分校,分散在新四军各师的战略区,处在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反磨擦的敌、顽、我三角斗争十分激烈的地区。在这样艰苦的战斗环境中,陈毅经常长途跋涉,日夜兼程,深入到抗大分校去听汇报、做调查、作指示。1943年春,他去淮北抗大四分校,过洪泽湖时,豪情满怀,作诗一首:“扁舟飞跃趁晴空,斜抹湖天夕照红。夜渡浅沙惊宿鸟,晓行柳岸雪花飞。”他在四分校住了几天,学员们唱着“新四军,向你敬礼”的歌欢迎陈毅军长。陈毅腰束宽皮带,系着左轮枪,军容严整,英姿勃勃地给干部作报告。他和群众打成一片,在欢迎会上唱《马赛曲》。在五分校,陈毅亲自讲《抗日游击战争》课程,亲自修改学校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讲稿。在八分校,他深入了解教职员的情况,对教员健康关怀备至。由于根据地物质条件艰苦,学校提出“白天多做事,晚上少点灯”的口号,办公室灯油的使用规定得很严格。为了保护教员的健康,陈毅指示,教员备课所点油灯可以增加两根灯芯。陈军长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教员们深为感动。陈毅和教员谈心,下围棋,更是常见的事。九分校按照新四军的指示,从苏南茅山地区突围到淮南后,陈毅前往学校看望师生,并说:你们日行百余里,爬山、渡江、过铁路,经过了龙潭虎穴(指青龙、白宪二山),你们干得好!

陈毅对干部教育工作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关心军队的干部教育工作,而且也表现在关心地方干部的教育工作上。他常到华中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华中卫校,以及盐城中学、联立中学等院校对师生作形势与政策报告。深受师生们的欢迎。他对干部、学生讲课、作报告,不但有理论,有实际,口若悬河,通俗易懂,而且风趣生动,妙语连珠,引人入胜。这里引用作家许幸之所写的《将军妙语绝人间》一文所记载的陈毅在抗大和鲁艺对师生讲课的一些生动具体情况:

陈毅有很高的讲课艺术,他在抗大、鲁艺对师生讲课中常常讲一些故事或风趣诙谐的话,使人听了不仅好记好懂,而且妙趣横生,引起哄堂大笑。在一次对“抗大”的学生和各部队连级以上的干部讲话中,“鲁艺”分院的部分师生和干部也被邀请参加听讲。陈毅在讲到军风纪的时候,他觉得太热先是解开胸前的纽扣,接着便索性把上衣脱下挂在身旁的椅背上,然后带着风趣的口吻说:“同志们别以为军长演讲的时候既然可以脱去外衣,那么,我们上操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打赤膊呢?”引起干部和学生哄堂大笑。接着他熄灭了一根烟头,又点燃起一根烟说,“也许还有的人认为军长既可以在讲台上抽烟,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课堂吃东西呢?”又引起一堂哄笑。“如果你们要选择来谈军风纪的话,那么,我就要问你们:‘为什么我能带兵,而兵不能带我呢?’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又引起一阵长时间的鼓掌哄笑。在这笑话中教育大家军队在政治上是平等的,但在组织上是分上下关系、遵守纪律的,不是绝对平等的。

陈毅又讲道:“当我们的部队从山沟沟里开进城来的时候,有一些同志没有见过电灯,他们老是看着灯,心里想,怎么不加油就会发亮呢(哄堂大笑)? 甚至还有些土包子,竟然还用旱烟袋凑上去吸烟(哄堂大笑)。闹出许多笑话,被老百姓看不起,说我们都是乡下佬,没有见过世面。……我说,既然不懂,为什么不去问一问懂了的同志怎么会有电灯的? 这岂不是很好的学习么(哄笑)?”

接着他批评部队里发生的一些奇怪现象:“最显著的一种现象就是,我们的部队从山沟沟里开进城来之后,忽然发现一些干部嘴里发出了亮光(党员、干部都互相觑视,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原来,大家都镶起‘金牙’来了(哄堂大笑),试问这有什么美观呢(哄笑)? 据调查,原来这些同志们因为接到家里的汇款,有钱没处藏,就跑去装金牙了(哄笑)。为什么不把父母亲辛辛苦苦寄来的钱,买两双新鞋袜,或是买两筒新牙膏一支牙刷,把牙齿刷得干净一些呢?”

我可以告诉你们，嘴里装‘金牙’并不美观，把牙齿刷得干净雪白，那才是真正美观呢！

“第二个现象是：从山沟沟里打了几年游击，同志们一旦到城里来，就想成家立业讨老婆了（哄笑）。同志们不想想，鬼子还没有赶出国土，老百姓们还没有安居乐业之前，我们就想‘成家立业’吗？这是一种错误想法。……我还听说个别同志用野蛮手段追求从上海来的女同志，追求不到手就说人家‘思想落后’，难道那个女同志一定要嫁给你才算‘思想进步’吗？我说，要追求女性么，也得自己先努力学习啊！同志们不但要打仗，还要学文化，要有一定的教养。她们从上海来的女同志，都受过一定的中高等教育的，难道要她们爱上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大老粗’，才算‘进步’吗（哄堂大笑）？”

“第三个现象是：现在部队里很流行‘打游击’这个名词。什么叫做‘打游击’呢？就是把其他同志手中所心爱的东西抢去据为己有，甚至不告而取谓之‘打游击’（哄笑）。其实，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中国有句俗话说：‘不告而取谓之偷’，现在都美其名曰‘打游击’，试问这和偷有什么两样呢（哄笑）？中国古书上又说过，‘君子不夺人之所好’，即使你是告而后取，但是你如果是夺人之所好，也还是个‘小人’，‘小人’就是‘坏蛋’（哄堂大笑）。……这样的人我们部队里是不容他存在的。”

“还有一种倾向：在我们部队里还残留着‘原始共产主义’的习气。例如在某一次战役中，打死了一个日本军官，接着就俘获一匹敌人的战马。同志们没法喂养它，结果就把那匹战马宰了，一个人割一块马肉分开吃掉了（哄笑）。这是多么幼稚的共产主义呢（哄笑）？我们为什么不能喂养它，训练它，让那一匹马为我们服务呢？”

“有一个冬天，我们某一个部队里逮捕了一个大汉奸，在枪毙之前，把他身上穿的皮袍剥了下来，对那个大汉奸倒是轻而易举地枪毙了。可是对于那件皮袍却没有办法处理（哄笑）。结果是把那

件皮袍较得粉碎，每一个人割下一块皮子垫鞋底了（哄堂大笑）……试想想这是多么愚蠢的共产主义呢？那时候，同志们为什么不想到把那件皮袍保存起来，留给为抗战而受伤的同志们穿，或是送给生病的同志们去保暖呢？要是这样做，才称得起同志的爱，才称得起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呀！……”

最后在一阵长久的雷鸣般地掌声中，结束了他那深入浅出、风趣幽默，而又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一次报告。

陈毅对干部上课作报告，就是这样既联系干部、学员的思想作风实际，从生活小事上来进行具体分析，内容丰富，寓意深刻，使干部学员在生动愉快的气氛中接受着深刻的教育，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许幸之在回忆陈毅的这次整顿军风纪的报告之后，特借用赵朴初的“将军妙语绝人间”的诗句，来形容陈毅讲话的艺术和风格。

第十二章 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一、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基本特点

华中解放区是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经过新四军、八路军广大干部战士的浴血奋斗，逐步建立起来的。华中解放区的各类干部学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干部教育思想指导下，在刘少奇、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借鉴延安干部学校的经验，结合华中解放区的实际，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我们今天总结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研究干部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干部教育发展的思路和方法，固然要从今天干部教育的实际出发，但也决不能忘记或忽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经验，以及它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特别是近代干部教育史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探讨抗日战争期间干部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应该从全国解放区包括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历史实际出发，研究总结解放区干部教育带有普遍性的干部教育经验，从中探索和发现干部教育的规律性。特别是要研究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半年左右）内，使受教育者能够在思想上发生显著变化，在认识上产生新的飞跃，这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就是要总结在这种特殊环境下的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从中找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

综观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有如下特点：

1.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是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指导

下,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既继承了中央苏区和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优良传统,又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有新的创造和发展。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有许多新的创造,逐步形成了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期间,他就把干部教育作为苏区教育的核心,领导创办了各类干部学校,为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并在培训干部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到了延安时期,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抗日救国的任务。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把培养抗日干部放在重要地位。毛泽东在新的干部教育的实践中,既借鉴苏区的干部教育经验,又总结新鲜的干部教育经验,使他的干部教育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系统的干部教育思想,并进一步达到成熟的程度。这主要表现在毛泽东关于干部教育的一系列论述和党中央做出的两个《决定》上。这两个《决定》一个是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另一个是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这两个决定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对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干部教育的方针、原则和方法以及对干部教育的领导,都做了原则的规定,使党的干部教育理论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理论的完善和成熟。所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教育上的革命》的评论文章,说它是“反对主观主义精神在教育上的具体运用,是培养干部的新纪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新革命”。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根据毛泽东的干部教育思想和两个《决定》的精神,借鉴苏区和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的经验,开办了各类干部学校,大力培训各类干部,并在干部教育实践中有所创造和发展。刘少奇和陈毅在开辟华中解放区的过程中,紧紧抓住培训干部这个革命链条中的中心环节不放,培

训了大量干部,并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新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干部教育思想,即前面所说的刘少奇、陈毅的干部教育思想,这是对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在刘少奇、陈毅的干部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事业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先后创办了几十所各类干部学校,培养了20多万名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条件。

2. 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是在战争烽火中培训干部,中心任务是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服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伟大的抗战运动,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与之相配合”。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教育事业是抗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要“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抗日干部。”^①“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教育任务,第一是为抗战培养干部,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②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就是在毛泽东干部教育思想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所有的干部学校都把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作为首要目标,所有课程都是根据这个目标而设立的。在教学内容上除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外,都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作为主要课程,一切为战争服务。

抗日战争是一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青年人思想敏感,爱国心强,只要在教学中讲清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和侵略中国的历史过程,讲清爱国报国的问题,就会点燃起蕴藏在他们心中的爱国火焰。再加上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容易激

^①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35、3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6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发他们的民族精神和阶级觉悟,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不惜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投入抗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学校的教育也容易收到很好的效果。各校的青年学生仅仅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教育,就使他们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和改造,愉快地走上各种战斗岗位,在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的在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则经过抗日战争考验成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领导骨干。所以,人们称华中解放区的干部学校为“华中抗日熔炉”。

华中解放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通过各类干部学校的培训教育,培养的各类干部总数达二十几万人之多(不包括地方上不脱离生产的干部),这在华中地区是空前的,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全国各解放区培训的干部如果加在一起就更为可观。中国自有史以来,像这样大规模地集中精力在广大人民中、干部中普遍进行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抗战教育和阶级教育,在战火中培训大量干部,还是第一次,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 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继承抗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和科学的教学方法。

毛泽东同志为抗大规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为干部学校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为抗大所规定的教学方针、原则和校风也是全国解放区所有干部学校都必须贯彻执行的,华中解放区各抗大分校和其他地方干部学校也是根据学校的特点,学习抗大的办学经验,按照抗大的教学方针、原则和方法进行教学的。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学校坚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在教学中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实际、学员的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善于针对学员的思想状况和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纠正他们错误的思想观点,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善于运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的历史经验来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善于启发诱导学员整理总结自身的战斗和工作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又引用实际经验来证明理论。并组织学员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根据地建设的新情况新经验以加深对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贯穿于学校的一切工作和一切活动之中，以提高教学效果。

“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学员的思想觉悟，纠正他们的错误观点，实现思想上的根本转变。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就是从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出发，针对他们存在的思想认识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和方法进行分析、阐述，以达到提高学员思想认识水平、转变思想的目的。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学校在教学方法上，按照中央提出的实行启发式的、研究式的、实验式的方法，坚决废止注入式的、强迫的、空洞的方法。教学是一种艺术，教学过程是创造的过程。教学不是创造人类尚未获得的知识，而是把已经获得的知识，如何变为学生自己的知识，包括记忆、理解和应用。教员要很好地完成这个转变过程，不仅需要掌握丰富的知识，而且要研究掌握科学的教学方法。启发式的、研究式的、实验式的教学方法，就是这种科学的教学方法。

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的干部切实履行一心为学员，处处做表率的原则，以学员的喜悦为喜悦，以学员的忧虑为忧虑，以学员的进步为进步，一切工作从学员出发，替学员打算，既言传，又身教，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做学员的表率。学员也把他们看作可敬可亲的兄长和启蒙老师，思想政治工作容易收到很好的效果。

4. 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是在战争环境下坚持办学，过着极其艰苦的战斗生活。

华中解放区处在敌后的游击环境中，特别是处在日伪心脏的

南京周围地区,日伪军经常派重兵对解放区进行“扫荡”、“清乡”。解放区的环境十分恶劣,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学校没有固定的地址和校舍,学员分散住在群众家里,经常进行转移,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但是在华中地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个干部学校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办学。没有校舍,就分散住在群众家里。没有教室,就利用祠堂庙宇或在野外树荫下上课。为了改善师生伙食,自己动手开荒种菜,捕鱼养猪;为了解决教材,自己开办土作坊、印刷厂,编写出版有关教材和书籍。

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下,为了避开敌人的“清乡”、“扫荡”,经常进行长途转移。有时在转移途中还遭遇日伪军的袭击,受到重大损失,一些师生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抗大总分校和九分校以及华中鲁艺分院都曾在日伪军的“扫荡”中,有不少师生献出了宝贵生命。就是在这种极其艰苦复杂的战斗环境中,华中解放区的各类干部学校仍然坚持办学,培训了大批干部,取得了很大成就。

华中解放区在极其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干部学校的广大师生仍然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积极向上的情绪。物质生活虽然艰苦,精神生活却是愉快、充实的。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而努力学习。

艰苦的战争环境,也能更好地锻炼人、考验人。学员们既经受战争环境的洗礼,又经受艰苦生活的磨炼,再加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思想进步很快,在较短的时间内锻炼成为既有较高思想觉悟,又有实际本领的抗日战士。

5.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体系。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是白手起家的,是随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扩大,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少到多,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以至发展成为覆盖全解放区的门类齐全,形式多样,专业各异的干

部教育体系。为培养革命干部,扩大革命队伍,增强革命力量,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不是零星的、局部的,残缺不全的干部教育,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全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体系,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党建等各个领域。

在军事干部教育方面,在军部有军部创办和领导的抗大总分校;在师部有各师创办和领导的抗大分校;在旅团则有教导队和随营学校。已经形成了由上而下的军事教学工作的指导系统。

在地方干部教育方面,有大学、公学、学院和各类专科学校,形成了包括行政、文教、卫生、理、工、财、农等各科门类比较齐全的地方干部教育体系。

在党的干部教育方面,有华中局党校、华中工委党校,在各区党委有区党委党校和地委党校,以及各种党训班,初步形成了党校教育体系。

在普通教育方面,有各地开办的中学、师范以及高级小学,都担负着培养干部的任务,形成了普通教育培训干部的教育体系。

在职干部教育方面,地方党政部门和军队领导机关都开办了机关业余学校和不定期的短期训练班,定期不定期的组织在职干部进行学习和培训,基本上形成了在职干部教育体系。

由此可见,在华中解放区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区的门类齐全,形式多样干部教育体系。从而使所有干部都有机会参加学习,接受教育,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政策水平,改进工作作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历史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以其成熟的指导思想、完整的教育体系、宏观的规模和丰硕的成果,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事

业的极其重要的历史篇章,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则是这历史篇章中的光辉一页。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虽然只是中国解放区干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它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组织部分。它创办的干部学校和培养的干部之多,作用之大,在全国解放区都是名列前茅的。在华中解放区创办的干部学校像一座座革命熔炉屹立在大江南北解放区的土地上,为抗日、为革命培养输送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干部,它在解放区干部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1. 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历史功绩在于培养了大批党政军民各类干部,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和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华中解放区地处日伪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周围地区,是日伪顽的必争之地,斗争十分激烈。在这样的敌后地区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大量培训干部,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抗日战争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全民战争,必须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而要发动人民群众,必须依靠有一定数量的思想觉悟高、工作作风好的干部队伍进行宣传、发动和组织,并带领群众前进。没有一定数量的干部去宣传和组织群众,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可能在广大群众中传播,不可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去进行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自身的解放。我们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但是人民群众需要具有较高政治水平和思想觉悟的干部去宣传、发动和组织。没有干部去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去进行自身解放的斗争,那只能是一句空话。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抓住了干部培养教育,就是抓住了革命链条中的决定性环节,整个革命工作就带动起来了。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哪个地方的党组织

重视和加强干部的培养教育,那个地方的工作就会发展,局面就会打开。反之,哪个地方的党组织如果忽视了对干部的培养教育,那个地方的工作就会停滞,工作就难以开展,甚至会造成重大损失。

华中解放区是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陈毅领导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经过艰巨复杂的斗争建立起来的。在建立和发展华中解放区的过程中,刘少奇、陈毅紧紧地抓住培养干部这个决定性环节,大力开办各类干部学校,大量培训各个方面的干部。从1938年新四军建军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近12年间,华中地区培训了二十几万名干部,对于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批人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许多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和领导者。比如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中央人民政府矿业部长朱训就是从华中建设大学培养出去的;曾任安徽省委书记和甘肃省委书记的黄璜就是从华中公学培养出去的;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的周克玉就是从射阳中学培养出去的;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副部长的王文哲就是从一联中培养出去的;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张怀西和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周汉荣就是从苏南公学培养出去的;著名作家陆文夫和音乐指挥家司徒汉就是从华中大学培养出去的,等等。由此可见,华中解放区的干部学校教育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和建设人才,在中国革命史和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了特殊的功勋。

2.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史,在中国解放区干部教育史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干部教育,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它与历史上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教育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在严酷的战争条件下进行干部教育的,培养了大批具有高

昂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抗日干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三种性质不同的教育:一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的是法西斯教育;二是在日伪统治区实行的是奴化教育;三是在中国敌后解放区实行的是以抗日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它与国民党统治区和日伪统治区的教育有着根本的区别。解放区的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结合解放区的实际情况,从制度、内容、方法上对旧教育进行了彻底改造,使之适合抗战的需要,从而造成一个与伟大的抗战运动相配合的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以培养抗日干部为重点,带动解放区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华中解放区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干部教育事业,是在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的方针下,在教育必须为战争服务,为生产服务,以及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原则指导下发展的,它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此可见,中国解放区的教育,特别是干部教育,是一种真正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为目的的教育,它真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中国解放区包括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坚持在战争环境下办学,在战火中培训干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以至世界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3.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既继承了延安地区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又在刘少奇、陈毅领导下创造了许多新经验,对加强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重视党的干部教育,加强党的建设,是党的优良传统。党的干部教育的重要地位,要提高到党的建设的重要地位上来认识。党的历史表明,要使党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成为政

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很成熟的党,必须加强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建设。而对党的各级干部进行培训教育,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觉悟和党性,改进工作作风,就是加强党的建设的行之有效的根本措施,是建设党和巩固党的重要步骤。对于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党的建设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既继承了苏区、延安地区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和干部教育经验,又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有所创新和发展。刘少奇、陈毅在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的干部教育理论,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干部教育思想,丰富了党的干部教育思想的宝库。特别是在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环境十分恶劣,经常处于敌伪顽的“清乡”、“扫荡”的战争环境中,创办了大批各种类型的干部学校,在战火中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德才兼备的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干部条件,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所创造的经验,也给党的干部教育和党的建设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4. 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探索干部教育规律,改革干部教育方法,提高干部教育质量和水平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教育是一门科学,干部教育是这门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干部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涉及到许多方面。研究、探讨干部教育理论,提高干部教育水平,既要从现实的干部教育实际出发,又要吸取和借鉴历史上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和经验。既要从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几十年干部教育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又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干部教育实践中寻找现实的依据。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的干部教育实践中研究探索干部教育的规律性,寻找干部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方法,把党的干部教育提高到一个新

水平。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是中国解放区干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刘少奇、陈毅的领导下,在继承党的干部教育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又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有许多新的创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干部教育的改革和创新,探索干部教育的规律性,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平,提供了一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有益的资料,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我们今天总结干部教育的经验,研究干部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干部教育改革发展的思路和方法,固然应以研究当今干部教育为重点,但决不能忘记或忽视中国解放区干部教育带有普遍性的历史经验,从中研究发现干部教育的规律性,使其对当今干部教育改革起借鉴作用。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也是和有一批道德高尚、学有专长、无私奉献的专家学者热心干部教育,不断总结干部教育经验,创新干部教育理论和方法分不开的。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薛暮桥和夏征农同志。他们从1938年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起,在华中解放区从事干部教育工作的时间很长。他们在长期的干部教育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创新干部教育理论、改进干部教育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对指导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起了重要作用。

薛暮桥,1904年生于江苏无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皖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教导总队任政治文化总教员、训练处长,负责教导总队的教学工作。抗大五分校在盐城成立后,又任抗大五分校的训练部部长,负责教学工作。他在长期的干部教育工作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教学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军队干部教育理论。他在总结干部教育经验的基础上1939年就写了《关于创造新干部的教育工作》,1942年又写了《抗大政治文化教育报告》。

在这两篇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军队干部教育的新观点新方法。特别是在1987年又和洪学智同志共同撰写了《华中抗日革命熔炉》一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从新四军教导总队到华中抗大分校在抗日战争中的办学经验,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对于今天的干部教育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夏征农,江西丰城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8年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任统战部副部长兼民运部长,常到新四军教导总队讲课。1943年起,任苏中公学教育长、校长。1946年春任华中建设大学副校长,对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不断进行探索,总结教学经验。在苏中公学撰写了《谈苏中公学的教育方针》,在华中建设大学撰写了关于干部教育的长篇文章《思想教育一例》,是对华中建大干部教育的总结。(曾由大连大众书店出版过单行本,解放后由三联书店再版。)他在为《苏中公学校史》和《华中建设大学校史》写的序言中,提出许多关于干部教育的独到见解,对今天的干部教育仍有指导意义。

薛暮桥和夏征农这两位百岁老人,对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事业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忠诚党的干部教育事业的老前辈,是卓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教育家。

主要参考文献

- 《毛泽东选集》(1—4卷)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 《刘少奇选集》上、下卷 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9年版
- 《新四军军部在盐城》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 《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 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 《陈毅在盐城》 解放军出版社 2001年版
- 《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1年版
- 《中国共产党建设史》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
- 洪学智、薛暮桥:《华中抗日革命熔炉》 华夏出版社 1987年版
- 张腾霄:《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 张腾霄编:《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丛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版
- 李桂林主编:《中国教育史》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 《老解放区教育工作回忆录》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 戴伯韬:《解放战争初期苏皖边区教育》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2年版
- 陈凤楼:《中国共产党干部工作史纲》 党建教育出版社 2003年版
- 吴林根、石作斌:《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研究》 黑龙江出版社 2001年版

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三卷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华中抗日斗争回忆》(一至十) 百家出版社(1984—1985)

《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史料选》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管文蔚传》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盐城人民革命斗争史》 北京出版社 1991 年版

《江苏淮南人民革命斗争史》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 年版

徐以达:《烽火人生路》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 年版

此外,还参考了内部出版的部分干部学校校史和有关资料。

后 记

华中解放区的干部教育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全国解放区干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1938年初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创办教导队起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近12年中,在华中解放区先后创办了几十所各类干部学校,培养了20多万名各类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干部教育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干部教育遗产。

撰写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是许多在华中解放区从事过干部教育工作的老同志的夙愿。我曾在华中公学、华中大学、苏南公学等干部学校学习、工作过,对干部学校有一定的感情,也想把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的历史如实地写出来。20世纪80年代,原华中解放区许多干部学校的校友,先后举行纪念建校50周年活动,有些学校还出版了校史和回忆录,这为编写《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

1986年6月,曾兼任华中大学校长的管文蔚同志和在华中解放区从事过干部教育工作的老同志在南京江苏省委党校召开编写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校史座谈会,要求分工编写部分干部学校的校史,笔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分工编写华中大学校史,并曾内部出版《江苏省九所革命干部学校简史》。在此以后,我注意搜集华中解放区干部学校的历史资料,在多年搜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了这部《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华中解放区的干部学校数量很多,分布很广,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全,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

免,尚希从事过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和在干部学校学习过的老同志以及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本书初稿写成后,我冒昧地送给著名的理论家、干部教育家、百岁老人夏征农同志审阅。夏老在炎热的夏天,审阅本书初稿后,特地为本书撰写了序言和题写了书名,使我万分感动,不胜惶恐之至。

本书的出版得到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支持和推荐,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组织专家评审后,把它列入2005年下半年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给予全额资助出版。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许多老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如鲍汗青、冒进、张子嘉、张锴、陈克良、李益三、吴钦、华平、潘祝平、倪士干、曹晋杰、陈肇彦等同志,他们或提供资料,或提出建议。盐城市委党史办公室和新四军纪念馆也为本书写作提供了部分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作 者

2005年12月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华中解放区干部教育史

作者 =

页数 = 381

SS号 = 0

出版日期 =

V s s 号 = 64034037